



欧洲雇佣兵研究

(1350-1800年)

许二斌 著



185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欧洲雇佣兵研究

(1350-1800年)

许二斌 著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雇佣兵研究：1350—1800年 / 许二斌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4

ISBN 978-7-100-23431-3

I. ①欧… II. ①许… III. ①雇佣军—研究—欧洲 IV. ①E15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4) 第 04500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欧洲雇佣兵研究 (1350—1800年)

许二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3431-3

2024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2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8

定价：65.00 元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问题研究(1350—1800)”
(项目编号: 14BSS045) 最终成果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雇佣兵在欧洲重新兴起的历史背景	7
一、古典时代雇佣兵在欧洲的兴盛	9
二、中世纪封建式军队的主导地位及其缺陷	13
三、中世纪中期欧洲的雇佣兵	14
第二章 百年战争期间法国领土上的自由军团	21
一、自由军团的形成	24
二、自由军团的收入来源、成员构成与组织结构	30
三、自由军团的威胁及教俗权威的应对措施	34
四、自由军团的没落	38
五、自由军团的本质及历史意义	41
第三章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的雇佣兵	43
一、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雇佣兵的兴起	46
二、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运作模式的变化	49
三、雇佣兵的出身、组织结构、首领与追随者的关系	61
四、雇佣兵都是“无用”和“不忠”的吗？	65

第四章 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承包人	83
一、什么是军事承包人	85
二、军事承包人在欧洲的兴衰过程	87
三、军事承包人的工作与生意	89
四、军事承包人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95
第五章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的德意志长矛兵	99
一、德意志长矛兵的兴起	101
二、德意志长矛兵的招募与薪酬	107
三、德意志长矛兵的军官、士官及其职责	110
四、德意志长矛兵的内部司法	114
五、对德意志长矛兵首领的个案研究	117
第六章 1567—1649 年苏格兰的海外从军现象	131
一、苏格兰海外从军现象的历史背景	135
二、苏格兰当局的政策	138
三、海外从军者的动机	153
四、海外从军现象的影响	160
第七章 15 世纪晚期至 18 世纪末的瑞士雇佣兵	165
一、瑞士雇佣兵的起源	168
二、瑞士雇佣兵的招募与管理	184
三、瑞士当局与雇佣兵使用者的关系	192
四、瑞士雇佣兵的忠诚性问题	200
五、瑞士雇佣兵的没落	205

第八章 1677—1815 年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事业·····	209
一、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212
二、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招募·····	216
三、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输出·····	219
四、雇佣兵事业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响·····	224
第九章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	231
一、英国与德意志邦国的协议·····	234
二、对士兵和军官的个案研究·····	245
三、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性质·····	256
四、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影响·····	261
结 语·····	268
附录一 白色军团与蒙特费拉特侯爵的协议·····	277
附录二 瑞士雇佣兵合同·····	281
附录三 为尼古拉斯·厄米上校统率的瑞士雇佣兵团 制订的誓言·····	284
附录四 英国与黑森-卡塞尔邦伯的条约·····	287
附录五 英国与布伦瑞克公爵的条约·····	292
参考文献·····	297

引 言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被一些学者称作欧洲的转型时期或过渡时期（1350—1800年）。^①在这段时期，欧洲社会各领域都经历了

^① 国内外学界通常把欧洲历史上的14—15世纪称作中世纪晚期，将16—18世纪称作近代早期。尽管把公元1500年前后视为历史分界点的观念在史学界颇受认可，但反映近代早期与中世纪晚期之间历史连续性的事实同样有很多，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未必少于断裂性。鉴于雇佣兵盛行这一持续的现象，本书将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视为一个连续的历史时期，并采用时下流行的“转型时期”这一称谓。国内学者所称的“转型”或“过渡”对应的英文是“transition”（学者们常常在同一论著中交替使用“转型”与“过渡”这两个词）。由于侧重点不同，学者们对“转型”或“过渡”的内涵有多种不同描述，例如：从中古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朱孝远）；从传统农业世界转向现代工业世界（侯建新）；从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化，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刘景华）；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张广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王勤榕）；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梁民慷、顾兴斌）；等等。参见朱孝远《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刘景华《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张广智《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王勤榕《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婚姻形态的若干变化》，《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梁民慷、顾兴斌《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及价值取向研究》，（转下页）

剧烈的变化。可能正是由于社会转型引起的阵痛，这一时段欧洲
的战争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频繁。在这些异常频繁的战争
中，欧洲各国所仰赖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既不是封建式军队，
也不是民兵，更不是现代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国民义务兵，而是
雇佣兵。雇佣兵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而且使
用雇佣兵的现象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未完全根绝。历史上各个时
代、各个地区几乎都发生过招募和使用雇佣兵的情况。然而，像
转型时期欧洲各国那样，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内以雇佣兵为最重
要的武装力量，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一
时期称作欧洲军事史上的“雇佣兵时代”。

对雇佣兵这样一种跨越时代、跨越文化的历史现象下定义是
非常棘手的难题。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语境下，人们使用“雇
佣兵”这个名词时所要表达的含义可能是极不相同的。从词源学上
讲，“雇佣兵”（mercenary）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mercennarius”。但
直到中世纪早期，这个词汇还不具有“雇佣兵”的含义。在古典拉
丁语和中世纪早期拉丁语中，“mercennarius”一词的意思就是“雇佣
劳动者”，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农业雇工、雇佣工匠或雇佣仆人。^①

（接上页）《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关于欧洲转型时期的下限，较为一致的意见是18世纪末。关于转型时期的上限，不同学者的看法差异极大：晚至16世纪初（王勤榕），早至14世纪中期（朱孝远）。有的国外学者甚至将转型时期的上限推至13世纪，参见侯建新《关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① John France, ed., *Mercenaries and Paid Men: The Mercenary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8, p. 144.

迄今为止，研究者对“雇佣兵”提出过许多种定义，但没有一种定义被公认是无懈可击的。本书采用菲利普·孔塔米纳等学者主张的定义：“雇佣兵指的是一种类型的职业军人，其行为的首要动机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个政治实体，而是出于他个人对获利的渴望。”^①

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有大量涉及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的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都是针对一个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雇佣兵的考察，其中有些是对雇佣兵群体或个人的传记性研究，有些是偏向理论性的探讨。^②这些成果虽然对相关具体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但很少把转型时期欧洲的雇佣兵看作一个整体，进而思考这一时期欧洲雇佣兵盛行的现象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现有研究对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问题的独特性关注不够。从考察的时间范围来讲，弗里茨·雷德里希、安东尼·莫克勒与迈克尔·李·兰宁等人的著作，是少有的跨越整个转型时期的雇佣兵问题专题研究。弗里茨·雷德里希的《德意志军事企业家及其员工：一项欧洲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对德意志军事承包人发展史——从萌芽到成熟（1350—1600年）、鼎盛（1600—1650年）、走向衰亡（1650—1800年）——进行了连贯叙述。^③安东尼·莫克勒的《雇佣兵》以及迈克尔·李·兰宁的《雇佣兵：从古希腊雇佣

① 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Michael Jo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4, p. 99.

② 具体成果参见本书第二章至第九章关于各特定雇佣兵群体的研究综述。

③ 参见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4, 1965。

兵到今天的私人军事公司》则选取从古至今比较经典的一些雇佣兵案例进行探讨，尽管不是一种连贯性的历史叙述，但把这些案例联系起来还是可以勾勒出雇佣兵发展史的大致脉络。^①

为了从宏观视角思考转型时期欧洲的雇佣兵问题，本书将考察的时间范围设定为14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地域范围设定为整个欧洲。对如此大范围的雇佣兵的历史进行完整、连贯的叙述需要一部鸿篇巨制来完成，但本书并不打算采取那样的方式，而是要像莫克勒和兰宁那样通过刻画一些重要的“点”来勾勒雇佣兵发展史的“线”。本书讨论的雇佣兵案例有些是与莫克勒或兰宁的案例重叠的，有些是不同的。本书与他们的著作最大的差别是，在讨论这些案例的过程中更侧重于雇佣兵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讨论雇佣兵问题。

本书第一章是一个介绍历史背景的序章，将简要叙述雇佣兵在欧洲古典时代的兴盛、在中世纪早期的沉寂，及其在中世纪中期逐渐走向活跃的历史。

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雇佣兵当中，最重要的两种角色是自由军团和意大利雇佣兵队长。虽然自由军团在研究中世纪晚期的文献中经常被提及，但国内外学界对自由军团的认知基本上还处于含混不清的状态。第二章将通过梳理自由军团的诞生过程、组织结构、活动特点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揭示其本质特征与历史意义。

^① 参见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London: MacDonald and Company Ltd., 1970; Michael Lee Lanning, *Mercenaries: Soldiers of Fortune,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oday'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5。

第三章专门研究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的雇佣兵，讨论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成为雇佣兵天堂的原因，意大利战场上雇佣兵主角的变化，意大利雇佣兵的出身背景、家族的作用、组织结构、首领与追随者的关系、雇佣兵的共同体意识等问题，还将对马基雅维里提出的所谓雇佣兵“无用”与“不忠”的观点进行辨析。

在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发展史上，军事承包人曾是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雇佣兵组织者和领导者。第四章将从军事承包人的概念、兴衰过程、工作与生意模式及其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等方面，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承包人进行考察。

德意志长矛兵（Landsknecht）是15世纪末与16世纪欧洲非常活跃的一种雇佣兵。第五章将考察德意志长矛兵的创建过程及其成为欧洲雇佣兵市场上重要角色的原因，还将从招募制度、组织结构、薪酬标准等方面探讨德意志长矛兵的军营生活，并将对两个典型的德意志长矛兵首领进行个案研究。

苏格兰也是近代早期欧洲十分重要的一个雇佣兵来源地。第六章将从苏格兰出现海外从军潮的社会背景、苏格兰当局对海外从军现象的政策、海外从军者的动机，以及海外从军现象的影响等方面，对詹姆斯六世与查理一世在位期间苏格兰人到海外充当雇佣兵的现象展开系统研究。

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雇佣兵当中，瑞士雇佣兵享有首屈一指的名声。第七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15世纪晚期至18世纪末的瑞士雇佣兵：瑞士成为著名的雇佣兵来源地的过程，瑞士雇佣兵的组织管理机制，瑞士当局与雇佣兵使用者的关系，瑞士雇佣兵最后走向衰落和终结的原因，等等。

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是德意志境内一个较小的邦国，然而它是18世纪欧洲最著名的雇佣兵输出地之一。第八章将考察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的形成原因、发展历程、招募机制、效力对象，并探讨雇佣兵事业对黑森-卡塞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雇佣兵是欧洲雇佣兵被使用在欧洲以外的最重要的案例，也是一国政府向外国出租部队这种雇佣兵类型的典型案例。第九章将对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进行深入考察，并将在欧洲雇佣兵由盛转衰的问题上提出新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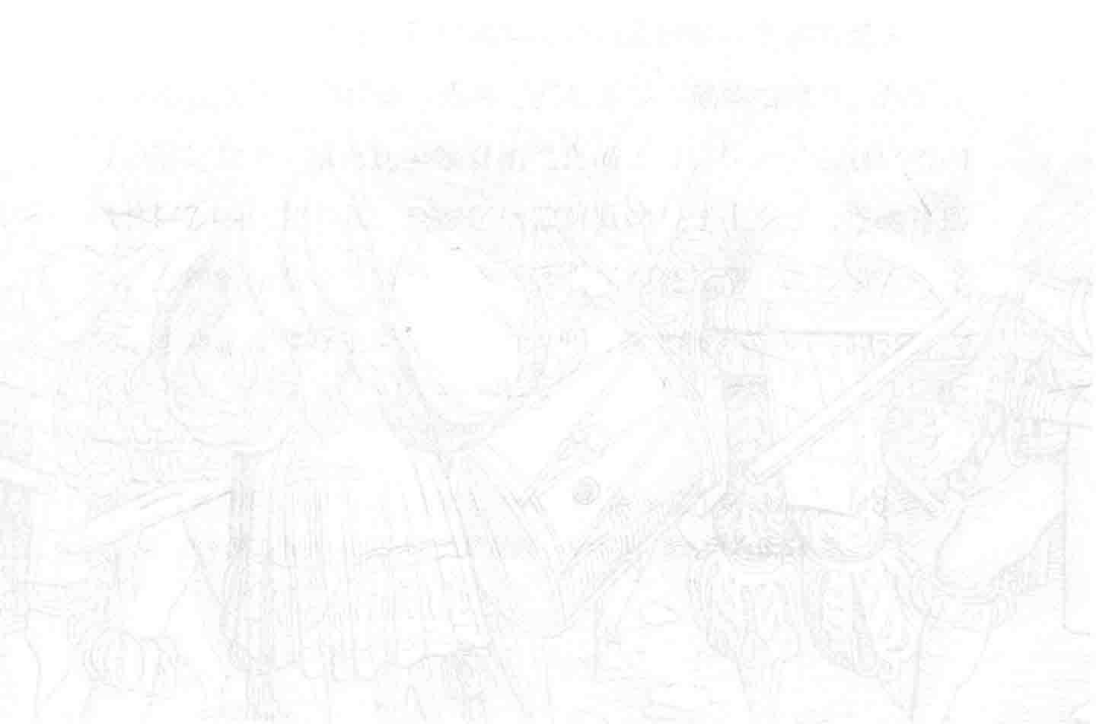
通过具体案例勾勒出欧洲雇佣兵发展史的大致脉络以后，结语部分将从宏观视角探讨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从兴起到衰落的深层原因，总结转型时期欧洲著名雇佣兵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特征，归纳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的主要类型，并讨论雇佣兵在转型时期欧洲社会变革中的影响。



雇佣兵在欧洲

重新兴起的

历史背景



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在古典时代欧洲就有大量雇佣兵活动，可以说那是一个雇佣兵兴盛的时代。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出现过一段雇佣兵沉寂的时间。本章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简要论述古典时代雇佣兵在欧洲的盛况，分析中世纪早期雇佣兵在欧洲沉寂的原因，并讨论中世纪中期雇佣兵在欧洲再度活跃的情况及其深层原因，希望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后面的章节。

一、古典时代雇佣兵在欧洲的兴盛

“当他本可无忧无虑地享受和平时，他却选择战争；当他本可安闲生活时，他却宁要劳苦，只要是战争的话；当他本可安全保有他的金钱时，他却愿作战来消耗它。”^①这里所描述的不是某位穷兵黩武的君主，而是古希腊城邦拉西第蒙的居民克利尔库斯。此人早年参加了拉西第蒙与雅典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在他的极力游说之下，斯巴达监察官派他出海去攻打住在科尔索尼斯和佩林图斯的色雷斯人。当斯巴达监察官改变了主意，想把他召回时，他却拒绝服从，因而被斯巴达当局判处死刑。逃亡在外的克利尔库斯来见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小居鲁士给了他1万达利克。^②

① [古希腊]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9页。

② 达利克(daric)是波斯帝国使用的一种金币，含金量约值5.4美金。

收到这笔钱后他并不去追求过闲散舒适的生活，而是用它征集了一支军队，去攻打、劫掠色雷斯人。直到有一天，小居鲁士发出召唤，他便带着这支队伍参加了小居鲁士试图从其兄阿尔塔薛西斯手中夺取王位的战争。克利尔库斯是小居鲁士雇佣的1万多名希腊士兵中的一员。小居鲁士死后，他成为这群被困于波斯境内的希腊雇佣兵的事实上的首领，后在谈判中被波斯人诱捕，遂遭杀害。色诺芬以亲历者的身份对这1万多名雇佣兵的详实记述，是我们了解古希腊时期雇佣兵的珍贵资料。在比色诺芬更早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以及比色诺芬稍晚的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等史家的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雇佣兵的记载。

希罗多德记述了雅典僭主佩西斯塔拉托斯借助雇佣兵夺回雅典统治权，以及希腊雇佣兵帮助埃及法老普撒美提科斯（公元前664—前610年在位）统一埃及的事迹。^①修昔底德也多次提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的雇佣兵。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及其子征服者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在对外扩张中都使用了大量雇佣兵。由于马其顿经济上的贫困落后，菲利普二世即位初期可能并没有财力使用雇佣兵。但在公元前356年占领克莱尼达斯（Crenidas）以后，菲利普设法对那里的金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用很短时间便集聚了丰厚的资金，并凭借这些财富使他的王国取得前所未有的威望和荣耀。他利用手中的金钱招募到大量雇

^①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9、179页。

佣兵，并诱使许多希腊人背叛自己的国家。由于流传下来的古典文献缺乏记载，我们对菲利普二世使用雇佣兵的确切数量并不清楚，但亚历山大使用雇佣兵的情况在古典文献中有详尽的记载。狄奥多罗斯对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率领越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军有如下记载：总数 3 万人的步兵中有 1.3 万或 1.2 万人来自马其顿，来自希腊盟邦的援军有 7 000 人，其余 1.1 万人均为雇佣兵；总数 5 100 人的骑兵中只有 1 800 人来自马其顿。^①由此可见，在亚历山大东征率领的部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雇佣兵。

罗马自建城至公元前 1 世纪的对外征服凭借的是由自耕农组成的罗马军团。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大，这种亦兵亦农的业余军队逐渐不能满足需要。经过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的改革，罗马军团变成了由来自各阶层的罗马公民组成的职业化军队。这一转变缓解了罗马的兵源危机，但同时埋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后来几个世纪的事实表明，这些职业化的士兵很容易将他们对国家的效忠转变为对统帅个人的效忠。当战事结束，大批士兵从军团复员时，他们不像其先辈那样可以回到自耕农的生活状态，而是直接面临失业和贫困。联结军团士兵之间的纽带不再是共同的农村生活背景以及保家卫国的热情，而变成单纯的一份工作。这一体制合乎逻辑的发展便是历史学家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描述的那一幕：193 年罗马皇帝佩蒂纳克斯（Pertinax）死后，整个帝国就像在拍卖行那样被那些杀死皇帝的士兵拍卖掉了。两名竞

^① Siculus Diodorus, *The Historical Library of Diodorus the Sicilian in Fifteen Books*, translated by G. Booth, London: W. Taylor, 1721, pp. 481, 528.

买者萨尔皮西阿努斯（Sulpicianus）和尤利阿努斯（Julianus）的出价一路抬高到每名士兵2万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名称）。最后，“尤里阿努斯不再每次少量地抬高他的出价，而是一次提高了5000塞斯特斯，他大声喊出，并用手指比画出那个数目”^①。于是士兵们接受了尤里阿努斯，并宣布他为新的皇帝。这些士兵的行为与一千多年以后马基雅维里所谴责的那些谁出价高就为谁效力的雇佣兵何其相似！罗马帝国后期职业化的军团士兵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雇佣兵，但其本质上已具备雇佣兵的一些特征。《剑桥战争史》第三章的作者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将他们称为“被雇佣的军队”（Hired Armies）^②，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典时代是雇佣兵在欧洲活跃、兴盛的一个时期。^③尤其是在希腊化时代，雇佣兵在军队中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古希腊城邦将自耕农编入方阵的作战方式培养了非常优秀的士兵。部分自耕农的经济状况恶化或破产使他们成为潜在的雇佣兵。由于希腊各城邦政府缺乏使用雇佣兵的资金——就连比较富裕的雅典，使用雇佣兵时都需要城邦将军们轮流承担付给雇佣兵的费用^④——，希腊雇佣兵主要效力于波斯、埃及这些东方国家的

① Geoffrey Park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5.

② *Ibid.*, p. 52.

③ 马修·特兰德尔认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均受到雇佣兵的影响。Matthew Trundle, *Greek Mercenaries: From the Late Archaic Period to Alexander*, Abingdon: Routledge, 2004, p. 167.

④ G. T. Griffith, *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3.

君主或者希腊城邦的僭主^①，到后来则效力于马其顿的菲利普二世和亚历山大。

二、中世纪封建式军队的主导地位及其缺陷

在中世纪早期的五个多世纪（5世纪后期至10世纪末），雇佣兵在欧洲虽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但仅有偶尔、零星的活动。原因在于继承罗马帝国西部的那些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不仅经济上贫困落后，而且缺乏有效的行政和税收体系，因而也缺乏使用雇佣兵所需要的资金。东欧的拜占庭帝国在中世纪早期没有大量使用雇佣兵则是由于完全相反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个帝国延续了古罗马的经济、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机制与传统；经济上的相对富裕和有效的行政、税收体系保障了帝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源，因而经过改进的罗马式步兵仍是防卫帝国的有效工具。

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在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武装类型是以封建方式组织起来的骑士队伍。所谓封建方式，核心意涵是指封君授予封臣一块土地（采邑），作为交换条件，当封君发出召唤时，封臣要自备马匹和武器装备以骑士的身份为封君服军役。这种组织军队的方式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首先，尽管在理论上封建土地占有者都应当是举行过册封仪式的骑士，可是现

^① 僭主通常是拥有一定私人财富的人，而且他可以通过没收政敌财产的手段扩大自己的财富。

实中当一名骑士过世时其继承人很可能尚在幼年，或者该骑士仅有女性继承人。这种情况下，采邑继承人是不能履行封君所期望的军事义务的。其次，骑士每年为封君服军役的义务有一个固定的天数，其中最通行的惯例是40天，在这40天内封君无需额外支付报酬给骑士，但40天过后骑士们便有权解散回家。此外，封臣为封君服军役的义务可能还存在地域范围的限制。12、13世纪里昂、阿拉贡、普罗旺斯、匈牙利等地的多份文献表明，除了每年40天的时间限制以外，骑士们还有权拒绝到其国王的领地以外服役。^①

很显然，对于追求军事荣耀和对外征服的君主而言，封建式军队并不是理想的工具。封建式军队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其实是因为中世纪早期西欧各国缺乏有效的行政官僚和税收体系，因而缺乏发展其他类型军队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一旦条件具备，西欧的君主们便尝试用其他方式组织军队，起初作为封建方式的补充，后来逐渐打破封建军队的主导地位。

三、中世纪中期欧洲的雇佣兵

11世纪以后，欧洲关于雇佣兵的记载逐渐增多起来。中世纪中期长子继承制逐渐确立以后，长子以外的贵族子弟丧失了继承土地的权利。对这些从小接受军事训练、以战争为荣耀的年轻人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 25.

而言，除充当雇佣兵以外，似乎也没有太多可选择的谋生出路。剩下的问题便是有没有能够付得起报酬的雇主使用他们。

这一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雇佣兵使用者是拜占庭帝国：一方面是由于它拥有相对富裕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卷入了太多的战争，不得不使用雇佣兵作为帝国军队的补充。

在拜占庭帝国使用的雇佣兵中，最出名的是瓦兰吉亚卫队 (Varangian Guard)，其名称源自于建立初期的主要成分——瓦兰吉亚人。^① 为了便于保卫皇帝及皇室成员，瓦兰吉亚卫队的兵营就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除非发生叛乱或有外敌入侵，这支部队很少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驻守帝国心脏的一支雇佣兵的指挥官，瓦兰吉亚卫队统帅在帝国政治纷争的关键时刻甚至能够决定皇帝的废立。挪威人哈拉尔德·哈德拉达 (Harald Hardrada, 1015—1066年) 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哈拉尔德·哈德拉达是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 (1015—1028年在位) 的同母异父弟弟，少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冒险精神和军事方面的潜力。1030年，15岁的哈拉尔德参加了其兄奥拉夫二世试图夺回王位的战争。在奥拉夫二世战败身死以后，哈拉尔德被迫逃亡海外。他先到了基辅罗斯，在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的军队中效力。几年后，哈拉尔德带领几百名士兵来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加入了瓦兰吉亚卫队，过了不久便升任瓦兰吉亚卫队的统帅。在拜占庭与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以及对西西里的远征中，哈拉尔德帮助拜占庭皇帝打了不少胜仗，同时

^① 瓦兰吉亚人即8—10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北欧人。

也为自己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他将获得的财物立即运往诺夫哥罗德，交由雅罗斯拉夫保管，这说明他对现任雇主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并不放心。1041年，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四世在病逝前将他的一个外甥收为养子，并确立为继承人，是为米哈伊尔五世。米哈伊尔五世继承皇位后试图独揽大权，不仅撤换了重要的廷臣，还将与他“共治”的太后佐伊（Zoe）放逐到女修院。皇帝的举措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在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哈拉尔德指挥的瓦兰吉亚卫队站在太后一方。他们推翻了米哈伊尔五世，将太后佐伊重新扶上权力宝座。一时间，哈拉尔德距帝国最高权力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一位现代学者评论说：“假如哈拉尔德的王室血统是希腊的而非挪威的，他本可以成为皇帝；或者，尽管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也可以与佐伊结婚，进而在佐伊有生之年统治这个帝国。”^① 不过，哈拉尔德向太后提出了离开拜占庭的请求。尽管这一请求遭到拒绝，他还是设法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凭借在拜占庭充当雇佣兵期间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哈拉尔德当上了挪威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发动过对丹麦和英国的战争。哈拉尔德死后，以他的事迹为蓝本的各种传说故事纷纷涌现。这些文学作品激发了一代代斯堪的纳维亚青年通过充当雇佣兵获取财富与名声的梦想。

瓦兰吉亚卫队的另一主要成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以后，大批心怀不满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收拾好能带走的一切，乘船逃亡到海外，其中许多人最终到达了拜占

^① William Urban, *Medieval Mercenaries: The Business of War*, London: Greenhill Books, 2006, p. 26.

庭。正如一位现代评论者所说：“关于东罗马人财富的传说数百年前就已流传至英格兰，所以许多逃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急切地投到拜占庭皇帝麾下充当雇佣兵。”^① 在一个名叫斯沃德（Siward）的人领导下就有 350 艘船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抵达时正值这座城市遭到塞尔柱突厥军队围攻，盎格鲁-撒克逊人立即投入战斗。他们的勇气、作战技能和献身精神给拜占庭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就被编入帝国精英部队瓦兰吉亚卫队。盎格鲁-撒克逊逃亡者的到来恰好迎合了拜占庭帝国的需求。这一时期拜占庭正在多个战场与不同的敌人作战，它在东方受到塞尔柱突厥的进攻，西方受到诺曼人的入侵，北方则有保加利亚人和佩彻涅格人的入侵。为了应付这么多的战争，拜占庭帝国似乎需要无数的士兵。实际上，拜占庭帝国在鼓动盎格鲁-撒克逊人逃亡海外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1070 年，拜占庭帝国的代理人爱奥尼亚·拉菲利斯（Ioannia Rafailis）抵达英国，其使命就是招募尽可能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在大批盎格鲁-撒克逊人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充当雇佣兵的同时，征服英国的诺曼人也在使用来自欧洲大陆的雇佣兵。在 1066 年远征英国的军队中，征服者威廉（即英王威廉一世，1066—1087 年在位）自己的封臣只占一部分，其他来自法国各地的骑士对威廉并没有封建义务，他们参加威廉的远征只因威廉承诺以征服得到的土地作为报酬。威廉一世的继承者苦于缺乏资金而难以大规模地

^① Erich B. Anderson, "Far Western Mercenaries in the East: English Varangian Guardsmen", *History Magazine* (February, 2015), p. 47.

使用雇佣兵。但在斯蒂芬（Stephen）与玛蒂尔达（Matilda）争夺王位期间（1135—1154年），雇佣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内战中作战的双方都有一种筹集资金的便利手段——没收对方支持者的财产。^①这场内战以后继位的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通过创设盾牌钱（scutage）制度为后世英国君主大规模使用雇佣兵铺平了道路。

所谓盾牌钱就是骑士向国王缴纳的一种税，以替代他们为国王服军役的封建义务。和平时期的盾牌钱流入国王的财库，需要时国王可以用这笔资金招募雇佣兵。这里所讲的“雇佣兵”既包含来自欧洲大陆的“外国人”，也包含英国的骑士。由于封建征兵方式固有的不足（一年服役40天、拒绝到海外服役等），向超额服务的封臣支付报酬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在封建体制内部发展起来，并最终导致一部分骑士转变为雇佣兵。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统治期间，有些小贵族带着比他们的封建义务所要求的数量更多的骑士上战场。例如，小贵族瓦尔特·德·韩特利科姆（Walter De Huntercombe）的封建义务是7名骑士的费用，但他1295年带着20名骑士出现在威尔士战场，1298年则带着18名骑士出现在苏格兰战场。^②

由于同样的原因，中世纪中期的法国也出现了支付报酬并导致一部分骑士向雇佣兵转化的情形。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

① William Urban, *Medieval Mercenaries: The Business of War*, pp. 31, 39, 41, 42.

②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 22.

年在位)每年向每名伴随他的骑士支付150里弗。^①在1231年的一场战役中,每位骑士一天能得到6苏的报酬,战斗中损失战马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这一时期在法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是被称为“劫道者”(routiers)的雇佣兵团伙。这些团伙的成员仅有少量贵族,其余主要来源于农民。由于得到报酬的机会很少,这些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团伙主要靠抢劫为生。从11世纪或者更早的年代开始,法国大封建主就在冲突中雇佣这些团伙。国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似乎也雇佣过这些团伙,1165年他承诺说要避免这样做。^②

早在11世纪以前,意大利的世俗领主和同样参与地区政治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们就开始使用雇佣兵。当意大利城市摆脱领主或主教的统治,取得独立地位以后,它们需要武装力量来保卫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11—12世纪在地中海贸易中富裕起来的意大利城市,比领主或主教们更有能力负担雇佣兵的费用。在意大利的雇佣兵使用者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便是罗马教皇。教皇不仅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精神权威,而且在意大利拥有广大的领土,因而在地区政治事务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159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一世

① 里弗(livre)不仅是法国古时的重量单位(约合490克),也是货币单位(约相当于490克白银的价值)。货币换算关系为:1里弗等于20苏(sou),1苏等于12德尼埃(denier)。最初的埃居(écu)是金币,这种埃居称大埃居,1641年以后埃居改为用银铸币,这种埃居称为小埃居,1小埃居等于3里弗。

②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p. 25-26.

（1155—1190年在位），便招募了雇佣兵。^①

与中世纪早期的沉寂状况不同，中世纪中期雇佣兵的活动在欧洲东部和西部都活跃起来。然而，能有足够财力使用雇佣兵的君主还是少数，这一时期在西欧占主导地位的军队组织方式依旧是封建方式。

^① William Urban, *Medieval Mercenaries: The Business of War*, p. 43.



百年战争期间

法国领土上的

自由军团



百年战争堪称中世纪晚期西欧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由于战争的时断时续，在战争间歇期产生大量失业的雇佣兵，由他们聚集而成的团伙不仅对法国及其西欧邻国的乡村与城镇造成严重破坏，其军事威力甚至可以挑战世俗和教会的权威，并直接威胁教皇的安全。法语文献中一般将这些团伙称为“compagnie”（有“结伴”“群”“伙”等含义），英语文献中称为“free companion”或“free company”，有时也称为“grand company”“great company”或“great society”。汉语世界对这些团伙关注较少，一般词典中都将“free company”解释为“中世纪的雇佣兵团”，其实并不准确，实际上它们是由失业的雇佣兵组成的团伙。根据其含义似乎可以翻译为“自由伙伴”“自由团伙”或“自由军团”。本书将统一采用“自由军团”这一称谓。自由军团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值得关注的—个社会群体，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并不充分。安东尼·莫克勒分析了封建制衰落与自由军团兴起的关系，以及封建法律对自由军团的影响。^①肯尼斯·福勒以类似传记的形式对1360—1369年活动于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著名的自由军团进行了细致考察。^②菲利普·孔塔米纳、迈克尔·马利特和威廉·凯菲洛等学者则从不同侧面考察了14世纪活动于意大利的自由军团。^③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p. 25–41.

② 参见 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③ 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pp. 158–161;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Barnsley: Pen & Sword Books Ltd., 2009, pp. 25–50; William Caferro, *Mercenary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Sien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4.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自由军团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法国和意大利，西方学者对意大利领土上的自由军团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本章将集中探讨百年战争期间法国领土上的自由军团。本章首先从百年战争双方军队的构成入手，探讨自由军团的形成过程，以及自由军团成员的动机，然后考察自由军团的收入来源、成员的出身分布及其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事例论述自由军团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与挑战，以及教俗权威应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进而探讨百年战争末期查理七世如何通过军事改革清除自由军团的危害，最后分析自由军团的本质及其历史意义。

一、自由军团的形成

由于封建征兵方式内在的缺陷，也因为君主财政资源的增加，12—14世纪西欧各国王家军队组成方式中封建义务的重要性在持续下降，支付报酬的成分则不断上升。自1159年亨利二世推行盾牌钱制度以来，英国大部分骑士可以通过支付盾牌钱代替军役义务，但国王的直属封臣男爵和伯爵仍旧需要带领自己的家臣亲自为国王服军役，除非他能提出不亲自服役的正当理由并提供适当的替代者。拒绝服从召唤的直属封臣不仅需要支付盾牌钱，而且还要支付沉重的罚金。

在英国军事史上，基于封建军役制度的部队被雇佣性质的部队取代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在此期间，有的骑士选择将自

己的军役义务折合为货币，有的仍旧选择自己服役。到14世纪初，英国每名骑士一年的军役义务折合成货币的数量大体固定为2马克^①。实行军役折算制度的一大好处是，国王和大贵族们可以雇佣比普通的家臣更加训练有素的骑士来打仗。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担任的弓箭手，也在14世纪演变成为一种职业军人，他们构成了英国的雇佣性步兵。1327年，在一位名叫约翰·德·贝德福德（John de Bedford）的伦敦皮革匠带领下，一伙来自伦敦的由骑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武装人员参加了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对苏格兰的战争。第二年，这一伙人又受雇于兰卡斯特（Lancaster）的亨利，跟随他进行了挑战国王权威的武力示威，全副武装地聚集在爱德华三世的住所前。这些人既可以为国王作战，也愿意为付得起报酬的大贵族效力，已经是纯粹意义上的雇佣兵。当时的一份财务档案显示，这伙雇佣兵在效力于英王对苏格兰的战争时，重装骑士的日薪是12便士，步兵的日薪是2便士。^②

百年战争中的英国军队是由封建性质的内核加上数量庞大的雇佣兵构成的。封建性质的内核就是国王和他的直属封臣，以及直属封臣的家臣。英军当中的雇佣兵既包括来自英格兰的骑士以及弓箭手（步兵），还包括大量来自威尔士、爱尔兰及欧洲大陆的雇佣兵。1337年，当爱德华三世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时，英国议

① 马克（mark）是古代欧洲的货币计量单位，曾经通用于欧洲西部地区。

② V. B. Redstone, "Some Mercenaries of Henry of Lancaster, 1327-133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7 (1913), pp. 152-155.

会把战争持续期间对羊毛的征税提高了一倍，议会法令规定王家军队中每名骑士都将领取国王的报酬；尽管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生活费用，但可以保留战争中的战利品及战俘赎金等个人收益。在这一时期，骑士领取报酬、为获利而作战已被视为常态。^①

法国军队的情形也差不多。^②到百年战争之前，骑士以服军役换取土地占有权的制度已经衰落，只交地租免服兵役的土地占有方式成为法国的标准制度。国王只有许诺高额的报酬才能招募到军队。被高额报酬与战利品、战俘赎金等利益吸引到法王麾下的，不仅有大批本国的骑士，还有大量来自热那亚、德意志等地的雇佣兵。在克雷西战役中，法王菲利普六世（1328—1350年在位）有大约12万名骑士（包括来自外国的骑士）和0.6万名热那亚弩手，还有大约2万名步兵。^③

总之，百年战争中英法两军都是由基于封建义务服军役的贵族构成的人数较少的核心，结合大量为报酬而来的雇佣兵而成的。这一时期，基于封建义务走上战场的大贵族也从国王那里领取报酬。尽管雇佣兵在欧洲活跃起来已有几个世纪，但只有到百年战争时期，雇佣兵才取代封建方式成为西欧占主导地位的军队组成方式。在这个时代，封建军队和城乡民兵都已成为辅助雇佣兵的力量，“军事行动操纵在雇佣兵团伙手中，如果不依靠雇佣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p. 27–28.

② 关于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的招募方式，可参见 Philippe Contamine, *Guerre, é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aris: Mouton, 1972, pp. 26–64。

③ William Urban, *Medieval Mercenaries: The Business of War*, p. 91.

兵，任何国家都无法获得伟大的军事胜利，甚至无法保证国家的继续存在”。^①

在1346年的克雷西战役和1356年的普瓦提埃战役中，英军两次大胜，英国人几乎成为法国的主人，甚至法国国王让二世（Jean II，1350—1364年在位）也成了英军的俘虏。到这种地步，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1360年，双方签订《布雷蒂尼条约》，结束了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作为《布雷蒂尼条约》的重要内容，法国须向英王爱德华三世割让大量领土，并应于1361年9月29日之前移交给爱德华三世，而爱德华三世则应将英军在法国其余部分占领的领土交还法国。然而，条约的执行绝非易事，原因是待移交领土上的驻军不肯轻易撤出。由于得不到军饷或者得到的军饷不足，很多要塞的驻守部队已开始依靠勒索周围的乡村来维持生存。只有在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金钱后，他们才肯撤离所占据的要塞。驻守部队撤离前索要的这种款项在法语中的原文是“rachat”，意为“赎金”。根据《布雷蒂尼条约》，英王爱德华三世的“臣民、盟友及追随者”所占据的要塞，守军撤离时索要的赎金应由英王爱德华来承担。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雇佣兵把他们占领的要塞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即便是雇主——由于战事停止，或许应当称为前雇主了——也只能通过向他们赎买的方式让他们撤出。《布雷蒂尼条约》签订后一周内，华威伯爵同意在得到1.2万金法郎的赎金后撤出他所占据的巴黎周围的九座要塞。但这样

^① Paul Douglas Solon, "Charles VII and the Companies D'Ordonnance, 1445-1461: A Study in Medieval Reform", Ph. D.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1970, pp. 12-13.

迅速撤离的情况是少见的，有些要塞的驻守部队迟迟不肯撤出。英王委任的代表需要与各要塞驻守部队的首领逐一谈判，导致原定于1361年9月完成的领土移交工作直到1362年春才大体完成。1360年10月至1362年3月间，法国北部约50座要塞的赎金就花费了大约1431千克黄金。^①

颇费周折的领土移交工作完成后，和平条约总算得到执行，然而对于被战争严重破坏的法国而言，更严重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战事的停止使财政不堪重负的国王和饱受战争蹂躏的百姓得到了喘息机会，但对雇佣兵而言，和平的降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布雷蒂尼条约》对遣散的部队没有做任何安排。在和平条约执行过程中，只有少数要塞的驻守部队撤出后得到了被法国雇佣的机会，其余大部分雇佣兵发现自己失业了。这些失掉工作机会的士兵聚集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首领周围，形成了一个规模不等的武装团伙，肆虐于法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这些自发形成、没有雇主、自行决定行动目标和路线的武装团伙就是自由军团。^②

正如安东尼·莫克勒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军团的出现与当时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在封建制度中每个人都终身固定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这一制度剥夺了那些没有高贵出身但已证明自己是优秀战士的人的发展空间。这些人在社会上是不可能获得崇高地位的，但是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赢得荣誉，还可以通过

① 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p. 24-27.

② 在1356年法国国王让二世被俘后的混乱时期，法国领土上已出现自由军团。在《布雷蒂尼条约》签署后的领土移交过程中，这些团伙的数量迅速增加。

抢劫和索取赎金获得财富。对他们而言，和平是不可忍受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观念，雇佣兵抢劫战利品和索取战俘赎金都是正合法的行为。假设战争中有一个英国人被一个法国人俘获，被俘的英国人获得释放后拒绝支付之前承诺的赎金，俘获他的法国人可以求助于英国的法庭；即便两国正在激烈交战中，那名法国人也可以期望在英国法庭上获得支持，反之亦然。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参加的是合法战争。所谓合法战争是指由君主或至少是男爵以上的大贵族发动的战争，也就是所谓“公共战争”。^①然而，《布雷蒂尼条约》签订后，雇佣兵们不仅丧失了领取报酬的机会，抢劫战利品和索取赎金也变成非法行为，他们甚至被要求在一定期限内离开法国。^②

对于那些人参加自由军团的动机，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已经有准确的观察。法国著名编年史家傅华萨（Froissart）这样描述英国人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成为一名自由军团首领的动机：英法两国签订《布雷蒂尼条约》而使战争停止时，霍克伍德不过是一名贫穷的骑士，他不想就这样返回英国，因为他认为在

^① 与“公共战争”对应，中世纪欧洲有“私战”的概念，但“私战”只能以对方的身体和生命为目标，不能抢劫财物和索取战俘赎金，因此很难引起雇佣兵的兴趣，况且中世纪晚期已经没有“私战”了。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p. 29–30, 37–38.

^② 1361年11月18日，英王爱德华三世派两名代表前往法国，负责搜索那些继续“像战争期间一样”掠夺战利品、抢劫和勒索赎金的英国臣民，给他们设定期限离开法国，如果他们不遵从就逮捕他们，如果不能将他们逮捕就汇报他们的姓名。

那里他什么也赚不到。当他看到所有战士被要求离开法国时，他使自己成为一个被称为“迟来者”（Late-comers）^①的自由军团的首领。^②有一次，两名修士用习惯的用语跟霍克伍德打招呼说：“愿上帝赐予你和平！”霍克伍德愤怒地回了一句：“愿上帝拿走你们的布施！”修士们解释说，他们并没有冒犯的意思。霍克伍德说道：“你们在路上遇到我的时候祈祷上帝让我饿死，这怎么不是冒犯呢？你们不知道我是靠战争生活的，而和平会让我破产吗？”^③在傅华萨《编年史》的另一处，来自加斯科涅的自由军团队长巴斯考特·德·莫雷昂（Bascot de Mauleon）以最简洁的方式解释了自由军团的成因：“尽管国王们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他们（指休战以后从各处要塞撤离出来的雇佣兵）总得以某种方式活下去吧！”^④

二、自由军团的收入来源、成员构成与组织结构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自由军团实际上是失业的雇佣兵团伙。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兵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没有雇主，

① 因活动于已经被其他团伙蹂躏的地区而得名。

② John Froissart, *The Chronicles of Froissart*, translated by John Bouchier and Lord Berner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4, p. 221.

③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 50.

④ John Froissart, *Chronic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offrey Brere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8, p. 282.

所以他们自行决定行动目标和路线。与战争中的雇佣兵一样，抢劫和勒索赎金是自由军团重要的收入来源。中世纪的文献在提及自由军团时总是将他们称作“匪帮”或“恶魔”。因为他们并非在合法的战争中效力于某位雇主，自由军团的所有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从理论上讲，被自由军团俘虏的人获释后是有权拒绝支付他所承诺的赎金的。但这样做的后果是，如果被同一个自由军团的成员再次俘获就会被处死，因此自由军团通常都可以得到他们索要的赎金。此外，自由军团还发展出一项更为稳定的收入，就是向附近的市镇和村庄征收保护费。保护费是那些市镇与村庄用来购买被自由军团进攻和抢劫的豁免权的一种费用。许多自由军团还任命了专门负责处理保护费事务的官员（clerc de pâtis）。

规模较大的自由军团都有自己的名号，最出名的有白色军团（White Company）^①、“迟来者”及圣乔治（St. George）^②，等等。中世纪的文献提到某个自由军团时常常会指出他们是“英国人”“加斯科涅人”“德意志人”，等等。通常情况下，每个自由军团的成员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其中多数人往往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我们无法了解自由军团普通成员的出身分布状况。现存的文献记载显示，自由军团首领来自于广泛的阶层。有些自由军团首领出身于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比如罗

① 因聚集在一起时闪亮的武器发出的银色光芒而得名。

② 得名于曾担任罗马军官后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而被处死的圣徒圣乔治，历史上不止一个自由军团使用过这一名号。

伯特·萨利（Robert Salle）早年是英国诺福克郡萨利村的农奴，约翰·约尔（John Jouel）曾经是多赛特郡阿伯茨伯利修道院的一名农奴，威廉·休盖特（William Hugate）曾经是约克大主教的一名男仆。另有一些自由军团首领来自于显赫的贵族世家，比如赛金·德·巴德富尔（Seguin De Badefol）是加斯科涅地区一个大封建领主之子，贝拉尔·德·阿尔布雷特（Berard d'Albret）和他的异母兄弟贝尔图凯·德·阿尔布雷特（Bertucat d'Albret）则来自朗德省地位显赫的阿尔布雷特家族。^①不过，从总体上看，出身卑微或显赫的自由军团首领都只占少数，大部分自由军团首领来自于这两者之间的乡绅或小贵族家庭，其中有些人本来就具有骑士身份，也有的人在从军过程中得到提拔，并受封为骑士。

自由军团内部组织具有很强的民主色彩：其首领往往是根据个人才能和声望选举产生的，重要决定都是在团伙内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并且按照等级和功劳来分配战利品。^②有些自由军团首领不是选举出来的——例如前文提到的约翰·霍克伍德、赛金·德·巴德富尔与贝尔图凯·德·阿尔布雷特等人^③——他们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军人，通过把一部分雇佣兵同伴聚拢在自己周围形成自由军团，但这个聚拢过程完全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讲，自由军团所有成员之间，包括首领在内，

① 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p. 11–12.

②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26–27.

③ 选举出来的自由军团首领有英国人约翰·艾墨利（John Amory）、约翰·克雷
斯韦尔（John Cresswell）及罗伯特·伯克黑德（Robert Birkhead），等等。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 5.

都是一种伙伴关系。当然，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平等。自由军团内部存在着等级和分工。比如说，14世纪欧洲雇佣兵当中重装骑兵的薪水高于弓箭手，在自由军团分配战利品时，一名重装骑兵获得的份额也高于一名弓箭手。另外，自由军团内部还有一些处理专门事务的人员，例如前文提到的处理保护费事务的官员，有负责管理财务的司库，还有负责起草协议等工作的文书，等等。

在自由军团从事活动时，往往是规模越大越有优势。所以许多单个的自由军团常常汇合在一起行动，以便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或者更加有效地威慑其勒索对象。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些自由军团首领在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自由军团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且不存在单一的领导者。首领们需要通过开会讨论来做出决策。缔结协议时，自由军团方面所有的首领都会在上面签名。在有些自由军团与交战对手签署的和平协议上，自由军团方面甚至有多达三十人的签名。1362年布里涅（Brignais）战役结束后，因为自由军团方面没有单一的最高统帅，法国王室和教皇英诺森六世委派的谈判代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让所有的自由军团首领都同意某项协议内容。在此前一年的圣灵桥（Pont-Saint-Esprit）危机中，教皇与法国国王的代表不是通过一份协议，而是与自由军团的不同组成部分单独签署的多份协议让这些团伙撤离圣灵桥的。^①

^① 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p. 35–36, 52–53.

三、自由军团的威胁及教俗权威的应对措施

自由军团的成员多是具有作战经验的专业军人，当多个自由军团联合行动时，能够聚拢成可怕的军事力量，乃至对当时的世俗权威形成挑战，并且对教廷的安危构成直接威胁。

法国国王让二世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被俘后，一名绰号为“大司铎”（Archpriest）的骑士成为一大群来自不同国家的重骑兵的首领。这些士兵发现法国王室给他们的军饷已经停止，继续留下来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于是，他们在“大司铎”率领下挺进到普罗旺斯，攻占了那里的不少设防城镇和城堡，并在远及阿维农的整个地区大肆劫掠。在阿维农的教皇英诺森六世和红衣主教们感到十分惊惧，他们一面将家里所有仆从武装起来日夜警戒，一面与这伙自由军团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自由军团首领“大司铎”带着他的部分追随者进入阿维农，并多次在宫中与教皇及红衣主教们同桌进餐，受到王公一般的礼遇。教皇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而且在他离开时还交给他4万克朗（crown），以便他在伙伴中分发。^①

1360年12月28日夜晚，一队自由军团突袭占领了罗纳河上的战略重镇圣灵桥。圣灵桥是罗纳河上仅有的四座桥梁之一，它位于教皇所在地阿维农的上游25英里处。桥的两端各有一座筑有

^① John Froissart, *Chronicles*, p. 148.

雉堞的高塔护卫。圣灵桥镇位于罗纳河西岸，有城墙环绕。守卫桥梁和城墙的责任本来是属于城市民兵，但在自由军团到来前不久，由法国国王的一名警卫官指挥的一支增援部队进驻圣灵桥，以加强防守。占领圣灵桥，自由军团就控制了去往阿维农的通道，从而可以勒索过往的商人和旅行者（其中包括许多世俗和教会的显贵）。此后数月当中，聚集到这里的自由军团越来越多，切断了从北方通往阿维农的物资供应线。

从自由军团占领圣灵桥的时机来看，其目标应该是夺取法国王室在南方征集到的用于支付法王让二世赎金的一笔钱款。按照计划，法国财政大臣委任的两名代表将在圣灵桥把这笔约合 46.4 千克黄金的款项交给让·苏瓦恩（Jean Souvain），再由他武装护送至巴黎。让·苏瓦恩于 12 月 27 日晚间或 28 日凌晨抵达了圣灵桥，但财政部门委托的那两名代表没有按时抵达。他们在阿维农听到圣灵桥被占领的消息后，带着那笔钱款回到了尼姆（Nimes）。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自由军团有攻占阿维农的计划，教皇英诺森六世还是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他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呼吁自由军团撤离，紧接着将他们开除教籍，最后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的十字军征讨。1361 年 1 月 17 日至 26 日，教皇分别致函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阿拉贡国王、热那亚总督以及法国的许多公爵和伯爵及其他贵族与市镇，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十字军行动提供部队。他还向那些领地位于罗纳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世俗领主与教会领主致函，要求他们拦截从法国各地奔赴圣灵桥的自由军团。

由法国陆军统帅（grand connétable de France）^①与一名陆军元帅指挥的法国王军在罗纳河西岸集结，由红衣主教奥斯提亚（Ostia）担任最高统帅的十字军在罗纳河东岸集结，十字军当中包括阿拉贡国王派来的600名重装骑士和1000名步兵。这些部队分别从罗纳河东西两岸对圣灵桥发起进攻。但是，对圣灵桥的围攻战进展并不顺利。教皇和法国国王都缺乏支付军饷的资金。根据傅华萨的说法，教皇期望十字军提供免费的服务，讨伐自由军团的十字军战士得到的将是灵魂的救赎，而不会有其他形式的报酬。结果十字军当中的许多人都离开了，有的去了伦巴德（意大利北部）充当雇佣兵，有的回家了，有的甚至加入到自由军团当中，致使自由军团的人数日益增加。^②

在武力讨伐难以奏效的情况之下，需要寻求迫使自由军团撤离圣灵桥的其他途径。教皇派人将意大利北部的蒙特费拉特（Montferrat）侯爵请到阿维农，承诺付给他一大笔资金，让他招募那些占领着圣灵桥的自由军团，将他们带到伦巴德，效力于蒙特费拉特侯爵对米兰公爵的战争。根据中世纪编年史家们的记载，教皇英诺森六世为此一共花费了10万弗罗林^③，其中3万弗罗林直接付给了自由军团，其余7万弗罗林付给了蒙特费拉特侯爵。除

① 在这一职位于1627年被废除以前，它一直是法国陆军的最高职位，其地位高于陆军元帅（maréchal de France）。早期的陆军元帅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头衔，同一时间可以有不止一位陆军元帅，但陆军统帅在同一时间只有一位。

② John Froissart, *The Chronicles of Froissart*, p. 143.

③ 弗罗林（florin）是13—16世纪佛罗伦萨铸造的金币，每个弗罗林包含3.54克“纯”黄金。

即将在伦巴德服役的报酬外，蒙特费拉特侯爵还向自由军团支付了6万弗罗林，以使其撤出圣灵桥。在罗纳河西侧，法国王军的两名指挥官同样是用赎买的方式让自由军团撤离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自由军团撤离圣灵桥后的目标将是效力于阿拉贡对卡斯提尔战争。^①

自由军团不仅可以攻占防御良好的要塞与城镇，而且能够在大规模野战中击败王室军队。布里涅是里昂西南大约8英里的一个小镇，位于一个周围有几座小山的平原上。14世纪时这座小镇有很好的防御工事：包括一座城堡，小镇周围有两重城墙环绕，并有一条引入河水的护城河。早在1360年布里涅就曾被自由军团短暂占领过，作为它们威胁里昂的一个基地。1362年3月，布里涅再次被自由军团攻占，法国王室派雅克·德·波旁（Jacques de Bourbon）统率的一支由6000名骑兵组成的王军赶来，试图夺回被自由军团占领的城镇，并阻止自由军团继续北上。1362年4月6日，由小梅斯琴（Petit Meschin）等人率领的自由军团与围攻布里涅的法国王军在布里涅城外的平原上展开对决，结果法国王军被彻底击溃，死伤无数。最高指挥官雅克·德·波旁身负重伤，并在几天后死亡，军中大批高级贵族成为俘虏。这场战役的战俘赎金和战利品数额巨大，使自由军团所有成员都“富裕起来”。^②

如果说教皇召集的十字军与法国王军在圣灵桥不能用武力击败自由军团还可以用缺少资金或当时阿维农城流行瘟疫等来解

① 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 36.

② *Ibid.*, pp. 46–51.

释的话，布里涅战役法国王军的惨败则更清楚地证明了自由军团的军事威力。^①既然军事手段和开除教籍的精神责罚都无法有效解决自由军团的祸害和威胁，法国王室、封建领主和教皇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以下措施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即设法将这一祸害引向其他地方。教皇曾试图推动自由军团对土耳其人进行十字军征讨，许多自由军团已向未开化的普鲁士进发，但它们到了阿尔萨斯就折返回来。离开法国的自由军团一部分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阿拉贡与卡斯提尔之间的战争中大量阵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由军团的威胁），更多的自由军团则越过阿尔卑斯山去了意大利。

四、自由军团的没落

当大部分自由军团或者去了西班牙或者去了意大利以后，那些留在法国的自由军团虽然很少再对世俗与宗教权威构成直接威胁，但它们继续在法国各地乡村和城镇进行劫掠与勒索，所造成的危害只有此前不久发生的黑死病可以与之相比。随着百年战争进程的时断时续，自由军团的命运也在不断变化：当战端重启时，它们成为领取报酬的雇佣兵，休战时期它们就再次成为自由

^① 根据中世纪意大利编年史家维拉尼（Villani）记载，布里涅战役中自由军团方面的兵力与法国王军的人数大致相当，双方各有大约6000名骑兵。Kenneth Fowler,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p. 49.

军团。

为了使自己的王国摆脱自由军团的危害，法王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竟连占星家都用上了。查理的御用占星家托马斯·德·皮赞（Thomas de Pizan）先查了占星表，然后制作了五个金属小人像，在每个小人像的下巴和胸口放上标志，再把取自法兰西不同地区的泥土填入小人像，最后把这几个小人像分别埋到取泥土的地区。占星家向国王保证说他的方法可以让自由军团消失，然而自由军团并没有消失。^①直至15世纪中期，自由军团的破坏一直是困扰法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存在于1435—1444年的“剥皮者”（*écorcheurs*）更是自由军团发展史的一个顶点。1435年12月，法国境内所有大的自由军团举行会议，并达成一个协议，以划分各自活动范围的方式对法国领土进行了瓜分。^②在这次会议后形成的“剥皮者”竟有1.5万人的规模，超过当时西欧任何君主能召集的武装力量人数。他们的活动成为刺激法王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进行军事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

1439年，法国三级会议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只有国王才有权招募军队，未经国王授权的武装力量都是非法的。当然，自由军团的祸害不是靠一道法令就能消除的，以前的法国国王已进行过多次类似的努力。然而，15世纪40年代查理七世的改革的确取

^① 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4.

^② Alexandre Tuetey, *Les écorcheurs sous Charles VII*, Montbéliard: Henri Barbier Imprimeur-Editeur, 1874, pp. 8-9.

得了成功。他通过建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敕令骑兵队（*compagnies d'ordonnance*）不仅恢复了瓦卢瓦王朝领土上的秩序和安全，而且在1449—1453年迅速征服了英国在欧洲大陆除加莱以外所有的领土，以法国的胜利结束了百年战争。

查理七世一方面通过三级会议将原来只在特殊情况下征收的军役税（*taille*）^①变成一种固定的税收，为建立常备军奠定财政基础；另一方面利用1444年与英国达成休战的契机，在1445年建立了由1500个复合兰斯（*Lance fournie*，每个复合兰斯有六个人，包括一名重装骑士、两名弓箭手、一名轻骑兵及两名仆人）组成的敕令骑兵队。^②敕令骑兵队的官兵都是根据年龄、身高、体能、勇气和作战能力等条件从以前的雇佣兵中选拔出来的，加上按时支付军饷和定期点名、检查等制度，使这支常备军在军纪和作战能力方面具备了超越自由军团的优势。包括“剥皮者”在内的自由军团一部分被吸收进新成立的常备军，一部分被强迫解散，而那些拒绝服从的则被王室派出的常备军逐步剿灭。^③至百年战争结束时，法国终于摆脱了自由军团的困扰。

① 军役税属于平民税，贵族、僧侣和很多官员都享有豁免权。军役税的征收存在地区差异，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以个人收入为课税标准，教士、贵族等特权阶级有免税权。南部多以土地为课税标准，持有贵族土地的人拥有免税权，哪怕他是平民。反之，持有平民土地的人，哪怕是贵族也要纳税。布列塔尼实行混合税制。有人将这种税称作人头税，其实并不准确，法国真正的人头税（*capitation*）直到1695年才初创。

② Philippe Contamine, *Guerre, é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p. 276–284.

③ Paul Douglas Solon, "Charles VII and the Companies D'Ordonnance, 1445–1461: A Study in Medieval Reform", pp. 21–39.

五、自由军团的本质及历史意义

虽然自由军团的活动在研究中世纪晚期史的文献中经常被提及，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自由军团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含混不清的状态，常常错误地把它们称为中世纪晚期的雇佣兵团伙。从本质上讲，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自由军团并不是雇佣兵团伙，只不过自由军团的成员大都来自于被解雇的雇佣兵，其作战经验和威力又使他们成为潜在的雇佣兵，所以导致许多人把自由军团与雇佣兵团伙混为一谈。然而，“自由军团”一词中的“自由”（free）的含义就是指它们没有受雇于任何人，而是自行决定行动目标，靠抢劫、绑架和收取保护费等方式生存。严格地说，一旦这些团伙找到一位雇主，开始为雇主效力时，就不能称作“自由军团”了。

自由军团并非中世纪晚期西欧所独有的现象。实际上，色诺芬《长征记》中记载的那1万名希腊雇佣兵就是自由军团的前驱。不过，百年战争时期自由军团的泛滥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西欧军队构成方式演变的结果，到百年战争前夕，西欧军队的主要成分已经是雇佣兵；另一方面，百年战争旷日持久、时断时续的特征导致战争间歇期大量雇佣兵失业，这是催生自由军团的直接原因。事实证明，武力围剿、金钱贿赂或祸水他引等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由军团造成的问题。直至查理七世建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敕令骑兵队来取代对雇佣兵的依赖，才根除了自由军团在法国的祸害。常备军的建立，是封建制度衰落后法国向

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由军团是在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一度靠近舞台中心位置的角色，它们在法国城乡造成的严重破坏及其对教俗权威的挑战，直接刺激了法国常备军的建立，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自由军团根据个人才能选举其首领，有影响力的军人在自愿基础上把同伴聚拢起来形成自由军团，多个自由军团为了共同目标汇聚起来一致行动，这些都是与中世纪等级森严的、强调出身血统和效忠关系的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封建制度松动的结果，也预示了未来社会变革的方向。等级森严的、强调出身血统和效忠关系的社会，将被强调个人才能的、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所代替。自由军团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伙伴关系”：不仅内部成员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各个自由军团之间也是一种伙伴关系。尽管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不要忘记，基于分工、才能与资历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组织中也是常态——但这种建立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毕竟是在西欧封建社会网络中撕开了一个裂缝。随着裂缝的扩大和裂缝数量的增多，^①旧的社会网络将逐渐走向瓦解，最终被一种新的社会网络取代。

^① 例如在经济领域，封建关系逐渐被代理制、合伙制及股份公司所替代。



中世纪晚期

意大利境内的

雇佣兵



提到 14、15 世纪的意大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群星璀璨的文艺巨匠及众多富庶的城市，较少关注其作为雇佣兵天堂的一面。说它是雇佣兵的天堂，不仅因为雇佣兵主宰了 14 世纪下半叶至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战争，还因为这一时期意大利有不止一位雇佣兵首领攫取政权成为邦国君主。国内对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的研究成果只有一篇硕士论文。^① 西方学者目前对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的研究，或将其融于对战争史的叙述中，^② 或侧重于雇佣兵团伙对意大利邦国造成的影响，^③ 或通过对单个雇佣兵首领的个案研究来揭示当时意大利雇佣兵的全貌。^④ 这些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已达到非常深入的境地，但由于缺乏从全局角度的审视，致使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仍未受到充分关注。本章试图从全局视野出发，首先探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雇佣兵兴起的原因，接着讨论 14、15 世纪意大利雇佣兵运作模式的发展变化，然后从出身、家族继承性、组织结构、首领与追随者的关系等方面考察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的特点，并将用具体实例证明，马基雅维里提出的雇佣兵“无用”与“不忠”的观点需要修正。

① 郝赫：《雇佣兵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

② 参见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Oscar Browning, *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 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 from 1409–1530*, London: Methuen & Co, 1895。

③ 例如 William Caferro, *Mercenary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Siena*。

④ 例如 William Ca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一、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雇佣兵的兴起

凭借地中海贸易带来的利润以及发达的手工业与金融业，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主要是北部和中部）已发展为西欧最富庶的地区。不过，在政治上由许多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拼贴而成的亚平宁半岛简直就是一个混乱的斗鸡场。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的意大利呈现一片可悲的景象，14世纪初生机盎然的局面已经被瘟疫、饥荒、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所取代。毫不夸张地说，意大利进入了它的“战国”时代：皮蒙特地区蒙特费拉特侯爵与萨伏伊伯爵之间的争斗、伦巴德地区教皇与米兰公爵之间的争斗、托斯卡纳地区各城市国家之间的争斗、威尼斯与热那亚这两个海权共和国之间的争斗、威尼斯与帕多瓦之间的争斗以及热那亚对米兰扩张政策的抵抗……这些争斗都分别引发了不止一场战争。在这些频繁的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武装力量，不是本邦的贵族或城乡民兵，而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或者意大利其他邦国的雇佣兵。

早在12、13世纪，意大利各邦国就开始使用雇佣兵。起初，雇佣兵是作为本邦武装力量的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佣兵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下面，我们就以佛罗伦萨为案例，来考察一个意大利邦国从依靠自身武装力量逐步转向依赖雇佣兵的过程。

12—13世纪佛罗伦萨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贵族组成的骑兵，另一种是人数更多的、由平民组成的民兵（民兵都是步兵）。在1260年9月4日的蒙塔佩尔梯（Montaperti）战役中，

尽管佛罗伦萨民兵与盟邦派来的援军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还是被锡耶纳雇佣的德意志骑兵与流亡的佛罗伦萨吉柏林派贵族合力击溃。这一惨败的教训表明，在当时的野战中，由训练有素的贵族担任的重装骑兵优于人数更多的步兵。在1289年6月11日的坎帕尔迪诺（Campaldino）之战中，贵族骑兵的冲锋为佛罗伦萨赢得了胜利。然而，这次凯旋以后贵族们表现出的傲慢和无法无天日益严重，最终导致《司法条例》（Ordinances of Justice）的颁布。该条例规定，成立一支由1000名精选的民兵构成的部队，以便对贵族攻击或杀害平民的行为执行严厉的惩罚措施。扼制贵族的暴力行为是必要的，但这种严厉镇压的政策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用严厉措施驯服一个曾占据统治地位的战士阶级的同时，如何确保它对一个市民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权忠诚呢？那些继续为邦国作战的贵族不断要求废除《司法条例》，而邦国政府则以在1309年、1321年和1324年重新颁布《司法条例》，并加入更严厉的惩罚条款作为回应。

军事上的惨败表明民兵的不可用，深刻的社会对立导致贵族的不可靠，这就是14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在军事上面临的尴尬处境。正因为如此，131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的远征军进攻佛罗伦萨时，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佛罗伦萨军队居然不敢出城应战。这个城市共和国军事上的不自信还表现在，在亨利的军队到来之际，佛罗伦萨匆忙接受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保护。此外，佛罗伦萨在1316年相继向瓦卢瓦的菲利普、卢森堡的约翰和波希米亚国王派出特使，试图用金钱换取军事上的援助。1325年，在阿尔托帕肖（Altopascio）之战中失败后，

佛罗伦萨急忙开征新的税收，以便购买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之子卡拉布里亚公爵查尔斯（Charles of Calabria）的军事服务。根据双方达成的条约，查尔斯将率领1000名骑士为佛罗伦萨效力10年，其报酬是每年20万弗罗林。^①

频繁战争和经济上的相对富庶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成为雇佣兵天堂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导致了雇佣兵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兴起。其一是由邦国民兵组成的步兵在与重装骑兵对抗中日益显露出劣势。尽管14世纪出现了两种能够有效对抗重装骑兵的步兵——英国长弓兵和瑞士长枪方阵——但14、15世纪意大利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重装骑兵。其二是意大利市民阶级兴起后对贵族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许多贵族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只好离开本邦去其他地方充当雇佣兵。其三是外国君主频频出兵干涉意大利的事务，在意大利领土上遗留下许多外国士兵。其四是意大利各邦国内部激烈的党派纷争——如吉柏林派与圭尔夫派之间的冲突——使决策的官员在对武装力量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使用雇佣兵。因为如果一个本地出身的军人在战场上取得成功，他就有可能谋求在本邦的政治利益；如果他在战场上失败，则可能引发他的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的争吵。相反，外国人或来自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则很少卷入本地政治，所以更具有优势。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各邦国从依赖自身武装力量转向依赖雇佣兵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社会环境的变

^① C. C. Bayley,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De Militia of Leonardo Brun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pp. 3-6.

化，基于封建义务的军队组织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当时能指望的就是雇佣兵和民兵这两种武装。雇佣兵作为一种职业化军队，作战经验与专业化程度使其具有民兵不可比拟的优势。从经济效益角度衡量，对商业、手工业发达的意大利邦国而言，花钱购买雇佣兵的军事服务，让国民专注于经济活动应该是最划算的。由于封建式军队和民兵不能满足需要，发展常备军的条件又尚未成熟，大量使用雇佣兵就成了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各邦国最合理的选择。^①

二、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运作模式的变化

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战场上使用的雇佣兵，主要来自大大小小的自由军团。正因为如此，迈克尔·马利特将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称作“自由军团的时代”。^②因规模之大、在战争中作用之强，以及对意大利各地社会破坏之重，百年战争期间从法国来到意大利的自由军团备受当时的编年史家及现代历史学家的关注。

^① 理森与皮亚诺通过对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促使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各邦国统治者放弃公民武装，转向使用雇佣兵的关键因素是内部政局不稳。Peter T. Leeson and Ennio E. Piano, "The Golden Age of Mercenarie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October, 2020), pp. 429-446. 不过，该文的核心论据之一——威尼斯在中世纪晚期比佛罗伦萨等其他邦国较少依赖雇佣兵——并没有可靠的量化资料作为支撑。

^②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 25.

然而，这些百年战争中产生的自由军团到来以前，意大利领土上已经有自由军团的活动。与百年战争中的法国类似，意大利领土上的自由军团也是在和平到来或冬季战事停止导致雇佣兵失业的情况下产生的。

研究者通常认为，1302年形成于意大利南部的加泰隆军团（Company of Catalan）是第一个自由军团。^①1302年，《卡塔贝洛塔和约》（Peace of Catabellotta）结束了西西里国王弗雷德里希三世与安茹的查尔斯二世之间的战争，失去工作机会的雇佣兵（主要是加泰隆人和阿拉贡人）在意大利军事冒险家罗杰·德·弗洛尔^②率领下乘船来到拜占庭帝国，效力于拜占庭皇帝。他们在战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甚至引起雇主的担忧，在拜占庭皇帝背信弃义地谋杀了弗洛尔后，加泰隆军团对拜占庭帝国展开疯狂的报复。根据拉蒙·蒙塔内尔《编年史》的记载，意大利南部的战事结束后，弗洛尔先与拜占庭皇帝达成雇佣兵服务的协议，然后才把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加泰隆人和阿拉贡人召集起来，形成加泰

① Hunt Janin with Ursula Carlson, *Mercenar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 Jefferson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13, pp. 97–98; David Murphy, *Condottiere 1300–1500: Infamous Medieval Mercenaries*,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7, p. 6.

② 因为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是加泰隆军团的首领，威廉·凯菲洛将其误作加泰隆人。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 64。然而，中世纪编年史家拉蒙·蒙塔内尔对罗杰·德·弗洛尔的身世有清楚的记载：他的父亲来自德意志，母亲是意大利当地一位贵族的女儿。Ramon Muntaner, *The Catalan Expedition to the East: From the Chronicle of Ramon Muntaner*, translated by Robert D. Hughes, Woodbridge: Tamesis, 2006, p. 21.

隆军团。^①所以，笔者认为加泰隆军团在意大利期间并不属于自由军团。不过，它作为自由军团在东欧所取得的辉煌战果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后来数十年间意大利领土上的许多自由军团都是以它为榜样的。

1322年冬天，一个被称为“锡耶纳军团”（Company of Siena）的自由军团在锡耶纳和翁布里亚（Umbrian）的乡村进行劫掠。第二年春天，当分批到邻近邦国效力的机会重新出现时，这个大约由500名骑兵和数量未知的步兵组成的自由军团就解散了。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对“锡耶纳军团”的起源有不同说法，有的说它是以锡耶纳的一群流亡者为核心形成的，有的说它最初的核心是一群德意志雇佣兵。其实意大利各邦国的流亡者和外国雇佣兵是14世纪意大利领土上自由军团的两个主要来源，这个自由军团大概就是由二者结合形成的。

1329年，800名德意志骑兵从神圣罗马帝国驻比萨的军队中开了小差，他们自行决定对富庶的城市卢卡（Lucca）发起攻击，但并未得手。对卢卡郊区进行了大肆抢劫以后，他们退守到附近小山上一个防御工事中，在那里选举一个名叫马可·维斯孔蒂的意大利人作为他们的首领。来年春天，这个被称作“切鲁格里奥军团”（Company of Cerruglio）的自由军团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占了卢卡城，在抢劫了巨大财富后，他们把卢卡城出售给热那亚又获得了3万弗罗林。这个自由军团在分配完战利品以后就解散了。

^① Ramon Muntaner, *The Catalan Expedition to the East: From the Chronicle of Ramon Muntaner*, pp. 36-43.

1339年，德拉·斯卡拉战争结束后形成的圣乔治军团，是意大利领土上诞生的第一个大规模自由军团。它包括2500名骑兵和1000名步兵，由三个首领共同领导，即米兰流亡者罗德里西奥·维斯孔蒂（Lodrisio Visconti）、德意志贵族兰道的康拉德（Conrad of Landau）和乌尔斯林根的维尔纳（Werner of Urslingen）。罗德里西奥率领圣乔治军团来到米兰附近，试图从其堂兄弟手中夺取米兰的统治权。在米兰西北方的帕拉比亚戈（Parabiago），圣乔治军团几乎已经把人数占优势的米兰军队击溃。但关键时刻赶到的700名骑兵扭转了战局，圣乔治军团最终被击败了。在这场战役中，双方共有4000多人死于战场。^①

尽管有些自由军团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军事威力，但直到14世纪50年代，意大利领土上活动的自由军团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因为它们满足于从事抢劫、勒索和地区性征服等活动来维持生存，一旦富裕起来往往就自动解散了。那些自由军团解散后，其成员大多是去充当雇佣兵了，军团整体作为雇佣兵为雇主效力是百年战争期间从法国来的自由军团才开始的。

从法国来到意大利的自由军团中最著名的是白色军团。^②这个自由军团大约有30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成员以英国人为主，其中包括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雇佣兵约翰·霍克伍德。他们在意大利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就为自己赢得了不可战胜的名声。1362年3月，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28–31.

② “白色军团”只是它的绰号，其正式名称为“英格兰与德意志大军团”（Great Company of English and Germans），也被称作“Great Society of English and Germans”。

白色军团按照雇主蒙特费拉特侯爵的要求，向米兰公爵统治的两个重要城市托特纳和帕维亚进攻。在他们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相当于托特纳门户的城镇卡斯提尔诺沃（Castelnuovo）后，米兰公爵派遣雇佣兵首领兰道的康拉德率兵去托特纳增援。白色军团在托特纳附近逗留了三个月，对周围的乡村进行破坏，托特纳城中人数两倍于白色军团的守军竟然不敢出城迎战。米兰公爵试图用金钱收买白色军团，但遭到了拒绝。他们回答说，他们进入伦巴德地区是受雇于蒙特费拉特侯爵来打仗的，他们打算继续忠实地效力于蒙特费拉特侯爵。^①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霍克伍德和他领导的白色军团先后效力于比萨、米兰、教皇和佛罗伦萨等雇主。

大规模的自由军团在 14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战争中确实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但这是一种难以控制，甚至危险的工具。当服务期结束后，它们以自由军团的身份作起恶来，哪怕对前雇主也是毫不留情的。况且由于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前雇主往往是它们威胁的首要目标。白色军团声名远扬不仅因为突出的作战能力和忠于雇主的品质，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它的残暴行为。它到达意大利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皮蒙特地区放火、抢劫、强奸妇女、把手无寸铁的人弄残和虐待俘虏。中世纪的编年史家阿扎里奥（Azario）描述道，白色军团为催促赎金把俘虏关在箱子里，威胁要把箱子沉到水里，还会一步步肢解受害者，先砍双手，再割鼻

^① John Temple-Leader and Giuseppe Marcotti, *Sir John Hawkwood: Story of a Condottiere*, translated by Leader Scott,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9, p. 16; 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 56.

子，再割耳朵，最后把剩下的躯干仍到城堡外的壕沟里让狗啃。^①

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自由军团就自行发动对邦国的战争，意大利没有哪个邦国可以幸免于它们的攻击或威胁，连教皇国也不例外。意大利邦国应对自由军团的攻击主要有三种措施可供选择：第一是与自由军团进行谈判，通过支付巨额的“保护费”让其离开；^②第二是借助雇佣兵进行武力对抗，不过使用雇佣兵不仅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如果武力对抗失败仍需向自由军团支付“保护费”；第三就是各邦国之间结成对抗自由军团的联盟，但由于邦国之间的钩心斗角，虽然出现过多个这样的联盟，实际作用却非常有限。因为不能像佛罗伦萨、米兰等强大的邦国通过征服新领土扩充税源，像锡耶纳这样的中等邦国在自由军团一次次攻击和勒索中逐渐衰落下去。到1399年，锡耶纳完全丧失了邦国的主权。^③

1379年4月30日，在罗马附近的马里诺战役（Battle of Marino）中，一支久经沙场的由布列塔尼人组成的雇佣兵，被意大利人阿尔贝里戈·达·巴比亚诺（Aberigo da Barbiano）率领的本土雇佣兵

① 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p. 46–48.

② 在1375年的一次攻击中，霍克伍德率领的自由军团从锡耶纳勒索到3.05万佛罗林的“保护费”，而那半年当中锡耶纳各项常规收入的总和不过2.712万佛罗林。为了筹集支付给自由军团的资金，锡耶纳将一座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卖掉，也仅得到5000佛罗林。在1364年，以哈内金·鲍姆加登（Hannekin Baumgarten）和阿尔伯特·施特兹（Albert Sterz）为首的自由军团从锡耶纳榨取的“保护费”达3.865万佛罗林。William Caferro, *Mercenary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Siena*, pp. 37, 39.

③ William Caferro, *Mercenary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Siena*, pp. 171, 190.

“意大利圣乔治军团”击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宣称，这件事标志着意大利人尚武精神的恢复。现代学者安东尼·莫克勒也认为这件事是意大利军事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意大利本土出身的雇佣兵取代了外国雇佣兵在意大利战场上的地位。^①迈克尔·马利特不同意这一说法，他指出马里诺战役并不是意大利本土军队第一次击败外国雇佣兵。马利特承认 1380 年前后的几年在意大利军事领域发生了“决定性”改变，但这场改变不是意大利人尚武精神的恢复，而是大规模自由军团时代的终结。^②

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不过是强调了一场转变的不同侧面而已。当然，简单地把一场战役看作改变历史的转折点并不合适，这场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14 世纪末至 15 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都可以视为一个过渡期。但无论如何，15 世纪意大利领土上的雇佣兵与 14 世纪已有显著的不同。

首先，14 世纪与 15 世纪的意大利邦国都依赖雇佣兵，但 14 世纪以外国雇佣兵为主导，15 世纪则以意大利本土出身的雇佣兵为主导。1379 年马里诺战役的辉煌胜利并未使意大利人巴比亚诺超越英国人霍克伍德的地位。不过，1394 年霍克伍德去世后，意大利一流的雇佣兵首领中外国人的名字就很少见了。迈克尔·霍华德说：“至 14 世纪末，外国人或者被吸收进当地贵族阶级，或者回家去了，或者死掉了。”^③ 马里诺战役以后，意大利的外国雇佣兵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p. 60–61.

②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42, 51.

③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5.

首领人数确实在减少。

其次，14世纪意大利的雇佣兵服务期限短、流动性大，而15世纪意大利各邦国越来越倾向于与雇佣兵保持长久性的雇佣关系。14世纪时，意大利的雇佣兵合同期限通常只有两三个月，每到秋天战争季节结束时雇佣兵合同也就到期了。到了15世纪初，就很少再有少于6个月的雇佣兵合同了。佛罗伦萨直到15世纪40年代仍在坚持使用期限仅为6个月的雇佣兵合同，但其他主要邦国都已普遍使用“6个月加6个月”或“1年加1年”的合同，威尼斯甚至还使用过许多“2年加1年”的雇佣兵合同（这些合同期限分为两段，第一段时间是已经确定的服务期，第二段时间为可选服务期，雇主如果愿意，可以要求雇佣兵在第二段时间继续服务，前提是他必须在第一段服务期结束前数周将这一要求通知雇佣兵）。^①

最后也是最突出的一点，14世纪意大利战场上的雇佣兵主要来源于自由军团，而15世纪则可以说是康多提埃里的时代。“康多提埃里”是意大利语“condottiere”（其复数形式是“condottieri”）的音译。这个词语来源于意大利语“condotta”（意为“契约”），其字面意思是“签约者”或“承包人”（相当于英文中的“contractor”），指的是那些14、15世纪与意大利各邦国签订合同的雇佣兵首领。^②在有些时候，康多提埃里这个词汇的外延被过分扩大。比如，大卫·墨菲在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的专著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 82.

②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pp. 25-26.

中写道：“它（康多提埃里）现在通常用来形容雇佣兵队长，但从技术上讲，任何签订合同的雇佣兵或者雇佣兵合同条款中所包括的人都可以称作康多提埃里。”^①笔者认为，大卫·墨菲对康多提埃里做这样的界定，其结果正是他自己在同一著作中所批评的将康多提埃里简单地等同于雇佣兵。^②

康多提埃里与自由军团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有两点。第一，自由军团是“团伙”，团伙的威力来自于规模，规模越大越有威力；康多提埃里是个体，其价值主要来源于个人长期从事雇佣兵这一行业所获得的知识、经验、能力和声望。由康多提埃里与追随他的雇佣兵组成的部队在英文中仍然称作“军团”（company），但其规模往往都不大。第二，自由军团全体成员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首领通常是因为具备某些才能或品行被选举出来的伙伴之一；而康多提埃里与他所率领的士兵之间则存在一种效忠关系和雇佣关系。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了解15世纪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1400年，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出生于贝加莫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年幼时，由于父亲遭人杀害，科莱奥尼被迫逃离家乡。20岁出头的时候，科莱奥尼在意大利南部开启了他的雇佣兵生涯。起初，他在当时著名的康多提埃里安德烈亚·博拉齐奥（Andrea Braccio）麾下，但只得到一个类似于马童的职位。所以他不久便离开博拉齐奥，投奔了卡尔多

① David Murphy, *Condottiere 1300–1500: Infamous Medieval Mercenaries*, p. 8.

② *Ibid.*, p. 6.

拉（Caldora）。在卡尔多拉的部队里，科莱奥尼表现出卓异才能，开始指挥20个兰斯的骑兵，后来增加到35个兰斯。1428年，科莱奥尼离开卡尔多拉，投奔到时任威尼斯军队统帅的弗朗切斯科·达·卡马尼奥拉（Francesco da Carmagnola）麾下，负责指挥40个兰斯的骑兵。1432年，卡马尼奥拉被雇主威尼斯政府处死，科莱奥尼变成直接受雇于威尼斯政府的一名康多提埃里，麾下有80个兰斯的骑兵。到1437年，科莱奥尼麾下的骑兵增加到180个兰斯，同时负责指挥威尼斯的所有民兵（步兵）。两年后，他指挥的骑兵增加到300个兰斯。为表彰科莱奥尼的战功，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在1441年通过一条法令，宣布科莱奥尼是保卫共和国安全的重要康多提埃里，在军饷以外授予他几座市镇和城堡作为采邑。1442年，科莱奥尼对其雇主产生了不满，一是因为与米兰的战事停止后威尼斯政府要裁减他麾下的一部分士兵，另一个原因是在讨要被拖欠的军饷时受到威尼斯官员的轻慢。1443年，科莱奥尼离开威尼斯，开始为米兰公爵效力。他为公爵建立了一些功勋，但因为受到猜忌被逮捕入狱，直到公爵死后才逃出监牢。1448年，科莱奥尼重新开始为威尼斯效力。在取得一系列战功以后，科莱奥尼于1455年被任命为威尼斯军队最高统帅，并担任这一职位直到他在1475年去世。根据1462年的协议，威尼斯共和国在和平时期每年应付给科莱奥尼6万弗罗林的军饷，战争时期每年10万弗罗林。当然，如此巨额的款项并非都是他个人的收入，因为其麾下的4000个兰斯的骑兵和10000名步兵是需要他来支付工资的。在科莱奥尼近五十年的雇佣兵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直接或

间接为威尼斯效力。^①

科莱奥尼的从业经历充分体现了15世纪意大利康多提埃里的一些特征。其一，他们通常是从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成长为雇佣兵首领的。其二，康多提埃里不仅要面对战争这一特殊职业带来的风险，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财务风险，因为他们要负担麾下士兵的工资，如果被雇主拖欠军饷或者赖账，便会蒙受经济损失。其三，在与雇主的博弈中，他们不像14世纪的自由军团那么强势，在受到雇主猜忌时难免会有牢狱之灾，甚至可能像卡马尼奥拉那样不明不白地丢掉性命。^②

从15世纪早期起，那种大规模的、有自己名号的雇佣兵团伙在意大利基本销声匿迹了。各邦国逐渐转向由威尼斯首先采用的一种雇佣兵模式：一方面与只有较小规模部队的康多提埃里保持日益长久性的雇佣关系；另一方面在需要时招募一个个小规模雇佣兵团伙或单个雇佣兵。这是意大利各邦国试图对所使用的武装力量努力加强控制的结果。14世纪后期意大利的政治局面呈现出新的面貌，许多中小邦国被强大的邦国兼并，而一些强大的邦国则通过征服其他邦国变得更加强大。领土扩张后的邦国力图在全部领土上实现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治理，必然更加看重防务力量的永久性。自由军团的衰落可以说是因为它们面对邦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因为

^① Oscar Browning, *The Life of Bartolomeo Colleoni, of Anjou and Burgundy*, London: FB & C Ltd., 2015, pp. 2-35.

^② 关于卡马尼奥拉之死，详见本章第四节。

出现了长期服务于雇主的机会，导致它们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康多提埃里与雇主签订合同，然后带领自己的部队为雇主效力，这是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的典型运作模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模式，因为15世纪的意大利邦国还直接招募单个的雇佣兵。由邦国直接招募的单个雇佣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打碎的兰斯”（lanze spezzate）。其成员多是出于各种原因脱离原来部队的骑兵，或者是康多提埃里死后留下的追随者。作战时，他们与其他重装骑兵一样被组成兰斯编队，但他们每个人都直接从雇主那里领取报酬，统率他们的指挥官也是由雇主任命的。1427年，佛罗伦萨有150名单个招募的雇佣骑兵，威尼斯则有大约400人。15世纪20年代，米兰的“打碎的兰斯”大约有700人。1434年，在米兰总数为7550人的骑兵中，有1200人是单个招募的。到1472年，米兰的“打碎的兰斯”达到4000人。^①

鉴于14世纪自由军团造成的危害，意大利各邦国在15世纪相继采取了一些旨在对雇佣兵加强控制的举措。开始是延长雇佣兵合同的期限，后来过渡到与雇佣兵保持长期的雇佣关系——和平时期也要维持数量可观的雇佣兵，战时再以此为基干扩充兵员。这些举措比法王查理七世设立敕令骑兵队以及勃艮第公爵鲁莽查理（Charles the Bold）的军事改革都要早，可以看作中世纪以来西欧最早进行的建立常备军的尝试，只是由于建设常备军的条件尚未成熟，上述举措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常备军。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112–113.

三、雇佣兵的出身、组织结构、首领与追随者的关系^①

从有资料记载的康多提埃里出身情况来看，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大部分来自于贵族阶层，而且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康多提埃里还是某个意大利邦国的君主。因为康多提埃里的作用不仅仅是率领手下的雇佣兵为雇主打仗，他们的价值更体现在雇佣兵的招募和管理方面。贵族家族的领地往往是康多提埃里招募士兵的重要基地。是否拥有招募士兵的稳定基地，是决定一名雇佣兵能否在其所从事的行当中上升到重要位置的因素之一。在这方面，那些本身就是君主的雇佣兵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卡罗·马拉泰斯塔（Carlo Malatesta）是其家族领地中的重要城市里米尼（Rimini）的君主，^②从小就是被当作未来的君主和军人培养的。作为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马尔皮基尼（Malpighini）的学生，他是著名的艺术赞助者。作为一名康多提埃里，卡罗·马拉泰斯塔曾先后效力于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成为战俘时被索要 10 万弗罗林的赎金，显示他在雇佣兵这一行当中享有

^① 中世纪晚期活动于意大利的自由军团在成员出身和组织结构等方面与活动于西欧其他地区的自由军团没有本质区别。关于自由军团的成员出身和组织结构等问题，本书第二章已经讨论过，此处只讨论康多提埃里率领的雇佣兵。

^② 当那些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意大利城市不是共和国时，统治这些城市的领主（lord）就相当于独立的君主。

很高的地位。但这种地位主要不是源于辉煌的战绩，^①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君主身份，以及能招募和供养一支规模可观的部队的事实。

卡罗的弟弟潘多夫·马拉泰斯塔（Pandolfo Malatesta）原本就是法诺（Fano）的君主，他还一度使自己成为布雷西亚的君主。与卡罗一样，潘多夫也拥有一支规模可观且能长期维持的部队。作为康多提埃里，他带领自己的部队曾先后效力于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有一段时间，他是威尼斯军队的统帅，在威尼斯拥有一座宫殿。

尽管马拉泰斯塔兄弟在雇佣兵这一行当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君主身份，但君主身份和贵族出身都不是一名雇佣兵成为顶级康多提埃里的必备条件。穆西奥·阿腾多罗·斯福尔扎（Musio Attendolo Sforza）是15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康多提埃里之一。^②他出身于罗马涅一个富裕的乡绅家族。阿腾多罗家族虽然没有贵族血统，但它是一个庞大的、出了不少优秀军人的富有家族，并能与当地贵族帕索里尼（Pasolini）家族争夺在科蒂尼奥拉的主导权。所以，穆西奥·阿腾多罗·斯福尔扎并非像他的某些颂扬者所宣称的那样来自社会底层。拥有科蒂尼奥拉这样一个招募

^① 佛罗伦萨人提到卡罗·马拉泰斯塔时曾将他称为“惯于失败”的人。在效力于威尼斯期间，卡罗曾因军队受到匈牙利人的突袭身受重伤。1416年，他被安德烈亚·博拉齐奥击败，并成为俘虏。1427年，作为米兰军队最高统帅的卡罗又被威尼斯军队俘获。

^② 他原本的姓氏是阿腾多罗，“斯福尔扎”是他在巴比亚诺麾下充当雇佣兵时后者给他取的绰号，意为“力量”。这个绰号后来成了穆西奥及其子孙的姓氏。

士兵的稳固基地始终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当然，他的成功主要还是由于个人的才能。^①

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雇佣兵这一职业与许多其他职业一样具有家族继承性。像马拉泰斯塔和阿腾多罗这些家族，都在好几代人中涌现出一系列重要的雇佣兵首领。家族对康多提埃里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领地可以作为招募和供养士兵的基地，而且家族成员在雇佣兵部队的管理中往往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阿腾多罗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在穆西奥·阿腾多罗·斯福尔扎的部队中效力。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战场上的雇佣兵主要是由骑士组成的。^②这些骑士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兰斯，每个兰斯都由包括骑士本人及其侍从、听差等在内一共三至六人组成。如果部队规模比较大，康多提埃里会把他的部队分成若干个大约由 25 个兰斯组成的中队（squadron）。在其中一个被称作“卡萨”（casa）的中队里，集中了最有经验、最忠诚的士兵，以及康多提埃里的管家、马夫、号手、神父等随从。除了这个由康多提埃里亲自指挥的中队外，其余中队的中队长（squadrieri）通常都是由长期追随康多提埃里并得到信任的雇佣兵担任，有的还是康多提埃里的家族成员。但中队长与康多提埃里之间存在以合同形式加以确定的经济关系。中队以下的组织单位是大约由五个兰斯构成的小队（post）。中队长与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63-68.

② 白色军团等来自英国的雇佣兵作战方式比较特殊，他们骑着马上战场，却以步兵的方式作战，故称为下马骑士。

小队长之间也会签订合同。1441年米凯莱托·阿滕多罗（Micheletto Attendolo）的由561个兰斯构成的雇佣兵部队共有87个小队。有时候中队的规模可能远远超过25个兰斯。比如，1437年皮耶罗·詹保罗·奥尔西尼（Piero Gianpaolo Orsini）的由800名骑兵和200名步兵构成的雇佣兵部队分为六个中队，其中有两名中队长也来自奥尔西尼家族。^①

康多提埃里与追随他的雇佣兵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属性。第一重关系是追随者对康多提埃里个人的效忠。有些追随者本来就是康多提埃里的封臣或其封臣的子弟，有些追随者是康多提埃里自己的家族成员，其他人则是在从事雇佣兵这一行当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其首领的忠诚。无论如何，雇佣兵忠诚于康多提埃里个人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况。这既是康多提埃里与雇主博弈的资本，也是引起雇主忧虑，并给康多提埃里招来祸害的原因之一。穆齐奥·阿滕多罗·斯福尔扎效力于那不勒斯期间，因卷入政治纷争曾两度被投进监狱，只是由于他的家人不懈努力，以及他的部队展现出的顽强意志才使他获得释放。^②

第二重关系是由于共同从事雇佣兵这一职业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康多提埃里是与雇主签订合同的人。在与雇主签订合同后，他不仅要带领追随者为雇主打仗，而且负责发放军饷和分配战利品。通常情况下，雇主会将报酬交给康多提埃里，再由他发放给士兵。从这一角度看，康多提埃里的角色类似于现代经济领域的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107–108.

② *Ibid.*, p. 68.

承包人。

第三，康多提埃里与他的追随者之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师徒关系。除了那些原本就是君主的少数人以外，几乎所有的康多提埃里早年都有追随别人充当雇佣兵的经历，在这一过程中从首领身上学习指挥作战的艺术和管理部队的方法。从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70年代，意大利境内最著名的雇佣兵首领中，巴比亚诺早年曾追随霍克伍德充当雇佣兵，斯福尔扎和博拉齐奥早年都曾追随巴比亚诺，而科莱奥尼早年曾追随博拉齐奥。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一个雇佣兵在不同阶段先后追随过多名康多提埃里。当他的军事经验和声望积累到可以组织一支自己的部队时，他就可能转变为一名康多提埃里。有时候，已经成为康多提埃里的“徒弟”仍会带领自己的部队在“师父”旗下作战一段时间。例如，在1379年以前的若干年中，巴比亚诺虽已有自己独立的部队，但还总是在霍克伍德旗下作战。当然，这种师徒关系并不妨碍他们效力于不同雇主时在战场上各为其主，正如后来效力于米兰的巴比亚诺与统率佛罗伦萨军队的霍克伍德所做的那样。

四、雇佣兵都是“无用”和“不忠”的吗？

雇佣兵和外国援军是无用而且危险的。如果有人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雇佣兵身上，他就永远得不到清静和安全，因为雇佣兵都是一盘散沙，野心勃勃，纪律涣散，缺乏忠诚。他们面对朋友时强横无比，面对敌人则胆小怯懦。他们不敬

畏上帝，对人也不守信用……他们上战场没有什么忠君爱国或其他理由，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军饷，而这点军饷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卖命。在你不发动战斗时，他们愿意当你的兵，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就逃之夭夭……雇佣兵首领要么是能干的，要么是无能的；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就不能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望扩张自己的势力——通过压迫你这个主人，或者违背你的意愿压迫别人——如果雇佣兵首领是无能的，他总是使你遭到毁灭。^①

这段话出自马基雅维里的名著《君主论》，其核心意思可以概况如下：雇佣兵打仗不卖命，所以是无用的；雇佣兵对雇主极不忠诚，所以是危险的。由于《君主论》的巨大影响，上述说法一代代流传下来，至今仍影响着世人对雇佣兵的认识。然而，这种流传广泛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对马基雅维里关于雇佣兵的说法并不是没有人质疑。早在1976年，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就指出，马基雅维里关于雇佣兵打不流血的仗这一指控并不符

^① Nicholas Machiavelli, *Nicholas Machiavelli's Prince Also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of Lucca, and The Meanes Duke Valentine us'd to put to death Vitellozzo Vitelli, Oliverotte of Fermo, Paul, and the Duke of Gravina*, London: R. Bishop, 1640, pp. 92-94. 这是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与《卡斯特鲁乔传》等著作收录在一起的一个英译本。《君主论》的中译本都将“mercenary”一词译作“雇佣军”，参见〔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58页；〔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张志伟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页；〔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合事实。^①法国学者菲利普·孔塔米纳在1980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曾指出，马基雅维里低估了雇佣兵作战的伤亡数字。^②英国学者大卫·帕罗特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马基雅维里关于雇佣兵伤亡的数字是虚构的，根源在于其反对雇佣兵的立场。^③不过，上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系统论述，也未触及马基雅维里有关雇佣兵观点的其他方面。因此，结合史实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辨析，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马基雅维里评说雇佣兵的主要依据是他对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的观察。为论证其观点，马基雅维里援引了古代迦太基人和底比斯人依赖雇佣兵的史实，但更主要的是援引了中世纪晚期米兰、那不勒斯、威尼斯、佛罗伦萨等意大利邦国依赖雇佣兵的史实，试图通过这些例证使读者相信其论断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④卒于1527年的马基雅维里没有机会看到，16—18世纪欧洲的雇佣兵中有大量与他的说法不符的例子。下文不打算援引马基雅维里生活时代以后的例子，而将通过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的实例，对马基雅维里提出的雇佣兵“无用”与“不忠”的看法进行辨析。

①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p. 26

② Philippe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p. 258.

③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8.

④ Nicholas Machiavelli, *Nicholas Machiavelli's Prince Also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of Lucca, and The Means Duke Valentine us'd to put to death Vitellozzo Vitelli, Oliverotte of Fermo, Paul, and the Duke of Gravina*, pp. 95-101.

（一）关于雇佣兵打仗是否卖命的问题

在1427年10月12日的马克罗迪奥（Maclodio）战役中，由著名雇佣兵首领弗朗切斯科·达·卡马尼奥拉统率的威尼斯军队彻底击败了同样由雇佣兵组成的米兰军队，威尼斯方面抓获了数量庞大的战俘，其中包括米兰军队最高统帅卡罗·马拉泰斯塔。然而，到了第二天，双方的战俘没有缴纳赎金就全部被释放了。这件事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交战双方的雇佣兵在未征得各自雇主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彼此协商释放了战俘，所以这件事成了人们指责雇佣兵打仗不卖命的一个经典例证。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奥斯卡·布罗宁对此事的解读是，雇佣兵们释放俘虏的原因是他们希望战争能持续下去，因为对他们来说和平就意味着失业。^①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事件中雇佣兵的行为动机还应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中世纪晚期活跃在意大利的雇佣兵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14、15世纪意大利境内几乎所有雇佣兵首领都处在一个师承关系前后相继的网络中。除师徒关系外，效力于同一支部队的雇佣兵之间也存在类似于现代职场上同事关系的那种熟人关系。尽管彼此熟识并不意味着关系一定友好，但相互交织的人际网络和共同从事雇佣兵这一特殊职业，使雇佣兵之间产生了一种互相同情。

关于马克罗迪奥战役后释放俘虏这件事，除了分析雇佣兵们的动机，更应当依据当时的法律或惯例来评判其行为是否合理。

^① Oscar Browning, *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 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 from 1409—1530*, p. 27.

按照中世纪晚期欧洲通行的惯例，虽然在战争中征服的领土归属于雇主，但抓获的战俘归属于俘获者个人，俘获者对他抓到的战俘享有索取赎金的合法权利，他也可以将这种权利出售或让渡给他人。^① 马克罗迪奥战役的胜利使威尼斯获得了贝加莫及其周边地区的领土（随后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在大陆上永久占据的最大一片领土）。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意味着以卡马尼奥拉为首的雇佣兵们已经履行了对雇主的义务。至于如何处理他们抓获的俘虏，那是他们自己权限内的事情。虽然不收取赎金就释放战俘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雇佣兵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中世纪欧洲骑士之间的战争有一个特点：“如果他们的敌人同为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就不会以除掉对手为宗旨。他们的目标是生擒对手，索要赎金。”^② 例如，在1119年英王亨利一世击败法王路易六世的布雷穆勒（Brémule）战役中，只有3名法国骑士战死，被俘的却有140名。根据研究军事史的大师级学者汉斯·德尔布吕克的说法，这不仅是因为骑士们希望生擒对手以索取赎金，还因为骑士中间正在发展出一种阶级精神，将敌方的骑士也视为兄弟或同志。^③ 在这点上，由骑士组成的雇佣兵与按照封建义务组织起来的骑士军队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马基雅维里

① Rémy Ambühl,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Ransom Cultur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3.

② [法] 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梁爽、田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12页。

③ 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 Volume III, translated by Walter J. Renfro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2, p. 287.

所批评的“在战斗中不互相残杀，但可以互相俘虏”，并非雇佣兵首创，而是骑士之间作战的常态，据此无法得出“雇佣兵打仗不卖命”的结论。事实上，“雇佣兵打仗不卖命”是个不值一驳的说法，因为雇佣兵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战场上英勇战斗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482年的坎波莫托（Campomorto）战役中，大约1200具尸体留在了战场。即便是地位高的雇佣兵首领，阵亡的风险也是确实存在的。在15世纪的意大利，指挥超过200个兰斯的雇佣兵首领一共有170名，其中有12人直接死于战斗。^①

雇佣兵如果真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那样无用，怎么可能从中世纪晚期一直兴盛到近代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欧洲最重要的军队类型呢？又如何理解欧洲众多君主及罗马教皇把贴身警卫的职责托付给雇佣兵呢？

作为《用兵之道》^②一书的作者，马基雅维里并非军事理论的门外汉，何以会有雇佣兵“打仗不卖命”“打不流血的仗”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呢？

一方面，持有这种看法可能与他所依赖的某些史料不准确有关。马基雅维里在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佛罗伦萨史》对14、15世纪意大利一些战役伤亡数字的记述并不准确。比如1440年的安吉亚里（Anghiari）之战，《佛罗伦萨史》的记述是：“只死了一名兵士；但他并非死于敌方的刀枪之下，也不是由于他曾进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197–198.

② 参见 Nicholas Machiavel, “The Art of War”, in *The Works of Nicholas Machiavel*, Vol. IV, translated by Ellis Farnsworth, London: T. Davies, 1775。

行过什么英勇而光荣的战斗，而只因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人们踩死。”^①然而，根据学者们考证，这场战役双方伤亡总数实际上达到900人。^②再比如，1467年的莫利内拉（Molinella）之战，《佛罗伦萨史》的记述是：“只打伤了一些马匹，抓了一些俘虏，但无一人死亡。”^③实际上，这场战役双方军队伤亡总数在600—700人，编年史对这场战役有“数日后，死尸的腐臭遍布乡野”的描述。^④

另一方面，产生上述片面认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雇佣兵的使用与马基雅维里在军事理论上的主张相悖。马基雅维里在《用兵之道》与《君主论》等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张是，无论君主还是共和国，都应当只靠国民兵打仗，依靠雇佣兵或外来援军只会带来灾难和损失。^⑤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入侵意大利拉开了意大利战争的序幕，随后几十年意大利沦为法国、西班牙及德意志等外部列强任意蹂躏践踏的对象，马基雅维里将这种灾祸的根源归咎于此前两个世纪意大利各邦国对雇佣兵的依赖。为了将意大利从当前的灾祸中解救出来，马基雅维里开出的药方是拒绝使用雇佣兵。但历史事实表明，马基雅维里的主张在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可行的良方。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雇佣兵的许多实例证明，雇佣兵打仗也是

①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9页。

②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97.

③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第384页。

④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 197.

⑤ Nicholas Machiavel, "The Art of War", in *The Works of Nicholas Machiavel*, Vol. IV, pp. 36—38.

卖命的。尽管其为金钱利益卖命的行为并不高尚，但是不可否认，其对雇主而言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二）关于雇佣兵首领的政治野心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雇佣兵首领中有些人本来就是邦国的君主，但也不乏雇佣兵首领攫取权力，从而变身为邦国君主的例子。尤其是那种在自己出生的邦国受到排挤，被迫流亡的贵族子弟，通过充当雇佣兵得到声望和军队指挥权后，往往会寻找机会夺取母邦的统治权。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出身于卢卡一个贵族家庭。在16岁那年，由于圭尔夫派在卢卡掌权，卡斯特鲁乔跟随父母逃离卢卡，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雇佣兵首领。1314年，他帮助乌古齐奥内·德拉·法吉沃拉征服了卢卡。1315年，他统率乌古齐奥内的军队击败佛罗伦萨。第二年，他便推翻了法吉沃拉，自己成为卢卡的君主。^①

比奥尔多·米凯罗梯（Biondo Michelotti）是一位来自佩鲁贾的雇佣兵首领，曾经效力于米兰，后来被佛罗伦萨共和国任命为军队最高统帅。1393年，他回到佩鲁贾，并成为这个城邦的统治者，但他在五年后被谋杀了。^②

^① Nicholas Machiavelli, *Nicholas Machiavelli's Prince Also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of Lucca, and The Means Duke Valentine used to put to death Vitellozzo Vitelli, Oliverotto of Fermo, Paul, and the Duke of Gravina*, pp. 223–288.

^② David Murphy, *Condottiere 1300–1500: Infamous Medieval Mercenaries*, p. 51.

安德烈亚·博拉齐奥出身于佩鲁贾一个有权势的贵族家庭。14世纪90年代初，他的家族在政治斗争失败后成为流亡者。他在1414年被教皇约翰十三世任命为军队最高统帅。1416年，他利用康斯坦斯宗教会议后教廷缺乏掌控力的时机，率兵攻占了佩鲁贾，成为一个邦国的君主。1424年，博拉齐奥死后，他所建立的统治就瓦解了。^①

穆西奥·阿腾多罗·斯福尔扎之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也是一名非常成功的雇佣兵首领。弗朗切斯科曾效力于维斯孔蒂家族统治下的米兰，担任过米兰军队最高统帅。1477年，米兰公国因公爵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出现政局混乱。弗朗切斯科在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开创了统治米兰一个多世纪的斯福尔扎王朝。^②

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出现了这么多登上君主之位的雇佣兵首领是很不寻常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即使偶尔出现过也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被称作“雇佣兵的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雇佣兵首领攫取邦国统治权的事例可能影响了马基雅维里对雇佣兵的看法，使他对一切雇佣兵都抱有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情绪和他主张只用国民兵的立场蒙蔽了他的眼睛，以至于对那些忠实服务于雇主事业、个人没有政治野心的雇佣兵视而不见。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69–72.

② Oscar Browning, *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 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 from 1409–1530*, pp. 49–57.

1378年，来自意大利维罗纳一个贵族家庭的雅各布·达尔·维尔梅（Jacopo dal Verme）被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galeazzo Visconti）任命为米兰军队最高统帅。从此以后，维尔梅以这一身份为米兰忠实地服务了三十年。1391年在亚历山大里亚（Alessandria）面对阿马尼亚克公爵率领的法国军队，1401年在布雷西亚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维尔梅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奖赏，维尔梅从詹加莱亚佐那里获得多处地产和城堡，还在1390年被接纳为米兰公民。因为率领米兰-威尼斯联军与帕多瓦作战取得的成功，他在1388年被威尼斯授予贵族头衔，并在威尼斯获得了一座宫殿。^①

出身于英格兰小贵族家庭的约翰·霍克伍德是在14世纪的意大利声名最显赫的雇佣兵首领。1380年以后，他与佛罗伦萨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雇佣关系。作为对其忠实服务的回报，同时也是为了笼络住这位极有价值的雇佣兵首领，佛罗伦萨对霍克伍德的奖赏是十分慷慨的。除了地产与几座位于战略要地的城堡，以及佛罗伦萨城中的一处住所外，霍克伍德从佛罗伦萨得到每年2000弗罗林的终身年金，他的妻子也获得每年1000弗罗林的年金（从霍克伍德去世后开始领取），他的三个女儿出嫁时都得到2000弗罗林的嫁妆。此外，他本人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尚未出生的男性后裔都被一次性地授予了佛罗伦萨的公民权（条件是他们不得担任公职）。^② 以上这些都是合同规定的报酬以外的奖励。1390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p. 52–54.

② 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 299.

年，佛罗伦萨付给霍克伍德的薪水是每月 3.75 万索尔多，相当于建筑师薪水的 72 倍，普通建筑工人薪水的 140 倍。^①霍克伍德死后，佛罗伦萨为他举行了国葬，并立即委任著名艺术家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绘制纪念他的壁画。^②

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是来自贝加莫一个贵族家庭的著名雇佣兵首领，他在 1455 年至 1475 年一直担任威尼斯军队的最高统帅。在临终遗嘱中，他不仅免除了威尼斯共和国拖欠他的军饷，还将 10 万杜卡特^③现金赠给威尼斯政府，专门用于威尼斯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另外，他还把费拉拉侯爵欠他的 1 万杜卡特债权赠送给威尼斯共和国。科莱奥尼死后，威尼斯共和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委托著名艺术家制作科莱奥尼的纪念雕像（图 1）。^④这尊由达芬奇的老师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创作的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铜像至今仍矗立在威尼斯的圣乔凡尼·保罗（San Giovanni Paolo）教堂旁边的广场上，不仅成为这个雇佣兵将领的恒久纪念，而且作为一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被来自全世界的无数参观者瞻仰。

① 索尔多（soldo）是一种意大利铜币。在 14 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一个人维持基本生存一天大约需要 3 索尔多。Hunt Janin with Ursula Carlson, *Mercenar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 p. 122.

② 现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霍克伍德壁画是 1436 年重新绘制的。

③ 杜卡特（ducato）是中世纪至近代早期威尼斯铸造的一种金币，含金量约 99.7%，重 3.56 克，因价值高、便于携带，在欧洲广受欢迎。

④ Oscar Browning, *The Life of Bartolomeo Colleoni, of Anjou and Burgundy*, pp. 52-57.



图1 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 1493 年创作的科莱奥尼骑马铜像

维尔梅、霍克伍德和科莱奥尼是那种忠实服务于雇主事业、个人没有政治野心的雇佣兵首领的典范。^①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还有不少雇佣兵因为忠实服务而获得荣誉头衔、终身年金、国

^① 维尔梅和霍克伍德等雇佣兵首领被其效力的城邦授予公民权，是一种荣誉性嘉奖，并未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兵的身份。霍克伍德在获得佛罗伦萨公民权以后，没有减少以英王特使的身份为自己的母国英格兰进行外交斡旋的活动。结束其漫长的雇佣兵生涯后，霍克伍德在 1393 年开始变卖在佛罗伦萨的不动产，准备返回英格兰定居。然而，其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未能返回英格兰便在 1394 年去世了。参见 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p. 312–313。

葬、死后的纪念画像或纪念雕像等各种嘉奖。这说明，笼统地给所有雇佣兵贴上“不忠”的标签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确曾出现过一系列攫取邦国统治权的雇佣兵首领，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忠实服务于雇主、没有政治野心的雇佣兵首领，马基雅维里的偏颇之处在于只看到前者，对后者视若无睹。

（三）关于雇佣兵背弃雇主的问题

除攫取邦国统治权的政治野心外，雇佣兵被批评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抛弃雇主，转而效力于新的雇主，即背弃雇主的问题。

在14世纪意大利的战争中，用金钱收买敌方雇佣兵是削弱对手的重要手段，这个时期雇佣兵临阵投敌的现象很常见。在1364年比萨与佛罗伦萨的战争中，由1.2万名英格兰、瑞士和德意志雇佣兵组成的比萨军队成功地将佛罗伦萨军队赶回城中，并对周边的乡村进行劫掠。佛罗伦萨政府用10万弗罗林收买了比萨方面的雇佣兵首领，使他们同意五个月的休战，立即解除了对佛罗伦萨的围困。其中只有霍克伍德拒绝了金钱贿赂，也拒绝了为佛罗伦萨服务的邀约，他不得不带领大约800名士兵向比萨撤退。佛罗伦萨军队一直将他们追至比萨城门，并在比萨城外展开报复。^① 屡屡拒绝这种收买也正是霍克伍德赢得良好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David Murphy, *Condottiere 1300–1500: Infamous Medieval Mercenaries*, p. 48.

到了15世纪，意大利各邦国与雇佣兵之间的合同期限变长，多数雇佣兵逐渐习惯于长期效力于相对固定的雇主，背上“不忠”的恶名不再是一种可以轻易尝试的风险了。在15世纪的意大利战场上，被收买的雇佣兵首领临阵倒戈的现象已基本绝迹。不过，合同没到期就抛弃旧雇主转投新雇主的情况仍经常发生，这种行为当然也是对原雇主的背弃。因为有多次抛弃雇主的行为，来自翁布里亚的波尔德里诺·达·帕尼科勒（Boldrino da Panicale）背上了不忠的名声，他的最后一位雇主不希望看到他下一次的背叛，在一场宴会上将他谋杀了。^①

在不适当的时候提出离开请求也会被视为背弃雇主。1409年4月30日威尼斯元老院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一些雇佣兵首领提出离开威尼斯的请求激怒了元老院，因为当时正值春天，作战季节刚刚开始，那些部队已经被威尼斯供养了整个冬天，有的已经供养了几年。元老院将这种请求视为不忠，决定将任何在9月份以前离开的雇佣兵首领列入永不叙用的黑名单，除非他将来获得元老院的专门批准。^②

上述情况表明，马基雅维里指责雇佣兵不可靠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包括马基雅维里在内的评论者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雇佣兵背弃雇主几乎都发生在拖欠军饷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上文提到的1364年被佛罗伦萨收买的雇佣兵被比萨方面拖

① Michael Mallett,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p. 58.

② Michael Mallett and John R. Hale,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 Venice c. 1400 to 16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5.

欠的军饷总数高达6万弗罗林。^①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整个欧洲没有哪个雇主不拖欠雇佣兵的军饷，各个雇主间的区别只是在拖欠的程度上，而且很多时候被拖欠的军饷是永远得不到偿付的。认真为雇主服务是雇佣兵的义务，按时、足额支付军饷是雇主的义务。在雇佣兵们已经履行义务的前提下，雇主一方不能按时支付军饷就已经违背了双方之间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合同没有到期，雇佣兵们为了生计转投新的雇主也有其合理之处。

至于那些合同到期重新寻找雇主的雇佣兵，即便与原来的雇主为敌，说他们背叛雇主也属于过分苛责了。不过从雇主的角度来说，有能力的雇佣兵首领离开自己去效力于对手，确实是件令人担忧的事。所以雇主对那些有能力的雇佣兵首领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加以笼络，另一方面不惜采取公开处决或谋杀的手段防止其为别人效力。威尼斯共和国处死其军队最高统帅卡马尼奥拉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此有必要详细讨论一下。

卡马尼奥拉统率威尼斯军队在1425年和1427年两次击败米兰，帮助威尼斯征服了许多领土。但1431年战端重启后，威尼斯在战场上遭遇失利。这个共和国的政府对其军队统帅开始产生了怀疑。到了1432年，这种怀疑更加强了，因为当时确实有米兰公爵维斯孔蒂的信使不断进入卡马尼奥拉的军营。威尼斯元老院不得不在2月22日告诫卡马尼奥拉不要相信维斯孔蒂的特使们。1432年3月29日，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做出了诱捕卡马尼奥拉的决

① William Caf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 108.

定。他们派一名信使到卡马尼奥拉当时所在的布雷西亚，请他到威尼斯来商讨即将开始的春季战役。如果卡马尼奥拉拒绝前来，就由布雷西亚总督将他逮捕并关进城堡。然而，卡马尼奥拉痛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到达威尼斯后受到总督的热情欢迎，但他的随从被拦在总督府门外。进入总督府后，卡马尼奥拉被投进了监牢。他和他的管家均受到严刑拷打。十人委员会最后判决卡马尼奥拉有罪。在如何惩处的问题上，有一部分人主张将他关进一个城堡，但处死的主张占了上风。卡马尼奥拉在圣马可广场被公开斩首后，威尼斯政府给了他妻子一份年金，他的几个女儿也都得到了妥善安排。^①

卡马尼奥拉之死究竟是一场冤案还是他罪有应得？我们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据来解答这个问题。奥斯卡·布罗宁认为十人委员会“可能”掌握了卡马尼奥拉背叛的证据，理由是这个委员会在经过仔细询问和长时间的审议后才做出判决，如果他们打算秘密杀害卡马尼奥拉是很容易做到的。^②但问题是，如果卡马尼奥拉的确已经勾结米兰背叛了威尼斯，他在收到元老院的告诫，从而知道威尼斯政府对他有所怀疑的情况下，怎么可能那么痛快地接受前往威尼斯的邀请？他死后威尼斯政府又为什么对其家属进行经济补偿呢？就连对雇佣兵有成见的马基雅维里，对这件事的解释也不过是“在他率兵击败米兰公爵后，威尼斯人深知卡马尼奧

^① Oscar Browning, *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 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 from 1409–1530*, pp. 26–31.

^② Oscar Browning, *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 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 from 1409–1530*, p. 31.

拉才具非凡，但看到他在战争中缺乏热忱，认为再也不能依靠他进行伟大的征服了；威尼斯人不愿解雇他，那样可能使他们丧失已经得到的战果，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不得不把他处死”。^①笔者认为，威尼斯政府处死卡马尼奥拉并不是确实掌握了他背叛的证据，而仅仅是出于未经证实的怀疑。处死一名功勋显赫的军队统帅，对以后招募其他雇佣兵首领必定会有负面影响，这恐怕是十人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长期审议，并且没有使用秘密杀害方式的原因。

像卡马尼奥拉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于雇主之手的雇佣兵首领还有不少，比如被佛罗伦萨政府谋杀的巴尔达西诺·德·安吉里，被米兰公爵杀死在监牢中的梯贝托·布兰多里尼，被那不勒斯国王杀死的雅各布·皮奇尼诺，等等。如果被怀疑不忠诚的雇佣兵首领是冤枉的，那么仅凭怀疑就将功勋卓著的雇佣兵首领处死难道不是背信弃义吗？一面指责雇佣兵的不忠，一面对雇主的背信弃义视而不见，这是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学者造就的一种偏见，应当加以客观分析。

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军事理论家，但马基雅维里对雇佣兵的看法是偏颇的。所谓“雇佣兵打仗不卖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不止一例雇佣兵首领

^① Nicholas Machiavelli, *Nicholas Machiavelli's Prince Also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of Lucca, and The Means Duke Valentine us'd to put to death Vitellozzo Vitelli, Oliverotto of Fermo, Paul, and the Duke of Gravina*, pp. 98-99.

攫取政权的情况，但同时还存在许多忠实服务于雇主的雇佣兵，马基雅维里的偏颇之处在于只看到前一种情况。14世纪意大利战场上确实有许多雇佣兵被收买临阵倒戈的情况，但雇佣兵背弃雇主几乎都发生在拖欠军饷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在批评雇佣兵不可靠的时候，也应看到雇主一方的背信弃义，如此方能得出对雇佣兵更为公允的评价。

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雇佣兵当中，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的雇佣兵是值得格外重视的。首先，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是欧洲雇佣兵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经历过古典时代雇佣兵的兴盛后，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大约八个世纪里雇佣兵在欧洲呈现相对沉寂的状态，中世纪晚期雇佣兵在欧洲重新兴起的过程中，吸引欧洲各地雇佣兵汇聚的中心便是经济富庶而又处于“战国时代”的意大利。其次，在雇佣兵的一些具体运作模式上，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就好像在为近代早期整个欧洲的雇佣兵进行预演，比如15世纪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就是16—18世纪活跃于欧洲各地的军事承包人的先驱。另外，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境内雇佣兵的嚣张及其对雇主的威胁程度，在世界雇佣兵历史上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百年战争期间自由军团在法国等地也对国家权威形成过一定挑战，但与法国王权相比，意大利多数邦国的力量更加弱小，因而在自由军团的威胁面前更加绝望。到了15世纪，尽管康多提埃里不像14世纪的自由军团那样强势，但还是有不止一位康多提埃里成为意大利某个邦国的君主。



近代早期

欧洲的

军事承包人



军事承包制是近代早期欧洲军事领域的一种独特现象，它与这一时期欧洲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些重要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军事承包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但迄今为止仅有弗里茨·雷德里希和大卫·帕罗特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德裔美籍经济史学家弗里茨·雷德里希主要从投资、风险和收入等经济学视角考察了德意志军事承包人的发展史。^①英国史学家大卫·帕罗特则主要从作战效用的角度考察了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承包人的发展过程。^②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可以互为补充，但在某些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章将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从厘清概念入手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加深关于军事承包人这个社会群体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

一、什么是军事承包人

本书所讨论的军事承包人是近代早期活跃在欧洲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在战场上作为指挥官的作用与一般意义上的军官大致无异，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通过招募、供养和管理军队来获取利润，换言之，他们像企业主对待企业那样经营着自己所招募的军队。当然，那些专门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食物、服装及日用

^① 参见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② 参见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品的物资供应商或随军小贩并不属于军事承包人。

“军事承包人”这一概念对应的英文是“military contractor”，其中的“contractor”意为“承包人”或“签约者”，因此这个名词也可翻译为“军事签约者”。这是一个囊括了各种国籍的欧洲人的社会群体。弗里茨·雷德里希认为近代早期德意志的军事承包人具备现代企业家的属性，所以他选择用“军事企业家”这个术语来称呼他所研究的军事承包人。^①大卫·帕罗特也沿用了“军事企业家”这一术语，在这两人的著作中有时也使用“承包人”这一术语称呼那些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两位学者使用了相同的名称，但他们对“军事企业家”或“承包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在雷德里希的著作中，“军事企业家”或“承包人”既包括自己筹资招募士兵的人，也包括预先从雇主那里获得资金招募士兵的人，但不包含专门供应军用物资的人；而大卫·帕罗特著作中的“军事企业家”或“承包人”则专指那些凭自行筹措的资金，向有需求的政府提供军队或军用物资的个人，不包含那些由雇主预先提供资金招募雇佣兵的人。

实际上，这两位学者对军事承包人的理解均有可商榷之处。雷德里希对军事承包人的界定不考虑招募资金的来源，因而“军事企业家”或“承包人”的称谓就几乎适用于历史上一切雇佣兵首领了；而帕罗特将那些军用物资供应商包含在“承包人”中，与大多数学者对这一名词的习惯用法又有出入。上述两种定义的军事

^① 弗里茨·雷德里希的这项研究最初就是在哈佛大学企业史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开展的。

承包人所指对象的重叠部分，就是本书对军事承包人的界定范围。

军事承包人是历史上多种多样的雇佣兵首领中的一种类型。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兵首领比较起来，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承包人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其一，军事承包人在招募和供养士兵中投入自己的资金或者他借贷来的资金，那些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具备某种才能被推举出来的雇佣兵首领不属于军事承包人；其二，古典时代或中世纪的雇佣兵首领与士兵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伙伴关系，而军事承包人与他们的士兵之间却形成了一种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二、军事承包人在欧洲的兴衰过程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揭示，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与麾下的士兵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雇佣关系。实际上，他们是欧洲最早的一批军事承包人。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与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承包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康多提埃里领导的雇佣兵以骑士为主，而16世纪以后的军事承包人领导的雇佣兵主要是步兵。

从15世纪末开始，瑞士成为欧洲最著名的雇佣兵输出地。瑞士联邦议会和各州政府在输出雇佣兵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多数情况下负责招募、管理和指挥的是瑞士当地的军事承包人。^①在近代早期欧洲的雇佣兵市场上，来自苏格兰、爱尔兰、德

^① 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意志及其他地方的雇佣兵，虽然名声与身价不及瑞士雇佣兵，但其人数同样不少，而招募、供养、管理与统率这些雇佣兵的工作，大部分也是由军事承包人来承担的。

欧洲军事承包人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达到鼎盛状态。由于军事承包人投入自己的金钱及他们借贷的资金为雇主招募和供养士兵，交战各国的政府得到了远超其财政负担能力的军队。战争前期，古斯塔夫率领的瑞典军队与瓦伦施泰因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主要是由军事承包人招募的，其士兵数量在17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628—1629年，瓦伦施泰因的军队人数超过了10万，而古斯塔夫的军队人数在1631年可能达到了15万。^①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达到极限，难以持久。同一时期，以巴伐利亚为首的天主教联盟的军队规模始终较小，它没有使用军事承包人，即便使用雇佣兵也是采取传统方式。在战争后期，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先后放弃了依赖军事承包人的政策，因此双方的军队规模都有显著下降。

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各国相继走上发展常备军的道路，军事承包人日渐丧失其重要性。然而，各国摆脱军事承包人的过程并不平衡。自17世纪后期起，以黑森-卡塞尔为代表的德意志诸侯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雇佣兵提供者。这些德意志诸侯想方设法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常备军，并将其常备军出租给有需求的雇主，再以换来的“津贴”供养其部队。这种运作模式使他们在17世纪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 180.

未摆脱了对上校与将军级别的军事承包人的依赖。不过，德意志诸侯对上尉级别的军事承包人的依赖又持续了一个世纪。与此对照，向德意志诸侯们支付的巨额“津贴”形成财政上的压力，使法国直到18世纪末才摆脱对上校和将军级别的军事承包人的依赖。^①由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义务兵爆发出的巨大力量，进入19世纪以后，各层次的军事承包人均退出了欧洲历史舞台。

三、军事承包人的工作与生意

军事承包人是同时具有多重身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身份之一是负责招募、管理和指挥军队的职业军官。在与雇主签订合同的时候，军事承包人会被雇主授予上校、上尉或将军的军衔（取决于合同所涉及军队的规模）。在完成招募、管理和指挥军队的工作方面，军事承包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当中多数人出身于贵族（往往是没有继承权的贵族非长子或私生子），有的人的家族连续数代都是军事承包人。中世纪以来欧洲贵族阶级所具有的尚武精神和领导才能，是这一阶级中的许多人成为出色的职业军官的重要因素。此外，家族的财富、血缘纽带及其在地方上的势力，在贵族出身的军事承包人完成招募士兵的工作中发挥了极为有利的作用。基于职业军官的身份，军事承包人必须服从雇主的

^①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I, p. 104.

命令，接受雇主委派的代表的监督。

军事承包人另外一重身份是生意人。他们投入资金招募、供养一定数量的士兵，并通过让这些士兵服务于某个雇主来获取利润。作为生意人的军事承包人与雇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生意伙伴关系。有时候，他们先招募好一支部队，然后再设法将招募好的部队兜售给有需求的雇主。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通常采取这种做法。近代早期的军事承包人则通常是先与雇主签订合同，然后再招募士兵，而且在签订合同后雇主往往预付招募资金。从这一点看，他们似乎并不属于军事承包人。然而，雇主预付的资金不一定足够支付招募、装备和运送新兵到集合地点的费用，往往还需要军事承包人的投资。例如，1574年，霍恩埃姆斯（Hohenems）签了一份合同，为西班牙国王在特里尔与上德意志招募一个4500人的步兵团。至当年11月，他就为招募工作投入其家族资金及借贷来的46844弗罗林。^①此外，由于急剧膨胀的军费需求与政府财政资源之间的矛盾，雇主应当提供的军队给养和士兵工资常常被拖欠。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士兵们留下来并避免发生哗变，指挥官们需要设法筹措资金维持军队的给养。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向控制区的人民勒索或放手让士兵抢劫外，常常需要投入他们自己的或借贷来的资金。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当一支部队突然遭到解雇，士兵们通常不会就此解散各自回家，指挥官便会派人向各个潜在的雇主兜售这支部队，这时他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90.

们的行为就变得类似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康多提埃里。例如，1622年7月，遭到挫败的波希米亚前国王、巴拉丁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命令统率其剩余军队的曼斯菲尔德（Ernest von Mansfeld）和克里斯提安（Christian of Braunschweig）解散军队，以谋求一个不太苛刻的和平协议。两位将军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敌军指挥官，并表示他们愿意率领这支已经许久没领到军饷的部队为神圣罗马帝国效力，或带领他们离开神圣罗马帝国，条件是皇帝支付这支军队被拖欠的军饷，并解除对他们两个人的权利褫夺。这一提议被拒绝后，曼斯菲尔德同时与四个潜在的雇主展开谈判，最终与荷兰达成协议。^①

军事承包人的生意主要是承包军事服务，但其军事服务的报酬通常要拖欠很久才能得到偿付，甚至可能最终得不到偿付。事实上，他们与雇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借贷关系。军事承包人与雇主之间的借贷关系主要表现为他们垫付资金招募和供养士兵。比如，1638年，马克西米连·冯·列支敦士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在匈牙利拉布（Laab）要塞的指挥官，他需要自己垫付资金来修缮要塞，以防备土耳其人进攻。1645年，米兰德（Melander）就任神圣罗马帝国陆军最高统帅时被要求贷一笔款项给皇帝。累积起来，军事承包人借贷给雇主的资金量是十分庞大的。这其中不仅包括他们自有的资金，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他们通过抵押不动产、珠宝、银器等向亲戚朋友或商业金融家借来的。16—17世纪商业金融家们

^①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p. 213–214.

以这种方式大规模地参与到欧洲国家的战争金融链条中来。他们宁愿同能提供抵押物的军事承包人打交道，也不愿意直接贷款给军事承包人的雇主，因为当时欧洲各国统治者信用状况普遍都很糟糕。关于这种借贷关系对维持战争机器运转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引述一段查尔斯·蒂利的精辟分析：“在1500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获胜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昂贵，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在筹集资金上……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从当前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们的军事费用……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就能把开支的节奏和收入的节奏分开，在收入之前花费。这使昂贵的战争变得更为容易负担，因为用于人力、武器和其他战争必需品的开支通常是波动的，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一般从一年到另一年很少变动。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更快地调动资源，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机会。”^① 16—18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把组织军队和打仗这样重要的任务承包给私人，根本原因恐怕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才干，而在于其投资可以弥补政府财源的不足。

军事承包人愿在雇主的战争努力中投入资金当然是因为可以期望获得更大回报，他们获取回报的形式有多种。其一，雇主常常把战争中征服（外国）的或没收（叛逆者）的土地作为对军事承包人的报酬，这种土地赏赐有时还伴随一个贵族封号，对于那些渴望财富同样渴望更高社会地位的军事承包人具有很大的吸引

^①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 p. 85.

力。不过，这一丰厚报酬能否持续保有取决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其二，通常情况下，雇主支付给军事承包人的薪水远高于相同级别的其他军官，高出的部分可以视作对其投资的分期偿还。其三，在服务期结束后，那些效力多年、功勋卓著的军事承包人往往可以从雇主那里领取年金。其四，礼物馈赠也是雇主回报军事承包人的常见形式。

来自雇主的报酬并非军事承包人经济收入的全部，有时甚至不是其主要的收入。军事承包人来源于雇主以外的收入也有多种形式。其一，担任战场指挥官的军事承包人通过征收超过维持军队所需的“军税”（contribution）^①为自己谋利。其二，抢劫。敌国一切可移动财产均属于战争胜利者，这一原则直至17世纪仍存在于欧洲战争法观念中。当军队进入一个近期末遭受过战争蹂躏的地区时，抢劫收益可能非常丰厚。1620年，波希米亚战役结束后，一位军官说，假如哪个上校或上尉没有通过抢劫弄到3万弗罗林，他必然是个笨蛋。^②其三，赎金。从中世纪至17世纪前期，欧洲战争中的俘虏都被视为俘获者个人的战利品，战俘的赎金也是战争可期望的一项重要收入。其四，有的军事承包人也利用其身份带来的便利从事武器弹药等物资的生产和销售。瓦伦施泰因不仅是三十年战争中最著名的军事承包人，他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还以前所未有的规

① 军队直接向其控制区域内人民强征的税。

②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 361.

模供应着帝国军队。^①1634年，苏格兰枢密院批准了军事承包人罗伯特·门罗的请求，授权他和他的继承人在苏格兰制造和销售火枪等武器，并规定除王家外其他人不得从事这一行业。^②

军事承包人获取利润的机会多，但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多。作为军官，他们非自然死亡的风险很高。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总数约1500名上校和将军级别的军事承包人中，有214人在战斗中阵亡或负伤致死，比例高达14%。^③作为生意人，他们投资的部队可能在战斗中被摧毁，也可能由于战斗表现不佳或军事承包人的其他过错被合并或撤销，导致其投资血本无归。他们作为雇主的债权人，被赖账的风险极高。如果战斗失利，他们行李车中的财物几乎一定遭到敌军或农民的洗劫。如果不幸被俘，不仅会丧失留在军营的财物，还要设法筹集自己的赎金，被关押期间的生活开销也要自己承担，当他们重获自由时往往已是一贫如洗。

一个军事承包人最终能否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关键一点是他是否效力于战场上获胜的一方。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取胜的雇主更有能力偿还拖欠的军饷；由他们赏赐的土地更有可能继续保有；获胜一方的军事承包人抢劫敌人和获取赎金的机会也更多，只有打了胜仗、建立功勋的军事承包人才有可能在结束服务后领取退休年金。比较起来，战场上失利一方的

① Michael Howard,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p. 29.

② Hume Brown,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 Vol. V,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904, p. 349.

③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 373.

军事承包人丧失报酬、丧失部队、丧失土地、遭受抢劫和被俘的风险要大得多。从根本上讲，军事承包人的经济利益与雇主在战争中的命运是联结在一起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军事承包人大多尽心竭力、十分敬业地投身于雇主的战争事业。马基雅维里认为，雇佣兵是在战争爆发后只顾保命，对雇主的事业毫无用处的一种军队，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16—18世纪欧洲军事承包人率领的雇佣兵。这里无须列举他们恪尽职守、英勇战斗的那些数不清的事例，光是上校与将军级别的军事承包人高达14%的阵亡率就足以说明问题。

四、军事承包人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尽管军事承包人在某些方面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特征，然而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他们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作战的风险是很大的，他们为什么甘冒生命的损失或人财两空的风险投身于这一行业呢？不考虑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欧洲贵族阶级独特的价值观，对这一问题就无法得到全面的认识。在中世纪，战争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上自帝王下至大小贵族均以跨上战马驰骋疆场为天职与荣耀，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是贵族提高其声望与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16世纪以后，欧洲战争的面貌已发生改变，社会上任何阶层的人均可成为士兵。然而，这一时期贵族阶级对军事事务的热衷，及其视荣誉高于生命的价值观，与中世纪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这些贵族出身的军官在战场上都是愿意冲锋在最前线

的，因而其伤亡的风险并不比普通士兵低。这就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年在位）这样的最高军事统帅也会战死疆场的原因。

如同转型时期欧洲的许多其他事物，军事承包人是贵族在欧洲军事领域所扮演角色的一个过渡形式。在中世纪，贵族拥有独立的武装，以封臣效忠封君的方式服务于君主的战争。随着封建制的瓦解和新君主制的兴起，到16—17世纪，贵族不再被允许拥有独立的武装，但骑士制度的没落并不意味着贵族淡出军事事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军事承包人的身份参与到政府的战争努力中来，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战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行政、财税体系的改革和完善，17世纪末，欧洲各国逐渐摆脱对军事承包人的依赖。在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取代雇佣军的过程中，贵族在军事领域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由参与投资的生意伙伴转变为单纯领取薪水的军官。

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彼此攻伐不已的各邦国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花钱购买军事服务，而不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本邦军队。马基雅维里将意大利后来遭受外部强权蹂躏的不幸归咎于各邦国依赖雇佣兵的政策虽然未必有理，但他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各邦国倚重于康多提埃里可能是出于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然而，16—18世纪欧洲各国统治者使用军事承包人则更多地是被情势逼迫，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时期欧洲战争的规模急剧扩大，战争的持续时间显著拉长，导致军费需求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尽管欧洲经济正变得日益活跃，社会财富在增加，但16—17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还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

行政官僚和税收体系，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尚十分低下。急剧膨胀的军费需求与增长相对缓慢的财政资源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在现代行政体系和税收制度确立之前，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是进行某种形式的“政府—私人”合作，将掌握资源的部分社会精英吸纳到政府的战争努力中来。军事承包人制度就是这种公私合作的重要形式（这一时期欧洲广泛采用的包税制则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开展的公私合作）。

16—18世纪的欧洲历史存在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在这个被历史学家冠以“绝对主义”之名的时代，欧洲各国的政府却在很大程度上将组织军队与打仗这样最为核心的工作承包给私人。即便是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典范、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了维持规模急剧膨胀的军队，也不得不吸纳掌握资源的社会精英以买卖军官职位的方式加入到国家的战争努力中来。^①从17世纪后期开始，由法国引领的旨在完善官僚行政体系的改革确实提高了各国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并使其逐步建立了由政府直接招募、管理和供养的常备军。然而，这一时期战争规模和军费需求的急剧增长还是将财政资源的增长远远抛在后面，从而使各国摆脱军事承包人的过程进展缓慢、一波三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所谓“绝对主义”时代的终结。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274–279.



15 世纪末
至 16 世纪的
德意志长矛兵



德意志长矛兵是在 15 世纪末与 16 世纪欧洲战争中非常活跃的一种雇佣兵。这些来自德国的雇佣步兵人数众多，服务对象广泛，几乎在 16 世纪欧洲所有的战争中都能见到其身影，以至于那个时期“德意志长矛兵”几乎成了雇佣兵的代称。在西方有关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欧洲战争的文献中，经常提到德意志长矛兵。然而，对这一群体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见。^①本章首先从历史背景入手考察德意志长矛兵的创建经过，然后从招募机制、组织结构、薪酬标准、军官与士官、内部司法等方面探讨德意志长矛兵的军营生活，最后对两名德意志长矛兵首领的从业经历进行个案研究。

一、德意志长矛兵的兴起

（一）14—15 世纪的骑士雇佣兵

与英国、法国等地发生的情况一样，用采邑换取军役的制度

^① 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主要有三部专著和波恩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Kettwig: Phaidon Verlag, 1985;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2; Birgit von Seggern, “*Der Landsknecht im Spiegel der Renaissancegraphik um 1500-1540*,”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Bonn, 2003; Luca Stefano Cristini, *The Landsknechts: German Militiamen from Late XV and XVI Century*, Zanica: Soldiershop, 2016。以上论著的共同特点是配有大量图片，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德意志长矛兵的生活，但理论分析有所欠缺，涉及德意志长矛兵的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比如，德意志长矛兵成为欧洲雇佣兵市场上重要角色的原因，他们与其他雇佣兵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等等。

在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也在逐渐瓦解。封建骑士每年只需要为其领主服役很短的时间，在服役的地点上往往也有限制，这是封建军役制度固有的缺陷，也是这一制度最终被淘汰的主要原因。在德意志，封建军役制度的衰落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这一时期德意志仍在实行析产继承制^①，使继承者获得的采邑越来越小，不足以维持骑士的生活。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以采邑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在德意志已经发生改变，采邑不再保障领主在需要时能够获得为他效力的骑士。但是，领主们只要能够付得起报酬就可以雇佣任何数量的骑士为他效力。那些从小接受军事训练同时又缺乏其他经济来源的骑士，只能依靠为别人提供军事服务为生。于是，他们变成了骑士雇佣兵。

在14—15世纪的德意志，骑士雇佣兵与雇主之间签订的合同，是从过去封授采邑时领主与附庸之间签署的文件演化而来的，因而保留了一些类似的特征。骑士雇佣兵合同的核心内容是：被雇佣方应当在雇主发出召唤时为其作战，且每年只需为雇主服务一个特定长的时间（这一点尤其接近于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合同，而不同于后世的雇佣兵合同）；至于作战对象，有可能在合同中指明，也可能是雇主的任何敌人（当然，被雇骑士自己的领主除外）。在多数情况下，合同中的被雇佣方不仅仅是骑士本人及其两个家臣组成的一个兰斯，^②还包括由其他骑士与他们的家臣组成的

① 析产继承制指家庭财产由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10—11世纪，在西欧许多地方，这种传统的继承制度逐步被长子继承制取代。

② 德意志的兰斯通常由三个人组成，除骑士本人外，还包括一名作为扈从的轻装骑兵，以及一名负责照看武器的步兵。这一时期德意志的雇佣兵合同中（转下页）

若干个兰斯。

从流传下来的合同内容推断，这些骑士雇佣兵从雇主那里按年领取报酬，但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可以待在家里，只要做好准备在雇主发出召唤时参加战斗就可以了。从 14 世纪后期至 15 世纪前期，德意志骑士雇佣兵的薪酬水平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在 1429 年的一个案例中，一个装备整齐、随时可以作战的兰斯一年的报酬是 60 个帝国弗罗林（Rhenish florin），在作战期间每个月还将额外得到 5 弗罗林。然而，到了 15 世纪后期，骑士雇佣兵的年薪下降到每个兰斯 15 个帝国弗罗林的水平，而且在作战时期也不再会有额外的报酬。在少数案例中，每个兰斯的年薪可以达到 20 个或 25 个帝国弗罗林，但也有的只有 10 个帝国弗罗林。相应地，这一时期的雇佣兵合同只要求被雇佣方在雇主发出召唤时提供相应数量的兰斯，并不要求准备到立即可以参加战斗的状态。当然，与合同中涉及的其他骑士不同，签订合同的那名骑士应该还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报酬或奖赏。例如在 1401 年，一个名叫鲁波尔特·艾菲塔勒（Leupolt Affetaler）的骑士为巴伐利亚公爵招募了 6 个兰斯，因此获得了 6 基尔德（Guilder）的奖赏。^①

（接上页）常常用“马匹”来指代兰斯。假如一份合同规定被雇佣方要提供 20 个“马匹”，在雇主召唤时前来报到的就应该是由 20 名骑士、20 名轻装骑兵和 20 名步兵组成的 20 个兰斯。

^①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p. 7-11.

（二）德意志长矛兵的诞生

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在军事史上被称作“骑兵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步兵完全丧失了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兴起以后，用防御工事环绕起来的市镇需要有步兵来守卫。在德意志为数众多的城市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居住在城里的男丁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负责守卫指定给它的一小段城墙。在这种民兵性质的武装之外，较大的城市还会使用雇佣兵来加强防守。于是产生了德意志的雇佣步兵。不过，他们主要担负城墙或要塞的守卫工作，在野战中尚不能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直到15世纪中期德意志的雇佣步兵数量还非常少。

15世纪后期，瑞士长枪方阵改变了欧洲野战的方式，战术和组织方面效仿瑞士长枪兵的德意志长矛兵登上历史舞台。在勃艮第战争中，强大的勃艮第公爵鲁莽查理被瑞士长枪步兵击败，后者的作战方式吸引了全欧洲的关注。1477年，奥地利公爵马克西米连娶了鲁莽查理的女儿。鲁莽查理在南锡战役中战败身亡后，马克西米连接管了查理的大部分领地。这个马克西米连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在位）。在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争夺鲁莽查理遗留领地的过程中，马克西米连凭借来自佛兰德尔等地的步兵（其中包括一部分瑞士雇佣兵），在1479年8月的吉内盖特（Guinegate）战役中击败了法国军队。在目睹瑞士长枪步兵对抗骑兵取得的惊人效果后，马克西米连决心学习瑞士人的战术。面对西边的劲敌法国和东边的强邻土耳其，以及许许多多随时准备发动叛乱的内部敌人，马克西米连需要大量部队保卫其广袤的领地。他招募了数以千计来自莱茵地区、阿

尔萨斯、南德意志、低地国家、瑞士以及苏格兰的雇佣兵。为了把这些战斗力不可靠的部队变成像瑞士步兵那样的军队，马克西米连聘请来自瑞士的教官对他们进行训练。到 1486 年马克西米连成为皇位当选人时，^① 他已拥有两支威力强大的步兵武装，人数各有三四千。1490 年，马克西米连凭借使用长枪的雇佣步兵攻克了匈牙利的斯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成功夺回了他在东方的世袭领地。然而，关键时刻他麾下的雇佣兵们拒绝继续向布达佩斯进军，而是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家去了。这一事件的教训促使马克西米连放弃了使用来自欧洲各地的大杂烩雇佣兵的做法，转而主要在德意志人当中招募步兵。这种由德意志人组成的采用瑞士作战方式的步兵在当时被称作“德意志长矛兵”（Landsknecht）。^② “Landsknecht”一词由德文的“Land”（国家）和“Knecht”（雇工）合成，字面意思是“（来自）本国的雇工”，意指是“从本国招募的雇佣步兵”。

（三）成为欧洲雇佣兵市场上的重要角色

早在 14 世纪，瑞士步兵在摩尔加腾（Morgarten）、劳彭（Laupen）与森帕赫（Sempach）之战的胜利，以及英国长弓兵在克雷西与普瓦提埃所取得的战绩就开始动摇重装骑兵在欧洲野战中的统治地位。在 15 世纪后期的勃艮第战争、施瓦本战争中，步兵起到了决

^① 经过教皇加冕后，选帝侯们选举出来的皇位当选人才能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加冕礼于 1493 年举行。查理五世（1519—1556 年在位）以后的历代皇位当选人没有经过教皇加冕，从法律上讲只能被称为皇位当选人，不过在现实中也都简称为皇帝。

^②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6-7.

定战役胜负的作用。这使欧洲关心军事的君主、诸侯及其他政治实体的当政者认识到：为自己效力的军队中必须包含一支可靠的步兵。大约在1515年前后，欧洲陆战当中形成了一套由步兵、炮兵和骑兵协同配合的战术。这种战术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都是欧洲陆战中最有效的作战方式。瑞士步兵在战场上的成功使他们成为各国军队效仿的对象，而德意志长矛兵堪称瑞士步兵最出色的模仿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长矛兵不仅在作战方式上成功模仿瑞士步兵，并且还像瑞士步兵一样变成了欧洲雇佣兵市场上的重要角色。

从16世纪20年代以后，瑞士与法国之间形成了一种长达三个世纪的特殊关系：以每年支付大量“年金”为条件，法国国王得到了在瑞士招募雇佣兵的优先权。^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国王几乎独占了瑞士官方授权招募的雇佣兵。这使同样希望招募优质步兵的其他欧洲国家既嫉妒又无奈。于是，德意志长矛兵成为瑞士雇佣兵的最佳替代品。马克西米连一世打造出德意志长矛兵这种部队，当然是要为自己所用。他的继任者查理五世也是德意志长矛兵的主要服务对象。但这些来自德意志的步兵除了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以外，还不加选择地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和外部的其他雇主效力。即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对手——瓦卢瓦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也常常成为德意志长矛兵的服务对象。无论他们在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力时，还是在服务于其他雇主时，其性质都属于为报酬作战的雇佣兵。

① 详见本书第七章。

二、德意志长矛兵的招募与薪酬

（一）招募制度与组织结构

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出现了一系列涉及雇佣兵招募的近乎标准化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那些需要招募雇佣兵的雇主、军事承包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任何地区进行招募活动，事先都必须获得当地统治者的许可（除非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招募雇佣兵）。1495 年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确立了一条原则，即使皇帝本人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招募士兵，也必须先获得当地诸侯或城市的许可。出于某些特定的原因，有时一个君主可能会禁止一切外来者在他的领土上招募雇佣兵，并禁止他的臣民出去充当雇佣兵。查理五世在位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多次发布禁止在帝国任何一部分领土上为外国（尤其是法国国王）招募士兵的命令。当然，尽管存在这些禁令，未经许可的非法招募活动总是难以杜绝，也不乏招募者被逮捕并投入大牢的记载。比如在 1546 年，就有一名法国军官因未经许可在格德斯（Guelders）招募雇佣兵被逮捕。^①在获得当地统治者许可以后，准备在某一地区招募雇佣兵的雇主通常会委任

^①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 38.

一位有经验的当地军人为“上校”（Oberst），^①由他负责在指定的地区招募一个团的士兵。^②这种时候，雇主会出具一份书面的委任状，其中包含上校的名字、拟招募的团的规模及其内部结构、部队的报酬、军纪条例、服务期限，等等。

最初，团的大小并没有什么定规，一个上校统率的所有部队就是一个团。到1550年前后，团在德意志逐渐成为大约3000—5000人的军队建制单位，每个团由大约10个连队（Fähnlein）构成。连队是这一时期德意志军队中最小的建制单位。连队的队

① 中世纪晚期欧洲军队内部尚未形成上下分层的组织结构，14、15世纪的欧洲军队只有连队（company）这一个层级。连队的规模有时只有几百人，有时多达数千人（在汉语中，把这种大规模的“连队”翻译为“军团”也许更加贴切）。无论连队的规模大小，其指挥官都称作“队长”（英文叫“captain”，德文叫“Hauptmann”）。这种情况下的“队长”实际上就是一支部队的统帅。进入16世纪以后，可能首先是在西班牙出现了把多个连队永久性地放在一起的做法。于是产生了比连队更高一级的建制单位——团（regiment），其指挥官称为上校。尽管在16世纪欧洲各国还没有把多个团永久性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更高一级建制单位的做法，但在一场战役中同时投入多个步兵团，或者步兵团与骑兵、炮兵协同作战的情况非常普遍，由此诞生了将军这一层级的指挥官。不过，在“将军”（Generaloberst）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以前，德语中的“上校”（Oberst）一词有两种含义，它可能是指部队的最高统帅，也可能是指一个团的指挥官，这种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16世纪30年代。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p. 108-110, note 32. 至于“队长”这个词语，直到晚近时期欧洲军队内部组织分层更加细化以后，其含义才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连长”或“上尉”。

② 从诞生之日起，德意志长矛兵最重要的建制单位就是团，最重要的军官是上校，这一点与瑞士雇佣兵有所不同。16世纪时，瑞士雇佣兵最重要的职权掌握在连队队长手里，重要军事行动都需要由队长们集体决策。参见本书第七章。

长 (Hauptmann) 在部队招募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典型的做法是, 上校在得到招募士兵的委任状以后便会着手确定每个连队的队长人选; 选定的队长会被指派到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招募 300—500 名士兵。

(二) 薪酬标准

16 世纪上半叶, 一个德意志长矛兵每月标准的薪水是 4 基尔德。这虽比瑞士雇佣兵的标准薪酬低 0.5 个基尔德 (瑞士步兵的声望始终是无法超越的), 但与平民生活中的其他职业比较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①1515 年的时候, 在德意志城市中, 砖瓦匠、石匠等技术工人每月只能挣到 2.5 基尔德, 而那些非技术劳工的月薪仅为 1.6 基尔德。除固定的工资外, 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加入雇佣兵行列的人心中, 都怀着通过缴获战利品、抢劫等方式一夜暴富的梦想, 这是一种不一定能实现但颇具诱惑力的期待。况且, 充当雇佣兵还能满足一些年轻人寻求冒险刺激的内心欲望。正因为如此, 每当队长们带着帮手在人流聚集的闹市挂起旗帜, 击鼓鸣笛, 开始招募雇佣兵时, 前来报名的人往往供大于求, 以至于还可以在报名者当中严格地进行挑选。除了身体条件以外, 报名者的经济状况也是队长们挑选新兵的重要依据。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 士兵们需要自己负担服装、武器和防护装备的费用。在那个时代, 一套基本的德意志长矛兵装备大约需要 12—14 基尔德, 这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0.

就把最贫困的人挡在了门外。那些能够置办得起全套甲冑（需要16基尔德）从而可以在长矛兵方阵的最前排进行战斗的人，与那些能够为自己购置一把火绳枪（需要3.5基尔德）以及火枪手辅助装备的人，在入伍时就会被登记为双酬佣兵（Doppelsöldner），每月可以得到8基尔德的工资。^①

三、德意志长矛兵的军官、士官及其职责

（一）军官

在多数情况下，一支德意志长矛兵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上校。少数例外情况是当多个团共同作战时，或者炮兵、骑兵和步兵共同作战时，就由一名“将军”来指挥。除了招募士兵与指挥作战以外，上校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努力确保他的士兵能够比较按时地领到军饷。鉴于那个时代雇主们常常因为手头吃紧拖欠雇佣兵的军饷，以及严重的拖欠军饷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在雇主不能按时支付军饷的情况下，上校往往需要用他自己的资金来填补军饷的空缺，或者用他个人的财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所以，那个时代要成为一名上校不仅需要具备军事指挥才能和在社会上的号召力（这一点有助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招募到数量更多的士兵），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财富资源。因为上

^①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 13.

校承担如此重要的职责，所以他的薪水是德意志长矛兵基准薪水（4 基尔德）的 100—150 倍。查理五世时期德意志长矛兵的上校每月可以得到 400—600 基尔德的薪酬。其中包括维持他的马车与马匹，以及他的贴身警卫、乐手、牧师、书记员、厨师、翻译等随员的费用。^①1507 年，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授权每位上校可以配备 22 名随员，但实际上随员的人数取决于上校个人的财务状况，因为随员的薪酬由上校支付。

上校有权决定他招募的团里军官的人选，他总是从自己在贵族或富裕市民阶层的朋友中挑选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员。按照惯例，上校会从连队队长中指定一个他信任的有才干的人担任中校（Obristleutnant）。中校的职责是上校不在时代替上校负责全团的军事指挥。当上校在的时候，中校只履行连队队长的职责，但他始终可以领取两倍于连队队长的薪酬。在个别情况下，特别是在大型战役中，上校会在连队队长之外任命一个人专门担任他的副手，这名副手的薪水与连队队长相同（相当于德意志长矛兵基准薪水的 10 倍，即 40 基尔德）。^②

除上述人员以外，德意志长矛兵团里的重要军官还包括军事纠察（Profoß^③）、法官（Schultheiss）、警戒总监（Wachtmeister）、司务长（Quartermaster）、军需官（Proviantmeister）、医务总监（Feldarzt）、财务总监（Pfennigmeister），等等。这些军官的职责也非常重要，因

①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S. 39.

② Ibid., S. 39-40.

③ 这个词相当于英文中的“provost”。

此他们的薪水与连队队长一样高。^①军事纠察负责惩戒违纪或抗命行为，以维持部队的纪律，并在部队内部审理案件时担任公诉人。法官负责处理部队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务，同时他还负责主持团里的法官法庭。警戒总监负责指派岗哨和巡逻队，确保营地和辎重行李得到恰当的守卫。司务长负责部队的住宿问题，在行军时他需要骑马到部队前方的市镇和村庄为全团官兵寻找住所，或者选择合适的扎营地点，并负责宿营地的分配。军需官负责与当地商人洽谈军需品的价格，以保障士兵们能以公道合理的价格买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同时不使部队在当地老百姓中失去人心。当部队处于友好的领土上时，这一点尤为重要。医务总监负责领导全团所有军医。财务总监负责管理部队的财务事项，并负责向全团官兵发放军饷。一个普通的德意志长矛兵团平均每月有2.5万—3.5万基尔德的资金流出量（相当于今天的800万—1000万英镑），^②可见财务总监这个职位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在德意志长矛兵的每个连队里都有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Leutnant）和一名掌旗官（Ensign）。队长是他所招募的这个连队的指挥官，他跟上校一样有权为自己配备工作人员和贴身警卫。与上校不同的是，队长在作战时并不骑马，他会身穿全幅铠甲，并像双酬佣兵一样使用长柄战斧、戟或双手剑等武器。队长会从双酬佣兵中挑选一人担任副队长。副队长的职责是队长不在的时候

①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S. 41.

②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15–16.

代替队长指挥连队，他的月薪是士兵基准薪酬的三到四倍。^① 德语中的“连队”（Fahnlein）一词本义是一面旗帜，当时每个连队都有这样一面军旗。部队招募起来以后第一次清点时，连队的旗帜会被交给掌旗官。从那一刻起，这面旗帜和掌管它的人便成为这个连队勇气和荣誉的象征。掌旗官需要誓死捍卫这面旗帜，如果在战斗中丢弃军旗逃跑，他将被处死。正常情况下，掌旗官总是手举旗帜站在方阵的中心位置。他在战斗中的作用是构成方阵的核心，作为集聚士兵的中心点。当战斗不利时，掌旗官卷起军旗把旗杆扛在肩上，这是撤退的信号。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他可以把军旗撕碎，以免旗帜落入敌人之手。掌旗官需要由身体条件、勇气和作战技能均出色的人来担任。通常情况下，担任这一职位的人选由上校决定。由于他的重要性，掌旗官的月薪是基准薪酬的六倍（24 基尔德）。^② 从语义发展史的角度讲，现代意义上的“中尉”一词由“副队长”演变而来，“少尉”则是由“掌旗官”演变而来。然而，在德意志长矛兵的时代，掌旗官在连队中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副队长，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薪酬水平上。

（二）士官

每个连队都有一名由经验丰富的年长士兵担任的军士长（Feldweibel）。他负责指导连队的操练，以确保士兵们保持在方阵中的位置。每个连队通常有两名军士（Gemeinweibel）帮助军士长

①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S. 41.

②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18-19.

保持方阵的战斗队形。这两名军士分别处在方阵第一行的两端，他俩之间第一行的那些人叫做排头兵（Rottmeister）。排头兵都是从双酬佣兵中挑选出来的富有经验的士兵，他负责指挥方阵中站在自己身后的那一列士兵。实际上，他就是这组士兵的组长。排头兵不仅在方阵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军营生活中还要负责组内分发食物及其他军需品、分配住宿、解决纠纷、安排执勤等。^①此外，连队里还有一些专门代表普通士兵利益的基层官员，他们是由士兵们选举出来的，通常只有一个月任期。其中士兵代言人（Führer）代表普通士兵参与法庭的审判，军需代表（Fourier）则在军需方面代表普通士兵的利益与长官进行交涉。

四、德意志长矛兵的内部司法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德意志长矛兵似乎过着无法无天或者自由随意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军营里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只不过他们不受平民法律的管辖而已（这是马克西米连一世赋予他们的特权）。德意志长矛兵的团里有两种形式的军事法庭，一种是常规的有法官的法庭（Malefigericht），另一种是没有法官的所谓“长矛法庭”（Mecht der langen Spieße）。

有法官的军事法庭大体上沿用当时德意志平民社会中法庭的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63.

制度，即由一名法官在若干名陪审员的帮助下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法庭审理案件都是在室外场地公开进行，通常是在军营里集中点名的地方。审案的时候，供法庭组成人员坐的长条凳围成一个长方形。法官和他的助手（法庭书记员）坐在作为主席的长凳上，两旁的两列长凳上坐着通常数量为 12 人的陪审员，以及相关的队长、掌旗官、士官和士兵代言人，等等。陪审员是由法官从全团各连队的双酬佣兵中挑选出来的。法官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为每个案件的审理挑选合适的陪审员。每位陪审员都要在法庭上宣誓，保证自己将根据事实和法律不偏不倚地做出公正的判决。^①那些前来观看审案的人围着法庭的长条凳站成一个大圆圈。作为旁听者，他们必须尊重法庭的秩序，否则将遭到严厉的惩处。在审理每个案件时，都是由军事纠察充当公诉人，公诉人和被告双方都可以委托代讼人参与案件的审理。被告士兵可以委托自己连队的军士、组长（排头兵）、士兵代言人或其他士兵代替自己进行辩护。案件审理的过程不能超过连续的三天，对法庭做出的裁决不得上诉。如果被告被判定有罪，那么相应的惩处要立即执行。如果是死刑，当场就由刽子手用剑或绞索予以处决。^②如果上校愿意，他本人或者他委派的代表也可以出席法庭。在理论上，上校有权否决军事法庭做出的判决，也可以说他掌握着终极的审判权，但是只有意志特别坚定的上校才会冒与士兵们的意愿对抗的风险。普通士兵的意见在部队的司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特

①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S. 55.

②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23–24.

点在“长矛法庭”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长矛法庭”是德意志长矛兵特有的一种审判形式。弗雷德里希·布劳认为，它是德意志古老的全体同伴裁决制度（*Genossenschaftsgerichten*）在军队里的残留。^①德意志长矛兵的每个团并非自然而然地就可以组织这种法庭。这种形式的法庭需要在部队招募起来以后第一次清点时获得雇主的认可，并且在随后的公开表决中被多数士兵接受才可以进行。这种法庭只适用于被告公然破坏部队秩序或实施了使军旗蒙羞的行为，并且其犯罪行为确定无疑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军事纠察可以向上校请求组织“长矛法庭”。在获得上校的同意后，他就可以把全团官兵召集起来，由他们表决是否继续进行接下来的审判程序。“长矛法庭”审理案件是由官兵群体直接做出裁决，因此既不需要法官也不需要长条凳。站在集中起来的全团官兵面前，军事纠察与被告双方代理人各自提出证据或反证以后，军事纠察便会重申判处死刑的请求，被告则会请求宽大。“长矛法庭”的判决只有处死或无罪开释两种结果。表决的时候，从全团官兵中分别抽取40个人为一组，由此形成三个独立的小组。每一组内部都按照多数票的原则形成一个判决意见，这三个意见当中的多数将形成最终的判决。^②如果得出的是有罪判决，官兵们随即前往行刑场，按照东西方向站成面对面的两条长队。被判定有罪的士兵首先会在两条长队中间来回走三遍，向那些被自己冒犯过的战友请求宽恕，并宽恕冒犯过他的人。然后，他就来到军事纠察面

①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S. 61–62.

② *Ibid.*, S. 64.

前，后者便在他的右肩上击打三下，并让他在两条长队之间快速奔跑。这时，他的战友们就在鼓声和横笛的伴奏下用长矛结束他的生命。假如有士兵留出缺口企图让罪犯逃脱，那么这个士兵就可能遭到与罪犯同样的下场。^①

五、对德意志长矛兵首领的个案研究

（一）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出身于一个来自蒂罗尔地区^②的骑士家族，1473 年降生在明德尔海姆（Mindelheim）城堡。他的父亲乌尔里希·冯·弗伦茨贝格是施瓦本同盟的部队中的一名队长。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很早就跟随父亲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 1499 年的施瓦本战争中，他效力于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正是在这次与瑞士军队交战的过程中，颇具军事天赋的弗伦茨贝格认识到，重装骑兵的时代结束了。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后来积极投身于协助马克西米连一世组织德意志长矛兵的工作。在被马克西米连一世任命为队长后，弗伦茨贝格招募了一支步兵，并按照瑞士步兵的方阵战术进行训练。

^① 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pp. 24-25.

^② 蒂罗尔位于现今奥地利的西南部，在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统治时期，蒂罗尔地区的主要城镇因斯布鲁克是哈布斯堡皇室主要居住地，这里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

由于在创建德意志长矛兵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被称作“德意志长矛兵之父”，而这种部队后来成了马克西米连一世及其继承者查理五世手中最得力的武装力量。^①（见图2）

在1503—1505年的兰兹胡特继承战争中，效力于马克西米连的弗伦茨贝格与他率领的德意志长矛兵就开始显露锋芒。1504年，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岑巴赫（Wenzenbach）战役中，弗伦茨贝格率领的德意志长矛兵将敌军用马车摆成的堡垒打开一个缺口，最终导致敌军的溃败。这场战役后，皇帝马克西米连亲自主持了弗伦茨贝格的骑士册封仪式。此后，弗伦茨贝格去了尼德兰，继续为哈布斯堡王朝作战。

在1508—1516年的康布雷联盟战争期间，仍旧效力于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弗伦茨贝格来到意大利战场。在1509年的维罗纳保卫战中，弗伦茨贝格统率一个团的德意志长矛兵击退了威尼斯军队的多次进攻，使皇帝马克西米连保持了对这座城市的占领。1511年，弗伦茨贝格率领1000名德意志长矛兵再次与威尼斯作战，不过这一次他效力的对象是法国国王（当时法王是皇帝马克西米连的盟友）。1513年的拉·莫塔（La Motta）战役中，弗伦茨贝格率领的3500名德意志长矛兵与西班牙将领费尔南多·德·阿瓦洛斯（Fernando d'Ávalos）率领的4000名西班牙步兵联合作战，彻底击溃了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威尼斯军队，以很小的代价造成敌军

^① “Frundsberg, Georg von”,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98, Vol. 5, p. 28.



图2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

说明：由画家克里斯托弗·安贝格尔（Christoph Amberger）创作于1520年，
原件是画在木板上的油画。

超过4500人的伤亡。这次战役可以用“大捷”一词来形容，借用弗伦茨贝格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敌军数量很多，我们的荣耀也多”。

意大利的战事结束以后，弗伦茨贝格于1517年回到德意志。1519年，他与施瓦本同盟签订了一份契约，为该同盟招募了一支德意志长矛兵，并率领这支部队将弗腾堡公爵乌尔里希驱离他的公爵领地。这支部队在查理五世当选为皇帝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521年，已经继承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成为皇帝的查理五世任命弗伦茨贝格为最高统帅，并给了他一个帝国顾问的头衔。^①

皇帝查理五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战争爆发后，弗伦茨贝格几乎不间断地活跃在各个战场，为查理五世屡立奇功。1521年，弗伦茨贝格征战于法国北部。当弗朗索瓦一世率领的大约4万名法军逼近时，弗伦茨贝格指挥人数处于劣势的帝国军队巧妙地完成了撤退，从而为查理五世保住了继续与弗朗索瓦一世斗争的资本。这次成功的撤退再次证明弗伦茨贝格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统帅。因为真正伟大的将帅不仅要能够赢得胜利，还要能在需要撤退时根据情势做出恰当的决定，并能成功地执行。

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弗伦茨贝格被召唤到意大利战场。1522年1月，他率领12个连队的大约6000名德意志长矛兵穿越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同年4月，在米兰附近的比

^①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 72.

可卡（Bicocca）之战中，作为德意志长矛兵统帅的弗伦茨贝格，与西班牙将领费尔南多·德·阿瓦洛斯及意大利雇佣兵首领普洛斯特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一道，指挥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与教皇联军击败了法国与威尼斯组成的联军。这场胜利将意大利北部更大的范围置于查理五世的控制之下。

弗伦茨贝格回到他在德意志的明德尔海姆城堡做了短暂休息即再次来到意大利，他率领 29 个连队的 1.2 万名德意志长矛兵赶往帕维亚解围。在 1525 年 2 月 24 日的帕维亚之战中，弗伦茨贝格的部队与来自西班牙的 6 000 名步兵及 4 000 名骑兵配合，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率领的法军分割歼灭，以己方损失 500 人的代价造成法军 1.5 万人死伤或被俘，战俘中包括弗朗索瓦一世本人。帕维亚之战可以说是弗伦茨贝格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场胜利，尽管他在名义上不是这场战役的主帅。^①

再次回到德意志的家中休息没多久，弗伦茨贝格在 1525 年招募了 8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投入到镇压德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中。1526 年秋，意大利的战端重启，弗伦茨贝格接到组织军队前往伦巴德增援帝国部队的召唤。不过，连年的战争导致哈布斯堡王朝财政严重困难，弗伦茨贝格收到的 3.6 万德意志塔勒大约只相当于招募部队所需费用的一半，另一半款项需要弗伦茨贝格自己筹集。为此，弗伦茨贝格用他的财产作抵押进行借贷，甚至变卖了家中的银器和他夫人的珠宝，一共筹集到 3.8 万弗罗林。弗伦茨

^① 在帕维亚战役中，查理五世的军队名义上的主帅是查尔斯·德·拉努瓦（Charles de Lannoy）。

贝格在招募军队中投入的3.8万弗罗林可以看作他向雇主查理五世提供的借贷。这其实是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承包人普遍的做法。弗伦茨贝格用了不到3个星期就组织起35个连队大约1.2万名德意志长矛兵，并率领这支部队来到意大利。然而，就在这时他得了中风，在意大利的医院挣扎了几个月后不得不返回德意志。1528年，弗伦茨贝格在他的明德尔海姆城堡中去世。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的儿子卡斯帕·冯·弗伦茨贝格（Caspar von Frundsberg）和他的孙子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都是比较出色的军人。不过，随着他的孙子格奥尔格在1586年去世，这个连续四代充当职业军官的家族就绝嗣了。

（二）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

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1496—1577年）出身于富裕平民家庭。凭借出色的才能、良好的运气和妥善的经营，他在四十多年的雇佣兵生涯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仅在年老时以百万富翁的身份退隐到乡间，甚至使他自己和子孙跻身于世袭贵族的行列。（见图3）

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的父亲做过绍恩多夫（Schorndorf）的林务官、法官和市长，其家庭环境虽不属于大富大贵，却也是比较殷实的小康之家。舍尔特林少年时代在图宾根的拉丁文法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20岁时离开学校来到康斯坦茨，担任主教的抄写员。两年后，他决定投笔从戎。起先是在当时著名的火炮手迈克尔·奥特（Michael Ott）麾下为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效力。不过，舍尔特林关于雇佣兵这一行当的本领是从格奥尔

格·冯·弗伦茨贝格这位大师身上学的。在 1519 年帮助施瓦本同盟驱逐符腾堡公爵的军事行动中，1521 年在法国北部的战斗中，以及 1525 年的帕维亚之战中，舍尔特林都在弗伦茨贝格统率的部队中效力。在 1526 年弗伦茨贝格最后一次招募并带到意大利的德意志长矛兵中，舍尔特林是一个连队的队长。此时舍尔特林已成长为一名可以独立指挥一支部队的雇佣兵首领了。

早在 1522 年，舍尔特林就统率 12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为了神圣罗马帝国与土耳其人作战。随后，他还与被废黜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签订过一份为后者招募 6 000 名德意志长矛兵的合同，后来因为对方取消合同他获得了 300 弗罗林的赔偿金。1524 年，舍尔特林来到意大利，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部队中效力，先参加了对法国马赛的远征，又参加了第二年的帕维亚之战。1525 年，纽伦堡市以 100 弗罗林的年薪聘请舍尔特林担任该城军队统帅，但后来舍尔特林请求对方取消了这一任命。同样是在 1525 年，舍尔特林参加了镇压德国农民起义的战争。1526 年，舍尔特林参加了一名贵族与陶伯河上的罗腾堡（Rothenburg）镇之间的冲突，获得了 500 弗罗林的报酬。1526—1528 年，舍尔特林以连队队长的身份先后在弗伦茨贝格和康拉德·冯·博依内堡（Konrad von



图3 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

Boyneburg) 等人麾下为皇帝查理五世征战于意大利，参加了对罗马城的洗劫和保卫那不勒斯的战斗。1529年，舍尔特林被当时处于皇帝控制下的符腾堡市任命为军队统帅，年薪是100弗罗林。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巴伐利亚的军队统帅，年薪也是100弗罗林。根据巴伐利亚公爵的命令，他带领自己从符腾堡招募的600名德意志长矛兵赶往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维也纳增援。由于对报酬不满，他在1530年辞去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军队统帅职务，转而接受了奥格斯堡市的一份终身任命，成为奥格斯堡的军队统帅，年薪是200弗罗林。1532年，舍尔特林率领奥格斯堡的50个兰斯和500名德意志长矛兵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帝国各部分军队集结起来以后，舍尔特林被任命为统领所有来自施瓦本地区部队的中校，后来又被任命为统领全军所有步兵的中校。此时，其月薪是200弗罗林。当年9月，他们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一场大胜。为了表彰他在战胜土耳其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皇帝晋封舍尔特林为骑士，其领地在奥格斯堡附近的布尔滕巴赫。^①此外，皇帝赠给舍尔特林一条价值300克朗的链子，舍尔特林的上司、军队最高统帅弗雷德里希伯爵送给他一把价值100弗罗林的剑。^②从此以后，舍尔特林就自称为塞巴斯蒂安·舍尔特林·冯·布尔滕巴赫。

1534年，当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在黑森邦伯（Landgrave）菲

① 早些时候，舍尔特林花费1.7万弗罗林购置了这块领地。

②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Lebensbeschreibung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ebastian Schertlins von Burtenbach*, Frankfurt and Leipzig: Beylagen, 1777, S. 30–36.

利普帮助下试图夺回他的领地时，他们希望舍尔特林为他们招募 4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并且送去了 2 000 弗罗林的预付金。然而，由于受到他的雇主奥格斯堡市的反对，舍尔特林放弃了这笔交易。他把收到的资金给了招募士兵的 4 位队长。1535 年，舍尔特林以年薪 200 弗罗林的条件担任了黑森邦伯的“待命仆役”^①。1536 年，在老弗伦茨贝格之子卡斯帕·冯·弗伦茨贝格的统率下，舍尔特林带领一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和 5 个兰斯的骑兵参加了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战斗。在此期间，他个人的月薪是 100 弗罗林，另外每月收到 60 弗罗林作为那 5 个兰斯的报酬。1542 年，萨克森选帝侯与黑森邦伯任命舍尔特林为上校，要求他招募 14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他实际上招募了 16 个连队，并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布伦瑞克公爵的战争。在此期间，他个人的薪酬是每月 400 弗罗林，雇主另外每月支付给他 384 弗罗林，作为他的 35 名随员以及马匹和马车的费用。

1543 年，舍尔特林开始以年薪 100 弗罗林的条件受雇于施马卡尔登同盟^②。加上黑森邦伯与奥格斯堡市各自付给他的 200 弗罗林年薪，即使在没有任何军事活动的情况下他每年都有不下 500 弗罗林的薪水。1544 年，为了入侵法国，皇帝查理五世邀请舍尔特林招募并指挥一个由五六个连队组成的团，舍尔特林拒绝了。

① 当时有的雇主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向一些有影响力的雇佣兵首领支付报酬，以保证在发生战争时得到所需要的雇佣兵，这些在平时领取报酬的雇佣兵首领称作“待命仆役”（Diener von Hausaus），其德语字面意思是“离开（主人）房子的奴仆”。“待命仆役”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类似于 14、15 世纪的骑士雇佣兵。

② 这是一个由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城市组成的同盟。

不久以后，帝国议会邀请舍尔特林招募8000人的德意志长矛兵去匈牙利对抗土耳其人。这一邀请又被舍尔特林拒绝了，他的理由是部队规模不足以取得成功。不过，随后皇帝任命他为陆军大元帅时，舍尔特林接受了。看着在自己统率下的伯爵、男爵和其他贵族，舍尔特林感觉自己享受到了君主一般的荣光，同时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得到不下7000弗罗林的实际利益。

1546年，舍尔特林接受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份合同，以年薪1000法郎为条件保证在法王需要时为其效力，但这一义务不包括针对舍尔特林的领主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信仰新教的诸侯或城市的战争。1546—1547年的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爆发后，舍尔特林加入到与皇帝对抗的新教一方。由于他事先有所准备，^①舍尔特林在一周之内就招募了16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并被任命为德意志南部各城市的步兵统帅。由于战争中施马卡尔登同盟被皇帝彻底击败，舍尔特林只好带着家人和动产逃亡到康斯坦茨，后来又去了巴塞尔。

1548年，舍尔特林与法王亨利二世签署了招募12个连队的合同。合同规定他的年薪为1.2万法郎，他的中校年薪为400法郎，12名队长每人的年薪为200法郎。签订这份合同后，舍尔特林取消了他与奥格斯堡市之间的终身任命合约。对舍尔特林效力于法国国王这件事，皇帝查理五世非常恼怒，他悬赏4000弗罗林捉拿

^① 此前，他已向一些雇佣兵首领支付一定报酬使他们保持待命状态。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支付给雇佣兵首领的费用相当于雇佣兵服务的定金，这种费用在德文中称为“Wartegeld”。

舍尔特林，如果能把他杀死也有 3 000 弗罗林的赏金。那一年，查理五世处死了好几名德意志长矛兵队长，理由是他们违反禁令为法国国王效力。1552 年，法王亨利二世与皇帝查理五世之间开战，舍尔特林开始积极地为法王服务。但是他的招募工作并不容易，由于皇帝的军队封锁了通往法国的道路，尽管吸收了一些瑞士雇佣兵，舍尔特林派出的队长们只勉强招募到总数为 3 000 人的 8 个连队。舍尔特林率领这 8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和一些骑兵先后参加了阿尔萨斯和皮卡迪地区的战斗。

1553 年，随着战事停止，法王亨利二世遣散了舍尔特林的一部分部队，同时降低了他的薪酬。同一年，舍尔特林与皇帝查理五世达成和解。第二年，他接受了莱茵同盟的一个上校职位，负责指挥 10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年薪为 800 弗罗林。他的两个儿子也担任其中两名队长，年薪均为 150 弗罗林。签署这份合同后，舍尔特林派人去见法国国王，请求后者同意取消了他们之间的合约。1556 年，舍尔特林接受了兰茨贝格同盟的一个中校职位，年薪是 800 弗罗林，战争时期提高到每月 600 弗罗林。合同规定，如果参加同盟的诸侯在战争期间都不领导军队，舍尔特林将担任部队最高统帅。1557 年，舍尔特林担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顾问，并为拟议中对土耳其的战争招募了一个团的德意志长矛兵，不过这一作战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563 年，一个名叫格伦巴赫（Grumbach）的贵族带着一个武装团伙在南德意志四处袭扰。为了防御这个武装团伙，舍尔特林为奥格斯堡市招募了 10 个连队的德意志长矛兵和 40 个兰斯的骑兵。与此同时，作为兰茨贝格同盟的中校，他为该同盟也招募了 10 个连队。在舍尔特林率领上述部队

向格伦巴赫的武装挺进途中，他接到了任务取消的命令。这是舍尔特林最后一次招募军队。之后，这位年近古稀的雇佣兵首领就回到自己在布尔腾巴赫领地上的庄园安度晚年去了。得益于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舍尔特林在退隐乡间以后回顾自己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撰写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自传。^①

（三）两个案例的异同

以上我们花费很多笔墨叙述弗伦茨贝格与舍尔特林的从业经历，因为这两人是代表德意志长矛兵首领的绝佳案例。弗伦茨贝格从业的时间从德意志长矛兵的创建直到16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弗伦茨贝格的学生，舍尔特林的从业时间一直延续到16世纪60年代。两人充当德意志长矛兵首领的时间前后叠加起来，则涵盖了德意志长矛兵在欧洲雇佣兵市场上活跃时期的大部分岁月。

这两个案例之间存在以下几点差异。第一，两人指挥的部队有所不同。作为德意志长矛兵创建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弗伦茨贝格一生专注于领导德意志长矛兵这种部队。舍尔特林虽然大部分时候率领的是德意志长矛兵，但在有些战斗中他同时指挥着一部

① 本书关于舍尔特林从业经历的叙述根据以下几种资料综合而成：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Lebensbeschreibung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ebastian Schertlins von Burtenbach*;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p. 78-89; "Sebastian Schertlin: Landsknecht und Kriegsunternehmer", <http://www.kriegsreisende.de/neuzeit/schertlin.htm>, 访问时期：2018年11月10日；"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ebastian_Schertlin_von_Burtenbach, 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0日。

分骑兵。第二，两人在为谁效力的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选择。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比如 1511 年效力于法国国王、1519 年效力于施瓦本同盟），弗伦茨贝格一生都在忠实地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查理五世服务。舍尔特林则不停地变换自己的雇主，他效力过的雇主既有自治城市也有诸侯，既有新教徒也有天主教徒，他既服务过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雇主，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效力，既为皇帝查理五世立过战功，也在效力于施马卡尔登同盟以及效力于法国期间与查理五世对敌。初看起来，舍尔特林在为谁效力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原则。但他曾多次拒绝潜在雇主的邀约，也曾多次请求雇主取消已有的合同，说明他在为谁效力的问题上是有选择的。报酬和职位高低当然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不过他最看重雇主让他招募和指挥的部队规模。对舍尔特林这样具有商人头脑的雇佣兵首领来说，麾下部队的规模不仅体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指挥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从中获取经济收益的多寡。在舍尔特林身上，比弗伦茨贝格更充分地体现了军事承包人的特征。第三，两人的出身不同。弗伦茨贝格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家族，舍尔特林则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市民阶级家庭，但凭借自己在雇佣兵事业中的奋斗进入了世袭贵族的行列。在取得过“上校”这一头衔的德意志长矛兵首领中（请注意前文提到的 16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上校”的两种含义），既有像屈斯特林的约翰侯爵（Margrave Johann of Küstrin）、索姆斯的莱因哈德伯爵（Count Reinhard of Solms）、索伦的伯爵艾特尔·弗雷德里希三世（Count Eitel Friedrich III of Zollern）及勃兰登堡-库尔姆巴赫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尔西比亚德斯（Albrecht

Alcibiades of Brandenburg-Kulmbach) 那样的出身于诸侯或大贵族世家的，也有像舍尔特林这样出身于富裕平民家庭的，但大多数的人是像弗伦茨贝格那样出身于下层贵族（骑士家族）。^①

尽管两个案例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但其共性更加不容忽视。第一，在战场上两人都是英勇的战士和杰出的统帅。在舍尔特林的从业经历中，似乎并未取得弗伦茨贝格在比可卡之战和帕维亚之战那样的辉煌战绩。不过，皇帝查理五世为了邀请舍尔特林出山，不惜委以陆军大元帅这一至高军职，也能从侧面证明舍尔特林作为一名指挥官的价值。第二，这两人都不单纯是职业军官，也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兵首领，因为他们都用自己家庭的或借贷来的资金投资于雇佣兵事业。换言之，他们都将雇佣兵活动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实际上，这也是德意志长矛兵时代欧洲大部分雇佣兵首领的共同特征。第三，他们都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雇佣兵首领。凭借父辈的关系，以及早早进入军队磨砺所积累的经验，那些第二代或第三代雇佣兵首领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能担任连队队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这也反映了近代早期欧洲雇佣兵首领具有家族遗传色彩这一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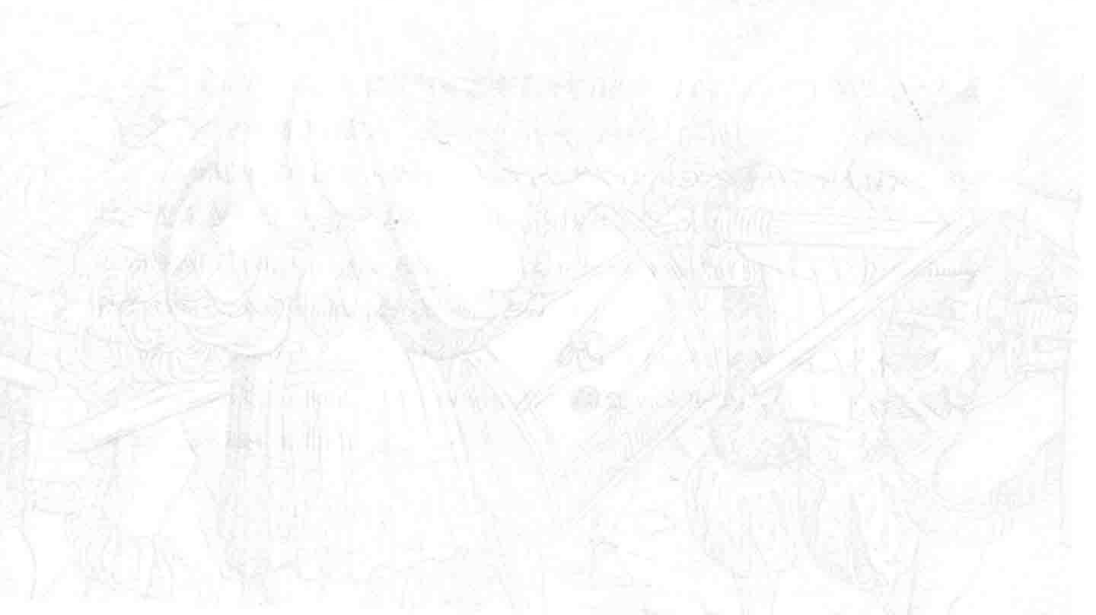
^① Fritz Redlich,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Vol. I, p. 106.



1567—1649 年

苏格兰的

海外从军现象



近代早期苏格兰历史中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大量国民到海外从军，并形成一股潮流。虽然一个国家的国民以雇佣兵或援军等身份为另一国家作战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在雇佣兵盛行的近代早期，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出现过这一现象，但无论从海外从军的人数还是他们赢得的声誉及造成的影响看，近代早期苏格兰人的海外从军都是极不寻常的。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为例，苏格兰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直接参战，^①然而战争期间约有五万苏格兰人投身于这场冲突，占当时苏格兰成年男性的两成以上。^②与此对照，人口总量数倍于苏格兰的英格兰，同一时期到海外从军的人却少很多。^③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在国际上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以至于在瑞典军中效力的荷兰人遇到敌人时总是喜欢演奏苏格兰进行曲，以图使敌人以为他们是英勇善战的苏格兰人。^④苏格兰人适宜从军的禀赋使他们在所服务的每支军队中都有许多人被提拔到很高的位置。17世纪20年代，丹

① 自1603年起，苏格兰与英格兰开始有共同的国王，但在1707年议会合并前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国家。

② 此时苏格兰的总人口还不到100万。据估计，1500年苏格兰的人口为50万，16世纪末在70万—80万之间，1700年达到100万。R. A. Houston and I. D. Whyte, "Introduction: Scottish Society in Perspective", in R. A. Houston and I. D. Whyte, eds., *Scottish Societ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

③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eiden: Brill, 2001, pp. 18—20.

④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51, p. 29—30.

麦军中的苏格兰军官数量甚至达到丹麦本国军官的三倍。^① 苏格兰人大规模的海外从军不仅对本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海外从军现象不只可以作为透视近代早期苏格兰历史的一个窗口，研究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现象还有助于加深对近代早期欧洲士兵供应体制及跨国人口流动等问题的认识。西方已有不少关于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的论著，但其中大部分是某一个或某一群海外从军者的传记，^② 涉及这一问题的学术性研究主要是针对一个时期里服务于某个国家的苏格兰军人展开的，^③ 目前还缺乏从全局视角对近代早期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现象的研究。^④ 有鉴于此，本章依据

① Robert I. Frost, "Scottish Soldiers, Poland-Lithuani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in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p. 191.

② 例如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Grant Simpson, ed., *The Scottish Soldier Abroad 1247-1967*,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2; James Miller, *Swords for Hire: The Scottish Mercenary*, Edinburgh: Birlinn Limited, 2007。

③ 例如 James A. Fallon, "Scottish Mercenaries in the Service of Denmark and Sweden, 1626-1632", Ph. D. Thesis, Glasgow University, 1972; Alexia Grosjean, "Scots and the Swedish State: Diplomacy, Military Service and Ennoblement 1611-166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8; Steve Murdoch, "Scotland, Denmark-Norway and the House of Stuart 1603-1660: A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nalysis",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8;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Matthew Glozier, *Scottish Soldiers in France in the Reign of the Sun King: Nursery for Men of Honour*,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4。

④ 参见 I. Ross Bartlett, "Scottish Mercenaries in Europe, 1570-1640: A Study in Attitudes and Policies", *Scottish Tradition*, Vol. 13 (1986)。该文是少数例外之一，但篇幅很短，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未能加以讨论。

苏格兰枢密院记录^①、议会法案、军人回忆录及国王的公告与信件等材料，从历史背景、当局政策、个人动机及社会影响等角度，对近代早期苏格兰人到海外从军的现象进行探讨。由于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影响，苏格兰人去海外从军主要集中在詹姆斯六世（1567—1625年在位）及其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统治期间，这段时期前后海外从军的人数则比较少，故本章以这段时期为中心展开讨论。

一、苏格兰海外从军现象的历史背景

（一）苏格兰的经济状况

怀特在一篇讨论近代早期苏格兰社会经济的文章中指出：“同它的许多欧洲邻国相比，16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是一个落后而不发达的国家……在参观者眼中，苏格兰显得贫困而落后，它的社会是由封建关系和亲属纽带支配的，其经济中的商业因素还很脆弱。”^② 直至1740年以前，苏格兰经济落后于欧洲主流国家的状况

^① 枢密院（Privy Council）是由国王亲信大臣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协助国王处理司法与行政事务。从1887年到1970年，苏格兰国家档案馆陆续出版的《苏格兰枢密院记录》（*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以下简称RPCS）包含大量关于苏格兰人去海外从军的信息，是本章最基本的史料依据。

^② I. D. Whyte, "Early Modern Scotl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 Whittington and I. D. Whyte,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cotl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p. 119.

始终没有改变。^①如果把近代早期的欧洲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苏格兰就是其贫困落后的边陲地带：这里不仅工商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英格兰、尼德兰等地区，而且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其农业产量也很低，不足以养活国内的人口，即使在正常年份都需要从北欧等地进口粮食，一旦歉收必然酿成大面积饥荒。据文献记载，苏格兰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历了全国性饥荒，随后在1571—1573年、1585—1587年、1594—1598年、1602年（这次饥荒限于苏格兰高地）、1621—1623年和1634—1636年这些年份里都经历了严重的饥荒。^②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既不能为国内人口提供维持生存的足够物资，又不能让他们获得充足的就业机会，这是近代早期苏格兰出现大量国民海外从军的经济动因。

（二）苏格兰高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

苏格兰人在历史上具有尚武的传统，实际上鲜明地体现这一特点的主要是高地人。从地理上讲，苏格兰高地是由众多高山、峡谷和岛屿构成的，这些天然屏障一方面使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抵御外来入侵。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苏格兰高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是由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小社会组合而成的，这些小社会

^① R. A. Houston and I. D. Whyte, "Introduction: Scottish Society in Perspective", in R. A. Houston and I. D. Whyte, eds., *Scottish Society 1500-1800*, p. 1.

^② Michael Flinn et al, *Scott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193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09, 120, 130-131.

的名字叫“氏族”(clan),其成员被认为是(事实上往往确实是)拥有共同祖先的宗亲。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土地和独立的武装。在这里,氏族首领是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国王既无力迫使这里的人民屈服,也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代表国王行使权力的官员不能进入氏族的腹地追捕违法者,受害人只能依靠其氏族伸张正义。因此,不同氏族间为了寻仇或争夺土地及其他财产处于无休止的战争中。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几乎每一个健全的男人都变成了优秀的战士。在高地的传统中,勇敢是男人必备的素质,怯懦不仅是可耻的,而且将被氏族首领像对待罪犯一样加以惩罚。高地人非常重视荣誉,无论利益的诱惑还是战场上的不利形势都不能使他们叛变投敌。他们还具有良好的体质,徒步就能保持与骑兵同样的速度。^①高地人的上述禀赋使他们在欧洲成为极受青睐的兵员,^②这也是大量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的重要条件。

(三) 外部环境

在詹姆斯六世及查理一世统治苏格兰期间,欧洲大陆上到处

^① David Stewart, *Sketches of the Character, Manner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Highlanders of Scotland with Details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Highland Regiments*, Edinburgh: Longman, 1825, pp. 23-24, 32, 39, 77, 93.

^②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的一幅描绘雇佣兵的宣传画配有盛赞苏格兰高地人的文字,称他们是一个坚强而能吃苦的民族,仅凭一丁点儿食物就能生存,没有面包他们就吃草根;在紧急情况下,他们每天能行军70英里。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p. 9.

都在进行战争，比如尼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年）、丹麦-瑞典战争（1611—1613年）、俄国-波兰战争（1609—1618年）、俄国-瑞典战争（1613—1617年）、波兰-瑞典战争（1617—1629年），等等。尤其是席卷大半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使欧洲雇佣兵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是大批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的外部条件。

二、苏格兰当局的政策^①

（一）通过授权制度对海外从军现象加以管控

在《苏格兰枢密院记录》中，第一份明确反映当局对海外从军问题态度的文件是1572年6月21日枢密院发布的一道命令：

由于当前爱丁堡市存在饥荒并缺乏生活物资，大摄政和枢密院知道这里有违背国王的意愿抓人的情况发生……穷人和身体虚弱者将不会被强制，但身体强壮的男人和士兵不可以继续留在这里消耗为数不多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或许可以

^① 在詹姆斯六世与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苏格兰的政权掌握在国王手中。其中1567—1583年因詹姆斯六世未成年，实际掌权的是由贵族担任的大摄政（Lord Regentis Grace）。尽管枢密院在国家的日常管理中发挥着比议会更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国王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本书中提到的苏格兰当局指苏格兰国王（或大摄政）及其政策执行者枢密院。

到国内其他地方生活，或者去佛兰德尔从军打仗，或者去其他能使他们维持生计的国家……（大摄政和枢密院）以国王的名义及权威公开宣布如下命令：爱丁堡市内所有身体强壮的男人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军人，必须在本月23日之前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仆人及物品离开爱丁堡，去那些他们能够维持生计的国家。^①

这道命令显示当时的大摄政和枢密院对于本国人民到海外从军持鼓励态度——这显然是为了缓解过剩的人口对国内经济和物资供应的压力。不过，当局对待海外从军问题的政策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力图加以严格的管控，将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点体现在1573年6月4日的一份《苏格兰枢密院记录》中：

据了解，这个王国的许多臣民正准备前往海外，以图在其他国家的战争中效力，但他们并没有获得国王专门的许可；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被用来在海上或陆地对付我们国家及国王的可靠盟友，从而引起那些国家对我们的敌意乃至战争……所以，大摄政根据枢密院的建议派人在爱丁堡、利斯、阿伯丁等地商业十字路口公开宣布，所有臣民无论是士兵还是其他人都不得擅自乘船离开苏格兰，除非在获得国王授权的队长带领下，或者他们本身获得国王的专门授权，违令者将被处死。另外，船长和船主不得运送没有国王授权

^① RPCS, Vol. II, pp. 148-149.

的队长、士兵或乘客到海外，否则将被处死并没收船只及其他动产。^①

由此可见，尽管在原则上对臣民到海外从军并不反对，但为了避免在外交上造成不利影响，苏格兰当局在士兵输出方面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政策，禁止没有获得授权的人离开苏格兰去海外从军。按照当时的政策，军官们在苏格兰境内招募士兵必须事先获得专门的授权，这种授权不仅明确规定了招募的人数和用途，而且对于获得授权的军官和招募的士兵有一系列限制性规定。获得授权的军官必须委托至少一位担保人和他一同到枢密院签署一份承诺书。1573年6月6日，托马斯·罗伯森（Thomas Robesoun）上尉在枢密院签署的承诺书，代表了此后数十年这类文件的标准样式：

今日，获得国王授权招募300名士兵前往低地国家，保卫那里正受迫害的真信仰的托马斯·罗伯森上尉，与他委托的担保人科尔斯的约翰·门特斯（Johnne Menteith of Kerse）应召来到大摄政与枢密院面前，共同做出如下庄严承诺：除非有大摄政的特别许可，托马斯上尉不会招募土匪头目和正在为国王服役的士兵；该上尉将于来年2月1日前把他的连队带走的相应数量的重炮、火绳枪、手枪、火药筒和盔甲送回苏格兰，并加以出售；他将让他招募的士兵自食其力，在行军

^① RPCS, Vol. II, p. 235.

过程中不会有欺压百姓的行为；他和他的士兵不会参与苏格兰国民之间的冲突；他和他的士兵在去低地国家途中不会侵袭、骚扰、抢劫或勒索王国的臣民或朋友；他们绝不会效力于天主教徒针对新教的战争；在离斯特灵（Striveling）城堡16英里的范围内，他不会召集他的士兵，也不会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否则将被处以5000默克^①的罚款；如果他的士兵损坏了王国朋友的货物——在该士兵死亡或仍归托马斯上尉控制的情况下，被损坏物品的主人可能会向苏格兰国家或国王要求赔偿——他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托马斯上尉保证他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会接替约翰·门特斯承担前述义务及所有罚金，等等。

签名：科尔斯的约翰·门特斯、托马斯·罗伯森。^②

在大摄政和枢密院要求托马斯上尉做出的各项承诺中，有的是出于国防的考虑（比如不招募正在为国王服役的士兵，把带出国的武器装备送回国内加以出售）；有的是出于维护国内社会秩序的考虑（关于军队纪律的要求和不参加本国臣民之间的冲突）；有的是出于国家对外政策的考虑（招募的士兵只能站在新教一方作战，不效力于天主教徒针对新教的战斗，不骚扰苏格兰国王的盟友，损坏他们的物品要负责赔偿，等等），而禁止托马斯上尉在国王居

^① 默克（merkis）为苏格兰古代银币，价值相当于13先令4便士（苏格兰），或者13.33英格兰便士。

^② RPCS, Vol. II, pp. 237-238.

住的斯特灵城堡周围召集他招募的士兵，显然是出于对国王人身安全的考虑。

1587年9月3日，由于“一些傲慢而放肆的臣民，试图在没有国王批准的情况下招募士兵，并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国家”，国王和枢密院不得不重新宣布：禁止未获授权的人招募士兵或作为士兵去海外服务；地方官员对违令者要坚决抓捕，并将其名单上报给国王，执行不力的官员将与违令者一样面临死刑的惩罚。^①然而，未经授权的招募和擅自到海外从军的行为并未停止。1612年8月4日，枢密院颁布了一道禁止擅自为瑞典招募士兵的命令，因为当时与瑞典作战的丹麦国王是苏格兰王后的兄弟，苏格兰当局认为擅自为瑞典招募士兵尤其不能容忍。^②1633年3月28日，查理一世给苏格兰枢密院的信中再次重申：“除非得到我专门下达的新指令，任何类型的为外国招募的活动都不得在苏格兰进行。”^③苏格兰当局一次次反复重申禁止擅自招募或擅自到海外从军的命令，恰好从反面证明这一禁令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二）通过对输出目的地的选择使臣民的海外从军服务于外交政策

前引1573年6月4日的枢密院记录显示，苏格兰当局对海外从军现象实施管控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可能

① *RPCS*, Vol. IV, pp. 211-212.

② *Ibid.*, pp. 430-431.

③ *RPCS*, Second Series, Vol. V, pp. 65-66.

被用于对付苏格兰在国际上的盟友，从而引起外交上的麻烦，甚至可能把苏格兰拖入冲突中。通过有选择地授权为外国招募士兵，不仅能够避免上述危险，而且可以把输出士兵当成在国际上支持盟友，打击敌人，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纵观詹姆斯六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枢密院记录，我们发现苏格兰当局对士兵输出目的地是有严格选择的。在詹姆斯六世年幼时期，大摄政和枢密院批准的约20份招募授权，士兵输出目的地均标记为“佛兰德尔”或“低地国家”。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苏格兰当局对尼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怀有极大的同情。1583年詹姆斯亲政以后，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目的地又增加了丹麦，因为詹姆斯娶了丹麦公主。1611年，丹麦与瑞典之间发生战争，詹姆斯拒绝了瑞典在苏格兰招募士兵的请求。三十年战争爆发后，苏格兰从1620年起陆续批准了一些为德意志新教诸侯招募士兵的授权。随着巴拉丁选帝侯战败逃亡，新教一方的战争主角相继由丹麦、瑞典和法国接替（法国虽为天主教国家，但三十年战争中站在新教阵营），苏格兰先后批准了一系列向丹麦、瑞典、荷兰和法国输出士兵的授权。

在詹姆斯六世统治时期，苏格兰当局对臣民海外从军的政策目标是避免臣民的海外从军危害国家和国王的利益。到查理一世时期，苏格兰当局对臣民海外从军的态度更加积极，其政策目标倾向于将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1625年9月，查理一世继位伊始，便下令召回在他父亲统治期间离开苏格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和西属尼德兰

大公服务的臣民。^①同年11月，查理一世与丹麦国王、荷兰执政签订《海牙条约》，结成了针对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联盟。根据条约，查理一世每月应向丹麦提供30万弗罗林的军费补贴。^②自此以后，查理一世以间接方式卷入了三十年战争，苏格兰当局在输出士兵方面开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严令召回效力于天主教阵营的臣民的同时，查理一世批准了许多为新教国家招募士兵的申请。

1626年3月16日，枢密院致信苏格兰高地的一些绅士，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协助唐纳德·马凯招募士兵去欧洲大陆，并声言：“此事受到国王陛下的高度关注，而且涉及国家的荣誉。”^③查理一世的政府甚至开始向获得授权为外国招募士兵的军官提供资金。1626年6月30日，查理一世在给苏格兰枢密院的信中表示，他乐意为唐纳德·马凯爵士和詹姆斯·莱斯利爵士已招募或即将招募的部队支付招募和运输费用。^④1626—1627年的《苏格兰枢密院记录》显示，查理一世先后为唐纳德·马凯爵士提供了2500英镑，^⑤为尼斯岱伯爵、斯比尼领主和詹姆斯·辛克莱爵士提供了8000英

① Charles I, *A Proclamation for the Calling Home of all such His Majesties Subjects as Are Now Employed either by Sea, or Land, in the Services of the Emperour, the King of Spaine, or the Archduches*, Printed by I. L. and W. T. for Bonnam Norton and John Bill, 1625. (下载自数据库 EEBO)

② Peter Wilson,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A Sourceboo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92-93.

③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 p. 247.

④ *Ibid.*, p. 313.

⑤ *Ibid.*, pp. 347-348.

镑，以便他们为丹麦等国招募士兵。^①我们在詹姆斯六世统治时期的枢密院记录中，只看到军官们通过变卖房产或借贷等手段筹集招募资金的记载，^②没有找到国王为他们提供招募资金的任何记录。查理一世愿意资助为外国招募士兵的军官，是因为这一时期当局已将输出苏格兰军人当作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

（三）强制社会闲散人员与罪犯到海外从军

强制乞丐、流浪者和其他闲散人员从军，不仅是在需要时招募到更多士兵的有效方法，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危害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故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各国经常采取的一项政策。为了解决大量无业游民充斥社会的问题，苏格兰议会曾多次制定关于禁止身体强壮的人乞讨、流浪的法令。比如，1579年的《关于惩罚身体强壮却游手好闲或乞讨的人以及救助穷人和残疾人的法令》规定：为了彻底消除身体强壮的人游手好闲或乞讨这一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顽疾，自1580年1月1日起，年龄在14—70岁之间，身体强壮的乞丐和流浪者将会被逮捕，他们将受到鞭打和用烙铁烫耳朵的刑罚，并由法庭记录在案，如果受过惩罚的人再次因这一罪行被捕将被处以死刑。^③

三十年战争期间，由于欧洲大陆对士兵的需求陡增，苏格兰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 pp. 550-552.

② RPCS, Vol. II, pp. 676-677; Vol. VIII, pp. 619-620.

③ Parliament of Scotland, *For Punishment of the Strang and Ydle Beggaris and Releif of the Pure and Impotent*, <http://www.rps.ac.uk/trans/1579/10/27>, 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当局在授权军官们为新教各国招募士兵的同时，允许他们用强制手段招募乞丐、流浪者和没有正当职业的闲散人员。1620年5月8日，枢密院重申了议会关于禁止身体强壮的人乞讨或流浪的法令，并敦促那些乞丐、流浪者和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员利用当下正在招募士兵的大好时机，报名参加格雷上校招募的部队，去欧洲大陆为波希米亚国王效力，从而可以获得不错的报酬，并可避免遭受死刑的惩罚。^①

如果说詹姆斯六世统治时期的政策主要是敦促身体强壮的乞丐、流浪者和其他闲散人员自行报名到海外从军的话，到查理一世时期，这一政策转变为授权军官们强行招募苏格兰境内的上述人员。1627年3月，已经获准为丹麦国王招募3000名士兵的斯比尼领主亚历山大从枢密院获得以下授权：他和他属下的军官可以搜索抓捕苏格兰境内身体强壮的乞丐、流浪者和缺乏谋生手段闲混日子的人，使其加入为丹麦国王招募的部队，因为这些人“对国家来说是毫无益处的负担，他们或许很适合当兵，让他们去国外从军比在国内混日子好”。这道命令还授权斯比尼领主用强制手段招募那些一年前报名参加马凯上校招募的部队，却在领取报酬以后逃走的人。^②这一时期，尼斯岱伯爵、詹姆斯·辛克莱等其他军官也获得了类似的授权。^③

那些身体强壮的乞丐、流浪者、闲散人员和逃兵并不甘心被

① *RPCS*, Vol. XII, pp. 259-260.

②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 p. 542.

③ *Ibid.*, pp. 546-547.

强征入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用火绳枪、手枪等武器对抗试图强行招募他们的军官。还有很多人为了避免被招募而逃往爱尔兰，打算等到正在招募的部队离开后再返回苏格兰。鉴于这种情况，枢密院不得不颁布一道命令，要求地方官员协助正在招募的军官将那些应被强制招募的人带到集合地点，并禁止所有船只运送苏格兰人去爱尔兰，除非被运送者能够提供地方官员出具的文书。^①

国内存在大量身体强壮却游手好闲的人，国外对苏格兰军人的需求远大于供给，在此情形之下，采取强制手段迫使身体强壮的乞丐、流浪者和逃兵到海外从军是个一箭双雕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在强制招募的过程中使用暴力造成了一些伤亡。例如，1627年9月13日，查理一世致苏格兰枢密院的信中提到，一个名为迪克森的人在为丹麦招募士兵的过程中造成一个名叫约翰·哈迪的人死亡，国王要求枢密院对迪克森的案件从轻处理。^②

另一方面，为了完成招募指标，军官们有时用强制手段招募那些不应被强制从军的人员。1627年11月，哈维克（Hawick）市副市长将一些强征入伍的市民交给枢密院，其中包括碾磨工人阿兰·狄恩斯、麦芽工人沃尔特·斯科特、官员詹姆斯·沃赫、管道工人约翰·泰特与约翰·莱恩，等等。枢密院发现，其中一些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 pp. 565-567.*

②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I, p. 69.*

人并不属于应当被强制从军的，于是将他们释放了。^①1642年12月，爱丁堡的刀具商约翰·罗伯森的仆人托马斯·乔尼斯顿向枢密院控诉，为了把他弄去法国从军，萨尔顿（Saltoun）领主属下的少尉罗伯特·斯特林（Stirline）抓捕了他，并把他投放到凯南盖特市监狱。查明真相以后，枢密院逮捕了斯特林少尉和凯南盖特市的副市长。^②1643年6月，约翰·史密斯等人向枢密院控诉，他们10周前在从事合法生意的途中被蒙蒂思（Monteth）上尉强行招募。枢密院审理后发现，其中多人确实不属于应被强制招募的人员，遂将他们释放。^③

暴力强制的招募手段一旦被滥用，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1612年8月的一份枢密院记录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因为许多未经授权的人使用强制手段为瑞典招募士兵，在苏格兰民众中造成了恐慌，以致没人敢单独出行，地里的庄稼成熟了都不敢去收割。^④

与强制招募乞丐、流浪者、闲散人员及逃兵一样，允许各种各样的罪犯通过海外从军换取对其罪行的赦免，也是在需要时招募更多士兵的有效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正如萨尔顿领主亚历山大请求将两名犯人交由他带去从军时所说的：“两人都是贫穷悲惨的人，根本付不出任何钱，但喜欢当兵，愿意跟随我去法国作战，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I, pp. 105–106.

② *RPCS*, Second Series, Vol. VII, pp. 586–587.

③ *Ibid.*, pp. 446, 450.

④ *RPCS*, Vol. IX, p. 431.

他们可能适合在那里服务，而在监狱里他们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有任何益处。”^①

苏格兰当局允许触犯法律的人到海外从军，可能主要是为了减少苏格兰境内危害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当局在批准犯罪分子到海外从军时，往往对这些人再次返回苏格兰的权利加以限制。例如，1621年，安德鲁·阿里尔德西斯和亨利·阿里尔德西斯因为残害牲口被关进爱丁堡监狱。按照当时的法律，他们的行为可以被判处死刑。枢密院同意詹姆斯·维切（Vetche）少尉将此二人带到佛兰德尔从军。根据枢密院的要求，少尉将他们带上船以后，在到达佛兰德尔以前不得允许他们上岸。安德鲁和亨利对枢密院的恩惠表示感谢，他们向枢密院承诺，没有国王的许可终生不再返回苏格兰；如果将来获准返回苏格兰，他们将找到负责的人为他们做担保，“以便维护国王陛下的社会治安”^②。1627年，枢密院批准犯有通奸罪的安德鲁·戴维森跟随斯比尼领主亚历山大去参加德意志战争（The Warres of Germanie）^③，以换取对其罪行的赦免。同时要求斯比尼以自己的荣誉保证，在战争结束前不会允许安德鲁·戴维森返回苏格兰。^④1643年1月，约翰·沃特和吉尔伯特·沃特因偷窃7只绵羊被判有罪，枢密院命令将这两人交由詹姆斯·麦克麦斯（McMath）上尉带到法国从军，并规定他们两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VII, pp. 573, 582-583.*

② *RPCS, Vol. XII, p. 431.*

③ 这是当时苏格兰人对三十年战争的称谓。

④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I, pp. 31, 183-184.*

人永远不得返回苏格兰。^①

不仅招募士兵的军官可以请求把罪犯交给他们，想要到海外从军的罪犯自己也可以向枢密院提出申请。比如，1621年3月，因盗窃被关在爱丁堡监狱的威廉·卡明，恳求枢密院批准他跟随汉密尔顿中尉去低地国家从军，同时保证不经枢密院批准他绝不重返苏格兰。枢密院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令爱丁堡市地方官员将他移交给汉密尔顿中尉。^②

值得注意的是，以海外从军代替刑罚必须经过枢密院批准，福利斯男爵罗伯特·门罗的案例表明，^③未经批准试图通过海外从军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是当局坚决反对的。福利斯的罗伯特·门罗在英格兰娶了年轻的玛丽·海恩斯，出身绅士家庭的妻子为他带来不少嫁妆。在把她全部财产弄到手后，门罗将怀孕的妻子留在一个荒凉的庄园，自己返回苏格兰又娶了另外一个女人。被遗弃的妻子提出了控告。1626年6月14日，枢密院致信正在为丹麦招募士兵的唐纳德·马凯：“我们得到确切消息，他（福利斯的罗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VII, pp. 371–372.

② *RPCS*, Vol. XII, p. 453.

③ 福利斯的罗伯特·门罗（Robert Munro [Monro] of Foulis）是苏格兰高地门罗氏族的第21代首领，第18代福利斯男爵。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麾下效力，被任命为上校，死于1633年。其同名堂兄弟奥博斯黛的罗伯特·门罗（Robert Munro [Monro] of Obsdale）三十年战争期间也在古斯塔夫二世麾下充当雇佣兵，担任中校之职，返回苏格兰后参加过“主教战争”，还在镇压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叛乱中担任过苏格兰军队统帅，死于1680年。后者撰写了一部叙述自己从军经历的回忆录，因而比其堂兄弟福利斯的罗伯特·门罗更为出名。除特别标注外，本书中提到的“罗伯特·门罗”都是指奥博斯黛的罗伯特·门罗。

伯特·门罗)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企图在你招募的团里服役,借此离开这个国家……像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违法者,试图通过服役逃避刑罚……我们要求你和你手下的军官不要允许他加入你的团,也不可直接或间接允许他跟随你们离开。”^①

除在押的罪犯以外,民事纠纷中有过错的人也可能被迫到海外从军。在1628年的迈克尔·普雷斯頓爵士与赫伊父子纠纷案中,枢密院认定迈克尔·普雷斯頓对赫伊父子存在不当行为。枢密院要求迈克尔随尼斯岱伯爵的部队到海外从军,三年内不得返回苏格兰。^②

由于多数罪犯只是将海外从军作为逃避刑罚的途径,而不是真心情愿离开苏格兰,所以中途逃跑的情况时有发生。爱丁堡的磨坊工人约翰·邦科勒、詹姆斯·亚历山大和罗伯特·吉布森因偷窃磨坊里的小麦被捕,在他们即将被处死时,布罗格(Brog)上校请求暂缓执行他们的死刑,让他们到海外从军。枢密院批准了这一请求,并将这三人交给布罗格上校。但这三人在船上等候出发期间逃跑了。1623年1月,枢密院重新下令搜捕这三名歹徒。^③有一个叫约翰·古迪(John Gowdie)的人与他的两个儿子因杀人被捕,交给博斯维克(Borthuick)上尉,跟随后者到瑞典从军。后来,这父子三人从瑞典国王麾下逃走,回到了苏格兰。枢密院在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 pp. 303-304.

②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I, pp. 272-273.

③ RPCS, Vol. XIII, p. 137.

1628年3月下令重新逮捕他们。^①

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在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中，被迫入伍者占很高的比例。苏格兰学者斯蒂夫·默多克对这一看法提出了挑战，他声称：“一个被反复述说的观点是士兵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被迫入伍的……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威尼斯大使断定，格雷上校的团当中‘苏格兰人数量超过英格兰人，而且士兵们具有较好的素质（of better quality）^②……’，士兵具有较好的素质显示其中乞丐与匪徒的数量一定很少，在几万人中至多有数百人。”^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且不说士兵素质的好坏与他们是否出身于乞丐或匪徒并无必然联系，即便将威尼斯大使说的“of better quality”理解为“有较好的出身”，那也只能说明这支部队的士兵中出身好的比较多，仅凭这点何以得出“乞丐与匪徒的数量一定很少，在几万人中至多有数百人”的结论？由于缺乏统计资料，被迫入伍者在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中究竟占多大比例是个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但枢密院记录中大量关于强制招募的文件足以使我们相信，被迫入伍者的人数远远超过斯蒂夫·默多克愿意承认的规模。

① RPCS, Second Series, Vol. II, p. 267.

② “quality”一词也有“身份、地位”的含义，所以这句话也可理解为“（士兵们）有较好的出身”。

③ Steve Murdoch, “The House of Stuart and the Scottish Professional Soldier 1618–1640: A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and Identities”, in Bertrand Taithe and Tim Thornton, eds., *War: Identities in Conflict 1300–2000*, Thrupp, Strou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p. 44–45.

三、海外从军者的动机

近代早期苏格兰人海外从军的动机历来是研究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在欧洲大陆受迫害的新教徒之同情是苏格兰人到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①也有学者认为，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是苏格兰人到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②还有研究者提出，追求军事荣耀是激励苏格兰人到国外从军的基本动机。^③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去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不过是为报酬而作战的雇佣兵。^④那么，究竟哪一种看法更接近实际呢？

1568年，尼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爆发后，信奉加尔文教的苏格兰人将这场战争视为捍卫真信仰的斗争。此后八十余年中，大部分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是在新教君主或共和国的军队效力。^⑤在莱比锡附近的战役结束后，罗伯特·门罗获准

① 例如 William S. Brockington, "Robert Monro: Professional Soldier, Military Historian and Scotsman", in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pp. 218-225。

② 例如 Steve Murdoch, "The House of Stuart and the Scottish Professional Soldier 1618-1640: A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and Identities", in Bertrand Taithe and Tim Thornton, eds., *War: Identities in Conflict 1300-2000*, pp. 45-47。

③ 例如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p. 45。

④ 例如 James A. Fallon, "Scottish Mercenaries in the Service of Denmark and Sweden, 1626-1632", p. 65。

⑤ 三十年战争后期，大批苏格兰人效力于法国军队，法国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它在战争中的立场是站在所谓新教阵营中的。

把3000名战俘中的不列颠人和爱尔兰人招进他的部队。在清点人数时才发现，这些战俘中根本没有不列颠人，只有三名爱尔兰人，门罗只好向他的雇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汇报：“不列颠人是如此热衷于陛下的事业，他们当中几乎没人效力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①

这一时期大部分苏格兰人信奉的是加尔文派新教，而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大多效力于新教国家的军队，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宗教情感是苏格兰人到海外从军的主要动机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因为当时在苏格兰招募士兵需要得到国王的授权，而国王批准的大多是为新教国家效力的招募。^②在多数情况下，海外从军的个人在服务对象方面其实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因此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效力不足以作为分析他们从军动机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当时有许多海外从军的苏格兰天主教教徒效力于新教国家的军队，也有不少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人效力于天主教君主。三十年战争中第一批苏格兰士兵的指挥官安德鲁·格雷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麾下的苏格兰将领约翰·赫本，都是在新教阵营中表现卓越的天主教教徒。由此看来，在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内心一定有比宗教更重要的动机。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宗教在近代早期苏格兰人精神生活中的分量，对打算到海外从军的苏格兰新教

^① Robert Monro, *Monro, His Expedition with the Worthy Scots Regiment (Called Mac-Keyes Regiment)*, Part II, London: William Jones, 1637, p. 73.

^② 参见罗斯·巴特利特对枢密院记录中的招募授权的统计。I. Ross Bartlett, "Scottish Mercenaries in Europe, 1570-1640: A Study in Attitudes and Policies", *Scottish Tradition*, Vol. 13 (1986), pp. 18, 21.

徒而言，能够在捍卫新教信仰的战争中效力是最乐意不过的事情了。

三十年战争期间，在效力于新教阵营的苏格兰人心目中，恢复伊丽莎白公主及其丈夫的地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考虑。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成为英格兰国王，便把王室迁移到伦敦，但生长于苏格兰的伊丽莎白公主以其和蔼可亲的形象一直深受苏格兰臣民的爱戴。后来这位公主嫁给了德意志重要的新教诸侯巴拉丁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四世。1619年8月，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费迪南德（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与臣民的宗教冲突被废黜后，弗雷德里希被推举为波希米亚国王。但弗雷德里希遭到皇帝和西班牙的联合进攻，其波希米亚王位和巴拉丁领地均被剥夺。随后，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并同情巴拉丁选帝侯的德意志新教诸侯、丹麦、瑞典和法国相继加入战团，一场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欧洲大战就此开始。

罗伯特·门罗在谈到自己投身于三十年战争的动机时写道：“其中的理由很多，首先是为了我们令人敬畏的君主的女儿，不幸的波希米亚王后的自由及其王朝问题；其次是为了我们不幸的新教兄弟们的自由；最后是为了使自己在军人这一职业中学到更多东西。”^① 笔者认为，门罗声称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是自己投身战争的首要动机，可能只是为了博得王室的好感，因为就在他的回忆录出版几年以后，查理一世与苏格兰臣民之间爆发

^① Robert Monro, *Monro, His Expedition with the Worthy Scots Regiment (Called Mac-Keyes Regiment)*, Part II, p. 63.

冲突，门罗从欧洲大陆返回苏格兰，参加了对抗国王的“主教战争”。^①值得注意的是，门罗的回忆录出版时写明是献给当时的巴拉丁选帝侯的，这位被门罗用长达几页的献词表达恭维之情的选帝侯就是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之子，也是查理一世的外甥。对罗伯特·门罗这样的军人而言，王室的支持对其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他在1634年获得在苏格兰独家制造和销售长矛、滑膛枪和甲冑的特权，^②并于1637年获得授权在苏格兰招募800名士兵为瑞典效力。^③

应当承认，许多苏格兰人是怀着对伊丽莎白公主及其丈夫的同情投身于三十年战争的，但把这种同情看作他们投入战争基本动机的学者，显然忽视了以下几个重要事实：第一，当巴拉丁选帝侯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击败并流亡海外时，他命令曼斯菲尔德麾下的苏格兰士兵解散，但这些士兵并未离开战场，他们仍然与曼斯菲尔德在一起。后者试图带着这些士兵投到他们曾经与之作战的皇帝旗下效力，但没有获得成功。随后，他们漫无目的地进入洛林，在那里待了很久，直到荷兰人愿意雇佣他们。^④第二，当1639年的“主教战争”爆发，查理一世召唤在海外的苏格兰军人回国为他效力，响应者寥寥无几，反而有不少人响应苏格兰议会的号召站在了国王的对立面。约翰·西顿（John Seton）上校拒绝查理一世的理由

① William S. Brockington, "Robert Monro: Professional Soldier, Military Historian and Scotsman", in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p. 224.

② *RPCS*, Second Series, Vol. V, p. 349.

③ *RPCS*, Second Series, Vol. VI, pp. 458-459.

④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pp. 19-20.

反映了这些军人的心声：他不能为了效忠于国王而反对自己的国家。^①此外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注意，在三十年战争初期，詹姆斯六世并不打算支持其女婿巴拉丁选帝侯，而是试图保持中立，因为他对选帝侯没有等到自己的建议就接受波希米亚王位感到不满，而且当时詹姆斯六世正在谋求其子查理与西班牙公主的联姻。^②试想一下，国王自己对女儿、女婿的遭遇都表现得漠不关心，^③对伊丽莎白公主的同情怎么可能是苏格兰百姓投身战争的基本动机呢？更何况，在海外从军的人中有那么多是违反国王的禁令擅自出国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不是苏格兰人到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

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究竟是投身于一项事业还是一种职业？笔者认为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尽管宗教情感和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在激励苏格兰人海外从军方面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谋生、追求财富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才是他们去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福里斯男爵罗伯特·门罗由于在法国奢侈的旅行导致经济上出现困难，不得已将此后十年的

① Steve Murdoch, "The House of Stuart and the Scottish Professional Soldier 1618-1640: A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and Identities", in Bertrand Taithe and Tim Thornton, eds., *War: Identities in Conflict 1300-2000*, p. 49.

② G. M. D. Howat, *Stuart and Cromwelli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Ltd, 1974, pp. 26-29.

③ 1623年11月，詹姆斯六世写信给女婿弗雷德里希，说他与西班牙的外交谈判已经失败，并暗示将采取军事手段帮助弗雷德里希恢复巴拉丁领地和选帝侯头衔。James I, *Letters of King James VI and 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428-430.

财产收入全部用来还债。然后与一些朋友来到德意志，起初作为志愿者进入唐纳德·马凯的团，服务一段时间后开始指挥一个连，最终荣升为上校。他的事迹激励着其他人追随他所走的路，“更愿荣耀富贵地生活在海外，而不愿像许多人那样留在苏格兰的家中侵占朋友的利益，迫不及待地去抢半块面包”。^①三十年战争中的苏格兰军人詹姆斯·特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德意志，我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准则，一个那里的军人过分相信的行为准则，那就是忠诚地服务于我们的雇主，至于我们的雇主是谁并不重要。”^②尽管斯蒂夫·默多克曾经提出过质疑，但笔者认为这段话充分显示了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的雇佣兵性质。^③

除谋生、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外，追求军事荣耀或战争冒险的刺激也是一部分苏格兰人去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之一。在苏格兰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占据着这块土地的人群之间为了个人的生存、土地的占有或权力进行着频繁的战斗。在17世纪以前，苏格兰绝大部分身体健全的成年男

① Robert Monro, *Monro, His Expedition with the Worthy Scots Regiment (Called Mac-Keyes Regiment)*, Part I, pp. 4, 36.

② Sir James Turner, *Memoirs of His Own Life and Times (1632-1670)*, Edinburgh: 1829, p. 14.

③ 默多克指出，特纳的话是在为自己曾在“主教战争”中反对国王的行动辩护，这可能有几分道理，但他进而得出“特纳所强调的雇佣兵式的想法对多数苏格兰士兵而言，是最不重要的人伍动机”这一结论缺乏依据，也不能令人信服。Steve Murdoch, “The House of Stuart and the Scottish Professional Soldier 1618-1640: A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and Identities”, in Bertrand Taithe and Tim Thornton, eds., *War: Identities in Conflict 1300-2000*, pp. 44-47.

子都是潜在的战士。^①由于历史原因，苏格兰男人对于战争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约翰·赫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在战争中总是主动要求承担艰巨的任务，“因为他是那种离开了战斗与胜利就感到生活毫无乐趣的人”^②。1567年詹姆斯六世继位以后，苏格兰国内出现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平静，那些在操弄武器中长大的人便把目光转向海外。这时欧洲大陆四处都在进行战争，尤其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导致军人成为严重紧缺的资源。

甘为荣誉冒险的所有勇敢的年轻人啊，听那战争女神贝罗娜的号角在吹响，战神马尔斯的旗帜在向你召唤！德意志、瑞典和丹麦飘起了烽烟，一群勇敢的青年受到了挑战；他们个个穿戴得盔明甲亮，令人炫目的伟大恺撒就在眼前，召唤你加入一场战斗！嗒嗒啦啦啦！哦，万岁！万岁！我们呼喊着古斯塔夫！在这里，我们要么赢得荣誉要么死亡！^③

这是三十年战争期间流行于苏格兰的一首歌曲的片段。可以想象，这类富有鼓动性的歌曲必定在许多苏格兰青年的内心激起了去战场上追求胜利与荣耀的冲动。詹姆斯·特纳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便是一个明证：

① Stephen Wood, *The Scottish Soldier: An Illustrated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Scotland's Fighting Men through Two Thousands Years*, Edinburgh: Archive Publications Limit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1987, p. 8.

②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p. 45.

③ *Ibid.*, p. 30.

在我满 18 岁之前，一个焦躁不安的想法进入了我的头脑，对于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多喧闹的，由非常著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成功指挥的，针对皇帝与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的这些战争，如果不做一名参与者，至少要做一个观察者。^①

综上所述，在近代早期去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之中，尽管有不少人将参加战争视为服务于自己的信仰或君主，但他们到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谋生，为了追求财富、地位、荣耀或冒险的刺激，所以他们本质上都是彻头彻尾的雇佣兵。

四、海外从军现象的影响

（一）缓解了苏格兰经济与人口之间的矛盾

海外从军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谋生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早期苏格兰国内经济的贫困落后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苏格兰中部斯特灵郡一个面包师的儿子埃德蒙，由于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中表现英勇而得到提拔，最终被授予上校军衔，并在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他将获得的财富慷慨地分给在家乡的贫困亲戚。晚年时，他回到家乡的小镇生活，为那里的教区牧师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死后还留给女儿一

^① Sir James Turner, *Memoirs of His Own Life and Times (1632-1670)*, pp. 3-4.

大笔财产。^①当然，并非每个到海外从军的人都能获得埃德蒙那样的成功，但苏格兰人英勇善战、不屈不挠的禀赋常常使他们得到提拔重用。例如，在瑞典征服的德意志领土上有60名苏格兰人被任命为城镇、城堡或要塞的总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麾下至少有4名陆军元帅、3名上将、1名中将、13名少将、3名准将、27名上校、51名中校、14名少校，以及不计其数的上尉和中尉来自苏格兰。^②有些苏格兰人通过海外从军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巨额财富，其他人则至少得到了一个就业机会，并可通过抢劫战利品偶尔发笔小财。

（二）有利于苏格兰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詹姆斯六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苏格兰国内出现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局面，而去海外从军为那些习惯了操弄武器、好勇斗狠的苏格兰青年过剩的精力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尤其大批乞丐、流浪者、没有正当职业的闲散人员和罪犯离开苏格兰到海外从军，更加有利于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位学者指出，在消除血亲复仇这种危害社会安定的历史现象的过程中，向海外输出雇佣兵比苏格兰王室在司法方面的努力发挥的作用更大。^③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①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pp. 14–15.

② *Ibid.*, p. 29.

③ Roger B. Manning, *Swordsmen: The Martial Ethos in the Three Kingdo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80.

（三）推动了近代早期苏格兰人向外移民

在海外从军的苏格兰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军队以后并没有返回苏格兰。他们或因为在当地有更好的职业前景，或因为与当地女子结了婚，或由于某些障碍无法回到苏格兰，所以永久性地定居在服役过的国家。其中一些人不仅被接纳为所在国的国民，而且还被授予贵族头衔，甚至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1628—1660年，有37名苏格兰军人在瑞典受封为贵族，并且进入了瑞典议会贵族院（Riddarhus）。与此对照，取得同样地位的英格兰人只有弗里特伍德（Fleetwood）上校一人。在1611—1680年，共有77位苏格兰人在瑞典受封为贵族，占这一时期瑞典新封贵族总数（670人）的11.5%，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于瑞典的苏格兰军人。^①议会是瑞典重要的政治机构，拥有否决国王政策的权力。按照规定，进入该机构的人必须是瑞典国民。苏格兰军人进入瑞典议会的事实说明，他们已经被接纳为瑞典人，而且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瑞典人。

（四）加强了苏格兰与欧洲邻国的联系与交流

古斯塔夫·阿道夫统治下的瑞典一度号称为欧洲的军事学校。古斯塔夫成为近代欧洲著名的军事改革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感谢其麾下的苏格兰军人，是他们将苏格兰某些优良的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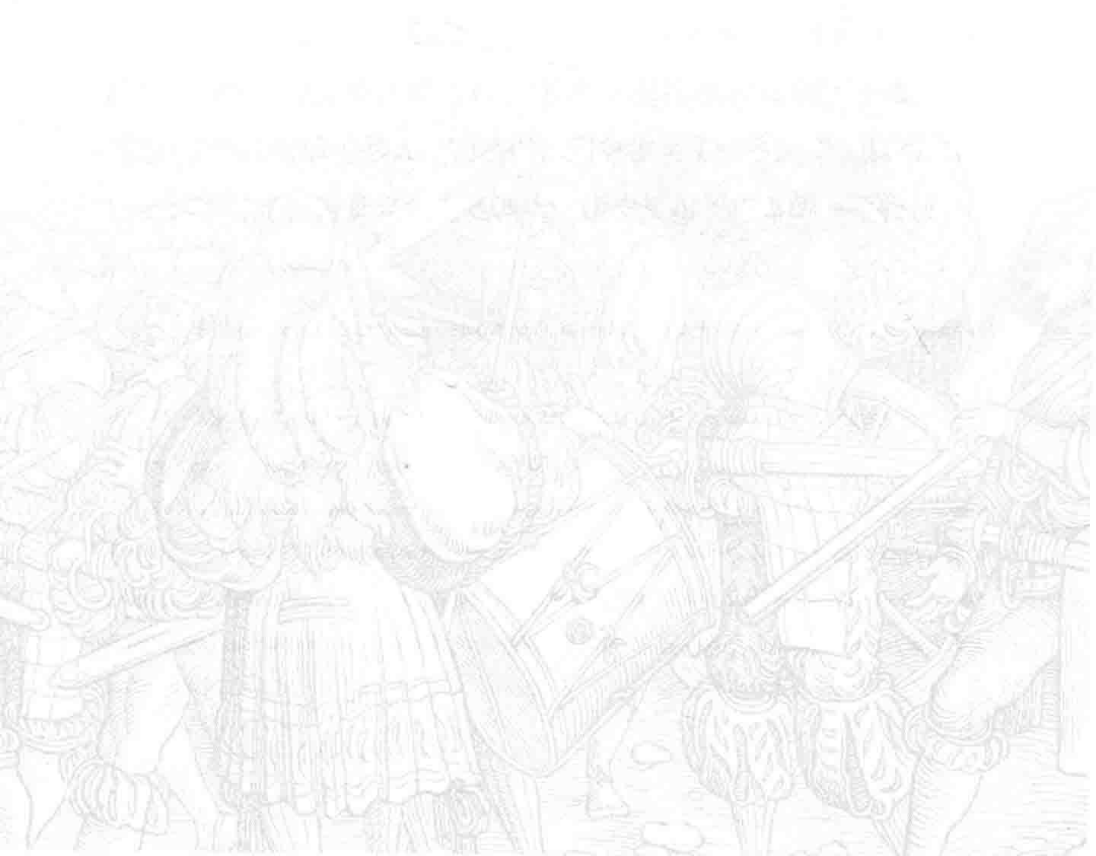
^① Alexia N. L. Grosjean, "Scots and the Swedish State: Diplomacy, Military Service and Ennoblement 1611-1660", pp. 120, 132-134.

传统——比如军事纪律——带到瑞典的。^①反过来，那些曾在欧洲大陆从军的老兵在 1639 年的“主教战争”及英国内战期间的各方军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正是他们将欧洲大陆上最新的军事制度和思想带到了不列颠。当然，伴随海外从军的人流动于各国之间的不只是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实际上，大规模的海外从军促进了苏格兰与欧洲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技术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交流。

^① James Grant,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p. 29.



15 世纪晚期
至 18 世纪末的
瑞士雇佣兵



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雇佣兵当中，名声最显赫的就是 15 世纪晚期至 18 世纪末的瑞士雇佣兵。瑞士雇佣兵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欧洲各国雇主的追捧，并能够得到比其他雇佣兵更高的报酬。他们长期在法国等雇主的军队中充当核心，往往能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瑞士人系统叙述本国雇佣兵发展史的著作早在 18 世纪就已问世。1751 年，楚尔-劳本编撰的八卷本《瑞士人为法国效力的军事史》^① 在巴黎出版，书中系统讲述了效力于法国的瑞士雇佣兵的历史。该书作者本身就是一名瑞士雇佣兵，曾担任法国国王瑞士卫队（Gardes Suisses）的队长。1788 年，梅·德·罗曼莫捷编撰的八卷本《瑞士军事历史以及效力于欧洲各地军队的瑞士人》^② 在卢塞恩出版，该书在论述古罗马时代至 17 世纪瑞士军事史的同时，着重考察了为欧洲各国效力的瑞士雇佣兵。不过，这些早期著作更像是相关雇佣兵的传记，并未触及瑞士何以走上发展雇佣兵之路等理论性问题。1908—1916 年，位于日内瓦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效力于外国的瑞士军人”的丛书，其中收录了一系列瑞士雇佣兵的日记和回忆录，为研究瑞士雇佣兵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③

①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Paris: Desant & Saillant, 1751.

② May De Romainmotier,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Suisse et celle des Suiss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ervices de l'Europe*, Lausanne: Jean-Pierre Heubachet Comp., 1788.

③ 例如 *Soldats Suisses au service étranger: Journal d'un sous-lieutenant de cuirassiers F. J. L. Rilliet, souvenirs d'un garde d'honneur F. A. Cramer, mémoires inédits d'un soldat prisonnier en Russie P. L. Mayer*, Genève: A. Jullien Éditeur, 1908; *Soldats Suisses au service étranger: Le vainqueur des Peaux-Rouges de l'Ohio Henry Bouquet, souvenirs des campagnes du lieutenant-colonel Louis Begos, un vaudois à l'armée d'Espagne J. D. Maillefer*, Genève: A. Jullien Éditeur, 1909.

随着瑞士雇佣兵在19世纪退出历史舞台，瑞士人研究雇佣兵历史的兴趣似乎也在减退。20世纪以来，关于瑞士雇佣兵的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著作几乎都出自瑞士以外的学者。安东尼·莫克勒出版于1970年的《雇佣兵》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14、15世纪及16世纪初瑞士的军事历史及其雇佣兵的情况。^①约翰·麦考马克（John McCormack）1993年出版的《百万雇佣兵：世界各地军队中的瑞士军人》^②一书对瑞士雇佣兵五个世纪的历史进行了叙述，这是迄今为止对瑞士雇佣兵最全面的研究。但该书侧重于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因此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章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瑞士这样一个小国是怎样成为欧洲最著名的雇佣兵提供者的？瑞士雇佣兵的招募与管理机制是怎样的？瑞士当局与雇佣兵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怎样？瑞士雇佣兵对雇主的忠诚度如何？瑞士雇佣兵在19世纪走向没落的原因是什么？

一、瑞士雇佣兵的起源

（一）瑞士联邦的形成

现今瑞士中部的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see，也称卢塞恩湖）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p. 74-104.

^②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London: Leo Cooper, 1993.

到阿尔卑斯山最高山脊之间的地区是瑞士联邦的发祥地。施维茨 (Schwytz)^①、乌里 (Uri) 和下瓦尔登 (Unterwalden) 这三个森林州的居民很可能是被罗马军队征服以后躲避到这里的一部分辛布里人的后裔。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里的居民几乎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他们在山谷中自由自在地以放牧为生, 未曾受到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或法兰克人等征服者的注意。那些外来者即或偶尔闯入过这些地方, 也没有在这蛮荒贫瘠的地方定居下来的意愿。然而, 基督教传教士比那些征服者更能忍受这里的艰苦环境, 他们的到来使这些未开化的山民变成了基督徒。^② 在基督教传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施维茨、乌里和下瓦尔登的居民共用着同一座教堂, 共同生活在他们自己选举出的头面人物的治理之下。

随着人口的增加, 施维茨、乌里和下瓦尔登分别有了各自的教堂, 并开始组成各自的自治机构, 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社区。^③ 不知从什么年代起, 这三个社区开始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他们大概认为皇帝可以保护其免受周围邻居的侵犯, 因为那些邻居不是皇帝的附庸就是皇帝的臣民。1240 年, 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 (1220—1250 年在位) 颁发了一份特许状, 将施维茨、乌里和下瓦尔登置于帝国直接保护之下, 使其脱离总督哈布斯堡伯爵的管辖。^④

① 瑞士的国名来源于此。

② A. Vieusseux,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ians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1840, p. 39.

③ Heinrich Zschokk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Memphis: General Books LLC., 2012, p. 13.

④ Karl Dändliker, *Geschichte der Schweiz*, Erster Band, Zürich: Friedrich Schultheß, 1900, S.363.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绝嗣造成皇位空缺的动荡时期，施维茨、乌里和下瓦尔登在1257年自愿恢复了本已废除的总督职位，接受鲁道夫·哈布斯堡的管辖，以获得这位强大邻居的保护。^①然而，在后来的年代里，这三个社区为对抗哈布斯堡家族将其变为世袭领地的企图，不得不联合起来。1291年8月1日，在鲁道夫·哈布斯堡去世17天后，来自施维茨、乌里和下瓦尔登三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宣誓将永远遵守它们先前缔结的盟约，在遭遇外部入侵时互相给予支援，并以和平手段解决同盟内部的争端。^②随着这个永久同盟的缔结，瑞士最早的三个州诞生了。^③

虽然三个森林州人口和经济规模都非常小，但它们之间的永久同盟是瑞士联邦的开端。为了摆脱正在崛起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卢塞恩、苏黎世、格拉鲁斯、楚格、伯尔尼等城市或乡村社区相继与三个森林州结盟，从而成为持续扩大的瑞士联邦的新成员。不过，所谓瑞士联邦只是一个围绕三个森林州的同盟关系网，并不存在联邦的中央政府，联邦层面既没有常设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没有财库和军队。^④直到法国大革命导致瑞士联邦覆灭，以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士联邦重新建立，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① Dionysius Lardner,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B. C. 110 to A. D. 1830*, Philadelphia: Carey & Lea, 1832, pp. 53–54.

② Karl Dändliker, *Geschichte der Schweiz*, Erster Band, S. 381–385.

③ 1291年的盟约是现存最早的盟约文本，因此被正式认定为瑞士联邦的开端。实际上，在此之前三地之间早就缔结过正式盟约，并有每十年更新盟约的传统。John Wood, *A Gener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Edinburgh: Peter Hill, 1799, p. 41.

④ A. Vieuxseux,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ians to the Present Time*, p. 209.

（二）孕育出欧洲最优秀的士兵

1291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三个森林州与日益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维持着和平共存的状态，因为哈布斯堡家族正忙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事务。然而，1314年施维茨因为牧场的纠纷进攻哈布斯堡家族保护下的艾因西德伦修道院，促使哈布斯堡家族发动了试图制伏这些山民的远征。1315年11月，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哈布斯堡纠集了2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4000名重装骑士），兵分两路向施维茨进发。当利奥波德亲自率领的大军行进到摩尔加滕隘口时，遭到大约1300名来自施维茨、乌里与下瓦尔登的山民的伏击。利奥波德的先头部队被预先设置的路障和一队弩手阻挡，而后面的队伍继续前进，以致全部骑兵都挤在狭窄的隘口里。此时，两侧山崖上的伏兵抛下大量巨石和树干。紧接着，森林州的主力冲杀出来，用戟和斧头对乱作一团的敌军肆意砍杀。战斗中，哈布斯堡军队有3500人丧命。根据编年史的记载，瑞士方面在这场战役中只有15人阵亡。^①摩尔加滕战役中瑞士人取得的胜利是惊人的，这是中世纪以来欧洲第一场由步兵战胜骑兵的较大战役。这场战役显示出瑞士山民作战英勇的特性及其进行周密计划的能力，但他们的胜利当时主要被归因于山地的特殊地形。直到1339年的劳彭战役和1386年的森帕赫战役，瑞士步兵

^① May De Romainmotier,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Suisse et celle des Suisses dans les différens services de l'Europe*, Tome 1, pp. 455-459; H. Leemann, *Abriß der Militär-Statistik der Schweiz*, Bern: L. R. Walthard' Schen Buchhandlung, 1839, S.6-25.

在开阔的地形条件下击败重装骑兵，^①人们才认识到摩尔加滕的胜利并非侥幸。

在高山、森林和山谷中放牧的生活从体质和精神两方面造就了瑞士山民成为优秀军人的特质。16—17世纪的旅行家费内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曾评论说，蛮荒的自然环境将瑞士人培育成了“一个狂暴的民族，他们能够忍受艰苦的环境，具有好战的性情，他们的身体就像大树和牲畜一样强壮，所以他们似乎是天生的军人”^②。瑞士山地的男孩们在十岁左右就开始帮大人放牧，到了十四五岁就已经是成熟的放牧者。他们通常在这个年纪加入由同龄人组成的团体。在共同外出打猎的过程中，在争夺牧场的武装冲突中，在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中——除摔跤、投掷石块等常规的比赛以外，搬着巨大的石头爬山这类即兴比赛也时常举行——青年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掌握了基本的战术，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且培养了对团体的忠诚和荣誉感。他们绝不能容忍别人蔑视他们的力量或勇气。

15世纪以前瑞士人使用的主要武器是戟。这是一种在近身肉搏战中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但其8英尺的长度与重装骑兵12—14英尺的长矛相比显得太短了。这一缺点在森帕赫战役中差点儿酿成灾难。15世纪20年代，瑞士步兵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武器——由长达18英尺的白蜡木杆和10英寸长的钢铁枪头组成

① 关于这两场战役，请参见 H. Leemann, *Abriß der Militär-Statistik der Schweiz*, S. 25–35。

② Fynes Moryson, *An Itinerary*, Part III, London: J. Beale, 1617, p. 266.

的长枪。^①如此硕大笨重的长枪在单个使用时并没有什么用处，它只能是一种集体性武器。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武器的效力，瑞士人采用了一种密集的方阵队形。进攻时，长枪在高于肩膀的位置以略微向下的角度向前刺杀。防守时，第一行的士兵用右脚将长枪末端固定于地面，并用左膝支撑，使枪头保持在肩膀的高度；随后三行的士兵则将长枪平端在腰部至肩部的高度（因此每个冲过来的敌人至少都要面对四支可怕的长枪头）；后面的士兵则将长枪垂直指向空中，形成一个抵御弓箭等武器的保护伞，并随时准备填补前面士兵伤亡造成的空缺。^②这种像刺猬一样由密集的长枪头组成的巨墙，足以有效防御包括重装骑兵在内的各种进攻。而且，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型“刺猬”在进攻中同样威力无穷。长枪兵在进攻与防守中的效力都取决于能否保持好密集的阵形。方阵中的士兵是按照他们所属的村庄、城区或行会分组的，这加强了他们对同伴的信任和集体的忠诚，使他们在危急时刻能够冷静地保持队形。^③瑞士军队标准的战斗序列是分成先驱、主力和后卫三个方阵。当先驱方阵向敌军发起冲击时，主力方阵并不是跟在它的后面，而是在它的左侧后方或右侧后方，与它保持协同前进。后卫方阵则常常停下来等待第一波冲锋的结果，以作为预备队之用。这样布阵的好处是，在每一个方阵的后方留出

① Charles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Volume 2,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8, p. 255.

② Trevor N. Dupuy, *The Evolu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 Fairfax: Hero Books, 1984, p. 85.

③ Bert S. Hall,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7-38.

了足够的空间，当被迫撤退时就不至挤压到后面的部队使其陷入混乱。^①

除了士兵的素质和15世纪在战争中逐渐形成的完美战术外，还有两个因素大大增强了瑞士军队的威力。一方面，瑞士多山的地形不适宜骑兵作战，瑞士联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由山地牧民和市民组成的非封建的社会，中世纪封建骑士那种以抓获战俘索取赎金为目标的战争传统从未影响到瑞士山民。瑞士军人在战争中不要俘虏，他们自己也是宁死不当俘虏，不祈求饶命，也不会饶过对手的性命，与他们作战死亡的风险极高。这是瑞士军人获得“凶残”名声的主要理由，也是令所有对手胆寒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瑞士军人基本上不佩戴防护装备，因此行动起来非常迅捷，其速度与重装骑兵相差不大，且比后者更加灵便。从出现在敌人视野至挺进到敌军阵线前沿只需片刻，往往能在敌军尚未部署完毕时就发起进攻。起初，因为山民们的贫困使其不可能像封建骑士那样配备价格昂贵的甲冑，而且长枪和戟都需要双手操纵，使他们不可能携带盾牌，所以他们的安全完全寄望于手中的武器。后来，由于在实战中一再被证明的效力，这一做法作为一种民族性的军事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瑞士人的军事威力在15世纪最后25年的勃艮第战争和施瓦本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鲁莽查理是第四位，也是最令人生畏的一位勃艮第公爵。得益于几代公爵通过联姻、继承、征服等方式不断的积累，权力鼎盛时期的鲁莽查理统治着包含佛兰德尔、布拉班

^① Charles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Volume 2, pp. 260-261.

特、埃诺、弗里斯兰、泽兰、林堡、聚特芬、格德斯、勃艮第、尼维奈、夏洛莱、欧塞瓦、皮卡迪、里尔、阿图瓦、维芒杜瓦、勒泰勒、内穆尔、列日、卢森堡、上阿尔萨斯以及弗朗什-孔泰等繁荣富庶的领地，并有望继承米兰和普罗旺斯。^①通过效仿法王查理七世的军事改革，鲁莽查理建立了一支以重装骑士为主的常备军，并配备了大量火炮，这支军队在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鲁莽查理曾经直接率兵到巴黎城下，威胁法王路易十一。^②他用武力控制了洛林公国的大部分领土，只需要吞并这个小公国，就可以将其所有领地连接起来，以实现建立一个从北海到地中海的庞大王国的梦想。如果这个梦想实现，将会有有一个中欧强国把法国与德国领土分隔开，欧洲后来的历史也将会改写。然而，因为不明智地让自己陷入与瑞士人的冲突，鲁莽查理将勃艮第公国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一并断送了。

1469年，奥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把阿尔萨斯和莱茵河上游其他几块领地抵押给鲁莽查理，换得5万弗罗林现金。^③从此以后，

① 这些领地彼此之间是独立的，但查理是每个领地的领主。尽管在名义上这些领地都属于法兰西王国或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勃艮第公爵对法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保持着独立性。鲁莽查理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之一，其财政资源与英格兰、法兰西及阿拉贡相当。Laetitia Boehm, "Burgundy and the Empire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Bol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 No. 2 (April, 1979), p. 158.

② A. Vieuxseux,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ians to the Present Time*, p. 96.

③ 提出这项交易的人是西吉斯蒙德，其目的在于借助鲁莽查理的力量对付瑞士联邦的扩张。有人认为这项交易出自法王路易十一的建议。无论法国国王还是奥地利公爵都希望看到易怒的鲁莽查理与暴躁的瑞士人在成为邻居以后来一场互相削弱的战争。

鲁莽查理与瑞士联邦的领土开始接壤。鲁莽查理派驻阿尔萨斯的总督与瑞士联邦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在法王路易十一与奥地利公爵西吉斯蒙德的挑动下，瑞士联邦与勃艮第公爵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474年爆发。1476年3月，鲁莽查理亲率大约2万人的大军在格朗松（Grandson）与1.8万人的瑞士军队展开对决。瑞士的先驱方阵和主力方阵成功地抵挡了勃艮第骑兵一次又一次冲锋，并将其骑兵统帅打落马下。为了把更多火炮调到前沿，鲁莽查理命令处于中心位置的步兵向后撤。恰在这时出现于战场的瑞士后卫方阵对敌军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一部分勃艮第士兵把后撤变成了逃跑，其他士兵受到影响，也开始跟着逃跑，最后演变为全军的溃逃。因为勃艮第军队的败逃发生得太快，所以伤亡数字只有1000人。但其军营里的400门加农炮、800支火枪、300桶火药、1万匹马及大量金银珠宝都成为瑞士军队的战利品，总价值估计有300万弗罗林。

瑞士人在格朗松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但勃艮第公爵的军事力量并未受到重创。同年6月，决心血洗前耻的鲁莽查理调集2.3万大军，围攻伯尔尼控制的莫拉特（Morat），却被前来解围的2.5万人的瑞士军队击败。吸取了格朗松战役未能重创敌军的教训，瑞士人在莫拉特战役中决心歼灭勃艮第军队。联邦议会在战前发布了禁止接收俘虏的命令。尽管勃艮第骑士们愿意出不菲的赎金保命，但那些放下武器蜷缩在地上或藏在树丛中的勃艮第军人还是被无情地屠杀了。这场战役中，勃艮第军队死亡多达1万人，而瑞士方面的损失只有410人。

由于鲁莽查理本人得以逃脱，瑞士人还需要一场战役才能使

他们的胜利变得圆满。半年后，这个机会便出现了。1477 年 1 月，试图做最后一搏的鲁莽查理率领 1.2 万人的军队，把莫拉特战役中帮助过瑞士的洛林公爵围困在南锡（Nancy）。然而，包括 8 400 名瑞士人在内的解围部队再一次彻底击败了勃艮第军队，鲁莽查理和 7 000 名勃艮第军人一起战死于南锡城外。^①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瑞士人通过三场战役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当时被视为欧洲最强大的陆军，这一辉煌战绩震惊了整个欧洲，使原先并不被重视的瑞士人获得了巨大的军事声望。瑞士长枪方阵的战术也开始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奥地利公爵马克西米连聘请瑞士军人做教官，模仿瑞士的战术和组织方式创立了德意志长矛兵，^②并在施瓦本战争中投入到与瑞士人的对抗中。然而，瑞士步兵不仅能够击败重装骑兵，他们在与采用相同战术的步兵对抗中同样具有优势。在 1499 年的弗拉斯坦兹（Frastanz）战役中，瑞士人以微不足道的伤亡代价歼灭了效力于皇帝的 4 000 名德意志长矛兵。^③

瑞士人的武器、战术和军队组织可以被效仿，但他们的英勇、坚毅和凶残却是无法模仿的。战场上连续不断的胜利使瑞士军人的自信日益增强，这种高度自信使他们即使在人数处于明显劣势时也敢于发起进攻。从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瑞士人开始被

① 关于勃艮第战争中三场战役的细节，可参阅 May De Romainmotier,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Suisse et celle des Suiss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ervices de l'Europe*, Tome 3, pp. 463-506, 523-554, Tome 4, pp. 3-17。

② Friedrich Blau, *Die Deutschen Landsknechte*, S.1-5.

③ H. Leemann, *Abriß der Militär-Statistik der Schweiz*, S.81-85.

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士兵。尽量避免与瑞士军人作战，争取与他们结盟，或让他们为自己效力，成为各个君主或共和国追求的目标。^①此后几个世纪里，欧洲许多君主及历任罗马教皇都把贴身警卫的重任交给了瑞士军人。

（三）走上输出雇佣兵之路

施瓦本战争是瑞士为争取独立进行的最后一场战争。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在战争中损失了2万多人以后，终于在法王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和米兰公爵的调停下接受和谈。在1499年9月签订的《巴塞尔和约》中，皇帝马克西米连承认了瑞士联邦事实上的独立性。自此以后，无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还是神圣罗马帝国再没有提出重新将其权威置于瑞士人头上的要求。^②虽然瑞士联邦名义上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但帝国的法令在瑞士没有实际效力，瑞士也不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1648年瑞士从法律上彻底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止。

经过勃艮第战争和施瓦本战争击败最强大对手并赢得独立以后，瑞士是否将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走上对外开疆拓土的道路，进而扩张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呢？在1494—1559年意大利战争中，

① 法王路易十一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瑞士人作为雇佣兵的价值的大国君主，他把瑞士联邦视为最有价值的盟友，不惜以每年支付2万法郎“津贴”的代价换取在瑞士招募雇佣兵的权利，参见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1, p. 82。

② A. Vieuxseux,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ians to the Present Time*, p. 109.

瑞士当局也曾短暂地尝试过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和扩张领土的政策，但军事上的一次挫折就使它放弃了扩张政策，转而走上专门为其他国家提供雇佣兵的道路。

在1513年6月的纳瓦拉战役中，瑞士军队英勇地歼灭了8000名法军，并迫使其残部逃走，把路易十二亲自率领的法军赶出了意大利。这场战役以后，高度自信的瑞士人开始将自己与古罗马人作比较。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里也把瑞士人称作“新罗马人”，并预言他们将成为意大利的主人。^①然而，这一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

1515年，新继位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率领超过3万人的大军来到意大利，扎营在米兰附近的马里尼亚诺。9月13日至14日，瑞士军队凭着雄狮一般的勇气向人数远超过己方的法军发起进攻。法军炮火造成的严重伤亡加剧了瑞士军队人数上的劣势。瑞士人虽然成功地迫使位于法军中央的德意志长矛兵退却了100米，但已没有力量继续推进。正当此时，法国的盟友威尼斯军队赶到战场，瑞士人不得不接受战役失败的事实。但他们保持着严整的方阵队形将伤员和旗帜围在中心，缓慢而有序地向米兰撤退，法军骑兵屡次冲锋都无法打乱他们的队形。在逆境中，瑞士军队显示出铁一般的纪律。这次撤退被当时人看作传奇式的英雄壮举。但马里尼亚诺战役中约有6000名瑞士军人抛尸疆场，对瑞士联邦来说毕竟是一次重大挫折，这是瑞士人首度遭遇军事上的挫败，这一挫败对瑞士联邦的发展方向产生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 74.

了很大影响。从此以后，瑞士联邦军队再没有到国外进行扩张战争，瑞士在欧洲国际政治中不再扮演积极角色，逐渐开始奉行在国际纷争中保持永久中立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天性好战的瑞士人只能专注于以雇佣兵的形式效力于欧洲各国军队。

纳瓦拉战役以后，佛罗伦萨人维托里（Vettori）这样描述瑞士人：“我几乎不能想象有什么军队能够对抗他们……（然而）他们不可能或不想统治大量臣属国，也不愿意花大力气组织管理机构；他们宁愿选择通过津贴制度（输出雇佣兵）获取经济利益这一更加便利的方式。”^①维托里的意思是，瑞士人有能力征服新的领土，却不愿意花大力气统治臣属国，他们宁愿选择通过输出雇佣兵获取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瑞士从扩张主义转向输出雇佣兵的政策，不仅仅出于主观意愿或偏好，而是在一系列客观条件制约下的近乎必然的选择。

首先，瑞士联邦内部的政治结构妨碍了它的领土扩张。当时的瑞士联邦实际上是拥有主权的各州之间的松散联盟。联邦中央唯一的组织机构——联邦议会——在对任何重要问题做出决议之前，各州代表都需要先听取本州政府对该议题的意见。各州之间在扩张领土方面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目标。比如，伯尔尼主张向西扩张，以便把瑞士领土延伸到防御法国入侵的天然屏障侏罗（Jura）山脉和孚日（Vosges）山脉；三个森林州希望向南扩张，以便打通其通往意大利的通道；苏黎世希望向北方扩张，以便把德意志南部地区纳入瑞士领土。缺乏集中领导使瑞士联邦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 57.

的政策总是变化无常，没有连贯性。各州之间的相互嫉妒又往往成为瑞士联邦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领土收益的障碍。例如，瑞士人用武力消灭勃艮第公爵以后，原来属于勃艮第公爵的领土不是归于奥地利就是落入法国之手，其中上勃艮第地区曾派代表请求加入瑞士联邦，尽管伯尔尼非常赞成，但因为其他各州的坚决反对而失败。^① 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分析，它们反对的理由可能是担心更多规模较大的州加入联邦将导致它们在联邦中的地位下降。^②

其次，瑞士的军事体制导致其没有产生伟大的军事统帅。瑞士联邦从诞生之日起就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所有健全男子都有应召出征的义务，但联邦和各州都没有常备军。每当需要召集军队时，从各村、镇以及城市中各区域、行会的应征者挑选出来的士兵组成州的部队，由州政府任命的队长统率。各州的部队会合以后形成的瑞士联邦军队并不设立最高指挥官（只有极偶尔的例外），重大行动都由队长们一起开会讨论做出决定。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瑞士人在军队指挥方面始终保持着他们那种古老的民主决策传统。在军事指挥中，那种吵吵闹闹的民主决策不但耗费时间，而且不太可能产生洞悉全局、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瑞士人在军事上能够获得胜利，是因为发展成熟以后的瑞士长枪方阵类似一

^① 关于勃艮第战争前各州在政策目标上的差异、矛盾，以及各州间的相互掣肘在战争胜利后妨碍其获得新领土的情况，可参见 Tom Scott, *The Swiss and Their Neighbours, 1460–15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73–81。

^② Heinrich Zschokk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p. 41.

架可以自动运转的作战机器，指挥官的杰出或平庸对其作战效力影响并不大。在这样的部队中，军官的首要作用是在方阵前排以自己英勇作战的行动为同伴做表率。然而，在这样的军事体制下，只会诞生一个又一个战斗英雄，却不会出现像亚历山大、恺撒或拿破仑那样的统帅。事实上，瑞士联邦历史上不仅没有产生伟大的军事统帅，也没有出现过杰出的政治领袖。尽管有许多在战场上取得声望的军官回到瑞士以后在本州政治事务中担任了重要角色，但其目光和雄心都非常有限。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领袖导致瑞士在国际舞台上沦为别人的棋子：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是受到法王路易十一和奥地利公爵的挑动，而1510—1515年瑞士参与意大利战争则主要是受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蛊惑。结果，瑞士军人喋血奋战的果实大部分被法国、奥地利等列强攫取，瑞士得到的往往只是眼前的物质回报和一些空洞的许诺。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是促使瑞士受到一次挫折便迅速从国际政治中退缩回去的重要原因。

再次，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加大了扩张领土的难度。在瑞士联邦为独立而斗争的两个世纪当中，它基本上是被一群虚弱的邻居包围着：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都是一些各自为政的小邦国，法国国王的权势受到独立称雄的大贵族制约，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则常常陷入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纷争而受到牵制，真正的强敌只有勃艮第公爵。然而，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得到西班牙王位以后，瑞士联邦所有的邻居都成为哈布斯堡家族或瓦卢瓦家族的领地。夹在这两大势力中间的瑞士即便有意愿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其困难程度也将比从前大得多。

另外，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人口过剩也是促使瑞士走上输出雇佣兵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士联邦的一位使者对鲁莽查理说过这样的话：把所有瑞士人能够筹集的钱加起来，还不如勃艮第公爵的部队中马刺和马镞的价值。^①由于多山的地形和不适宜发展农业的气候环境，在 18 世纪瑞士境内发展起一些重要工业以前，瑞士的经济与邻国比较起来一直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在国内经济并没有显著发展的情况下，瑞士人口从 15 世纪初的 60 万增加到 18 世纪初的 120 万。^②人口增速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过剩成为一个突出矛盾。瑞士人大规模地到国外充当雇佣兵，为过剩人口提供了一个就业出路，也使来自欧洲各国的大量资金流向瑞士。这是瑞士发展成为欧洲著名的雇佣兵输出地的经济动因。

瑞士人在意大利等地充当雇佣兵的现象在 13 世纪就已经有记载。但在 14—15 世纪，瑞士人进行战争的目的基本都是为了捍卫他们独立于外部强权的自由地位。1476 年，格朗松战役的战利品使瑞士人第一次体验到在战争中瞬间获取巨大财富的喜悦。自此以后，对财富的渴望日益成为瑞士人参加战争的强烈动机。1477 年在南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8 400 名瑞士人，实际上不是瑞士联邦派出的部队，而是洛林公爵以月薪 4.5 基尔德招募的雇佣兵。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瑞士雇佣兵总能获得远高于其他同行的报酬。16 世纪早期瑞士雇佣兵的基础工资是每月 4.5 基尔德，

① Anthony Mockler, *Mercenaries*, p. 81.

②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 78.

这一工资水平是当时农业劳工月薪的两倍多。^①火绳枪手在基础工资以外还可以得到15苏，装备齐全的长枪兵可以得到相当于基础工资两倍的薪水，掌旗手则可以拿到十倍于基础工资的薪水。不过，吸引他们加入雇佣兵行列的主要诱因不是雇主给的报酬，而是通过抢劫敌军或掳掠平民而一夜暴富的可能性。瑞士军人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使他们成为最受雇主欢迎的雇佣兵，但劫掠成性一直是其遭人诟病的一大缺点。

二、瑞士雇佣兵的招募与管理

（一）授权制度

勃艮第战争以后，瑞士长枪方阵的声望如日中天。欧洲各国无不希望瑞士军人为自己效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优质的士兵已成为瑞士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内资源，以致当局认为有必要对瑞士人到国外充当雇佣兵的行为加以管控。如果任由国外雇主来瑞士招募士兵而不加管控，可能会导致留在国内的青壮年人数不足以保卫本国安全和维持国内经济运转，而且可能出现受雇于敌对双方的瑞士人在战场上互相杀戮的情形。

瑞士联邦议会一方面禁止国民擅自到国外充当雇佣兵，另一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48.

方面要求所有希望在瑞士招募士兵的雇主事先向瑞士联邦议会提出申请，只有在获得瑞士联邦议会授权以后才可以进行招募。然而，上述规定并未得到有效执行。遭到联邦议会拒绝的外国雇主依然派人潜入瑞士各州招募士兵。1494年10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对私自到国外充当雇佣兵的行为可以判处死刑，同年12月发生的一项实际判决却仅仅是监禁五个星期的处罚。1503年通过的一项新法令把对违反者的惩罚改成了监禁与没收财产。^①尽管表面看起来议会的态度非常严厉，实际上许多议员接受了贿赂并对未经授权的招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瑞士青年们厌倦了那些大人物的虚伪和善变，充当雇佣兵对他们来说又是那样具有诱惑力，所以无视禁令擅自到国外充当雇佣兵者仍是络绎不绝。

（二）合同内容

在接受了外国雇主招募雇佣兵的请求后，瑞士联邦议会便会与对方商谈具体的条款，并签订关于提供雇佣兵服务的合同。1450年瑞士与纽伦堡市签订的关于提供800名雇佣兵的合同是此类文件中现存最早的一份，也代表了这个时期瑞士雇佣兵合同的典型特征。在此有必要概述一下这份合同的主要内容：每名士兵的月薪为5莱茵基尔德，在集合地清点人数时将预付一个月的工资，合同有效期不满一个月的天数要按整月支付报酬。如果纽伦堡方面提出中止合同，士兵们将得到相当于14天工资的回家路费。如果是瑞士方面提出中止合同，士兵们可以得到相当于8天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p. 40.

工资的回家路费。这 800 人的部队不会被分开使用，他们有参与分享战利品的权利，受伤的士兵将得到照顾并同样能领取报酬。士兵们必须发誓他们不会抢劫或虐待妇女、教士及其他友善的人员，不会把女性带到军队，不会进行赌博，不会焚烧或抢劫教堂，不会追究过去的私人恩怨，要把一切纠纷提交到队长面前解决。违反上述誓言的士兵将被遣返回家。^①

除了这种单独为了一次招募而签订的雇佣兵合同，瑞士与法王、教皇等盟友签订的同盟条约中也包含许多关于雇佣兵的条款，实际上可以看作另外一种形式的雇佣兵合同。例如，1521 年瑞士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签订的同盟条约中，除了关于政治同盟的内容，还包含以下条款：在弗朗索瓦的任何领地受到进攻时，他有权在瑞士招募不少于 0.6 万人不超过 1.6 万人的雇佣兵（如果该国王亲自统率则可以突破人数上限），全部招募费用由该国王支付。瑞士雇佣兵在战争期间不能被分开使用，而且只能被用于陆战。雇佣兵的队长和其他军官由弗朗索瓦提名，然后由瑞士方面确认。瑞士方面应在接到请求后的 10 天内让雇佣兵们离开瑞士。如果需要，弗朗索瓦可以一直保留那些雇佣兵，瑞士只有在自身处于战争中的情况下才可以拒绝提供或召回已经提供的雇佣兵。每名士兵的月薪为 4.5 弗罗林，薪酬从他离家之日起算。一旦雇佣兵们离开瑞士国境，弗朗索瓦就应至少支付他们三个月的薪酬，即使他已经不需要他们效力也应如此。作为瑞士同意他招募雇佣兵的回报，弗朗索瓦每年应向瑞士的每个州支付 2 000 里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 38.

弗的年金，并允许瑞士商人在法国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个条约以法王弗朗索瓦有生之年为期限，而 1549 年法王亨利二世与瑞士签订的条约则将有效期延伸至亨利二世死后五年。^①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这些条约招募的雇佣兵效力的对象是法王个人，而不是法国这个国家。这一差别的重要性，在雨格诺战争中就显现出来了。

1553 年，法国常驻瑞士大使与瑞士议会之间签订的《巴登条约》成为此后一个多世纪瑞士与法王之间关于雇佣兵问题的基础性文件。与 1521 年的条约相比，《巴登条约》中出现的新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由雇佣兵的队长们选举他们的上校，而不是由法王任命；阵亡士兵的工资交给他最近的血亲；为雇佣兵提供体面的住宿条件；用黄金或信用良好的货币支付军饷，以避免兑换过程的损失；在招募时至少给每名士兵 4 克朗，以便招募到优秀的新兵；法王使用瑞士雇佣兵的过程中应尊重瑞士的盟友；瑞士方面承诺，会敦促士兵们服务到他们的合同期满，而且会把开小差的雇佣兵逮捕并送回给雇主。^②

在这些涉及雇佣兵的长期性条约的框架下，法王在每一次需要招募瑞士士兵的时候，他的大使都要向瑞士联邦议会提出请求，瑞士议会照例都会同意。接下来，双方会就本次招募的人数和服务期限等问题签订具体的合同。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pp. 61–62.

② *Ibid.*, pp. 73–74.

（三）招募程序

外国雇主在与瑞士当局签订合同以后，他委派的人员就会在瑞士各州按照合同展开招募工作。通常是在每个州招募一个连的士兵。后来，这种直接由雇主派人招募士兵的方式逐渐被一种新的方式取代，即由富有军事经验的瑞士当地人招募起整个连队，并担任连队队长。^①在招募工作启动以后，队长会亲自带领随从人员打着旗帜、敲锣打鼓地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进行招募。在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中，雇佣兵招募者的到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在16、17世纪，自愿报名的人数往往多于需求，所以队长们可以进行挑选。被选中的人员需要自己配备刀或剑，队长负责为他们提供长枪和火器等。他通常是从州军火库购买这些武器。在装备整齐以后，新招募的全连士兵要在指定的日期到一个地点（比如州政府所在地）集合，凭借预先安排好的通行证穿越其他州，到达为全团士兵指定的集合地。在那里，雇主委派的官员会对全体士兵进行清点，并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由此形成的花名册将作为合同规定的整个服务期内发放军饷的依据。在连队被雇主代表检阅以后，全连士兵在领取第一笔军饷以前都必须进行一个庄严的口头宣誓。实际上，这个内容详尽而冗长的誓言相当于部队的纪律条例。^②（参见图4）

① 参见附录二。

② 参见附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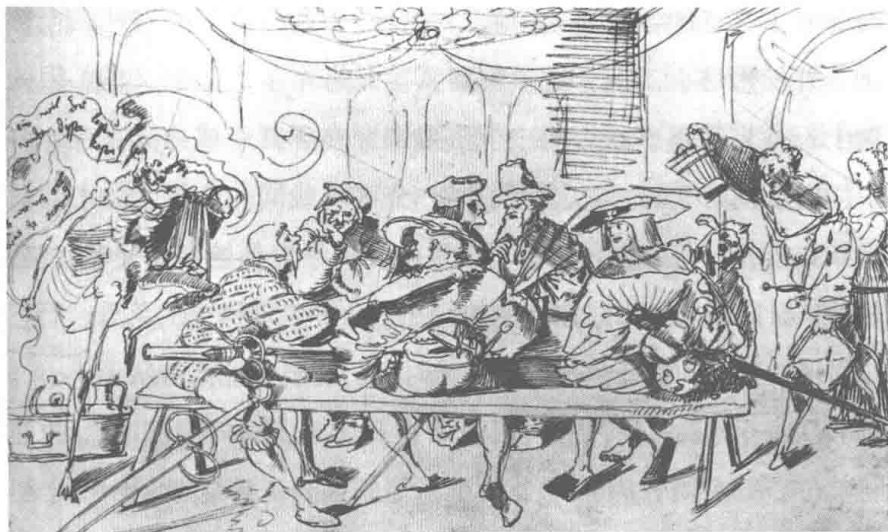


图4 素描画《招募》

说明：1521年5月，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与瑞士联邦签订了同盟条约，瑞士将为法王提供部队，以便用于即将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这是由巴塞尔的年轻银匠乌尔斯·格拉夫（Urs Graf）于1521年6月或7月画的一幅素描。图中最右端是一名当地小酒馆主人和他妻子在招呼坐着的客人们喝酒。旁边一名法国招募官员（从他袖子上的百合花徽章可以辨认出来）将手伸进自己的钱袋。他身后有个年轻人发出放肆的大笑。一名巴尔干骑兵与一位神职人员相对而坐，似乎在争论什么。在他们左方是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展望着自己暗淡的未来。画完这幅名为《招募》的素描后不久，乌尔斯·格拉夫就在8月24日作为安东尼·迪西特勒（Antoni Dichtler）连队的士兵，离开巴塞尔前往米兰参加战斗。

图片来源：John Richards,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 11.

（四）内部组织与管理

除了那些私自到国外充当雇佣兵的人，经过瑞士当局批准而招募的雇佣兵都是作为一个整体作战单位为雇主效力的。瑞士当

局与雇主签订的各种形式的雇佣兵合同中始终都有不得把瑞士部队分开使用这一条款。这一规定其实是有军事上的意义的，因为瑞士长枪方阵军事威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其组成方式：在方阵中，来自同一个村镇、城市中同一个区域或同一个行会的士兵总是被安排在一起，士兵们在军队里的表现很容易被家乡父老知晓，这种来自同伴的压力往往能使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英勇，而且对同伴的熟悉和信任使他们在危难时刻仍能坚定地保持队形。

从16世纪40年代起，瑞士雇佣兵部队开始采用“团”的建制单位。每个团分为若干个大小不等的连。正常情况下，一个团应由十几个连组成，但最少的时候一个团只有5个连，最多则可达20个。每个连的人数在100—300人之间。团的指挥官是上校，他不仅对全团整体的军事行动和管理问题负责，同时也担任其中一个连的队长。每个团均以其上校的名字命名。从理论上讲，上校是由队长们选举出来的。但在现实中，雇主往往对上校人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为他掌握着钱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校这一职位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不过，在16世纪，最重要的职权还是都掌握在队长手里。

队长不仅是连队的指挥官，还是连队的主人，他们对于自己招募的连队是要投入资金的，所以这些瑞士雇佣兵队长也属于军事承包人。在签订招募合同后，雇主往往会预付一笔资金给队长，作为发给应征者的入伍津贴。例如，1567年7月，法国大使为了让两位队长各自招募300名士兵，付给每位队长300埃居。^①队长

^①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4, p. 543.

在招募过程中需要为士兵们购买武器装备。在为雇主效力期间，队长负责为士兵发放军饷。雇主通常把整个连队的军饷交给队长，再由队长发放给士兵和其他军官。队长们在这一过程中总能获得可观的利润，但他们同时也要承担被雇主拖欠军饷的风险。在雇主不能按时支付报酬的时候，队长不得不自己筹集资金来给士兵们发放军饷。效力于法王的瑞士雇佣兵队长巴尔塔萨·冯·格力萨赫（Balthasar von Grissach）就因为雇主的欠薪而破产了。^①

瑞士雇佣兵享有的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在国外服务期间只受军队纪律和瑞士法律的管辖。雇佣兵军官始终坚持要求所在国当局把惹是生非的士兵交给部队，由他们自己进行审判和惩处。在瑞士雇佣兵的每个团中都有一名法官。作为全团的法律顾问，他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裁定某一事件是否属于可交由一名军官处理的轻微违纪问题。严重的违纪问题需要召开法庭进行审判。法庭由全团所有低级军官外加每个连队的一名军士组成，由全团最年轻的队长主持。无论天气如何，法庭的审理都在室外当着全团士兵的面进行。法庭的判决需要提交给一个由全团高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审核，该委员会由全团最年长的队长主持。委员会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法庭给出的惩处。常见的惩处包括罚款、增加额外的岗哨职责、夹道鞭笞乃至死刑。判处死刑的情况包括举起武器威胁军官、偷窃同伴的武器、劝说别人当逃兵等。至于在战场上的怯懦行为则不需要提交法庭，因为每名士兵在发现任何同伴试图逃跑时，都有权将其当场处死。^②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p. 76-77.

②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4, p. 531.

三、瑞士当局与雇佣兵使用者的关系

（一）与法国的特殊关系

除了1510年瑞士与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签订的同盟条约，瑞士当局从未在雇佣兵合同中承诺不为其他潜在雇主提供雇佣兵。当瑞士将“永久中立”确定为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基本政策后，任何付得起报酬的君主、诸侯及城市都可以向瑞士联邦议会提出招募雇佣兵的请求。然而，在15—18世纪总数大约100万人的瑞士雇佣兵当中，有超过60万人是效力于法国的（见表1）。很显然，法国是瑞士雇佣兵最主要的雇主。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与瑞士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从路易十一时期开始，法国国王与瑞士签订的历次同盟条约，虽然没有使法王取得对瑞士雇佣兵的垄断权，但这些条约都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法王每年向瑞士支付数量可观的年金，从而在实践中享有在瑞士招募士兵的优先权。

表1 15—18世纪为法国效力的瑞士雇佣兵人数

时期	人数（万）
路易十一时期（1461—1483年）	1.26
查理八世时期（1483—1498年）	3.75
路易十二时期（1498—1515年）	7

续表

时期	人数 (万)
弗朗索瓦一世时期 (1515—1547 年)	16.3
亨利二世时期 (1547—1559 年)	8.11
查理九世时期 (1561—1574 年)	4.09
亨利三世时期 (1574—1589 年)	4.83
亨利四世时期 (1589—1610 年)	1.84
路易十三时期 (1610—1643 年)	5.45
路易十四时期 (1643—1715 年)	4.23
路易十五时期 (1715—1774 年)	3.125
路易十六时期 (1774—1792 年)	1.4362
总数	61.3987

资料来源：May De Romainmotier,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Suisse et celle des Suisses dans les différens services de l'Europe*, Tome 6, p. 59。

与瑞士的特殊关系使法国长期拥有一个能够稳定地提供大量优质士兵的资源，因此欧洲其他列强都以妒忌的目光审视着法国这种优越地位。当然，为了维持这种特殊关系，法国每年都要以各种名目向瑞士各州及有影响的个人支付巨额的资金。

让我们以 1632 年索洛图恩 (Solothurn) 州的情况为例，来观察法国为了维持与瑞士的特殊关系所花费资金的种类和规模。

第一项，根据同盟条约法国每年应向瑞士各州支付的年金中，有 2 000 里弗是分配给索洛图恩州的，这笔款项直接支付给了州政府的财政部。

第二项，按照官方公布的一个年金清单，分发给 157 位索洛图恩州公民的官方年金，总数为 3 000 里弗。其中，得到年金最多的是索洛图恩市的市长，以及另外 3 位州政府官员。这份清单中包含了 13 名旅馆老板、17 名铁匠、13 名屠夫和 14 名皮革匠，原因是这些人能够在招募士兵的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

第三项，用于让索洛图恩州议会每位议员的两个儿子可以免费就读巴黎大学的年金，总额为 4 000 里弗。这项年金既可以讨好当前的决策者，又能在索洛图恩的公民中培养亲法的社会精英。

第四项，秘密分发给 183 位索洛图恩人的“个人年金”（individual pensions），总额为 5 000 里弗，其中有的领取者同时也是官方年金的领取者。

第五项，秘密送给 23 位最显赫人物的“无偿年金”（voluntary pensions），总额为 2 650 里弗。

第六项，送给个别人物的好处费，用于酬谢为法国利益做出特定贡献的人，比如与法国签署雇佣兵合同的具体操作者，或者促使州当局拒绝与法国的敌人签署雇佣兵合同，等等。据推测，“好处费”的金额一笔就可以达到数千里弗，但这种款项是最为隐秘的，我们并不掌握该年度这项支出的具体金额。

即使不把“好处费”考虑在内，索洛图恩市的市长冯·罗尔（von Roll）在这一年从法国得到 192.5 里弗的官方年金、100 里弗的个人年金、300 里弗的无偿年金，加起来总数将近 600 里弗。要知道，当时一名普通瑞士雇佣兵的月薪只有 4.5 里弗。^①可以想见，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p. 63–64.

市长冯·罗尔一定是法国利益的积极支持者。

从表面看来，上述各种“年金”和“好处费”只是表达尊重或感谢的礼金，接受礼金的人并没有义务一定要为法国做什么，但实质上这些都是或公开或秘密的贿赂。从以上例子可以推知，法国每年在整个瑞士联邦花费之巨。^①这仅仅是平时维护与瑞士特殊关系正常运转的开销，在需要雇佣兵时的入伍津贴和军饷则是更大的财政负担。既然维持瑞士的特殊关系需要花费如此巨大的财政资源，法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

16 世纪以后，欧洲陆战中骑兵的作用进一步下降。就像 1515 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所昭示的那样，步兵、炮兵和骑兵协同配合是当时最有效的野战方式，而攻城战在近代早期欧洲的盛行进一步推高了对于步兵和炮兵的需求。法国从 15 世纪就开始拥有令人艳羡的炮兵，可是在这几个世纪当中法国国内始终没有锻造出精良的步兵。

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统治期间创设的民兵性质的免税弓箭手（francs-archers）并不是一支可信赖的武装，其训练和装备都很差，而且缺乏战斗意志。^②在封建制瓦解以后，有着长久骑士传统

^① 根据当时的法国驻瑞士大使估计，1668 年瑞士商人根据同盟条约在法国享有免税经营的贸易特权就价值 10 万埃居，当年度法国付给瑞士的各种年金总额是 30 万埃居。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p. 80.

^② 因为参加这种部队的人可以免税，所以被称为“免税弓箭手”。虽然名为“弓箭手”，但这种部队后来也使用其他步兵武器。Paul Lacroix, *L'ancienne France: l'armée depuis le moyen âg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Ditod et Cie, 1886, p. 42; Philippe Contamine, *Guerre, é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p. 363–364.

的法国贵族仍然愿意在敕令骑兵团这种常备性质的骑兵中效力。然而，在他们的观念中，从马背上下来以步兵的方式作战是降低身份的表现。因此，法国常备性质的步兵组织最先诞生于贵族势力较为弱小的边境地区。形成于1480年的皮卡迪大队（Bandes de Picardie）、形成于1507年的皮埃蒙大队（Bandes de Piemont），再加上后来形成的加斯科尼大队和布列塔尼大队，这几支本国的步兵虽然比免税弓箭手有所改善，但在战争中也未能发挥重要作用，法王还是不得不依靠外国雇佣兵作为步兵主力。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步兵的问题，弗朗索瓦一世在1534年又进行了一次尝试。他下令在全国组建七个常备性质的军团。诺曼底、布列塔尼、皮卡迪、朗格多克、吉耶纳这五个省份各提供一个军团，其余省份提供另外两个军团。按照计划，每个军团包含6000名步兵，由国王任命的上校统率；每个军团分为六个大队，大队由队长指挥；军团士兵都由该军团所在地区的自愿报名者组成，军官则由当地贵族充任。然而，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越了当时法国的行政管理和财政资源所能负担的限度，况且很少能够找到数量足够的报名者，因此军团总是处于不满编的状态，并且严重缺乏训练。尽管被乐观地冠以古罗马军团的名字，而且在每个军团的人数上也刻意地效仿古罗马，但法国这些“军团”的作战能力非常令人失望，只能承担挖掘壕堑或驻守防御工事等次要任务，在弗朗索瓦一世死后就被撤销了。

在国内缺乏精良步兵的情况下，邻国瑞士却拥有大量随时准备为国外雇主效力的优质步兵，这导致法国国王不惜以重金维持与瑞士的特殊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瑞士与法国围绕雇佣兵服务的特殊关系对双方都有益处。经济上较为贫困的瑞士通过年金、雇佣兵薪酬、贸易特权等方式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回报，法国则利用这种关系解决了国内缺乏精良步兵的问题。^①然而，雇佣兵供需双方看起来“互利共赢”的关系并非总是那样和谐。实际上，双方经常发生纠纷。

（二）拖欠军饷和年金导致的矛盾

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革命导致军队规模和战争费用急剧增加，各国的行政管理水平和财政资源的拓展却显得相对滞后。^②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君主都抵制不住招募超越其财政供养能力的军队这一诱惑。这就使拖欠军饷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的问题，时常在近代早期欧洲的雇佣兵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引发纠纷。在瑞士与法国之间，除拖欠军饷外还有拖欠年金的问题，其矛盾纠纷牵涉的范围更广。

对于那些经过当局批准的雇佣兵，瑞士各州政府常常出面帮助他们讨薪。由于各州政府里有许多人物本身就是通过成功的军事生涯取得高位的，因而各州政府始终把帮助雇佣兵讨薪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为了讨债，它们常常威胁说要召回本州所有的雇

^① 17 世纪长期担任法国陆军元帅的德意志人朔姆贝格将军曾说：“瑞士步兵在法国陆军中的作用就像骨头在人体中的作用一样。”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p. 61.

^② 参见许二斌《变动社会中的军事革命：14—17 世纪欧洲的军事革新与社会变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9—107 页。

佣兵（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当债务纠纷导致瑞士当局与法国关系恶化时，瑞士人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是向法国的敌人提供雇佣兵。路德维格·普菲费尔（Ludwig Pfyffer）是16世纪瑞士最著名的雇佣兵首领，他不仅担任了卢塞恩的市长，而且在瑞士各州都有很大影响力，甚至被人戏称为“瑞士国王”。由于在巴黎为自己讨要薪水和年金期间受到怠慢，愤怒的路德维格·普菲费尔从1577年底开始秘密与西班牙合作。尽管西班牙方面提出愿意给他两倍的年金，并支付他被法国拖欠的80万克朗，他在1582年还是率领瑞士代表团参加了瑞士与法国续签条约的庆典。可到了1585年，他与马耶讷（Mayenne）公爵签订了招募8000名雇佣兵的合同，开始公开为法王的敌人招募雇佣兵。

当然，雇主们并非不知道拖欠军饷可能造成的危害。比可卡战役的失败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1522年4月，严重的拖欠军饷问题已经使效力于法国的瑞士雇佣兵接近兵变的边缘。他们的队长们向法国方面的将军洛特雷克（Lautrec）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下令向敌军进攻，以便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战利品以代替被拖欠的军饷，要么他们就要回家去了。当时敌方军队在比可卡占据着十分有利的位置，在瑞士雇佣兵队长们的胁迫下，法军投入了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役，其结果当然是遭受惨败，战斗中有3000名瑞士雇佣兵死于疆场。^①由于拖欠军饷被雇佣兵胁迫投入一场没有获胜希望的战斗，这是比较罕见的情形。更常见的情况是，拖欠军饷造成军纪涣散、士兵开小差甚至兵变，这些问题均有可能导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p. 64–65.

致战争中的不利结局。尽管如此，军费需求与财政资源之间的不匹配注定了拖欠军饷是雇佣兵使用者不可避免之恶，被拖欠的军饷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多年都未必能得到偿付。等到下一次需要招募新的雇佣兵时，之前拖欠军饷和年金形成的债务问题就会成为拦在雇主面前的一大障碍。1523年，法国国王为了在瑞士重新招募一批雇佣兵，不得不把王室的珠宝抵押给瑞士的伯尔尼州，作为他能够为计划招募的部队支付军饷的担保。16世纪90年代担任法国驻瑞士大使的哈雷（Harlay）有一次不得不把自己全部家产抵押给日内瓦，以担保法王能够支付雇佣兵的报酬。

1597年，法国与瑞士的同盟条约到期时，拖欠的雇佣兵军饷与年金合计达到3582.3万里弗，成为阻碍续签条约的突出矛盾。经过五年艰苦的谈判，双方才在1602年达成偿还债务的方案：立即偿付100万里弗，以后每年偿付400万里弗。为了庆祝同盟条约的续签，由42位重要人物组成的瑞士代表团应邀参加了1602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盛大庆典。深知瑞士雇佣兵重要性的法王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感谢他的使者们成功地与瑞士达成协议，从而“将朕与朕的继承者的王位置于更加稳固的地位”。^①

（三）宗教问题造成的困扰

除了拖欠军饷、年金等引起的纠纷以外，宗教问题也会影响瑞士与雇佣兵使用者之间的关系。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使整个欧洲陷入新教与天主教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在瑞士联邦内部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p. 96.

同样出现过苏黎世、伯尔尼等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州与信奉天主教的州之间的严重对立。为了能够在信仰新教的各州与信仰天主教的各州同样招募雇佣兵，雇主通常不会干涉瑞士雇佣兵的宗教信仰。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团中既会有一个天主教神父也会有一个新教牧师。在部队内部，宗教争论是受到严格禁止的。^①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唯一例外的部队是瑞士百人队（Cent Suisses）。作为法国国王的贴身警卫，这支部队的成员必须是清一色的天主教教徒。后来出现的瑞士卫队的指挥官也必须是天主教徒。

在不干涉士兵宗教信仰的前提下，瑞士为法国国王提供雇佣兵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但是，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当瑞士雇佣兵被法王用于对付雨格诺派新教徒时，苏黎世和伯尔尼拒绝签署瑞士联邦与法国之间的同盟条约，而且对于志愿者们自发组建的准备去帮助雨格诺派的部队，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四、瑞士雇佣兵的忠诚性问题

关于瑞士雇佣兵，人们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是：“没有金钱就没有瑞士人。”（Point d'argent, point de Suisse）^②意思是说瑞士雇佣兵不可靠，一旦雇主没钱支付报酬，他们就会拒绝继续战斗，抛弃雇主

^①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4, p. 531.

^② 这句话出自17世纪法国剧作家让·拉辛（Jean Racine）的戏剧《讼棍》（*Les plaideurs*）。

投靠敌军，或者干脆回家去。然而，这是对瑞士雇佣兵的公正评价吗？

早期的瑞士雇佣兵，尤其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的确经常用拒绝继续战斗的方式逼迫雇主支付所拖欠的军饷，从而给雇主造成极大的不便。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事实：他们索要的都是雇主应当支付却未能按时支付的报酬，从来没有哪一次是要挟雇主支付超过合同规定的报酬。既然雇主不按时支付报酬已经违背了双方的合同，一味地批评雇佣兵不履行义务恐怕也有失公允。

尽管在战术和组织方面模仿瑞士人的德意志长矛兵经常出现倒戈投敌的现象，但历史上凡是按照官方批准的合同招募的瑞士雇佣兵从未出现过在合同期内倒戈投敌的情况。^①这或许是因为瑞士雇佣兵不仅受到与雇主之间合同的约束，而且他们在外服务期间仍处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州的政府权力管辖之下。

客观地讲，与其他的人群一样，在充当雇佣兵的瑞士人当中肯定也有许多贪婪和不值得信赖的人。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瑞士雇佣兵确曾有过抛弃雇主回家去的纪录。尽管他们不曾倒戈进攻自己的雇主，而是选择返回瑞士家乡，但这毕竟是有损荣誉的行为。16 世纪中期以后，瑞士雇佣兵虽有许多次为讨要被拖欠的军

^① 这里说的是成批部队倒戈投敌的情况，不排除个别军人开小差以后又效力于敌方部队。例如，拿破仑战争期间表现出色的瑞士人约米尼将军，因为在法军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而投到反法同盟一方。至于那些未经当局批准擅自出国充当雇佣兵的瑞士人，由于文献资料的记载相对缺乏，我们对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不够充分，也不能排除他们有过成批倒戈投敌的行为。

饷而发出要回家去的威胁（最突出的是在1571年和1650年），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即便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瑞士雇佣兵在战争中对雇主事业的忠诚度——也可以称其为“职业操守”——与来自其他地区的雇佣兵相比也是非常突出的。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之前，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成功地诱使来自弗里堡（Fribourg）和伯尔尼两个州的5000名瑞士军人接受法国提出的条件撤出了米兰，余下的7000—10000名瑞士军人就是否接受法国100万埃居的贿赂发生了争论，有一半出席者主张接受法国给出的条件，来自东部各州的人则争辩说，他们的荣誉以及与米兰公爵之间的合同不允许他们那样做。最终，另外1万名瑞士军人的到达使忠实履行对米兰的义务的意见占了上风。面对人数和火炮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法军，瑞士军人不可能意识不到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他们会遭受严重的伤亡。就在发起攻击前那一刻，楚格州的队长举行了令人动容的简短仪式，他从第一个方阵前的地上捡起三块土，一面把土扔过士兵的头顶一面说道：“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杰出的、忠实守信的同胞们，这里将是我们的坟地。”^①

在几个世纪的瑞士雇佣兵历史上，像这样拒绝敌方重金贿赂、不顾遭受严重伤亡的风险忠实履行职责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战役显示，瑞士雇佣兵忠于雇主事业的“职业操守”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即使在面对

^① David Parrott,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27–28.

效力于敌军的瑞士同胞时，同样会毫不留情地展开疯狂杀戮。马尔普拉凯战役中，瑞士雇佣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效力于法国的瑞士卫队在掩护法军撤退过程中有好几个连队都彻底消失了。在这场战役中，敌对双方一共损失了 3.4 万人，其中 0.8 万人是双方阵营中的瑞士雇佣兵。^①

长期以来，世人对雇佣兵的评价莫不受到马基雅维里的影响，“雇佣兵毫无原则”“谁出价高便为谁效力”等说法几乎成为对雇佣兵的标准认识。然而，许许多多实例证明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至少不适用于瑞士雇佣兵。如果瑞士雇佣兵真是那样善于变节投敌，各国君主以及教皇竞相追捧他们，甚至将贴身警卫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就难以解释了。

关于雇佣兵是否忠诚可靠，我们其实更应该听听其雇主的看法。1525 年的帕维亚战役中，法王弗朗索瓦一世遭到失败，成为俘虏。当这位充满伤痛的君王经过他的瑞士百人队战斗的地点，目睹他们遍地的尸体时，眼含热泪对俘获自己的那不勒斯国王说：“假如我所有的部队都像这些勇士一般尽忠，我不会成为你的俘虏，而你将作为我的俘虏。”^②在法王弗朗索瓦的一生中，瑞士雇佣兵曾经是他在战场上的可敬对手，更多的时候则是用鲜血保卫他的勇士。在这位君王死后，他的墓碑上显赫的位置刻着瑞士雇佣兵的浮雕。1568 年，从莫城（Meaux）到巴黎途中险些被雨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p. 127.

② Emmanuel May,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Suisse et celle des Suiss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ervices de l'Europe*, Tome 5, p. 187.

格诺派俘获的法王查理九世（1561—1574年在位）说道：“除上帝以外，我的王国最应感谢的就是瑞士雇佣兵与内穆尔公爵。”^①1712年的德南（Denain）战役后，法王路易十四对瑞士卫队的上校雷诺（Reynold）说：“雷诺先生，我对瑞士人的表现很满意，非常满意！”^②

在瑞士人以雇佣兵的身份效力于欧洲各国的几个世纪中，没有哪位雇主抱怨过其忠诚性的问题，如果雇主对瑞士雇佣兵有所怨言，也只是说他们太昂贵了。法国战争大臣卢瓦（Louvois）侯爵与瑞士雇佣兵首领斯杜帕（Stuppa）上校在法王路易十四面前的一次语言交锋，生动地体现了瑞士雇佣兵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卢瓦对路易十四说：“陛下，如果把您以前付给瑞士人的所有钱集中起来，可以铺满一条从巴黎到巴塞爾的道路。”斯杜帕上校机智地回答说：“陛下，如果把我的同胞为法国流的血集中起来，可以填满一条从巴黎到巴塞爾的运河。”^③瑞士雇佣兵的报酬一直高于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同行，但他们总是受到各国雇主的追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突出的战斗能力，他们格外看重荣誉，在危难时刻仍能尽忠职守，也是其取得崇高声望的重要原因。

① Eugène Fieffé, *Histoire des troupes étrangères au servic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Militaire, 1854, Introduction, p. 3.

②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 128.

③ *Ibid.*, p. 110.

五、瑞士雇佣兵的没落

从 15 世纪晚期至 18 世纪末，欧洲几乎所有战役中都能见到瑞士雇佣兵的身影，他们长期在法国等雇主的军队中充当核心，往往能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①然而，瑞士雇佣兵在 19 世纪逐渐没落，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 19 世纪前期和中期，瑞士雇佣兵依旧效力于欧洲各国乃至欧洲以外的国家，但其人数与前几个世纪相比显著下降。1815 年 1 月，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是在瑞士百人队的护送下回到巴黎的。同一年，法国与瑞士签订了总数为 1.4 万人的六个团的雇佣兵合同。1830 年的七月革命期间，由法国人组成的步兵部队加入了革命者队伍，只留下瑞士雇佣兵保卫杜伊勒里王宫。如同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样，瑞士雇佣兵在法国人民眼中再次扮演了帮助压迫者镇压革命的角色。^②随着 1831 年《卢塞恩条约》的签订，法国与瑞士之间的雇佣兵合作画上了句号。拿破仑战争以后，效力于西班牙的瑞士雇佣兵团再没有补充过新的兵员。西班牙议会在 1820

① 从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瑞士雇佣兵始终是法国陆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忠实的服务得到了法国君主的高度赞扬。Albert Babeau, *La vie militair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Didot Et Cie, 1889, pp. 353, 357-359.

② 大革命期间，当法国人组成的部队纷纷倒向革命阵营时，瑞士雇佣兵仍忠实地为波旁王朝浴血奋战。相关细节可参阅 Eugène Fieffé, *Histoire des troupes étrangères au service de France*, pp. 382-386.

年正式宣布解散瑞士雇佣兵团，只是这一命令在1835年才最终得到执行，那时候雇佣兵团里只剩下约300名老迈的军人。荷兰在1814年招募了总数为1万人的四个瑞士雇佣兵团，他们一直为荷兰服务到1829年。另有一些小规模瑞士部队效力于荷兰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在1848年革命爆发以前，那不勒斯王国一直保有四个团的瑞士雇佣兵。1848年以前，普鲁士有一个营的瑞士雇佣兵。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秘密招募了3300名瑞士雇佣兵。大约4000名瑞士军人参加了1861—1864年的美国内战，其中大部分效力于北方。^①

效力于各国的瑞士雇佣兵总人数明显减少了，表明瑞士雇佣兵在兴盛了几个世纪后终于走向没落。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首先，作战方式的变化导致瑞士雇佣兵丧失了比较优势。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雇佣兵是欧洲职业军人的基本类型，也是当时欧洲最具专业性的军人。由于其专业性，即使是在各国开始建立常备军以后，许多国家仍然把瑞士人等优质的雇佣兵作为其军队的坚强核心。到18世纪末，由于作战方式的变化，欧洲战场上需要的是数量更多而且价格更为低廉的士兵，普通人经过较短时间的训练就能成为合格的步兵，瑞士人作为价格昂贵的优质步兵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

其次，国民义务兵制度的出现逐渐使雇佣兵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作战工具。法国在大革命时期为了对抗反法同盟而首创的国

^① John McCormack,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ld*, pp. 171-172.

民义务兵制度——全面强制征兵制——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也预示着欧洲军队组织方式的新方向。这一制度的第一个优点是使交战国可以得到的兵员数量达到空前的水平，第二个优点是使交战国摆脱了支付雇佣兵的报酬及为招募雇佣兵而支付年金等财政负担。^①不过，这种强制征召的国民义务兵接受训练的时间较短，不可能具备长期以战争为业的雇佣兵所具备的专业性。况且使用国民义务兵必然面临在战争期间国内劳动力匮乏的问题，还要面对伤亡军人的抚恤问题，以及战争结束时突然出现的大量退役军人如何安置的问题。此外，为了保证兵员的素质，国家有必要为全体国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总之，看似“免费”的国民义务兵，对国家来说其实并不是“免费”的战争工具。因此，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除普鲁士外欧洲各国并没有立即放弃较小规模的职业化军队这种模式，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陆续实行了国民义务兵制度。^②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市场上对雇佣兵的需求减少了。

另外，在国际上对瑞士雇佣兵的需求大幅减少的同时，瑞士能为国外雇主提供的雇佣兵也越来越少。在16—17世纪的瑞士，充当雇佣兵被视为一种回报丰厚且有前途的职业。到了18世纪，随着瑞士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雇佣兵的经济回报与在国内从事其

① 关于近代以来招募军人的不同方式及每种方式的利弊，可参见 Erik-Jan Zürcher, "Le recrutement et l'emploi des militaires en Europe, au Proche-Orient et en Asie, 1500-2000", *Le Mouvement social*, No. 241 (2012), pp. 127-145.

② Janice E. Thomson, "State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Decline of Mercena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1 (March, 1990), pp. 31-32.

他行业相比已经没有明显的优势，雇佣兵这一职业对瑞士人的吸引力开始下降。到19世纪，这种下降的趋势进一步扩大，愿意充当雇佣兵的瑞士人越来越少。

最后一点是舆论氛围的变化。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以兹文利为首的瑞士新教牧师就坚决反对瑞士当局输出雇佣兵的政策。到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于雇佣兵为了金钱在与己无关的战争中从事杀戮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法国大革命以及1830年、1848年的革命期间，雇佣兵都扮演了帮助暴君镇压革命的角色。因此，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雇佣兵的批评到19世纪以后更加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至19世纪中期，欧洲形成了废除雇佣兵的舆论氛围。^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瑞士当局做出了政策调整。1848年颁布的瑞士新宪法向最终结束雇佣兵事业迈出了第一步。新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今后不得批准新的雇佣兵合同。因为各州坚持认为它们不能撕毁现有的雇佣兵合同，所以新宪法只规定不能进行新的招募活动。到了1859年，瑞士联邦最终通过了禁止国外雇主在瑞士招募雇佣兵和禁止本国公民出国充当雇佣兵的全面禁令。至此，久负盛名的瑞士雇佣兵退出了历史舞台。

^① 关于西方国家对雇佣兵的态度从接纳到反对的转变过程，可参见 Sarah Percy, *Mercenaries: The History of a Nor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1-195。



1677—1815 年

黑森-卡塞尔的

雇佣兵事业



黑森-卡塞尔是德意志境内一个较小的邦国，然而它是18世纪欧洲最著名的雇佣兵输出地之一。与16、17世纪的瑞士人一样，18世纪的黑森人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军人，是欧洲各大国竞相争夺的兵源。通过输出雇佣兵这种独特的方式，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很小的黑森-卡塞尔，在欧洲、北美乃至非洲的历史上均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黑森雇佣兵在历史上的影响甚至使现代英语中的“黑森人”（Hessian）一词变成了“雇佣兵”的代名词。^①国内学术界对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西方学者目前的研究或局限于讨论某一场战争中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②或只关注某位君主统治时期的雇佣兵，^③或侧重于分析雇佣兵输出对黑森-卡塞尔农民生活的影响，^④还缺乏对其一个多世纪的雇佣兵事业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章将首先探讨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的历史背景、形成条件和发展过程，然后从雇佣兵的招募和输出两方面探讨其运作机制，最后分析雇佣兵输出对黑森-卡塞尔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响。^⑤

① 在南非荷兰语中“黑森人”（Hes）一词意为“笨拙的人”，这是被派到海外殖民地驻守的雇佣兵留下的痕迹。E. V. K. D. "A Further Note on 'Hessian'", *American Speech*, Vol. 18, No. 4 (December, 1943), p. 310.

② 参见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参见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④ 参见 Peter K.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Peasant Life and the Hessian Military State, 1688-18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黑森-卡塞尔名义上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邦国，但1648年的（转下页）

一、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德意志中部的黑森山区起伏不一的地形有利于形成许多较小的权力实体。1247年，布拉班特家族承袭了绝嗣的路多文格家族在黑森的领地。1292年，黑森邦伯取得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的地位。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黑森的疆域不断拓展。在高尚者菲利普统治时期（1520—1567年），黑森一度对德意志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①在菲利普死后，四个儿子根据其遗嘱分割继承领地，导致邦国一分为四，其中最大的黑森-卡塞尔1567年时的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拥有17.5万人口。^②

黑森-卡塞尔的领土多为山地和森林，土壤不肥沃，气候条件差，这些因素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与德意志其他邦国比较起来，黑森-卡塞尔的农民是贫困的。^③然而，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

（接上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赋予德意志各邦国自主处理内部一切教俗事务、拥有自己的军队以及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尤其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以后，德意志各邦国事实上已成为欧洲国际体系中独立采取政治行动的主权国家。Hagen Schulze, *Germany: A New History*, translated by Deborah Lucas Schneid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7, 69, 84. 因此，本章将黑森-卡塞尔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看待。

① [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德意志史》第二卷，陆世澄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86—787页。

② Peter K.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Peasant Life and the Hessian Military State, 1688-1815*, p. 26.

③ Charles Ingrao, "Barbarous Stranger": Hessian Stat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4 (October, 1982), p. 960.

却造就了黑森-卡塞尔农民强健的体魄和刚毅的性格，使他们比别人更能适应艰苦的军旅生活。据一位18世纪的旅行者观察，黑森-卡塞尔的男人“结实而强壮”，因为他们的食物“不丰盛但富有营养”。^①这是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兴起的一个重要基础。不过，黑森-卡塞尔得以成为欧洲著名的雇佣兵输出地，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历代统治者的政策。

17世纪初，博学者莫里茨在黑森-卡塞尔推行了一场改革，试图通过发展民兵制度来摆脱对外国雇佣兵的依赖，但由于财政资源有限等原因最终没有成功。三十年战争后，帝国议会从法律上赋予德意志各邦国征收军事税的权利。凭借军事税和传统的税收，普鲁士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在黑森-卡塞尔，威廉六世同样的努力遭到邦国议会的抵制。有时议会允许邦伯向贵族以外的臣民征收为期六个月的军事税，但这项收入始终无法满足创立一支常备军的需要。

由于议会对征收军事税的严格限制，1670年继位的黑森-卡塞尔邦伯卡尔一世决心寻找新的财源建立常备军。他不顾即将破产的危险，将军队扩充到八个步兵连加四个骑兵连的规模。在1677年丹麦与瑞典、普鲁士的战争中，他以每名士兵20塔勒^②的价格，派遣1600人的军队去帮助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五世，从而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19.

^② 塔勒 (Taler, 也写作 Thaler) 是16—19世纪在德意志广泛使用的银币。近代早期德意志缺乏统一的货币体系，塔勒的重量与价值因地区和时期差异很大。

获得3.2万塔勒的报酬。^①本来这是在即将破产的情况下筹集军费的一个权宜措施，但既然出租军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财政资源的不足，他便在以后的年代不断重复这一做法。尽管卡尔不是这一做法的首创者，^②但他通过出租军队供养常备军的做法对黑森-卡塞尔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以后，这个邦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欧洲的雇佣兵市场，出租军队变成筹集资金的一个常规方法。

1687年，卡尔派出1000人的部队帮助威尼斯对抗土耳其。1688年，卡尔派遣3400名士兵为荷兰服务，使荷兰部队得以集中力量进行对英国的征服。在随后的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中，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以其卓绝的表现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这是靠卡尔与他的臣民共同的牺牲赢得的：卡尔有五个儿子亲自领兵在战场上为雇主服务，其中两人先后阵亡。^③为了寻求更多出租雇佣兵的生意，卡尔还经常派遣自己的外交人员到国外活动。

1730年卡尔死后，名义上继任邦伯的长子弗雷德里希一世当时已经是瑞典国王，卡尔的另一个儿子、实际上统治黑森-卡塞

^① Peter K.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Peasant Life and the Hessian Military State, 1688-1815*, pp. 30-31.

^② 自17世纪60年代以来，德意志中小邦国的君主几乎都进行过一种被称作“士兵交易”（Soldatenhandel）的活动，就是把自己的军队出租给其他国家使用。第一笔规模较大的“士兵交易”是1665年明斯特（Münster）与英国之间的交易。即使像普鲁士这样强大的邦国也曾在1701年和1709年向英国出租部队。Peter Wilson, "The German 'Soldier Trad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 Reassessmen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vember, 1996), pp. 763, 775.

^③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14.

尔的威廉八世继续奉行其父的政策，积极发展雇佣兵事业。1745年威廉在写给一位大臣的信中称，雇佣兵是“我们的‘秘鲁’（Peru）^①，失去这些部队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全部的资源”^②。在威廉八世统治时期，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760年继位的弗雷德里希二世对雇佣兵事业的热衷更是达到了极点。他坚持每天亲自操练部队，节假日也不例外，如果天气不好就将训练场地移到宫中的餐厅。时人评价说这位邦伯“最酷爱的是军队，而对军队的酷爱则源于他对钱财和收益的热爱”^③。七年战争结束后，由于一段时期内欧洲没有大的战事，黑森-卡塞尔邦伯与法国、荷兰、英国及奥地利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却始终没能签订一份雇佣兵协议。然而，弗雷德里希二世仍然保持着1.2万人的精良部队，因为他相信早晚会有一场新的冲突给他的雇佣兵带来生意。1775年，当英国在北美殖民地遇到麻烦时，他是唯一能够立即提供一支强大部队的雇佣兵提供者，因此得到了黑森-卡塞尔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雇佣兵生意。

美国独立战争后，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事业在欧洲舆论界受到广泛的批评。在黑森-卡塞尔内部，邦伯对雇佣兵事业的主

①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秘鲁地区以后，西班牙在这里设立了名为“秘鲁总督区”的殖民地。因为有丰富的银矿和金矿，秘鲁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西班牙王室重要的收入来源，黑森-卡塞尔的威廉八世在这里用“秘鲁”比喻丰厚的海外收入来源。

②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20.

③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29.

导权也受到议会挑战，因为派到美洲的雇佣兵包括一部分民兵，议会认为邦伯无权自由支配那部分军队。面对议会的抱怨，1785年继位的威廉九世一面通过减少军事税来缓和矛盾，一面重申邦伯在雇佣兵事业上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威廉直接参与了反法同盟的战争，因而丧失了出租雇佣兵获取报酬的机会。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由于受到日益激烈的批评，英国放弃了使用雇佣兵的政策。黑森-卡塞尔再也没有得到任何雇佣兵生意，其雇佣兵事业从此走到终点。

二、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招募

从卡尔一世统治时期起，黑森-卡塞尔实行强制性民兵和志愿性正规军（常备军）相结合的军事制度。黑森-卡塞尔农民一向把参加民兵视作应尽的义务，因为这关系到保卫自己的家园。但民兵只能在本国领土范围内使用，不能作为雇佣兵输出。正规军的新兵在入伍时得到一笔入伍津贴（Handgeld），并发誓从此以后真心服从邦伯。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中，正规军士兵与邦伯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来源于几个世纪以来雇佣兵与军事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协议。

从理论上讲，作为雇佣兵输出的正规军只能招募自愿入伍者，但随着市场上对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需求日益增大，招募中的强制色彩越来越浓。1762年，弗雷德里希二世按照征兵的需要将黑森-卡塞尔划分成若干郡，每个郡负责招募一个团的士兵，

卡塞尔、马堡等工商业城镇则免除征兵责任。为避免招募士兵影响到工农业生产，黑森-卡塞尔长期坚持只招募那些在国内经济中可有可无的人，那些拥有3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净资产超过250塔勒的个人、盐业工人、矿工、工匠学徒、神职人员、公务员、学生以及贵族的仆人，或者由于能够纳税，或者因其职业对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均被排除在正规军招募的范围之外。^①除被豁免者外，所有年龄在16—30岁、身高在5英尺6英寸以上（如果身高仍在增长，则应在5英尺4英寸以上）的健全男子均应由地方官登记在花名册上，以备征兵官招募。每年复活节是花名册更新的时间，上述男丁必须亲自到场。^②尽管政府一再颁布命令规范征兵官的行为，禁止使用暴力胁迫的方式征兵，但每名征兵官必须在分配给自己的区域内招到指定数量的新兵，所以变相强迫或哄骗入伍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征兵官先请年轻人喝酒，然后乘他们醉酒时劝其在新兵名册上登记。

由于正规军的数量不能满足需求，邦伯便通过给予民兵入伍津贴的方法模糊民兵与正规军之间的界限，从而达到把民兵作为雇佣兵输出的目的。在七年战争期间，黑森-卡塞尔首次将民兵作为雇佣兵输出，从此打开了邦伯对所有臣民强制征召的大门。弥补兵员不足的另一措施是派人到外邦去招募士兵。1776年11月19日，弗雷德里希二世向臣民发布通告，为了保障本邦农业的

①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p. 132-133.

②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21.

劳动力，他将从外邦招募士兵来补充在美洲遭到严重伤亡的雇佣兵。他向许多德意志诸侯及自由市发出招募士兵的请求。很多被询问的诸侯同意了黑森-卡塞尔邦伯的请求，因为招募雇佣兵有利于减少社会上的流氓无赖等闲散人员。实际上，黑森-卡塞尔的征兵官在获得许可的地区公开进行招募，而在未获许可的地区则进行秘密的招募。从外邦招募来的士兵被编入黑森-卡塞尔部队中，但他们的素质远远不如真正的黑森士兵。美国独立战争后期大部分黑森雇佣兵团的纪律和训练状况日益恶化，以至于只能承担守卫职责，主要是因为大量外邦士兵的加入。

在黑森-卡塞尔招募的士兵当中，大部分是因为贫困、事业失败、婚恋挫折或喜好冒险等原因自愿充当雇佣兵的，但也有被迫加入的例子。比如，有个来自萨克森的大学生从莱比锡大学辍学后，在前往巴黎的途中被黑森-卡塞尔的征兵官抓住，后来被送到美洲充当雇佣兵，与他同在一条运输船上的一名僧侣因为被迫充当雇佣兵抑郁而死。^① 邦伯下达给征兵官的一系列指令也表明招募过程中的确存在强迫现象：为防止新兵在到达军营前逃走，护送新兵的征兵官必须佩戴剑和手枪；必须让新兵走在自己前面，绝不让新兵离自己太近，并要警告他只要走错一步就可能丧命；必须尽可能避开大市镇以及该新兵以前服役过的地方，也要避开该新兵的出生地；必须选择那些主人肯定会站在征兵官这一边的客栈过夜，夜间新兵和征兵官都必须脱掉衣服，并把衣服交给客栈老板保管；尽可能住在楼上，并且窗户上应当有栅栏；

^① 详见本书第九章对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梅的个案研究。

必须通宵亮着一盏灯，征兵官应将武器交给客栈主人，以免新兵在夜间拿来对付他；早上征兵官要在新兵拿到衣服之前穿好衣服，做好出发的准备；当进入一所房子时，必须让新兵最先进入，最后出来；吃饭时必须让新兵坐在靠墙的位置；当征兵官不得已杀死或致伤一名新兵时，他必须让地方官员为他出具一份文件，但如果他护送的新兵逃走了，任何文件都不能开脱他的罪责。^①

随着雇佣兵事业的发展，成年男性人口已经成为黑森-卡塞尔最宝贵的资源，黑森-卡塞尔政府严格禁止本国青年私自到国外服役，也不允许外国政府派人到其领土上来征兵。那些私自出国服役的青年在回国后会受到惩罚，如果他留在国外不回来，其父母就要被迫缴纳招募一名新兵的费用。那些协助外国征兵者的黑森-卡塞尔人，则可能受到体罚或终身监禁等严厉惩处。^②

三、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输出

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的雇主有哪些？尽管有时供需双方签订的协议与最终落实的交易会有一定距离，但表2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多世纪当中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交易的大致情况。

① Margarete Woelfel, "Memoir's of a Hessian Conscript: J. G. Seumes Reluctant Voyage to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5, No. 4 (October, 1948), p. 555.

②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35.

表2 1677—1815年黑森-卡塞尔签订的雇佣兵协议

年份	雇主	雇佣兵人数	报酬 (单位: 塔勒)
1677	丹麦	1 600	—
1678	丹麦	1 500	34 000
1684	西班牙	1 500	14 870
1684	威尼斯	1 000	80 000
1687	荷兰	3 400	14 870
1688	荷兰	4 600	—
1694	英国	—	10 000
1701	荷兰	1 000	29 936
1702	荷兰	1 000	—
1702	荷兰	4 920	11 376
1703	英国 / 荷兰	9 000	21 000
1703	英国 / 荷兰	11 070	24 492
1707	英国 / 荷兰	11 070	120 845
1707	英国 / 荷兰	—	115 900
1708	英国 / 荷兰	9 000	100 000
1717	德意志皇帝	2 300	13 026
1726	英国	1 200	543 478
1733	德意志皇帝	3 200	—
1736	英国	4 000	—
1740	英国	6 000	—

续表

年份	雇主	雇佣兵人数	报酬(单位:塔勒)
1742	德意志皇帝	3 000	324 000
1743	普鲁士	3 000	—
1744	德意志皇帝	9 000	7 500+36 229
1744	普鲁士	3 000	—
1745	英国	6 000	—
1747	荷兰	3 400	—
1755	英国	12 000	258 620
1757	英国	18 992	272 727
1759	英国	12 000	272 727
1760	英国	15 392	—
1776	英国	12 000	19 000 000
1787	英国	12 000	258 720
1793	英国	8 000	172 413
1793	英国	12 000	301 724
1794	英国	12 000	100 000+20 689
1809	奥地利	10 000—12 000*	—
1815	英国	7 500	280 000

* 该协议中有一个条件是奥地利将黑森领土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所以这个协议可能从未生效。

资料来源: Peter K.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Peasant Life and the Hessian Military State, 1688—1815*, pp. 24—25。

上表显示，在这一百三十八年中，黑森-卡塞尔签订的37份雇佣兵协议中有20份的雇主是英国，可见英国在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事业中的重要性。由于议会担心维持庞大的军队可能导致国王的专制，这一时期英国陆军被限制在极小的规模，其在欧陆的政策是凭借雄厚的财力雇佣别国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对于黑森-卡塞尔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理想的雇主了，而英国则希望任何时候一旦需要就能获得黑森-卡塞尔的雇佣兵。这种相互需要逐渐催生一种特殊关系。1727年，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规定英国每年向黑森-卡塞尔支付12.5万英镑，从而享有对其士兵的优先雇佣权。1744年，双方签订了新的条约，其中规定此后黑森-卡塞尔只向英国提供雇佣兵。^①18世纪60年代，弗雷德里希二世继位后曾试图与法国、奥地利商谈雇佣兵交易，但由于臣僚的反对以及对普鲁士的忌惮，这些谈判都没有成功。

纵观黑森-卡塞尔雇佣兵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每一代邦伯输出雇佣兵都不是单纯为了经济利益。与那种谁出价高就为谁服务的私募雇佣兵不同，邦伯在为其军队选择雇主时始终坚持一定的原则：因为邦伯及其臣民几乎都是加尔文派新教徒，黑森-卡塞尔长期坚持只向新教国家提供雇佣兵。在维护新教信仰的长期斗争中，黑森-卡塞尔成了一个包括北德意志各邦、英国、荷兰、瑞典及丹麦在内的“新教体系”的固定成员。黑森-卡塞尔在这个“新教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能在战争期间向盟友提供大量优质的雇佣兵。雇佣兵是黑森-卡塞尔与盟友对话的筹码，每当有战事发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 14, 17.

生，它就能得盟友的尊重，而当处于和平状态时，往往会受到冷遇。

对黑森-卡塞尔政府来说，输出雇佣兵不仅是筹集资金的手段，而且还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尽管拥有一支令人称羡的军队，但黑森-卡塞尔毕竟是一个小邦，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它不得不通过与某些大国结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黑森-卡塞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表现说明，这个小邦外交政策的目标与大国几乎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其实现目标的手段主要是向愿意帮助自己的大国提供雇佣兵。当战争爆发时，有 6 000 名黑森-卡塞尔雇佣兵正在为英国服务，而英国在战争中与奥地利结盟使黑森-卡塞尔的威廉八世面临抉择：支持英国和奥地利就意味着与传统盟友普鲁士为敌，况且奥地利不承认黑森-卡塞尔对哈瑙（Hanau）的领土要求，而战争中的另一方则许以多块领土和选帝侯头衔为报答。于是，威廉派出 6 000 名雇佣兵支持巴伐利亚选帝侯争夺帝位，从而出现了黑森-卡塞尔雇佣兵同时受雇于交战双方的情形（有一个秘密条款防止这两支雇佣兵在战场上碰面）。^①

黑森-卡塞尔政府每次派出雇佣兵都会事先与雇主签订协议。协议会规定雇佣兵的人数和服务期限，雇主应付给邦伯的津贴（subsidy）数额，在多数情况下是由雇主承担雇佣兵的工资、入伍津贴及装备费用。有时雇佣兵协议当中会写明出现伤亡时应如何赔偿，比如 1744 年威廉八世与巴伐利亚签订的协议规定：每名雇佣兵战死威廉就能获得 36 弗罗林，每匹马战死他就能得到 112 弗

^① 其实一个国家向交战双方提供雇佣兵的做法在当时的欧洲算不上反常现象，瑞士雇佣兵曾多次出现同时服务于敌对双方的情形。

罗林外加 30 克朗，如果骑兵和他的战马都战死，威廉能得到 150 弗罗林。^① 这些条款被批评者认为是邦伯在出卖其臣民的鲜血，因而被称为“血钱”条款，^② 后来的协议中不再明确写出伤亡官兵如何赔偿。有些雇佣兵协议含有双方宣誓保护彼此的利益，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另一方有援助的义务等内容，^③ 因此雇佣兵协议不只是简单的士兵交易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盟条约的性质。

四、雇佣兵事业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响

（一）对黑森-卡塞尔政治体制的影响

在发展雇佣兵事业之前，黑森-卡塞尔邦伯的财政全靠税收，议会掌握着批准税收权，因而制约着邦伯的政治权力。通过发展雇佣兵事业，邦伯把军队由财政负担变成了财政资源。从雇佣兵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大大增强了邦伯的财力，使邦伯不仅摆脱了议会的制约，而且还通过向议会贷款的手段逐渐将其变成顺从的工具。从 1730 年到 1760 年，邦伯因输出雇佣兵得到的津贴总数达到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16.

② 最早对“血钱”条款提出非议的重要人物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在 1740 年继位前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他就对德意志诸侯们“出卖臣民的血”进行了抨击。H. D. Schmidt, “The Hessian Mercenaries: The Career of a Political Cliché”, *History*, Vol. 43 (October, 1958), pp. 207-208.

③ 详见附录四。

830万塔勒（相当于125万英镑），而同一时期该邦国各项税收的总和也不过2000万塔勒。^①在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占领军要求黑森-卡塞尔议会为其征收巨额的军事税，议会尽管增加了税收仍不能满足法国人的要求，只得向邦伯借债250万塔勒。议会成了邦伯的债务人，所以对邦伯更加顺从。为了讨好邦伯，议会在战争结束后一下子批准了此后三十六年的军事税。输出雇佣兵获得的利润使弗雷德里希二世比以前的邦伯更少依赖于议会批准的税收，财政独立和议会的合作使他得以顺利地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这场改革加强了邦伯对全国的控制，使黑森-卡塞尔逐步形成“绝对主义”的政治体制。^②

（二）对黑森-卡塞尔经济的影响

雇佣兵事业的发展使18世纪的黑森-卡塞尔成了全欧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773年，黑森-卡塞尔军人总数为1.86万，这意味着军人与总人口的比例为1:14。与此对照，以奉行军国主义著称的普鲁士，1787年军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仅为1:28。根据1793年的一项统计，在15—25岁的黑森-卡塞尔男青年中有34.3%为士兵。^③尽管黑森-卡塞尔政府竭力避免招募雇佣兵影响国内经济，但这么多青壮年男子从劳动力中抽走是不可能不影响到国内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20.

② Peter K. Taylor, *Indentured to Liberty: Peasant Life and the Hessian Military State, 1688-1815*, p. 40.

③ Peter K. Taylor, "Military System and Rural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Hesse-Casse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5, No. 3 (Spring, 1992), pp. 482, 500.

经济的。1782年，一名地方官向邦伯汇报说，许多在美洲的士兵的家人都无力耕种家中的土地，如果不将这些士兵召回，那些土地就要荒芜了。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匮乏，黑森-卡塞尔农民不得不以高出平常的价格从外邦雇人来代替那些被派往美洲的本地青年。除了在国外效力的雇佣兵，还有大批青年因为不愿充当雇佣兵而逃往国外，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劳动力供应的紧张。

虽然劳动力流失对经济造成了一定损失，但雇佣兵输出使大量资金流入黑森-卡塞尔，从而对其经济产生了多种积极影响。比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黑森-卡塞尔向英国提供了将近1.9万名雇佣兵（其中一部分是从外邦招募的），邦伯总共得到不下1.9亿塔勒的津贴，扣除各种费用后仍有1.265亿的净收入。同时，英国政府付给雇佣兵的工资也使大笔金钱流入雇佣兵家中。1779年12月，弗雷德里希二世正在考虑是否续签即将到期的雇佣兵协议，大臣施里芬汇报说，雇佣兵已经从美洲向其家中寄回59.11721万塔勒，这个国家正在从中获益。这一判断得到了邦伯的认可，弗雷德里希二世随后写信通知英王，他将让他的部队继续支持英国的事业。^①随着雇佣兵事业的发展，邦伯的金库里积累了大量资金，并以4%—5%的利率向外发放贷款，从而给国内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本支持。邦伯财政状况的改善也有利于降低人民的纳税负担。1784年，黑森-卡塞尔人均纳税额从先前的3塔勒降至2.2塔勒，这一数字低于普鲁士（4.1塔勒）、巴伐利亚（3.8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227.

塔勒)、巴登(4.2塔勒)、科隆(5.3塔勒)、茨威布吕肯(6.2塔勒)等邦国。^①因为邦伯坚持要在黑森-卡塞尔境内采购雇佣兵的军服和武器装备(购买这些物资的费用是由雇主提供的),雇佣兵事业对黑森-卡塞尔经济的另一积极作用是刺激了国内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使黑森-卡塞尔成为近代早期德意志境内著名的纺织业中心和冶铁中心之一。^②从总体上看,雇佣兵事业对黑森-卡塞尔经济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消极影响。

(三) 对黑森-卡塞尔社会的影响

输出士兵带来的资金不仅降低了黑森-卡塞尔老百姓的纳税负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社会福利。利用输出雇佣兵获得的资金,弗雷德里希二世不仅给退役的雇佣兵军官或死亡雇佣兵的遗孀发放年金,而且兴建了许多公共设施,其中包括德意志境内第一座育婴堂和欧洲大陆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③

雇佣兵作战中的伤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黑森-卡塞尔的人口死亡率。另外,大量处在婚育年龄的男性作为雇佣兵或为避免成为雇佣兵而离开家乡,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从长期来看,雇佣兵输出减缓了黑森-卡塞尔人口增长的速度。根据彼得·泰勒对

①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27.

② [英] E.E. 里奇、C.H. 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高德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472页。

③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2.

黑森-卡塞尔境内一个教区的研究，在1700年至1800年之间，有雇佣兵输出的四十多个年份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没有输出雇佣兵的年份相比，前者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泰勒认为导致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雇佣兵输出的年份出生率的降低。^①

雇佣兵事业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就业选择。对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来说，担任雇佣兵军官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对于农村和城市穷人来说，充当雇佣兵常常是解决生存危机的救命稻草，所以在夏天收获季节来临前的招募工作总是进行得格外顺利。一旦入伍就能得到每月1.5塔勒的工资，足够买一头母牛（1.3塔勒），普通士兵的工资比当时非熟练工人的薪酬高。^②

雇佣兵输出不仅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改善，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且为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提供了一种可以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从而大大缓解了人口增长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德意志其他各邦相比，18世纪黑森-卡塞尔的社会显得更加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雇佣兵事业。

（四）对黑森-卡塞尔国际地位的提升

黑森-卡塞尔原本是一个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比较贫穷的弱小邦国。然而，邦国政府通过发展雇佣兵事业不仅促进了经

^① Peter K. Taylor, "Military System and Rural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Hesse-Casse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5, No. 3 (Spring, 1992), pp. 485-486.

^②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30.

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而且使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与其领土面积、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较大影响。凭借输出雇佣兵积累的雄厚财力，卡尔一世使其长子当上了瑞典国王。到威廉九世时期，黑森—卡塞尔邦伯成了向欧洲各国发放贷款的银行家，^①并且在 1803 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这些都得益于邦国政府经营的雇佣兵事业。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252.



第九章

美国独立
战争中的
德意志部队



“他此刻正在运送庞大的外国雇佣军，来完成业已开始的制造死亡、荒凉和暴政的勾当，在最野蛮的时代也少有能与之相比的残忍和不仁不义，他完全不配担任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① 这是《独立宣言》对英王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诸多控诉中的一条。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使用了黑森-卡塞尔、布伦瑞克等德意志邦国总数为3万人的部队，到美洲帮助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② 这些被英国雇佣的德意志部队是促使殖民地宣布独立的一个催化剂。英国与德意志邦国签订协议的消息传到美洲，既打碎了许多内心摇摆的殖民地人民对与英国政府和解的幻想，也凸显了英国当局镇压政策的非正当性。为了击败英国的武装镇压，殖民地需要获得外国的援助，然而只有殖民地正式断绝与母国之间的联系，欧洲大国才便于提供援助。^③ 这些德意志部队不仅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欧洲军事制度演变史上也是一个分水岭。

欧美学界对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已有丰富的研究，

① Thomas Jefferso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 3.

② 1778—1781年，德意志部队约占英国在北美总兵力的三分之一。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Army, 'Military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7, No. 1 (January, 2010), p. 78.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德意志部队中的士兵并不一定都是德意志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美洲当地招募的黑人。参见 George Fenwick Jones, "The Black Hessians: Negroes Recruited by the Hessians in South Carolina and Other Colonies",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 83, No. 4 (October, 1982)。

③ Jack N. Rakove, *The Annotated U. S. Constitution an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 94.

但学者们在部队的性质等问题上一直有争论，^①对相关协议的理解也存在歧义。现有研究都着眼于部队整体，缺乏从军人个体视角的考察。本章首先依据谈判决策者的信函与英国议会记录中的文件重新解读相关协议，力求准确呈现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全貌。然后，选取代表不同层级的四名军人进行个案研究，借助其日记、回忆录或书信考察他们参加这场战争的经历、动机和态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结合时代背景讨论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性质及其在欧洲军事史上的影响，并在欧洲雇佣兵衰落的问题上对西方学界通行的观点提出修正。

一、英国与德意志邦国的协议

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发现自己手中根本没

① 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是雇佣兵，例如 Max von Eelking, *Die Deutschen Hülfsstruppen im Nordamerikanischen Befreiungskriege, 1776 bis 1783*, Hannover: Helwing'sche Hofbuchhandlung, 1863;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Jean-Pierre Wilhelmy,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3*, Montreal: Baraka Books, 2011; Brady J. Crytzer, *Hessians: Mercenaries, Rebels, and The War For British North America*, Yardley: Westholme Publishing, LLC, 2015。另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并不是雇佣兵，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士兵只是被德意志诸侯贩卖给英国的受害者，例如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Berlin: Verlag von Fanz Duncker, 1864; Edward J. Lowell, *The Hessians and the Other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New York: Harpper & Brothers, 1884; Maximilian Hake, *Deutsche Truppen Im Amerikanischen Unabhängigkeitskrieg, Die "hessians" ALS Söldner?* Munich: Grin Verlag, 2018。

有足以镇压革命的武装力量。当时英国共有大约 4.5 万人的陆军（其中步兵 38 254 人，骑兵 6 869 人），分别驻守在英格兰、苏格兰、马恩岛、爱尔兰、马六甲、直布罗陀、印度、美洲和非洲。^①英王乔治三世还有一个身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汉诺威选帝侯，因而他得以派遣汉诺威的五个团（2 365 人）到直布罗陀和马六甲，以便把驻守那里的部分英军调往美洲。他试图在汉诺威再招募 4 000 人，却只招募到 250 人。在英国国内招募新兵亦不可行，因为那是一个非常耗时费力的过程，而且当时许多英国人抱有同情殖民地的态度，大规模征兵可能在本土引出麻烦。看来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像过去那样在欧洲大陆寻求雇佣军。英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向俄国求助。然而，沙皇叶卡捷琳娜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称，她刚刚开始享受和平，自己的帝国需要休息，派一支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英国提出的请求是 2 万人）到另一个半球接受别国指挥是不适宜的。遭到俄国拒绝后，乔治三世转而求助于荷兰，却碰了一个软钉子。荷兰人表示愿意提供一个旅的部队，条件是不得派它到欧洲以外。英国没有接受荷兰的提议，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愿意出租军队的德意志邦国了。^②

还在英国发出询问之前，就有四个德意志诸侯主动向英国提出愿意提供部队，他们是黑森-哈瑙伯爵威廉、安斯巴赫-拜伊罗特（Ansbach-Bayreuth）侯爵卡尔·亚历山大、瓦尔德克君主弗雷德

^① Jean-Pierre Wilhelmy,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3*, p. 31.

^② *Ibid.*, pp. 34-35.

里希及安哈特-策尔普斯特 (Anhalt-Zerbst) 君主弗雷德里希·奥古斯塔斯。黑森-哈瑙伯爵威廉在给英王的信中说, 他的 500 名士兵“都是受恩于陛下保护的儿郎, 我坚信他们都已准备好同我一道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为陛下效劳”^①。其他三位小邦君主也都表现出同样的热忱。这四个小邦国的君主态度非常积极, 但他们能提供的士兵数量有限, 而英国需要的是大量士兵, 并且时间紧迫。1775 年 11 月, 英国政府派遣威廉·福西特 (Faucitt) 上校前往布伦瑞克和黑森-卡塞尔这两个德意志邦国商谈。国务秘书萨福克勋爵 (Lord Suffolk) 致福西特的信函中写道: “尽你所能多弄到一些士兵; 在当前的紧急状况下费用问题不像寻常那样成为障碍, 但如果能争取到最好的协议条款, 你就立下了大功……国王陛下处于极度焦虑中; 你一旦得知对方是否愿意提供部队, 就从布伦瑞克和卡塞尔派一两个信使回来, 不必等到提出具体的条款。”^②

福西特于 11 月 29 日抵达布伦瑞克, 很快就说服布伦瑞克公爵为英国提供部队。然后, 双方就交易细节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 最终在 1776 年 1 月 9 日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 布伦瑞克公爵将向英王提供由 3 964 名步兵和 336 名轻骑兵组成的部队, 供英王在欧洲或美洲使用。除轻骑兵所需要的马匹由英方提供外 (在

^① “Der Erbprinz von Hessen-Cassel an König Georg III (Hanau, 19. Aoüt 1775)”, in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230.

^② W. Bodham Donne,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with Lord North from 1768 to 1783*, London: John Murray, 1867, Vol. I, p. 294.

英国暂时不能提供马匹的情况下这些轻骑兵将作为步兵使用), 部队需要的其他武器装备都由布伦瑞克公爵负责配备。英王将以每名士兵 30 克朗的价格(对方最初的要价是每名士兵 60 克朗)向布伦瑞克公爵支付“招募费”(levy-money)。此外, 部队为英方效力期间, 英国将每年向布伦瑞克公爵支付 64 500 克朗的“津贴”。在部队返回布伦瑞克以后的两年时间内, 英方将继续支付津贴, 并且数额将增加一倍。英方将按照与本国军人同样的标准向布伦瑞克军人发放军饷和给养。部队中的伤病员会与英国军人一样得到照料, 费用由英方承担。那些不适宜继续服役的伤员将由英方承担费用送回欧洲。部队中的军官由布伦瑞克公爵任命, 公爵保留对这些部队的司法管辖权。为了弥补各种原因造成的减员损失, 布伦瑞克公爵承诺每年要提供装备齐全并经过训练的新兵员。^①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英国提供部队的六个德意志邦国中, 黑森-卡塞尔无疑是最重要的。这个大约只有 30 万人口的邦国, 却有一支 1.2 万人的正规军和 1.2 万人的民兵。^②1773 年正规军人数甚至达到 1.86 万人。^③长期以来, 黑森-卡塞尔部队在为外国

①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Reigning Duke of Brunswick”,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London: T. Gillet, 1802, pp. 33–37. 该协议与其他几份协议原件都是用法文书写的, 笔者未能找到这些协议的法文版, 但相关人员按照英王的指令提交给议会的英译本在准确性上应该是可靠的。

②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32.

③ Peter Taylor, “Military System and Rural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Hessel-Casse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5, No. 3 (Spring, 1992), p. 482.

效力的历次战争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在当前急需大量部队的情形下，为了得到黑森-卡塞尔的支持，英国给了超乎寻常的优厚条件。1776年1月15日，双方在卡塞尔签订了协议。^①与六天前英国与布伦瑞克签订的协议相比，英国与黑森-卡塞尔的协议从内容到语气都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看上去只是一份单纯的部队租借协议，而后者还是一份防御性的军事同盟条约。该协议第一条就明确了英国与黑森-卡塞尔之间是一种“真诚、坚定、持续的”联盟关系；第十条的内容是，签约双方中任何一方在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另一方要尽全力驰援，直至冲突结束。军事同盟的条款显然是黑森-卡塞尔方面要求加进协议的，主要是担心向英国提供部队可能使自己招致法国的进攻。^②

根据协议，黑森-卡塞尔将为英国提供1.2万人的部队。这些部队不会被分开使用，并将由一名黑森-卡塞尔将军统一指挥，他们不会被部署到西印度群岛。英方将按照本国军人的标准向黑森-卡塞尔官兵发放军饷和给养。每名士兵的招募费标准仍然是

^① 威廉米把该协议的签约日期误作1777年1月15日，又把英国与安斯巴格-拜伊罗特的协议签署日期误作1777年1月14日，是其对事实描述不准确的例证。Jean-Pierre Wilhelmy,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3*, pp. 40, 42.

^② 在七年战争中，黑森-卡塞尔因帮助英国而被法军占领。地理位置上处于法国与黑森-卡塞尔之间的都是军事实力弱小的邦国。一旦战端开启，这些小邦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英国与黑森-卡塞尔的协议签订后，在英国议会批准的过程中经过激烈的争论，多位反对者强调：协议中的同盟条款使英国被黑森-卡塞尔外交政策绑架，未来有被黑森-卡塞尔拖入战争的风险。

30 克朗，但英方承诺每年给黑森-卡塞尔邦伯的津贴高达 45 万克朗。^①不考虑为了填补减员损失后续提供的兵员数量，单就协议涉及的部队规模来看，黑森-卡塞尔邦伯每提供一名军人得到的年津贴是 37.5 克朗。这比布伦瑞克公爵每提供一个军人得到的年津贴高出一倍还多。据德国学者卡普计算，单是因为协议中“津贴”比其他德意志诸侯格外优厚，黑森-卡塞尔邦伯在这场战争中就多获利约 60 万英镑（400 万塔勒）。^②当然，黑森-卡塞尔邦伯领取“津贴”的时间只持续到部队返回本邦以后一年（布伦瑞克是两年），假如这场战争在很短时间内结束，那么黑森-卡塞尔的协议就不会显得那么优厚了。在协议以外，黑森-卡塞尔的谈判代表还成功迫使英方同意支付此前一直存在争议的 4 万英镑旧债。^③

卡普把英方的让步归因于黑森-卡塞尔的谈判代表施里芬高超的外交手腕，并说福西特上校和萨福克勋爵认为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或最多持续两年，他们中了施里芬的圈套。^④这实在是过分贬低了英国前方谈判代表及其后方主导者的能力。其实，英方在谈判中做出如此多的让步（以至于后来在议会辩论中遭到质疑和强烈批评）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己方急需部队的紧迫情势使然——英国是寻求帮助的一方，黑森-卡塞尔可以慢慢等待对

①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Landgrave of Hesse Cassel”,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p. 41-46.

②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67.

③ W. Bodham Donne,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with Lord North from 1768 to 1783*, Vol. I, p. 295.

④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66-68.

方让步，英国方面却等不得。

在上述两个协议签署后，福西特开始与那几个主动表示愿意提供部队的小邦国谈判。1776年2月5日，英国与黑森-哈瑙签署协议，后者向英国提供由668名步兵组成的部队。4月20日，英国与瓦尔德克签署协议，约定的部队规模为670人。1777年2月1日，英国与安斯帕格-拜伊罗特签署协议，后者提供1285人的部队。英国与安哈特-策尔普斯特之间的协议到1777年10月才签署。^①这四个小邦国与英国的协议在内容和措辞上与布伦瑞克的协议极为相似。每名军人的招募费标准都是30克朗，官兵的军饷也是按照英国军人的标准，有差异的是英国支付给这些邦国君主的“津贴”。不考虑为了填补减员损失后续提供的兵员数量，从协议中每提供一名军人获得的年津贴数额来看，黑森-哈瑙（37.5克朗，持续到部队返回后一年）、瓦尔德克（37.4克朗，持续到部队返回后一年）、安斯帕格-拜伊罗特（35克朗，持续到部队返回后三个月）这几个邦国得到了比布伦瑞克更加优厚的回报。^②“津贴”是这些德意志诸侯从交易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渠道，因为

① 除最终签订协议的六个邦国以外，巴伐利亚选帝侯、符腾堡公爵及另外几个德意志小邦国也曾主动提议为英国提供部队。由于能提供的部队质量太差，或者因为在地理位置上被敌视英国的邦国所阻隔，这些提议都没有结果。

② 参见“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Hereditary Prince of Hesse Cassel, Reigning Count of Hanau, &c”,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p. 46-48;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Prince of Waldeck”,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p. 275-279;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Anspach”,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VII, London: John Almon, 1777, pp. 44-49。

30 克朗的招募费要用于发放给登记入伍的新兵以及为士兵购置武器装备。

布伦瑞克与英国的协议第十一条有这样的规定：

按照惯例，三个受伤的人将被视为等于一个死亡的人；每死亡一个人将按照其招募费的金额进行赔偿。部队中的任何团、营或连队，如果在野战、攻城中或由于严重的传染病导致非比寻常的人员损失，或在前往美洲途中遇到船只失事，英王陛下将以最公正的方式对其人员损失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将是招募相应数量新兵的费用，以使受损部队恢复原状。^①

协议公开后，这一条款引起了广泛的非议，被指为“血钱”条款，因为 30 克朗的赔偿金将进入布伦瑞克公爵的腰包，而不是支付给受伤官兵或死亡官兵的家属。

对这一条款的含义及其前后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学者们的解读都不能令人满意。卡普对这一条款的理解是，英国在赔偿伤亡官兵 30 克朗的同时，另外向布伦瑞克公爵支付 30 克朗，作为替代者的招募费。^②按卡普的理解，30 克朗本来是赔偿给伤亡官兵或其家属的，只是在现实中被公爵侵占了。洛厄尔对这个条款的解读则显得模棱两可：“或许可以理解为英王将承担新兵的

^①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Reigning Duke of Brunswick”,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 36.

^②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46-47.

招募费，以填补战死士兵的空缺，而对于那些开小差的或生病死亡的（除非是严重的传染病）士兵，布伦瑞克公爵需要自己承担替补新兵的招募费用。但是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三个受伤的人’又是什么意思？”^①他最终也没有对条款的含义给出明确的意见。威廉米认为，协议中的赔偿金就是用来招募替代者的30克朗，并不存在另外支付的30克朗赔偿金。^②笔者认同威廉米在这一点上的判断，但他与卡普、洛厄尔、英格罗等学者都认为，黑森-卡塞尔的协议与布伦瑞克的协议有一项重要差别，就是它没有包含“血钱”条款。^③至于其中原因，威廉米、英格罗与洛厄尔均没有给出解释。卡普的说法是，黑森-卡塞尔方面在谈判中没有对伤亡官兵的赔偿提出要求，而是把谈判重点放在英国把官兵的工资交给黑森-卡塞尔方面来发放这一要求上。^④

① Edward J. Lowell, *The Hessians and the Other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p. 18.

② Jean-Pierre Wilhelmy,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3*, pp. 38-39.

③ 在涉足过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中，只有伊尔金（Eelking）没有提到黑森-卡塞尔的协议与其他协议之间的区别。可惜这不是对几份协议的文本进行细致比较后的结论，他仅对三份协议的内容不加区分地进行了粗枝大叶的笼统概述，甚至没有注意到受伤者与死亡者的赔偿金不同。Max von Eelking, *Die Deutschen Hülfsstruppen im Nordamerikanischen Befreiungskriege, 1776 bis 1783*, S.13.

④ Jean-Pierre Wilhelmy,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3*, p. 40;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37; Edward J. Lowell, *The Hessians and the Other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p. 18;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68.

其他五个邦国的部队到达美洲后，军饷都由英国直接发放给官兵。只有黑森-卡塞尔邦伯得到了经手军饷的机会，从而可以通过“吃空饷”等手段额外攫取大量钱财。但他会因此放弃对伤亡官兵赔偿金的要求吗？1777年，黑森-卡塞尔邦伯弗雷德里希二世在写给部队指挥官的信中抱怨说：“英国人在受伤和残废官兵的问题上钻空子，不想按照与死亡官兵同样的标准（法语原文是‘tariffé pour les morts’）赔偿我。”^①这说明此前双方对死亡官兵的赔偿金达成过约定。笔者认为，这个约定其实就隐含在黑森-卡塞尔的协议第八条中：

倘若因为海上事故或其他原因，致使该部队中任何一个团或连队不幸遭到完全的或部分的毁灭，或者火炮等装备被敌军掳去或丢失在海里，英王陛下将赔付必要的新兵费用和上述火炮的价款，以便尽快重新配备火炮并使上述团或连队恢复原状。^②

^① “Lettre du Landgrave de Hesse au commandant de ses troupes en Amérique”, in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267. 尽管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是德意志人，信却是用法语写的，黑森-卡塞尔的宫廷里日常交流也使用法语。法语在当时是欧洲各国君主、廷臣和外交官们的通用语言，这一状况差不多延续至19世纪后期。布伦瑞克公爵在部队出发前给指挥官里德泽尔的指令就是用德、法两种语言书写的。Edward J. Lowell, *The Hessians and the Other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p. 5; Friederich Adolphus Riedesel, *Memoirs, an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Major General Riedesel, during his Residence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William L. Stone, Aabany: J. Munsell, 1868, p. 26.

^②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Landgrave of Hesse Cassel”,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 44.

在这里，针对死亡官兵的赔偿金被含蓄地表述为“必要的新兵费用”。在官兵死亡的原因方面，没有明确提到战斗中的死亡，而是用“海上事故或其他原因”这一隐晦的方式来表述。既然火炮被敌军掳去属于赔偿的范围，那么战斗中的死亡显然也包含在应当赔偿的“其他原因”中。

“三个受伤的人将被视为等于一个死亡的人；每死亡一个人将按照其招募费的金额进行赔偿”这样的文字确实没有被写进黑森-卡塞尔的协议。不过，在布伦瑞克等邦国的协议中，这句话的作用更像是解释条款后半部分涉及的赔偿的具体标准，而不是在约定另外一份不同的赔偿。从条文的含义看，黑森-卡塞尔的协议中关于赔偿金的条款与其他几份协议的相关条款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黑森-卡塞尔的协议在伤亡官兵的赔偿方面用了隐晦、含蓄的表述方式。与其他邦国的协议相比，黑森-卡塞尔的协议在序言部分增加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本条约和以前的条约中都没有规定的事项，应当……本着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加以解决。”^①黑森-卡塞尔前任邦伯曾因为“血钱”条款遭受过非议，所以这一次的协议采取了隐晦的表述方式。在表述方式上的含蓄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批评者的声音，但是约定不明确无疑增加了协议双方发生纠纷的可能性，弗雷德里希二世对英国人的抱怨就是证明。

^①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Landgrave of Hesse Cassel”,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p. 41-42.

二、对士兵和军官的个案研究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前述六个德意志邦国一共派出 29 875 名军人到美洲帮助英国作战，其中 17 313 人在战争结束后随部队回到了德意志（表 3）。

表 3 美国独立战争中六个德意志邦国提供给英国的部队人数

邦国名称	派出人数	战后随部队 返回人数	损失人数
布伦瑞克	5 723	2 708	3 015
黑森-卡塞尔	16 992	10 492	6 500
黑森-哈瑙	2 422	1 441	981
安斯帕格-拜伊罗特	2 353	1 183	1 170
瓦尔德克	1 225	505	720
安哈特-策尔普斯特	1 160	984	176
总计	29 875	17 313	12 562

本表根据卡普的研究成果整理而成。

资料来源：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209-210。

总计为 12 562 人的“损失人数”中，一部分是由于各种原因死亡了，一部分是因为严重的伤病无法继续服役而被提前送回

欧洲，而数量更多的人则是脱离部队后留在美洲大陆，最后变成了美国或加拿大的公民。这约3万名德意志军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自愿还是强制）加入这一行列的？（对自愿者而言）他们加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与部队的性质密切相关，很有探讨的必要。幸好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和士兵用日记、回忆录或书信的形式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以下将通过他们自己所写的文字对其中几名军人进行个案研究。

（一）约翰·康拉德·德拉

约翰·康拉德·德拉（Johann Conrad Döhla）是安斯巴格-拜伊罗特部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出生于1750年的德拉是一名制砖工的儿子，但显然受过比较好的文化教育。大概是作为像他这种来自普通家庭的青年谋出路的一种方式，德拉在18岁时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步兵。1777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美洲。德拉在日记中对这件事的描述是：“1777年2月28日，按照我们最安详的君主布兰登堡侯爵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希·卡尔·亚历山大的命令，我们开始启程前往美洲，作为外援部队效力于英格兰与不列颠的国王乔治三世陛下。”^①显示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是正面、积极的。德拉记述了他与战友们离开安斯巴格-拜伊罗特后乘船航行途中的经历，以及到达美洲后的战斗、执勤和生活，其中包括1781年约克顿战役中部

^① Johann Conrad Döhla, *A Hessian Diary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ed by Bruce E. Burgoyn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0, p. 3.

队投降的经过，及随后一年半的战俘生涯。战争结束后，德拉与他所在的部队于1783年11月回到安斯巴格-拜伊罗特。他随即提出退伍申请，并得到了批准。他在1783年12月4日离开部队，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为自己的君主忠实地服役将近十五年以后，德拉在退伍前仍只是一名列兵。此时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厌倦了军旅生活，也许是对自己得不到提拔感到失望了，不过他在日记中没有表露这一类想法。我们在他日记中读到的仍旧是他对自己君主的敬意：“12月1日中午，我收到了批准退伍的通知，因为我已经为我的主人安详的君主光荣而忠实地在陆地和海上服役差四个月就十五年了。”^①

德拉是一名自愿参军并善始善终地履行职责的士兵，下面来看一个被迫入伍的案例。

（二）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梅

约翰·戈特弗里德·佐伊梅（Johann Gottfried Seume）1763年出生于萨克森地区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②在莱比锡大学上学期间，佐伊梅因为信仰问题与身边的朋友及学校管理者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变卖了一些书籍，还清了债务，离开莱比锡。在他徒步前往巴黎的途中，被黑森-卡塞尔征兵者抓住，被迫成为一名士兵。佐伊梅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如下：

① Johann Conrad Döhla, *A Hessian Diary of the American*, p. 254.

② Johann Gottfried Seume, "Mein Leben", in *J. G. Seume's Sämmtliche Werke*, Erster Band, Leipzig: Joh Friedr Hartknoch, 1839, S. 4, 6.

第三天晚上，我在巴赫（Bach）过夜。在这里，卡塞尔的邦伯，当时重要的人口贩子（Menschenmäkler），^①不顾我的抗议，通过他的征兵官开始为我提供前往齐根海茵、卡塞尔，继而前往新大陆的住宿……我被人像半拘留犯（Halbarrestanten）一样押送到齐根海茵城堡，那里已经有许多来自各个地区的受害者，我们将在春天与其他人一起接受福西特的检阅，然后被送往美洲。我只得屈从于命运，试图从坏的境遇中寻找最好的结局。我们在齐根海茵停留很久，直至必要数量的新兵从他们耕作的田地里、从他们行走的大路上或从征兵站被集合到这里来。那个时代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在人口贩子（Seelenverkäufers）的爪牙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劝诱、诡诈、欺瞒、暴力，各种手段无所不用。没人过问为了这一可恶的目标采取了什么手段。各种各样的外乡人遭到逮捕、关押并被送走。他们撕掉了我的学术论文，那是我学生身份的唯一证明。最后，我不再愤怒了。人在哪里都能活，那么多人能应付的环境，你也能应付。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穿越大洋的航行是够有吸引力的，大洋彼岸一定有什么值得看的事物……这里真正是一个各色人等聚集的大杂烩，有好人、坏人，还有一些时好时坏的人。我的同伴包括一位来自耶拿的已退学的大学生、一位维也纳的破产商人、一位汉诺威的制花边工人、一位哥达的被解雇的邮局抄写

^① 佐伊梅在这里创制了一个词汇，德语中“Menschen”的意思是“人”，“Mäkler”具有“中间人、经纪人”的意思。

员、一位维尔茨堡的修士、一位梅农根（Meinungen）的区行政官、一位普鲁士的轻骑兵中士、一位当地的被开除的黑森少校，以及类似的其他人。^①

按照佐伊梅的叙述，这些人不久就酝酿出一个密谋，他们打算发动突然袭击把卫兵制伏，再把军官们锁起来，然后越离军营只有数英里的边境线，从而使这1500人都得到自由。有人推举佐伊梅担任这个计划的领导者。他听了一位年长者的忠告，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因此在密谋泄露后躲过了上绞刑架的危险。^②

佐伊梅和他所在部队到达美洲后被安排在加拿大驻守，直至战争结束都没有经历真正的战斗。佐伊梅虽然是被强抓来的士兵，但豁达积极的心态和勇于冒险的个性使他适应了军队生活，而且被提拔为一名中士。其内心对行伍生活的态度已渐渐发生转变，由最初的反感与抵触变为顺应和接受，后来甚至发展到憧憬的程度，以致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他感受到的不是喜悦而是失落：

当和平的消息最终到来时，我并不感到喜悦。因为一个充满进取心的年轻人看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时，并不会感到高兴。人们曾经恭维我说，我将能够变成一名军官，并将开启自己的一番事业。随着和平的到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① Johann Gottfried Seume, "Mein Leben", in *J. G. Seume's Sämmtliche Werke*, Erster Band, S. 57, 59–60.

② *Ibid.*, S.60.

在和平时期，像我这样平民出身的人无法获得比中士更高的军衔，而终身做一名中士绝不是令我艳羡的事情。^①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被强抓来的士兵对军旅生活的态度都发生了像佐伊梅那样的转变。比如那位来自维尔茨堡的修士，是一个对历史和数学懂得很多的人，拉丁语说得也不错。在军营里和航行途中，与这位伙伴聊天是佐伊梅摆脱无聊的避难所。然而，佐伊梅无论如何都无法使这位伙伴摆脱极度忧郁的精神状态。被强抓入伍的命运和航行途中的艰苦已将这位修士彻底击垮。“即使我到了大洋对岸，”他这样说，“苦难还将在那里继续，贫困、匮乏和辛劳就是我们的全部前景，直至某一天被一个步枪手射中胸膛，或者被一个莫霍克人剥掉头皮。”^②这个人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医生从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身体疾病的迹象，但人们需要用鞭打的方法才能强迫他去走动，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洗漱，甚至进食也需要人逼迫。到最后，大家没有耐心再鞭打他了。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洗漱，几乎不吃什么东西，直到躺在自己的粪便中死去。^③

在被强抓入伍的士兵当中，佐伊梅与那位修士代表了两种极端的表现。大多数人既不像佐伊梅对军旅生活接受得那么顺利，那么彻底，也不像那名修士完全无法接受。他们通常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状，而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便有可能逃走。

① Johann Gottfried Seume, "Mein Leben", in J. G. Seume's *Sämtliche Werke*, Erster Band, S.92.

② Ibid., S.73.

③ Ibid., S.72-74.

(三) 约翰·查尔斯·菲利普·冯·克拉夫特

约翰·查尔斯·菲利普·冯·克拉夫特(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rafft)是一名贵族子弟,1752年出生于萨克森地区的德累斯顿,其祖先有好几代人在普鲁士担任军官。克拉夫特从十几岁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生涯。贵族出身和个人英勇无畏的品质使克拉夫特在军队里发展十分顺利。1773年7月,他成为普鲁士军队的一名少尉,同年12月又晋升为中尉。1776年,克拉夫特厌倦了和平时部队里的平静生活,决心辞去在普鲁士军中的职务,去其他军队效力。离开普鲁士以后,他先去了圣彼得堡。但他发现,自己在俄罗斯军队里需要先以志愿者身份服役两三年后才能进入领军饷的名册,因为在他前面还有大约700名申请者。于是,他决定自费前往美洲,以便加入在那里的黑森部队。乘一艘英国船只到达魁北克后,克拉夫特曾尝试加入驻守在附近的布伦瑞克部队,但遭到了拒绝,因为未经公爵批准布伦瑞克部队不能招募陌生人。在魁北克滞留一段时间以后,他遇到了一位刚从欧洲带一批新兵来美洲的黑森中尉。在跟随中尉前去与黑森大部队汇合的航行途中,中尉与人发生冲突,克拉夫特受到牵连而被捕,并被遣送回欧洲。在法国波尔多滞留一段时间以后,克拉夫特搭乘一艘美国私掠船再次来到美洲。经过十几天的跋涉,克拉夫特于1778年2月初抵达美军司令部所在地。华盛顿将军同意任命他中尉,但克拉夫特不满意,他想要上尉的职位。他谎称自己要返回欧洲,从而获准离开美军军营。沿途躲过多重美军哨卡后,他终于在3月9日抵达英军占据的费城。在那里,克拉夫特说自己只愿意在

黑森-卡塞尔部队中效力，他被引荐给黑森-卡塞尔部队的指挥官，但后者只能给他一个中士职位。大概是认识到没有更好的出路了，克拉夫特接受了这一职位，从此开始了他在黑森-卡塞尔部队五年多的服役时光。^①

虽然暂时接受了士官的身份，但克拉夫特对晋升为军官的期待非常急切。1778年6月，他听到部队将返回黑森-卡塞尔的传言，在22日的日记里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决心辞职，因为我不想以士官的身份出现在欧洲。”^②在黑森-卡塞尔部队里迟迟得不到晋升的情况下，他在1779年3月曾尝试转到英国部队中效力，发现那里也不能给他军官职位才作罢。^③1780年3月1日，克拉夫特成为一名候补少尉（Fahnenjunker），虽有少尉的名义，但仍按中士领取军饷。同年9月2日，听到又一批提拔军官的命令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失望的克拉夫特在日记中写道：“该死的命运！它一直折磨我！我不抱希望了，从现在开始只要机会出现我就要设法离开黑森人。哦，我只能乘一艘海盗船逃走！我只能去死，至少那样就没有痛苦了！我要发疯了！”^④1781年6月27日，再一次听到失望的消息后，克拉夫特立即提出辞职，还流下了眼泪。1781年12月8日，克拉夫特终于收到来自黑森-卡塞尔的委任状，正式成为

①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rafft, *Journal of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arafft Lieutenant in the Hessian Regiment von Bose, 1776-1784*, translated by Thomas H. Edsall, New York: Printed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1888, pp. 1-29.

② *Ibid.*, p. 42.

③ *Ibid.*, pp. 81, 83.

④ *Ibid.*, p. 119.

一名少尉。1783年4月8日，他又如愿收到晋升为中尉的委任状。同年12月，在随部队返回欧洲的航行途中，克拉夫特决定辞去军中的职位回到美国，原因是此前在纽约过冬期间，他与房东的女儿相爱，而且他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离开黑森-卡塞尔部队以后，克拉夫特于1784年3月从英国启程前往美国，从此在这个曾经战斗过的国家定居下来。^①

（四）弗雷德里希·阿道弗斯·里德泽尔

弗雷德里希·阿道弗斯·里德泽尔（Friederich Adolphus Riedesel）出身于德意志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其家族曾长期拥有黑森陆军元帅这一世袭职位。他的父亲是一位政府官员，母亲是一位普鲁士中将的女儿。里德泽尔出生于1738年。15岁那年，里德泽尔被送到马堡的一所法律学校读书。当时有一个步兵营驻扎在马堡，活泼好动的里德泽尔被部队威武雄壮的军容深深吸引，经常逃课去观看部队操练。不久，他就放弃学业，加入了这支部队。劝说里德泽尔入伍的军官声称已写信给他的父亲，并征得其同意，实际上是在哄骗他。父亲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甚至一度停止给里德泽尔提供生活费。后来，里德泽尔所在的团被黑森-卡塞尔邦伯租借给英国，驻扎在伦敦附近。此时里德泽尔已经是一名少尉。在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黑森-卡塞尔和布伦瑞克都是英国的盟友。里德泽尔少尉担任了盟军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的助

^①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rafft, *Journal of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arafft Lieutenant in the Hessian Regiment von Bose, 1776-1784*, pp. 141, 154, 181, 201-202.

手兼传令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得公爵信任。1761年，黑森-卡塞尔邦伯在提拔一批军官时忽略了里德泽尔，后者因此辞去了在黑森-卡塞尔军队的职务。从那时起，这位来自黑森的职业军人就开始了在布伦瑞克军队中近四十年的服务。1761年5月，里德泽尔被布伦瑞克公爵任命为一个轻骑兵团的中校，两个月后又兼任另一个团的指挥官。1772年，他被拔擢为上校。1776年，布伦瑞克与英国达成提供部队的协议后，里德泽尔被布伦瑞克公爵任命为这支部队的统帅。在部队开拔以后，里德泽尔才得知自己已被提升为少将。^① 出发的那一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从来没有遭受过比今早的离别更大的痛苦。我的心已经碎了，如果我能折返回去，谁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但是，亲爱的，上帝已经将我放置于当前的使命中，我必须遵循上帝的召唤。职责和荣誉使我做出这样的决定，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慰藉，而不要抱怨什么。^②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里德泽尔率领他的部队回到布伦瑞克。1787年，他被提拔为中将。1794年，里德泽尔被任命为布伦瑞克军队总司令，直到1800年在这一职位上去世。

^① Friederich Adolphus Riedesel, *Memoirs, an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Major General Riedesel, during his Residence in America*, pp. 1-30.

^② Friederich Adolphus Riedesel, "From General Riedesel to His Wife", in *Letters and Journals Relating to the Wa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pture of the German Troops at Saratoga*, translated by William L. Stone, Albany: Joel Munsell, 1867, p. 17.

以上四个案例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分别代表四个不同层级的军人：德拉是一名普通士兵，佐伊梅是一名士官（这是介于官兵之间的一个层级，本质上仍属于士兵），克拉夫特是一名下层军官，里德泽尔则是一位高级将领。两名士兵都出身于平民家庭，两名军官都出身于贵族家庭，这并非偶然。正如佐伊梅所说，在当时平民出身的人要取得军官职位是比较难的，在和平时基本不可能。事实上，在18世纪欧洲的军队里，军官职位多数还是由贵族担任的。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

对四名军人的个案研究表明，这些部队中有人是主动加入的，有人虽是服从命令随部队到美洲的，但其最初加入部队是自愿的，在被迫加入的人当中也有人在服役过程中对军旅生活产生了憧憬。从他们到美洲参战的方式来看，克拉夫特是四个案例中主动性最强的。他是自己承担漂洋过海的费用和风险到美洲加入黑森-卡塞尔部队的。当德拉和里德泽尔效力的部队被派往美洲时，出于军人的职责，他们只能服从命令，但这不等于说这两人到美洲参战不是自愿的。佐伊梅是四个案例中唯一被迫到美洲参战的。我们无从得知被迫加入者的确切数量，但实际比例应该远低于人们通常的印象。这种印象与佐伊梅自传中的夸大叙述有一定关系。佐伊梅声称，与他一起被送到美洲的那一批1500人基本都不是自愿加入的。^①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相信这位诗人的说法。种种迹象表明，佐伊梅的自传中存在一些夸张不实的

^① Johann Gottfried Seume, "Mein Leben", in *J. G. Seume's Sämmtliche Werke*, Erster Band, S. 60.

叙述。比如，像他这样一个年纪轻轻毫无军事经验的大学生，竟被推举担任1500人兵变计划的领导者，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说法。在讨论黑森-卡塞尔部队时，英格罗说：“绝大多数被送到美洲的军人是自愿选择的。”^① 笔者相信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

以上四个案例在战争中都躲过伤亡的命运幸存下来，尽管德拉和里德泽尔各自经历了一段战俘生活。战争结束后，里德泽尔继续在布伦瑞克军队效力，他是四个案例中唯一终身以军事为职业的人。离开军队以后，德拉回到家乡，跟他父亲一样当了一名制砖工匠。^② 佐伊梅后来成了略有些名气的诗人。克拉夫特重返美国后先在纽约以教书为生，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名工作人员。^③ 四个案例虽然都是来自德意志的军人，但只有德拉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在自己邦国的部队中效力，并且只有他把在美洲作战描述为对自己君主的效忠。

三、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性质

对相关协议和军人个案的研究表明，笼统地将美国独立战争

^① Charles W. Ingrao,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p. 140.

^② Johann Conrad Döhla, *A Hessian Diary of the American*, Preface, p. 21.

^③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rafft, *Journal of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arafft Lieutenant in the Hessian Regiment von Bose, 1776-1784*, p. 3.

中的德意志军人定性为雇佣兵或贩卖人口的受害者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唯有对不同情况进行区分才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除了上述由诸侯派出的部队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还有大量德意志军人直接在英军中效力，其中多数是通过德意志军事承包人招募的。^①前文对克拉夫特的案例研究显示，个别职业军人在战争期间自行前往美洲加入英军，或离开德意志部队转投英军也是可能发生的。这场战争中还有不少德意志军人加入美军，帮助殖民地人民作战，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雷德里克·威廉·冯·施托伊本（Frederick William von Steuben）。^②在法国参战以后，罗尚博（Rochambeau）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中也有许多德意志军人，^③最出名

① 例如，从1775年夏到1776年2月，汉诺威人格奥尔格·海因里希·阿尔布雷希特·冯·沙伊特（Georg Heinrich Albrecht von Scheiter）为英国招募了近两千名士兵。沙伊特希望指挥这支部队，但英国政府只让他负责招募，可能是因为在七年战争中曾试图欺骗英国财政部。关于这些士兵最后被分配到英国在美洲的各个团的情况，见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Army, 'Military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7, No. 1 (January, 2010), pp. 80-84.

② 施托伊本出身于普鲁士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他14岁时就跟随父亲开始了军旅生涯，先后参加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施托伊本主动投身于殖民地的解放事业，被大陆会议任命为大陆军总监察长，其军衔与乔治·华盛顿一样是少将。他把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操练和纪律引入革命军队，从而把大陆军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战争结束后，施托伊本成为美国公民，因为在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大片土地和丰厚的年金。Friedrich Kapp, *The Life of Frederick William von Steuben, Major General in the Revolution Army*, New York: Mason Brothers, 1859, pp. 44-45, 645.

③ J. G. Rosengarten, "American History from German Archiv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39, No. 62 (April, 1900), p. 144.

的例子包括威廉·德·德庞（William De Deux-Ponts）^①及其兄长克里斯蒂安·德·德庞。按其所在部队划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军人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在自己邦国派到美洲的部队中效力；第二种是在其他邦国派到美洲的部队中效力；第三种是直接在英国军队中效力；第四种是在美国军队中效力；第五种是在法国远征军中效力。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军、美军和法军没有强迫外国人入伍的纪录，那些在英军、美军或法军效力的德意志军人均出于自愿。尽管其中有的人对英王镇压“叛乱”的事业抱有同情，有的人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抱有同情，但获取报酬、荣耀和晋升到更高军阶的机会是促使他们加入战争的首要动机。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典型的雇佣兵。革命宣传者一直谴责雇佣兵充当英王推行暴政的工具，但大陆军里也雇佣了不少来自欧洲各国的军官。革命者声称这些外国人是“志愿者”，而不是雇佣兵。实际上，大陆军里的外国军官与当时欧洲各国军队里的外国军人性质是一样的。^②

^① 威廉来自于德意志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其姓氏的德文形式“茨威布吕肯”（Zweibrücken）字面意思是“二桥”，因而在法语中被称作“德庞”（Deux-Ponts），其含义也是“二桥”。出生于1754年的威廉在1778年加入其兄克里斯蒂安创建的德庞团，当时这个团正效力于法国政府。1780年，这个团作为罗尚博统率的法国远征军的组成部分抵达美洲。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因作战英勇，威廉被法国国王册封为圣路易骑士团骑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威廉及其兄克里斯蒂安被迫离开法国回到德意志，并一直在巴伐利亚军中效力。参见 William De Deux-Ponts, *My Campaigns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Samuel Abbott Green, Boston: J. K. Wiggin and W. M. Parsons Lunt, 1868.

^② Eric Spall, "Foreigners in the Highest Trust: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European Mercenary Officers in the Continental Army", *Early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2014), p. 351.

在德意志诸侯派到美洲帮助英国作战的部队中，只有黑森-哈瑙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本邦人组成，其他几个邦国的部队中有大约一半是外邦人。^①无论是在自己邦国的部队中，还是在其他邦国的部队中效力的德意志军人，都有一部分是自愿入伍的，有一部分是非自愿加入的。非自愿也有程度之分，有的是被强行逮捕押进军营的，有的是被花言巧语诱骗，或者灌醉酒以后哄骗入伍的。1767年颁布的《黑森步兵条例》中有一个条款，要求团长和连长们在招募士兵时应尽量多招募外邦人（Ausländer），以便保护本邦的人力资源。^②邦国政府虽然明令禁止征兵官强迫非自愿者入伍，但这一规定可能仅适用于本邦人，黑森-卡塞尔征兵官用强制手段招募外邦人时几乎毫不掩饰，在当时就已是尽人皆知。那些被强迫到美洲作战的人，说他们是贩卖人口的受害者似乎并无不妥。然而，他们不代表这些德意志部队中的全部军人，甚至也不是其中的大多数。那些自愿加入外邦部队服务的军人，比如前文研究的个案克拉夫特和里德泽尔，其首要动机是为了报酬，以及作为职业军人的晋升机会，所以也都可以定性为雇佣兵。

难以下结论的是那些自愿加入本邦部队的军人，比如前文研究的个案德拉。尽管他们加入的是本邦军队，但不能据此认为保家卫国是其基本动机。在当时的德意志邦国，真正体现保家卫国

① Jean-Pierre Wilhelmy,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3*, p. 54.

② *Reglement vor Die Hessische Infanterie*, Cassell: 1767, S.622.

精神的是民兵武装。比如在黑森-卡塞尔的军事制度中，民兵是只能用来保家卫国的武装，正规军则可以被用于出租。鉴于邦国出租部队的历史，新兵在加入正规军时的预期是，自己参加的部队有可能被出租，从而在一场原本与己无关的战争中效力。按照当时的制度，新兵在入伍时可以领到一笔入伍津贴，入伍以后又可以按月领取军饷，这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不能说没有吸引力。至于贵族子弟，除了经济回报，还可期待通过参军提高个人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就其动机而言，那些自愿加入本邦部队的军人与军事承包人招募的雇佣兵没有本质区别。因此，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里所有自愿加入的军人都可以看作雇佣兵。

根据以上分析，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是由贩卖人口的受害者与自愿加入的雇佣兵这两种人构成的。这些部队是由德意志邦国的君主根据国际协议派出的正规军。前文对协议的解读已揭示，在部队为英国服务期间，军官的任命权及对部队的司法管辖权都在德意志诸侯手中。尤其黑森-卡塞尔与英国的协议将双方关系明确界定为军事同盟。基于这些事实，有的学者更愿意把这些部队称作“外国援军”（auxiliary），而非雇佣兵。^①有一种定义明确将“由一国政府派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排除在雇佣兵之外。^②不过，这是法学家对现代雇佣兵的界定，在讨论历史上的雇

① 例如 Christof Mauch, "Images of America-Political Myths-Historiography: 'Hessian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Vol. 48, No. 3 (2003), p. 413。

② H. C. Burmester, "The Recruitment and Use of Mercenaries in Armed Conflic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2, No. 1 (January, 1978), p. 39.

佣兵问题时，笔者认为还是菲利普·孔塔米纳等学者采用的定义更为恰当。^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包括黑森-卡塞尔在内的德意志诸侯与英国之间的合作，本质上就是一笔交易。在交易中，英国花钱买到了军队的服务，德意志诸侯则通过出售军队的服务得到了金钱。尽管其中的非自愿者不能算作雇佣兵，但作为整体，这些德意志部队是可以称为雇佣兵的，只不过他们是一种由政府组织招募，并由政府向外出租的雇佣兵。

四、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影响

一国政府靠出租其军队来赚取报酬，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理解这种少见而奇特的做法。然而在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后期的欧洲，它是一种盛行的雇佣兵模式。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部队的呢？

北美殖民地军民对德意志部队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于黑森-卡塞尔部队在其中占大多数，而且殖民地人民对各邦国部队之间的区分不太清楚（或不太在意），所以把这些部队都称为“黑森人”。在德意志部队到达美洲初期，殖民地军民对这些所谓“黑森人”的看法可以用“憎恶”与“畏惧”两个词概括。一方面，这些部队是来帮助英王剥夺殖民地自由的帮凶，当然是令人憎恶的。另一方面，由于黑森-卡塞尔军队过去在欧洲

^① 见本书引言。

战场上取得的优良战绩，加上革命宣传者夸张地渲染德意志军人如何凶暴残忍，殖民地军民最初对德意志部队都有相当程度的畏惧心理，甚至有不少人以为德意志雇佣兵是吞吃小孩子的妖怪。^①在与黑森-卡塞尔部队交手的最初几个月中，乔治·华盛顿一直回避与黑森部队进行正面对抗，也是顾虑到士兵当中普遍存在的畏惧心理。1776年12月26日的特伦顿（Trenton）战役打破了黑森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获胜的华盛顿将军特意安排800名黑森-卡塞尔俘虏当众游行。从此以后，殖民地军民对德意志部队的畏惧心理逐渐消失。随着相互接触的增多，殖民地人民逐渐了解到，德意志军人并不是传言中的吃人妖怪，而是与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另一方面，英国政府灌输给德意志军人的对“叛乱者”的憎恨也在逐渐减退，其中不少人转而同情殖民地人民追求自由的事业。德意志部队与驻地百姓之间的友好交往日益增多，军人与当地姑娘恋爱、结婚的事例也越来越多。^②

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对于被强制进入德意志部队的士兵只有同情，而不是反感。即使对于那些自愿加入的军人，舆论主流也没有今天人们对待雇佣兵的那种反感。尽管马基雅维里在16世纪早期就批评雇佣兵是一种“毫无用处，而且非常危险”的军队，但在一个世纪后的三十年战争期间雇佣兵反而在欧洲进入鼎盛时期。即使到了18世纪后期，像里德泽尔那样取得显赫地位，甚至

①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 60.

② 在克拉夫特的日记中就提到不少这样的事例。

成为所效力国家的军队总司令，并被各国君主待若上宾的雇佣兵也有不少。至于为数众多的普通雇佣兵，他们的谋生方式当时还没有成为舆论谴责的焦点。把雇佣兵看作一个不道德的、肮脏的行当，在19世纪才成为欧洲舆论的主流看法。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欧洲舆论抨击的对象不是德意志部队中的军人，而是出租这些部队的德意志诸侯。在1776年6月写给伏尔泰的一封信中，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二世谴责黑森-卡塞尔邦伯“像把牲畜卖到屠宰场一样把自己的臣民卖给英国……这种行为完全是由肮脏的自私所导致”^①。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领导者之一的米拉波，在1776年写了题为《致被其君主卖给英国的黑森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小册子，对德意志诸侯们的贪婪进行了猛烈抨击，以至于黑森-卡塞尔邦伯为消除影响试图买下该小册子的全部副本。在创作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戏剧《阴谋与爱情》中，席勒对输出部队到美洲的德意志诸侯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在当时的欧洲舆论中也有很多为德意志诸侯辩护的声音。^②辩护者的主要论据是：德意志诸侯出租部队是在遵循一个悠久的传统；通过出租部队得到的金钱为邦国带来了利益；黑森-卡塞尔邦伯、布伦瑞克公爵与英国王室都有亲属关系，其部队参加

^① Edward J. Lowell, *The Hessians and the Other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pp. 22, 24-25.

^② H. D. Schmidt, "The Hessian Mercenaries: The Career of a Political Cliché", *History*, Vol. 43, No. 149 (October, 1958), pp. 209-210.

的并不是一场与己无关的战争。这些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即便论战在当时尚未有明显结论，论战的发生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讨论这场论战的影响之前，请允许笔者陈述一下对输出雇佣兵的德意志诸侯的看法。黑森-卡塞尔邦伯在给部队指挥官的信中写道：

收到你的汇报后，我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我的勇敢的黑森人为了一项外国的事业英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证明我认为他们勇敢的看法没有错，也证明我期待他们忠于我的利益没有错。但我不能原谅英国人在记录中如此大幅度缩小我们的牺牲数字。何不坦率承认，我们失去的是1700人而不是900人……难道这些先生以为大约30基尼（guinnés，英国金币名称。——引者）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吗？尤其在我最近昂贵的旅行之后，我又有了新的债务。不，我亲爱的，基于你为我服务并想让我满意的热忱，请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加倍努力，去激励越来越多我忠诚的臣民牺牲自己的生命，直至最后一人……请向M上校转达……我对他目前的表现多么不满意。为什么呢？他的部队是我们所有部队中唯一的至今仅有一人死亡的团。这使我感到羞辱并使我苦恼倍增……该死的英国人在受伤和残废官兵的问题上钻空子，不想按照与死亡官兵同样的标准赔偿我……这些不幸的人现在还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呢？他们已经做不了任何事了。另外，那些可

恶的叛军（指美国人。——引者）射击总是那么低，这无疑导致了伤残。^①

这就充分暴露了德意志诸侯输出部队的真实动机——钱！能得到多少钱是其内心最在乎的问题。弗雷德里希二世口口声声夸赞的英勇的臣民，不过是他用来挣钱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工具。如果英国人不愿为伤残军人进行赔偿，宁愿敌人瞄得更准一点儿把他们打死，那样的话他们的君主就能得到赔偿。与英国结盟的传统或与英国王室之间的亲属关系只是可以用来遮羞的幌子，他们输出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尽管英国资金的流入在这些贫困的德意志邦国产生过一些积极影响，但这不足以为输出雇佣兵的自私动机开脱。如此看来，当时舆论对这些德意志诸侯的批评并不过分。

1776年以前，一国政府为了“津贴”向另一国提供“援军”，在欧洲的法理和实践中都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在分别出版于1758年、1760年和1764年的论著中，法学家瓦特尔（Emer de Vattel）、艾森哈德（Johann Friedrich Eisenhard）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均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只要不是用于非正义的战争，通过提供“援军”换取“津贴”的做法就是符合自然法的。^②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不仅为黑森-卡塞尔和布伦瑞克等邦国的“援军”

① “Lettre du Landgrave de Hesse au comandant de ses troupes en Amérique”, in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S. 267-268.

②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 22-23.

支付“津贴”，甚至也向普鲁士支付了大笔“津贴”，这些交易在当时并未成为舆论焦点。在十几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德意志诸侯与英国之间的雇佣兵交易引发的轩然大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种已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过去一直被接受的活动陡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呢？美国独立战争与以往德意志诸侯出租部队所参与的战争相比，最大的差别是这次的战场在遥远的美洲。尽管欧洲雇佣兵被用在欧洲以外的战场已有不少先例，但如此大规模地在欧洲以外使用还是第一次，更何况是在遥远的另一个半球。海上航行的风险和艰辛，与家人之间远隔重洋的距离，对美洲陌生环境的恐惧……这些都是以往大多数欧洲雇佣兵不曾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兵员需求远大于供给，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包含了较多用强制手段招募来的非自愿者，这也是引发舆论攻击的一个原因。然而，导致这场舆论风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启蒙运动的深入展开，到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人所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君主对臣民的奴役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在欧洲引发的争论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场争论是促使雇佣兵在欧洲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舆论旋涡对于出租部队的德意志诸侯和使用这些部队的英国政府都产生了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调整政策。从此以后，德意志邦国出租部队的交易基本停止了。美国独立战争既是政府出租军队这种雇佣兵模式的发展顶点，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这

种雇佣兵的告别演出。以往的研究者都把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视作雇佣兵在欧洲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不同学者的分歧只在转折的原因上。^①通过对美国独立战争中德意志部队的研究，本书对这一学术共识提出挑战。笔者认为，在当时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两类雇佣兵类型中，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仅是其中一种由盛至衰的转折点，而另一种雇佣兵的衰落则开始于年代更早的美国独立战争。

在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这段时期的欧洲，个人在外国军队效力和政府出租部队，是两种大体上同等重要的雇佣兵类型。如果说前者的衰落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那么后者的衰落则与美国独立战争密切相关。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欧洲雇佣兵最大规模的一次在欧洲以外被使用，而且是欧洲一种主要类型的雇佣兵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因此，我们认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德意志部队在欧洲军事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水分岭。

^① 最主要的研究有：Janice E. Thomson, "State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Decline of Mercena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1 (March, 1990), p. 31; Deborah Avant, "From Mercenary to Citizen Armies: Explaining Change in the Practice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Winter, 2000), p. 43; Sarah Percy, *Mercenaries: The History of a Nor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4-120。

结 语

雇佣兵是一种几乎在任何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都能见到的现象。但转型时期的欧洲长期以雇佣兵为最重要的军队类型，却是独一无二的情况。即使在古典时代，欧洲雇佣兵的兴盛也未曾达到此种程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格里菲斯在《希腊化世界的雇佣兵》一书中提出了产生雇佣兵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存在战争或发生战争的预期；二是有人（或团体）愿意并且能够付钱请别人为他作战；三是有人愿意在一项与己无关的事业中冒生命危险获取生计。^①上述三个条件可以作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分析框架。

转型时期是欧洲历史上战争异常频繁的一段时间，当然具备产生雇佣兵的第一个条件。不过，存在战争或发生战争的预期这一条件在此前和此后的欧洲都具备，要解释这一时段雇佣兵在欧洲格外兴盛，需要着重分析产生雇佣兵的另外两个条件。

中世纪中期雇佣兵在欧洲逐渐活跃起来，至中世纪晚期取代封建式军队成为最重要的军队类型，最关键的原因是雇主对雇佣

^① G. T. Griffith, *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 1.

兵的需求日益增长。一方面，中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所发展，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日益活跃，为君主或其他战争主体大量使用雇佣兵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依据封建义务组织起来的军队存在固有缺陷，而当时的民兵武装都是步兵，他们在由重装骑兵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战场上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在当时的环境下，最有作战效能的武装力量就是雇佣的骑士。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雇佣兵主要是骑士，此外还有少量由农民或手工业者担任的弓箭手、弩兵或其他类型的步兵。在封建制度下，骑士都有为其封君作战的义务，像英国的盾牌钱那样将封建军役义务折算为货币税的制度实行以后，欧洲许多地区的骑士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通过缴纳货币代替军役义务，从而得以专注于经营田产或在工商业等领域的活动，另一部分人则因为对田产经营不善难以维持生计，或因为在家中不是长子没有财产继承权，或者就是因为对从军打仗的兴趣，他们成了谁出钱就为谁打仗的骑士雇佣兵。

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hired hand）不是好牧人，因为羊不属于他自己，所以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①可见世人对雇佣劳动者的不信任至少可以追溯至福音书诞生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佣兵也是一种雇佣劳动者，他们会真心实意地为雇主卖命吗？尽管马基雅维里认为雇

^① Philip Yancey, ed., *The Student Bible with Concordanc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7, p. 929.

佣兵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武装，但战争中的大量实例已证明，无论是中世纪晚期的骑士雇佣兵，还是后来的瑞士雇佣步兵、德意志长矛兵、苏格兰雇佣兵，或者黑森-卡塞尔雇佣兵，都是在实战中非常有效的职业化军队。雇佣兵的盛行能够在欧洲长期持续，关键在于它始终是一种有效的武装力量，因此才一直有雇主愿意使用他们。从供给方面来说，直至18世纪，欧洲仍有许多贵族热衷于军事，充当雇佣兵是他们追求财富、荣誉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对于为数众多的平民子弟而言，充当雇佣兵是可供选择的谋生手段之一。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充当雇佣兵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谋生手段。

转型时期欧洲各地区几乎都有使用雇佣兵也有输出雇佣兵的现象。不过，其中有些地区因使用雇佣兵著称，而另一些地区则因输出雇佣兵出名，前者包括14—15世纪的意大利中北部、16世纪以后的法兰西与18世纪的英格兰，后者包括近代早期的瑞士、苏格兰高地与黑森-卡塞尔，等等。因使用雇佣兵而著称的，往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较为先进的地区。比如，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中北部是当时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的摇篮。完成统一以后的法兰西，不仅国内经济逐步走向繁荣，而且在欧洲各种制度革新中也常常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到了18世纪，英格兰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还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地。瑞士、苏格兰高地和黑森-卡塞尔这些因输出雇佣兵出名的地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这些都是崎岖多山、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第二，这些地区当时的农业和工商业不发达，在欧洲经济中属于比较贫困落后的地区。第三，这些地区的人民普遍

具有吃苦耐劳和刚毅顽强等适宜从军的禀赋。第四，这些地区的统治当局对输出雇佣兵采取了支持、鼓励乃至积极倡导的政策。

雇佣兵在欧洲的兴盛只持续到 18 世纪末，进入 19 世纪以后，雇佣兵在欧洲战争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其原因是什么呢？

从雇主的角度讲，主要有两方面原因改变了他们使用雇佣兵的意愿：一是经济成本的考虑，二是欧洲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长期以来，雇佣兵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作战工具，但使用这种工具需要承担昂贵的经济成本。在没有更好的选项时，雇主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代价。18 世纪末，一种新型军队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挽救可能被反法同盟击败的危局，法国革命政府在全国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以这种方式组建起来的新型军队在实战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欧洲军队的作战方式演进到这个时期，士兵的人数比士兵的素质更重要，与训练有素的小型职业化军队相比，经过短期训练的大规模义务兵在作战效能上更具优势。在作战效能不减的情况下，使用义务兵的经济成本更为低廉。过去欧洲各国政府使用职业化军队时，无论对本国军人还是外国军人都需要支付有吸引力的报酬，否则便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兵员。如果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则在理论上可以要求国民无偿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展开，德意志邦国出租部队这种形式的雇佣兵交易在 18 世纪末成为舆论抨击的对象，被指责为贩卖人口。这种部队的使用者同样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使用这种部队的政策。

从雇佣兵自身的角度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改变了

欧洲人充当雇佣兵的意愿。第一，欧洲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使充当雇佣兵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吸引力日益下降。到18世纪末，尤其进入19世纪以后，瑞士、苏格兰高地及黑森-卡塞尔等地区在工商业领域有了显著的发展，经济面貌大为改善。在经济状况改善以后，除对那些天生嗜好冒险和刺激的青年以外，充当雇佣兵不再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职业。第二，随着欧洲思想环境的改变，充当雇佣兵开始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在近代早期，虽然欧洲各国国民的民族认同已逐渐形成，但是以雇佣兵的身份为外国作战并不会受到道德谴责。在当时欧洲人的主流观念中，雇佣兵就像商人、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普通的职业。然而，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把充当雇佣兵看作为个人获利而从事杀戮的肮脏行为。尤其民族主义思潮在19世纪的欧洲兴起以后，一个国家的国民为另一个国家作战受到更为严厉的道德拷问。第三，随着行政和司法体系逐步完善，欧洲各国政府对其国民的控制力增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逐渐从一种理论主张变成现实。在近代早期，虽然不少欧洲国家都颁布过禁止国民私自出国充当雇佣兵的法令，但这些禁令的实际执行效果差强人意。到19世纪以后，情况就大为不同，违背禁令充当雇佣兵，面临更为严峻的法律风险。由于这些原因，欧洲人充当雇佣兵的主观意愿日趋减退。雇佣兵在欧洲兴盛数个世纪以后，终于在19世纪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中世纪晚期雇佣兵在欧洲兴起以后，最开始占主导地位的是伙伴式的雇佣兵团伙，其首领往往是基于才能和声望被推选出来的。15世纪诞生了专门投资组建雇佣兵部队的军事承包人，由军

事承包人招募的雇佣兵成为主导类型。这种类型的雇佣兵在 17 世纪 30 年代达到顶峰。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各国相继走上发展常备军的道路，军事承包人组织的雇佣兵渐趋没落，但这并不意味着雇佣兵在欧洲的衰落。在各国纷纷建立常备军的情况下，另外两种形式的雇佣兵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一是德意志各邦国把自己的常备军出租给有需求的雇主；其二是欧洲各国有志于从军的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外国的常备军中效力。在 18 世纪 60 年代，法国军队的 25% 是外国人，英国军队的 38% 是外国人，普鲁士军队里的外国人则高达 56%（其中包含德意志其他邦国的人，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瑞士、匈牙利等地的人）。^① 经过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国民义务兵制度的冲击，欧洲职业军人在外国军队效力的现象急剧减少，但直到 19 世纪中期以后才基本绝迹。

按照招募、组织雇佣兵的主体，可以将转型时期欧洲的雇佣兵划分为公募与私募两大类。所谓公募雇佣兵，就是由政府招募、管理，并由政府与雇主签约输出的雇佣兵。这主要是指 17—18 世纪德意志各邦国出租的军队。所谓私募雇佣兵就是由私人招募、组织的雇佣兵，古今绝大多数雇佣兵都属于这一类型。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有的康多提埃里本身也是某个小邦国的君主——比如卡罗·马拉泰斯塔和潘多夫·马拉泰斯塔兄弟——但他们对邦国的统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相去甚远，即便与 17—18 世纪德意志诸侯的统治也不能比拟。确切地讲，他们仅仅是邦国的领主，并没

^① Janice E. 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State-Building and Extraterritori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9.

有在邦国招募常备军的权力。所以，我们将这些康多提埃里招募的雇佣兵也归为私募类型。

16世纪以后，即便是私募类型的雇佣兵，往往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管控。近代早期欧洲许多国家都实施了雇佣兵招募授权制度，禁止未获授权的雇主在其境内招募雇佣兵。在对私募雇佣兵的管控方面，瑞士当局的介入是最深的。瑞士不仅实行了雇佣兵招募授权制度，而且联邦议会和州政府还过问雇佣兵的薪酬标准、服务期限等具体问题。另外，瑞士当局始终保留着在需要时召回雇佣兵的权力，瑞士雇佣兵在海外效力期间仍受瑞士的司法管辖，政府还常常出面帮雇佣兵讨薪。

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盛行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现象，而是经济、政治、社会及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那么，雇佣兵盛行对当时欧洲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一，雇佣兵盛行最直接的影响是扩大了欧洲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对当时欧洲多数国家而言，财政资源不足是扩充军队最主要的障碍，雇佣兵的存在使各国在战争中可以投入远超其财力所能供养的军队。雇佣兵打仗只是为了报酬，如果报酬不能按时发放，他们便会肆意危害周围的百姓，甚至发动兵变。一旦战事停止，失去工作机会的雇佣兵便可能成为以抢劫、勒索与绑架为生的武装团伙。

第二，在特定情况下，雇佣兵对国家政治体制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凭借输出雇佣兵获得的巨额利润，18世纪的黑森-卡塞尔邦伯逐步将议会变成顺从的工具，最终形成了“绝对主义”的政治体制。在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则通过限制发展本

国陆军、在陆战中依靠雇佣兵的政策防止君主扩张权力，最终形成了君主立宪政体。^①

第三，雇佣兵盛行不仅是转型时期欧洲社会变革的结果与表征，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变革不断深化的因素之一。比如，以“伙伴关系”为特征的自由军团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西欧封建制松动的结果，其活动也推动了封建社会秩序的瓦解。再如，把雇佣兵当做一门生意来经营的军事承包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一种经营特殊商品的资本主义企业家。

第四，雇佣兵盛行加强了欧洲各地区之间的联结。在那个经贸关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时代，雇佣兵是把欧洲各地联为一体的重要纽带。甚至可以说，雇佣兵市场是最早的欧洲共同市场。雇佣兵的活动促进了人员、资金、信息、技术、制度、观念及习俗的流动与传播。雇佣兵在各国间的大规模流动，不仅加速了军事技术、作战方式等在欧洲范围的传播，而且加强了欧洲各地区之间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

第五，作为一种重要的移民方式，雇佣兵的跨国流动客观上起到了调节各地区人口密度不平衡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某些地区人口增长过快造成的矛盾。近代早期有些欧洲国家甚至将输出雇佣兵作为改善国内治安的一项手段。例如，16—17世纪苏格兰枢密院曾多次发布强制社会闲散人员去国外充当雇佣兵的命令，对改善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18世纪黑森-卡

^① 详见许二斌、王乙竹《去常备军之传统观念与17世纪英国陆军大遣散》，《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4期。

塞尔的社会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显得更为稳定，也与输出雇佣兵有关。

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兵的国际公约。迄今为止，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非洲统一组织等机构通过了不下100项谴责雇佣兵活动的决议。但雇佣兵的活动并未根绝。据媒体报道，在2022年爆发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了大量雇佣兵。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雇佣兵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种受到普遍谴责的非法事物。然而，对于历史上的雇佣兵，我们还是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客观评价，不能以现今的法律准则和道德观念评判历史上的事物。

附录一 白色军团与蒙特费拉特侯爵的协议*

(1361年11月22日)

作为蒙特费拉特侯爵和帝国代理人 (Imperial vicar)^①，我约翰向下列尊贵的人士承诺：现停留于里瓦罗洛 (Rivarolo) 的英格兰与德意志大军团 (Great Society of English and Germans) 首领阿尔伯特·思特兹勋爵，上述军团的小头目安德烈亚·德·贝尔蒙特、伊瓦尼·德·哈克德、吉勒莫·夸特里顿、罗比诺·德·品哥、吉勒莫·达拉斯、吉勒莫·佛里菲特、伊瓦尼·斯托切兰德、亚当·斯科托、吉勒莫·博森、艾奥哈尼·巴克希诺、罗伯特·德·索尔波罗、托马斯·德·博蒙特，上述军团中的埃及诺·德·海顿、托马斯·德·比斯顿、艾奥哈尼·博尔格雷、托马斯·利德雷、吉勒莫·科尔科比，以及该军团中的其余每一个人。直至明年7月以前，我不会协助、商讨或支持与上述军团敌对的行为。相反，我将视其为亲爱的、可靠的朋友。

* 译自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White Company and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in William Ca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pp. 349-350.

① 帝国代理人是代表皇帝管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某一个王国的君主。

我承诺，他们作为我的朋友，可以在我领地内任何地方花钱购买他们所需的食物、日用品、饮料及其他物资。

我承诺，他们作为我亲爱的朋友，可以在我的领地逗留或离开，只要他们来的人数不要过多，并持有我给他们的许可文书。换言之，在我的领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安全地与我的臣民交往和交易。

我承诺，任何想要加入上述军团的我的敌人，如果提出请求，我将允许他们不受阻碍地从我的领地上过境，条件是 they 要跟别人一样受上述军团与我之间的合同之约束。不过，对于兰道伯爵和意大利其他叛国者，以及在我统治下流亡的人，我不会准许其通过我的领地。我希望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叛徒和流亡者对待。

我承诺，在各种情况下，我都将给予上述军团我的权威、建议、帮助和恩惠，只要他们不与我的臣民或宣誓效忠于我的人作对。唯一例外的是，尽管我知晓该军团不反对我的侄子萨伏伊伯爵及其领地与臣民的立场，但我自己对萨伏伊伯爵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自由。

我承诺，对于上述全部事项，我都将严格地、诚信地遵守，直至前面提到的日期为止。

我们，即上述军团首领阿尔伯特·思特兹骑士，军团小头目安德烈亚·德·贝尔蒙特、伊瓦尼·德·哈克德、吉勒莫·夸特里顿、罗比诺·德·品哥、吉勒莫·达拉斯、吉勒莫·佛里菲特、伊瓦尼·斯托切兰德、亚当·斯科托、吉勒莫·博森、艾奥

哈尼·巴克希诺、罗伯托·德·索尔波罗、托马斯·德·博蒙特，以及埃及诺·德·海顿、托马斯·德·比斯顿、艾奥哈尼·博尔格雷、托马斯·利德雷、吉勒莫·科尔科比，和上述英格兰与德意志大军团的所有伙伴，以及该军团现在的和未来加入的所有成员，对前面提到的身为蒙特费拉特侯爵和帝国代理人的杰出高贵的君主约翰承诺：在明年7月以前，我们不会与他为敌，不会侵犯他的荣耀，不会与他的任何领地、城市、要塞和臣民作对，我们不会与热那亚总督及热那亚城市公社为敌，对于侯爵的臣民以及与他结盟的人，我们不会集体地或个别地、公开地或秘密地施加伤害，我们不会效力于侯爵的任何敌人，如果我们得知有任何人谋划或商议有损于上述侯爵、总督及其臣民的事，我们将告知侯爵和总督，并且尽可能与那些人保持距离。

我们承诺，我们当中的全部或一部分人停留在蒙特费拉特侯爵及其臣民的任一领地、城市或要塞时，我们将忠实地保卫这些地方不受任何人侵犯。

我们承诺，如果该侯爵要求我们作战，或驱赶驻扎在他拥有或占有的、或将来拥有的任何领土与要塞内的敌人，并且上述地点具备相当的武备条件，我们将按照侯爵的要求与任何敌人作战，忠实地为他效力。

我们承诺，上述侯爵的士兵，他杰出的亲属布伦瑞克公爵奥托的士兵，热那亚队长的士兵，侯爵与热那亚总督所有的骑士、贵族、官员及臣民，当他们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将尊敬他们，保卫他们，像对待我们主人的士兵以及我们自己的兄弟朋友一样，友好地对待他们。

上述侯爵、奥托公爵与热那亚队长，以及他们的全部骑士、官员和臣民，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前往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待在那里或离开，可以与他们交往，可以像我们亲爱的兄弟朋友一样，自由、安全地用他们的货物、马匹及日用品与我们交易。

我们承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完全履行保卫侯爵、总督及其臣民的职责。为此目的，我们将提供强而有力的帮助和建议。

对于前述侯爵和总督的臣民，我们不会使用暴力。

然而，以上承诺不包含我们与来到伦巴德的其他英格兰军团或英王的臣民作战，除非他们效力于上述侯爵的敌人。

我们承诺，忠实诚信地遵守以上全部承诺，直至前面提到的日期为止。

1361年11月22日签订于里瓦罗洛

附录二 瑞士雇佣兵合同*

(法国驻瑞士大使与楚尔-劳本、舍恩 [Schoen])

两名队长关于招募两个连队的合同，1567年

7月9日签订于索洛图恩)

第一条 连队全部由 300 名瑞士人组成，不得以其他国家的人冒充，否则将革除队长的职务。在这 300 人中要有 10% 即 30 人配备胸甲，另外有 30 人配备火枪。

第二条 按照每人 3 埃居的标准，(法国)国王每月为这 300 人支付 900 埃居或者等值的其他货币，按每埃居等于 40 苏或 48 苏的比率计算。此外，每名火枪手可以额外得到 15 苏的月薪。队长将另外拿到相当于全连月薪总数 20% 的资金，以便他付给中尉和掌旗手。

第三条 在连队执行双倍岗哨任务时，他们将额外领取 303 埃居加 40 苏。300 人的月薪总数达到 1 450 埃居。队长们承诺，在国王委派的检查人员每次检阅清点时，连队都能保持满编的 300 人。

* 译自 "Capitulation de la compagnie de Zur-Lauben & de Schoen au régiment Suisse de Pfiffer", dans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4, pp. 540-543。

第四条 前述队长们不得克扣任何士兵的军饷以中饱私囊。他们也不得盲目地招募士兵，不得在检阅时让同一个士兵走过去两次，不得提供不能服役、不适宜作战的士兵，否则将受到惩处……^①得到国王私下的关怀，效力于国王陛下并置身于战争委员会。如果前述队长们被发现有这样的过错，或者他们支持这样的行为，国王可以将其革职，并且依据1553年颁布的《圣·让法令》进行惩处。

第五条 前述队长有责任在出勤日亲自去生病的士兵那里，以避免各种欺骗。生病的士兵自己不能决定是否应出勤，前述队长通过法官或该士兵的长官认证的文件来掌握情况，以便了解真正应当休息者的数目。

第六条 前述队长发誓，在国王陛下要求的各种事务中忠诚地为国王陛下效力，甚至不顾自己的愿望，但有所保留的是，不违背他们对自己的领主、长官、盟友的义务和条约规定的义务。

第七条 没有国王的同意他们不得终止为国王服务。如果队长或士兵在没有取得国王的许可或通行证的情况下离开，他们在遇到骚扰或损害时不能以任何方式向国王申诉，也不能要求赔偿。

第八条 为了遵守以上条款，国王陛下允诺并保证向队长支付前述1450埃居或等值的其他货币或保证金。上述条款已经在队长面前陈述清楚并且已经被理解，他们不能提出任何与此相悖的主张，也不能对这些条款有任何抱怨。

^① 原文此处有缺失。

第九条 当连队的人数达不到 300 时，根据惯例，将根据短缺的人数扣减军饷。

第十条 为了帮助队长在新招募的团中保持良好的纪律与秩序，将会给法官和其他司法官员支付相应的报酬，报酬的标准参照以前招募的部队，不增加也不减少；只需将上述官员的人数登记在一个特定的名册即可。假设上述法官和纠察人员玩忽职守，或者不能履行维持公正司法的职责，可以革除他们的职位或加以惩处，可以用能够履行这一职责并能让国王满意的人取代他们。

第十一条 总纠察和其他当值人员都不得向卖酒食的随军小贩、厨师与随军商人勒索钱财，只能依靠自己每月的军饷生活。

第十二条 上述队长将在今年 7 月 21 日收到军饷。

以上是关于每个连队的条件……法国大使支付给每位队长 300 埃居以保证他招募 300 人。

附录三 为尼古拉斯·厄米上校统率的 瑞士雇佣兵团制订的誓言*

(1552年11月15日)

你们全体以及你们当中的每个人宣誓，将以全部荣誉和忠诚为法国国王效力，你们将长期在各位队长带领下为法王陛下服务。在被遣散以前，你们保证不经过队长同意不会离开部队，尤其是在没有事先取得通行证的情况下不离开部队。而且你们每个人宣誓将忠实地捍卫你们队长的旗帜，在有紧急情况或在战斗时每个人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了杀敌不惜牺牲身体甚至性命，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如果有一个或多个人因惧怕危险而试图当逃兵，你们应当阻止他或他们。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应当像对待战斗中的逃兵一样将其斩杀，你们事后不会受到追查与惩罚。

掌旗手们宣誓，在当前招募的部队服务期间，直至队长发出遣散命令之前，要忠诚地捍卫军旗。在一切必要情况下以及在战

* 译自“Formule du serment ordonné pour le régiment Suisse du colonel Nicolas Irmi de Bâle le 15 novembre 1552 au service de la France”，dans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4, pp. 530-534。

斗中，不惜抛弃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也要让军旗展开，至死方休。

任何人不损害或冒犯修道院、教堂、神职人员、妇女、儿童、老人、磨坊以及面包房的烤炉，否则将被处死或剥夺财产，并且要支付赔偿受害者所需要的费用。

在本次出征期间我们团里发生意见不同或争吵时，各人应毫不拖延地将他的主张提交到部队的司法人员面前。

任何人不得嘲笑或侮辱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不得当众取笑别人在斋戒日吃荤，以便更好地保持友爱和团结。

每个人还要注意不亵渎神，不过度酗酒；如果谁被发现有这些行为，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在礼拜六或节庆日前一天以及斋戒日，无论白天或晚上都不得赌博。不在公墓里赌博，不在站岗放哨时赌博。

任何人不粗暴对待随军商贩，要公道地付钱给他们。强行买卖或买东西不付钱者，将根据其过错受到相应惩罚。

不参与也不煽动他人参与为了反抗队长进行的聚集，否则将被处死。

每个人都应按照职责大小服从自己的队长、法官、纠察官、军士、长枪兵统领、戟兵统领、火枪兵统领及其他军官。当纠察官、法官以及他们的助手抓到犯错的人时，他们有权采取各种方法将其拘押，这是他们加入时发的誓言所赋予的责任，如此方能使恶行受到惩罚。

每个人在站岗放哨时应服从军士的命令，应保密哨兵的口令。为了履行好哨兵的职责，应高度集中注意力，直到队长或军士安排换岗前不离开哨位。

不得因为他们做出的判决或自身遭受的监禁而伤害纠察官、法官、参与审判的军官以及这些人的助手。不得因为诉讼案件殴斗、憎恨、指责或辱骂上述人员。

你们不得在乡村或庄稼地里放牧各种马、骡、牛，应当在正常的牧场及这些牲畜造成破坏最少的地方放牧。

任何人不得砍伐各种果树，也不在田地和花园砍伐，不破坏篱笆和围墙，不破坏花园，不给葡萄园造成损失，不弄坏或拿走翻越围栏用的梯子。

任何人不得偷窃或抢掠田地里的大麦、黑麦、燕麦和水果，无论它们属于家庭还是农场，也无论其数量多少。确实想在公共市场上购买上述物资，应支付公道合理的价钱，以避免一切抱怨。

屠夫不可以在军营里宰杀羊、牛、马等各种动物，而应当在能比较方便地找到水的地方进行宰杀，以便产生的内脏等各种污物可以被水冲走。无法找到水源时，应将屠宰产生的污物掩埋。

住在房屋里或在宿营地都应保持清洁的生活，把一切臭味和垃圾拒之门外，以使大家保持最好的健康状态。

队长们一致保证，在完成巡逻任务以后不站岗时，应该留在宿营地或住所，不得上街。没有司务长的命令不要住在客栈里。杜绝每个人大声喧哗和歌唱，无论白天或晚上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不得在军营放枪，违反者将受到惩处。

任何人不得抢占别人的宿营地，不得擦去房屋或农庄上的宿营地标记。不得占据司务长指定给掌旗手的、挂有旗帜的宿营地，违反者将被剥夺军饷。

附录四 英国与黑森-卡塞尔邦伯的条约*

(1776年1月15日签订于卡塞尔)

不列颠国王陛下渴望雇佣最尊贵的黑森-卡塞尔邦伯的1.2万人的部队。对国王陛下充满仰慕之情的黑森-卡塞尔邦伯只想证明他对国王陛下的善意。为了达成这一联盟，国王陛下已经派遣威廉·福西特上校作为全权代表抵达卡塞尔。为了同样的目标，最尊贵的邦伯任命他的国务大臣、陆军中将、骑士团成员马丁·厄内斯特·德·施里芬男爵为他这一方的全权代表。双方同意，大不列颠和黑森以前签订的条约将作为当前条约的基础，应尽可能采用其中适合于当前环境的条款，对于需要做出不同规定的内容应通过新的条款加以确定；凡是没有另做规定的内容，都应视为继续具有完全的效力；对于本条约及以前的条约都没有规定的事项，应当像上一场战争期间或战后双方在同类情况下所采取的做法，本着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加以解决。

第一条 通过本条约，英王陛下与最尊贵的黑森-卡塞尔邦

* 译自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Landgrave of Hesse Cassel,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p. 41-46。

伯以及各自的继任者和后代，将形成紧密的友好关系以及真诚、坚定、持续的联盟，双方都应把对方的利益视作自己的利益，应诚信地尽最大努力保护对方的利益，共同努力防止和避免一切麻烦与损失。

第二条 为此目的，双方同意，以前双方所有条约的主体内容将被视为通过本条约得到更新和确认，其中所有条款内容如同一字不改地插入本条约一样具有效力，只有那些在本条约中另做不同规定的条款除外。

第三条 将服务于英王陛下的 1.2 万人的黑森部队，由 4 个掷弹兵营（每营 4 个连）、15 个步兵营（每营 5 个连）和 2 个追击兵连组成，配备将军和其他必要的军官。部队应该配有全套武器装备和帐篷及所有必要的服装。部队要尽可能达到最好的状态，只能包括适于服役的人员，人员是否适于服役要得到英王陛下委派的代表认可。以往在签约日期与召集部队的日期之间通常会有间隔，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时间刻不容缓，本条约签字当日就是召集部队的时间。3 个营的掷弹兵、6 个营的步兵和 1 个连的追击兵，在 2 月 14 日应可以在英王陛下全权代表面前接受检阅，次日，即 2 月 15 日，开拔前往登船地点。如有可能，余下部队应在四个星期后做好准备，以同样方式开拔。

除非作战需要，该部队不应拆分使用，即使拆分，亦应在最尊贵的邦伯信任的将领指挥下；如与作战计划无冲突，拆分出的第二支部队也应派往第一支部队相同的地点。

第四条 该部队的每个营都应配备两门野战炮，并需配备相应的军官、炮手及其他人员。如国王陛下认为必要，还应给野战

炮配备后勤马车队。

第五条 为了补偿最尊贵的邦伯给上述 1.2 万人的军团提供装备的开销，大不列颠国王陛下承诺，将以每名步兵 30 克朗的标准向最尊贵的邦伯支付招募费，如果部队中有追击兵和炮兵的话，也执行同样的标准。与双方以前的合作一样，费用的总额将根据该部队的实际组成人数来确定。

其中的 18 万克朗（汇率按照下一条款的规定计算）招募费应在 2 月 10 日支付，剩余款项应在该部队的第二批兵员开拔时支付。

第六条 以前的条约都规定了有效年限，但目前英王陛下选择以他需要该部队服务的时间为合同有效期。为此，陛下同意：在条约签订之日至条约失效之日支付双倍津贴，即该 1.2 万人的部队津贴总额为每年 45 万克朗；每克朗等于 53 荷兰索尔或英国货币 40 先令 9 便士 3 法寻；该部队由英国支付军饷期间，津贴将以此为基础持续发放。如果要停止津贴，英王陛下应提前 12 个月（或一整年）通知最尊贵的邦伯；在部队返回并重新进入黑森境内以前，国王陛下不会发出停止津贴的通知。在部队重新回到黑森境内以后，国王陛下将继续支付当月剩余天数的军饷；四年以后，如果届时部队还没有被送回，也没有商定好下一个服务期限，最尊贵的邦伯保留召回该部队的权力。

第七条 在军饷与福利方面，无论是日常军饷还是额外福利津贴，上述部队都将按照英国部队的标准对待；国王陛下的战争部将毫不拖延地把部队的军饷和津贴如数交付给最尊贵的邦伯的战争部。考虑到如果没有额外的经费，最尊贵的邦伯将无法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让该部队做好出发准备，第一批出发的部队的军饷与福利将从2月1日算起。第二批出发的部队的军饷与福利将从他们出发前七天开始算起。上述费用应不折不扣地支付给黑森的战争部，以便按照将会专门制订的方法进行发放。上述费用中的2万英镑将立即预付给黑森方面。

第八条 倘若因为海上事故或其他原因，致使该部队中任何一个团或连队不幸遭到完全的或部分的毁灭，或者火炮等装备被敌军掳去或丢失在海里，英王陛下将赔付必要的新兵费用和上述火炮的价款，以便尽快重新配备火炮并使上述团或连队恢复原状。上述补充新兵事宜应按照1702年条约第五条的规定执行，以使部队总是保持在出发时的状态，并完好地返回黑森。每年补充的新兵需要经过训练并且装备齐全，应按照英王陛下指定的时间在登船地点移交给英国代表。

第九条 国王陛下可在欧洲任何他认为合适的陆地上使用该部队，但在全球其他地方，该部队只能被部署在北美大陆。该部队不应在海上服役，他们不受任何限制地享有与英国军队相同的工资和福利。

第十条 倘若最尊贵的邦伯在他的领地内受到攻击或骚扰，英王陛下承诺将尽全力予以支援，直至邦伯获得彻底的安全和公正的赔偿。最尊贵的邦伯承诺，若英王陛下在他的王国、选帝侯领地、海外领土、省或城镇受到攻击或骚扰，邦伯也应给予全力支援，直至国王陛下取得良好且占优势的和平。

第十一条 为使联盟更加完善，并使缔约双方对于根据本条约可期望获得支援的确定性不必怀疑，双方明确同意，为了判断

将来的具体情况是否适用于本联盟，以及是否提供条约规定的支援，只需满足以下条件：缔约任何一方实际上遭受武力进攻，并且他自己没有首先对该进攻者使用公开的武力。

第十二条 生病的黑森部队军人，应由黑森自己的内外科医生或根据黑森部队统帅为此目的指派的人员照料；英王陛下给予自己军队的一切都应配备给他们。

第十三条 所有的黑森逃兵，无论在国王陛下所属的领土上任何地方被发现，都应当诚信地交出来。最重要的是任何黑森人未经其君主的同意都不得在美洲定居。

第十四条 该军团所有人员与物资的运输费用，都由英王陛下承担；鉴于战场的距离，该部队的所有人员都不需要支付信函的邮资。

第十五条 条约将由双方高层批准，并尽快换约。

分别作为英王陛下的全权代表和最尊贵的黑森邦伯的全权代表，以下签署人已当面签订本条约，并已盖上各自的印章。

1776年1月15日于卡塞尔

威廉·福西特 马丁·厄内斯特·德·施里芬

附录五 英国与布伦瑞克公爵的条约*

(1776年1月9日签订于布伦瑞克)

现告知各相关人员，大不列颠国王陛下决定向最尊贵的布伦瑞克和鲁伦堡公爵阁下提议，公爵阁下让出其军队的一部分为大不列颠王国服务，最尊贵的公爵阁下热情、欣然地同意国王陛下的提议。为此，签约双方已经下令给各自的大臣；英王陛下的代表是卫队队长威廉·福西特上校，最尊贵的布伦瑞克和鲁伦堡公爵的代表是枢密院顾问德·佛容斯；双方代表在互相出示授权证明以后达成以下条款：

第一条 最尊贵的布伦瑞克和鲁伦堡公爵同意向英王陛下提供一支3964人组成的步兵，该部队完全交由国王陛下在欧洲和美洲使用。

第二条 最尊贵的布伦瑞克和鲁伦堡公爵还同意向英王陛下提供一支336人组成的轻骑兵部队。在英王陛下没有为这支部队提供马匹时，以上轻骑兵将作为步兵服役，如需要他们在马上作

* 译自“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Reigning Duke of Brunswick”,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pp. 33-37。

战，国王陛下将自己承担马匹的费用。

第三条 除轻骑兵的马匹外，最尊贵的布伦瑞克和鲁伦堡公爵将给这两支部队提供全部装备。双方代表同意，该部队的第一批兵员 2 282 人，最迟将于 2 月 15 日做好出发准备，以便他们在 2 月 25 日之前抵达登船地点。至于第二批兵员 2 018 人，最尊贵的公爵保证他们最迟将于 3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拔。这两批兵员将在登船地点接受国王陛下委派的代表检阅。为预防开拔过程中的逃兵现象，英王陛下将在他作为选帝侯的汉诺威领地内发布明确的命令，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拦截该部队的逃兵，并毫不拖延地把他们送到登船地点，让他们回到自己所在的团。英王陛下将给各地的总督、军队统帅、地区行政官等人员下达同样明确的指令，要求像对待他自己的汉诺威部队一样执行关于该部队的命令。

第四条 这支步兵和轻骑兵部队将由五个团外加两个营组成，详见本条约附件中的清单；清单上的军官仆人也要像士兵一样配备武器和必要的装备，如果形势需要，他们要像士兵一样参加战斗，并将领取与士兵同样的报酬。

第五条 最尊贵的公爵承诺每年为该部队补充必要的新兵；在提前四个月通知以后这些新兵将被交给英王陛下的代表；他们必须经过训练，并且装备齐全。上述新兵将在指定时间到达登船地点，具体时间，双方将在每场战役前商定。

第六条 无论为了服务于国王陛下，还是为了使部队保持完好，都要求负责指挥的军官和副官必须是专门人才，最尊贵的公爵将慎重挑选相关人员。

第七条 最尊贵的公爵确保该部队处于最佳状态，只有适于作战的人才能参加该部队，兵员是否适于作战需经英王陛下的代表认可。

第八条 该部队要配备帐篷和所有必要设备。

第九条 国王将按照英国军队的标准给予该部队常规军饷和额外报酬，以及粮草与给养等；最尊贵的公爵承诺让该部队不折不扣地享有英王陛下给予的所有报酬；与国王陛下的军队一样，该部队的伤病员将由国王陛下支付费用在医院得到照料；如伤者无法继续服役，应由国王陛下出资送回欧洲，并在易北河或韦斯河的一个港口登陆；至于轻骑兵部队，当他们不骑马时，将跟随英国的轻骑兵行动；但如果他们骑马作战，从当天起就应享有和国王陛下的轻骑兵同样的待遇，包括日常军饷和额外报酬。

第十条 以每名步兵或不骑马的骑兵 30 克朗的标准向最尊贵的公爵阁下支付招募费。1 克朗相当于 53 荷兰索尔或者 40 先令 9 便士 3 法寻。招募费的三分之一应在条约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另外三分之二应在签约后两个月内支付。不过，在国王陛下的代表检阅时，每出现一名非疾病原因缺勤的兵员就扣留 30 克朗的招募费；一旦缺勤兵员返回其部队，扣留的招募费将被立即支付。

第十一条 按照惯例，三个受伤的人将被视为等于一个死亡的人；每死亡一个人将按照其招募费的金额进行赔偿。部队中的任何团、营或连队，如果在野战、攻城中或由于严重的传染病导致非比寻常的人员损失，或在前往美洲途中遇到船只失事，英王陛下将以最公正的方式对其人员损失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将是招募相应数量新兵的费用，以使受损部队恢复原状。

第十二条 最尊贵的公爵阁下保留空缺军官岗位的提名权，保留司法管辖权。英王陛下将给该部队所在的军队最高指挥官下达指令，不要求该部队执行超出常规的任务，或者与他们在全军中的人数比例不相称的任务。该部队将向英王陛下宣誓效忠，但这种效忠不应违背他们此前向自己君主做过的宣誓。

第十三条 为了补偿仓猝间为部队提供装备而产生的额外费用，英王陛下同意在该部队出发前就支付两个月的军饷；在部队离开布伦瑞克的军营向目的地行军途中，所有费用都由英王陛下承担。

第十四条 英王陛下给予最尊贵的公爵阁下一项年度津贴，其计算方法如下：该津贴自本条约签字之日起算，在部队领取英国的军饷期间实行单倍津贴，即每年 645 万德意志克朗；在部队停止领取英国的军饷以后实行双倍津贴，即每年 129 万德意志克朗。该双倍津贴将持续至上述部队返回最尊贵的公爵的领地以后的两年。

第十五条 条约将由双方高层批准，并尽快换约。

以上条款由大不列颠国王陛下委派的全权大臣为一方，最尊贵的布伦瑞克及鲁伦堡公爵阁下委派的全权大臣为另一方，双方达成一致并签署。

1776 年 1 月 9 日于布伦瑞克

威廉·福西特 德·佛容斯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史料

(一) 公文、档案、雇佣兵合同、军队条例等

1. "Adels diploma Herrn Sebastian Schertlin", in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Lebensbeschreibung des berühmtenRitters Sebastian Scherflins von Burtenbach*, Frankfurt and Leipzig: Beylagen, 1777.
2. *Articles of Militarie Discipline*, Edinburgh: Lames Bryson, 1639.
3. Brown, Hume,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 Vol. V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905.
4. Brown, Hume,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 Vol. I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900.
5. Brown, Hume,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 Vol. V,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904.
6. Brown, Hume,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 Vol. VI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906.
7. Burton, John Hill,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Vol. I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878.

8. "Capitulation de la compagnie de Zur-Lauben & de Schoen au regiment Suisse de Pfiffer", dans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Paris: Desant & Saillant, 1751, Tome 4.
9. Charles I, *A Proclamation for the Calling Home of all such His Majesties Subjeds as Are Now Employed either by Sea, or Land, in the Services of the Emperour, the King of Spaine, or the Archduches*, Printed by I. L. and W. T. for Bonnam Norton and John Bill, 1625.
10. "Commission from Gustavus Adolphus to Donald Maky with Conditions of Service and Rates of Pay, dated June 17, 1629", in 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11. *Emperour, the King of Spaine, or the Archduches*, Printed by I. L. and W. T. for Bonnam Norton and John Bill, 1625.
12. "Formule du serment ordonné pour le régiment Suisse du colonel Nicolas Irmi de Bâle le 15 novembre 1552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dans M. L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Tome 4.
13. Jefferson, Thoma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14. "Letter of Agreement, dated 4th March 1626, Between Captain David Lermont on Behalf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Prince Ernest, Prince and Count of Mansfelt, &c., General, &c., and the Right Honorable and Potent Lord James, Lord Occultrie, in the Name and Behalf of the Right Honorable Sir Donald Maky, Knight of Stranaer'", in 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15. Masson, David,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Vol. XI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895.

16. Masson, David,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Vol. XII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896.
17. Masson, David,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Vol. IX,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889.
18. Masson, David,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Second Series, Vol. 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899.
19. Masson, David, ed., *The Register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Scotland*, Vol. I, Edinburgh: H. M. General Register House, 1881.
20. Parliament of Scotland, *For Punishment of the Strang and Yde Beggars and Rleif of the Pure and Impotent*. (<http://www.rps.ac.uk/trans/1579/10/27>)
21. *Reglemenl vor Die Hessische Infanterie*, Cassell: 1767.
22. "Tables of Monthly Pay of Officers and Men of Lord Reay's Regiment when in the Service of Gustavus Adolphus, King of Sweden", in 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23. *The Acts of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 Vol. V, Printed by Authority of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 1870.
24.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White Company and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in William Caferro,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Hereditary Prince of Hesse Cassel", Reigning Count of Hanau, &c",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London: T. Gillet, 1802.
26.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Landgrave of Hesse Cassel",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London: T. Gillet, 1802.
27.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Anspach", in *The Parlicamentary Register*, Vol. VII, London: John Almon, 1777.

28. "Translation of a Tr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Prince of Waldeck",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London: T. Gillet, 1802.
29. "Translation of a Teaty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Reigning Duke of Brunswick",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London: T. Gillet, 1802.
30. "Trans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with the Landgrave of Hesse Cassel, for 9000 Men, to be put into the Service of His Majesty and the States",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III, London: T. Gillet, 1802.
31. "Translation of the ulterior Convention between His Majesty and the Hereditary Prince of Hesse", in *The Parliamentary Register*, Vol. VII, London: John Almon, 1777.

(二) 书信

1. "Der Erbprinz von Hessen-Cassel an Künig Georg III (Hanau, 19, Aoüt 1775)", in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Berlin: Verlag von Fanz Duncker, 1864.
2. Donne, W. Bodham,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with Lord North from 1768 to 1783*, London: John Murray, 1867.
3. "Generall Major Monroe His Letter to Generall Lesler", in *A Trve Rel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cottish Armie Now in Ireland, By three Letters*,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Bartlet, 1642.
4. "Letter from Count von Rantzow to Sir Donald Mackay, Dated March 28, 1626", in 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5. "Letter from Danish Commissary-General to Sir Donald Mackay, Dated March 27, 1627", in John Mackay,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6. "Letter from King Charles I. to Sir Donald Mackay, Dated April 22, 1626", in John Mackay,

-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7. "Lettre du landgrave de Hesse au comandant de ses troupes en Amérique", in Friedrich Kapp,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Berlin: Verlag von Fanz Duncker, 1864.
 8. *Letters of King James VI and 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9. *Letter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Vol. II, London: Henry Colburn Publisher, 1848.
 10. *Letters to King James the Sixth from the Queen, Prince Henry and Her Husband Frederick King of Bohemia, and from Their Son Prince Frederick Henry*, Printed at Edinburgh, 1835.
 11. Friederich Adolphus Riedesel, "From General Riedesel to His Wife", in *Letters and Journals Relating to the Wa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Capture of the German Troops at Saratoga*, translated by William L. Stone, Albany: Joel Munsell, 1867.
 12. Riedesel. Friederich Adolphus. *Memoirs, and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Major General Riedesel, during his Residence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William L. Stone, Albany: J. Munsell, 1868.
 13. *Sebastian Schertin von Burtenbach und seine an die Stadl Augsburg geschriebenen Briefe*, Augsburg: Verlag der v. Jenisch und Stage'schen Buchhandlung, 1832.
 14. "The Earle of Antrims Letter to Generall Major Monroe", in *A Trve Rel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cottish Armie Now in Ireland. By three Letters*, London: Printed for IohnBartlet, 1642.
 15. "The Major and Aldermens Letter of London-Derry to Generall Major Monroe", in *A Trve Rel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cottish Armie Now in Ireland, By three Letters*, London: Printed for IohnBartlet, 1642.
 16. Wallenstein, Albrechts von, *Albrechts von Wallenstein, das Herzogs von Friedlanci und Mecklenburg, ungedruckt, eigenhändige vertrauliche Briefe und amtliche Schreiben aus den Jahren 1627 bis 1634*, Berlin: G. Reimer, 1828.

(三) 回忆录与日记

1. Bassompierre, *Journal de ma vie: Mémoires du maréchal de Bassompierre*, Paris: Libraire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1873.
2. Burtenbach,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Lebcesbeschreibung des berührnten Ritters Sebastian Scherllins von Burlenbach: Aus Dessen eigenen und Geschlechts Nachrichten vollständig herausgegeben und mit Anmerkungen und Beylagen versehen*, Frankfurt and Leipzig, 1777.
3. Burtenbach,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Lebensbeschreibung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ebastian Schertlins von Burtenbach (Zweiter Theil), bestehend in Berichtigung Des Tertes im ersten Theil, Erläuterungen und hieher gehörigen Beylagen*, Nürnberg: Verlag Der Christ, Weigel Schneiderischen Kunst und Buchhandlung, 1782.
4. Deux-Ponts, William De, *My Campaigns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Samuel Abbott Green, Boston: J. K. Wiggin and WM. Parsons Lunt, 1868.
5. Döhla, Johann Conrad, *A Hessian Diary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ed by Bruce E. Burgoyn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0.
6. Hodgson, John, *Autobiography of Captain John Hodgson*, Brighous: A. B. Bayes Printer, 1882.
7. Hutchinson, Lucy, *Memoirs of the Life of Colonel Hutchinson Governor of Nottingha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06.
8. Krafft,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Journal of John Charles Philip von Karafft Lieutenant in the Hessian Regiment von Bose, 1776-1784*, translated by Thomas H. Edsall, New York: Printed for Private Distribution, 1888.
9. Monro, Robert, *Monro, His Expedition with the Worthy Scots Regiment (Called Mac-Keyes Regiment)*, London: William Jones, 1637.
10. Napier, Mark, *Memoires of the Marquis of Montrose, 1612-1650*, Edinburgh: Thomas G. Stevenson, 1856.
11. Pontis, De, *Memoirs of the Sieur De Pontis*, London: F. Leach, 1694.

12. Raymond, Thomas, *Autobiography of Thomas Raymond and Memoirs of the Family of Guise of Elmore, Gloucestershire*,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17.
13. Seume, Johann Gottfried, "Mein Leben", in *J. G. Seume's Sämmtliche Werke*, Erster Band, Leipzig: Joh Friedr Hartknoch, 1839.
14. Seume, Johann Gottfried, "Memoir's of a Hessian Conscript: J. G. Seumes Reluctant Voyage to America", translated by Margarete Woelfel,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Vol. 5, No. 4 (October, 1948).
15. *Soldats Suisses au service étranger: Journal d'un sous-lieutenant de cuirassiers F. J. L. Rilliet, souvenirs d'un garde d'honneur F. A. Çramer, mémoires inédits d'un soldat prisonnier en Russie P. L. Mayer*, Genève: A. Jullien Éditeur, 1908.
16. *Soldats Suisses au service étranger: Le vainqueur des Peaux-Rouges de l'Ohio Henry Bouquet, souvenirs des campagnes du lieutenant-colonel Louis Begos, un vaudois à l'armée d' Espagne J. D. Maillefer*, Genève: A. Jullien Éditeur, 1909.
17. Turner, James, *Memoirs of His Own Life and Times (1632-1670)*, Edinburgh: 1829.

第二部分 著作与论文

(一) 中文著作与论文(包括译著)

1. 陈志强:《晚期拜占庭帝国雇佣兵控制权的丧失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
2. [英] E. E. 里奇、C. H. 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高德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侯建新:《关于西欧现代社会转型起始年代的新观点》,《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 4.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5.梁民愫、顾兴斌：《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及价值取向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 6.刘景华：《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 7.[德]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德意志史》第二卷，陆世澄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 8.[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 9.[法] 乔治·杜比：《布汶的星期天：1214年7月27日》，梁爽、田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10.[古希腊] 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019年重印）。
- 11.王勤榕：《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婚姻形态的若干变化》，《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 12.[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 13.许二斌、王乙竹：《去常备军之传统观念与17世纪英国陆军大遣散》，《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4期。
- 14.许二斌：《变动社会中的军事革命：14—17世纪欧洲的军事革新与社会变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15.张广智：《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 16.朱孝远：《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二）西文著作与论文

1. Altorfer-Ong, Stefan, "Exporting Mercenaries, Money, and Mennoites: A Swiss

-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Hague, 1710–1715”, in André Holenstein et al, eds., *The Republican Alternativ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Ambühl, Rémy,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Ransom Cultur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Anderson, Erich B., “Far Western Mercenaries in the East: English Varangian Guardsmen”, *History Magazine* (February, 2015).
 4. Anderson, John, “Contracting for Force: The Effect of Transaction Costs on Mercenary Employment by the Italian City States of the 13th to 15th Centuries”, Ph. D. Thesis, Clemson University, 2007.
 5. Atwood, Rodney,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Avant, Deborah, “From Mercenary to Citizen Armies: Explaining Change in the Practice of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Winter, 2000).
 7. Babeau, Albert, *La vie militaire sous l'ancien regim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et Cie, 1889.
 8. Bartlett, I. Ross, “Scottish Mercenaries in Europe, 1570–1640: A Study in Attitudes and Policie”, *Scottish Tradition*, Vol. 13 (1986).
 9. Bayley, C. C.,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he De Militia of Leonardo Brun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1.
 10. Bert S. Hall,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Black, Jeremy, ed., *European Warfare 1453–1815*,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12. Black, Jeremy, ed., *War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London: UCL Press, 1999.
 13. Blau, Friedrich, *Die Deulschen Landsknechte*, Kettwig: Phaidon Verlag, 1985.
 14. Boehm, Laetitia, “Burgundy and the Empire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the Bol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I, No. 2 (April, 1979).

15. Boutaric, Edgard, *Institutions militaires de la France avant les armées permanentes*, Genève: Mègariotis, 1978.
16. Brockington, William S., "Robert Monro: Professional Soldier, Military Historian and Scotsman", in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eiden; Boston; Koln: Brill, 2001.
17. Browning, Oscar, *The Age of the Condottieri: A Short History of Medieval Italy from 1409–1530*, London: Methuen & Co., 1895.
18. Browning, Oscar, *The Life of Bartolomeo Colleoni, of Anjou and Burgundy*, London: FB & C Ltd., 2015.
19. Brzezinski, Richard, "British Mercenaries in the Baltic, 1560–1683 (1)", *Military Illustrated Past & Present*, No. 4 (December, 1986; January, 1987).
20. Brzezinski, Richard, "British Mercenaries in the Baltic, 1560–1683 (2)", *Military Illustrated Past & Present*, No. 6 (April/May, 1987).
21. Burmester, H. C., "The Recruitment and Use of Mercenaries in Armed Conflic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2, No. 1 (January, 1978).
22. Caferro, William, "Mercenaries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The Costs of Undeclared Warfare in Fourteenth-Century Siena",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Fall, 1994).
23. Caferro, William, *John Hawkwood: An English Mercenary in Fourteenth-Century Ital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 Caferro, William, *Mercenary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Sien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 Clark, George, *War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26. Contamine, Philippe, *Guerre, é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aris: Mouton, 1972.
27. Contamine, Philippe, *War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Michael Jones, Oxford: Basil

- Blackwell Ltd., 1984.
28. Conway, Stephen, "The British Army, 'Military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7, No. 1 (January, 2010).
29. Corvisier, André,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translated by Abigail T. Siddall,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0. Cristini, Luca Stefano, *The Landsknechts: German Militiamen from Late XV and XVI Century*, Zanica: Soldiershop, 2016.
31. Crytzer, Brady J., *Hessians: Mercenaries, Rebels, and The War For British North America*, Yardley: Westholme Publishing, LLC., 2015.
32. Dändliker, Karl, *A Short History of Switzerland*, translated by E. Salisbury,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Lim., 1899.
33. Dändliker, Karl, *Geschichte der Schweiz*, Erster Band, Zürich: Friedrich Schultheß, 1900.
34. Delbrück, Hans,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History*, Volume III translated by Walter J. Renfro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2.
35. Diodorus, Siculus, *The Historical Library of Diodorus the Sicilian in Fifteen Books*, translated by G. Booth, London: W. Taylor, 1721.
36. Dukes, Paul, "The Leslie Family in the Swedish Period (1630-5)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 12 (1982).
37. Dupuy, Trevor N., *The Evolu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 Fairfax: Hero Books, 1984.
38. E. V. K. D., "A Further Note on 'Hessian'", *American speech*, Vol. 18, No. 4 (December, 1943).
39. Eelking, Max von, *Die Deutschen Hülftstruppen im Nordamerikanischen Befreiungskriege, 1776 bis 1783*, Hannover: Helwing'sche Hofbuchhandlung, 1863.
40. Eelking, Max von, *The German Allied Troops in the North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1776-1783*, Albany: Joel Munsell's Sons. Publishers, 1893.

41. Fallon, James A., "Scottish Mercenaries in the Service of Denmark and Sweden, 1626–1632", Ph. D. Thesis, Glasgow University, 1972.
42. Fieffé, Eugène, *Histoire des troupes étrangeres au service de France*, Paris: Librairie Militaire, 1854.
43. Flinn, Michael et al, *Scott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193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4. Fowler, Kenneth, *Medieval Mercenaries*, Volume I: The Great Compan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45. France, John, ed., *Mercenaries and Paid Men: The Mercenary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8.
46. Froissart, John, *Chronicle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offrey Brere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1968.
47. Froissart, John, *The Chronicles of Froissart*, translated by John Bouchier and Lord Berner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4.
48. Frost, Robert I., "Scottish Soldiers, Poland-Lithuania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in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eiden: Brill, 2001.
49. Glozier, Matthew, *Marshal Schomberg 1615–1690 "The Ablest Soldier of His Age": International Soldier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State Armi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5.
50. Glozier, Matthew, *Scottish Soldiers in France in the Reign of the Sun King: Nursery for Men of Honour*,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4.
51. Grant, James, *Memoirs and Adventures of Sir John Hepburn*,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51.
52. Griffith, G. T., *The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53. Grosjean, Alexia, "Scotland: Sweden's Closest Ally?" in Steve Murdoch,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eiden: Brill, 2001.

54. Grosjean, Alexia, "Scots and the Swedish State: Diplomacy, Military Service and Ennoblement 1611–166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8.
55. Hale, John R.,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1450–162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56. Houston, R. A. and I. D. Whyte, "Introduction: Scottish Society in Perspective", in R. A. Houston and I. D. Whyte, eds., *Scottish Societ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57. Howard, Michael,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8. Howat, G. M. D., *Stuart and Cromwelli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Ltd., 1974.
59. Huppert, George, *After the Black Death: A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urope*,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60. Ingrao, Charles,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1. Ingrao, Charles, "Barbarous Stranger': Hessian State and Society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4 (October, 1982).
62. Janin, Hunt with Ursula Carlson, *Mercenar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 Jefferson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3.
63. Jaun, Rudolf,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 Armee: Vom 17. Jahrhundert bis in die Gegenwart*, Zürich: Orell Füessli Verlag, 2019.
64. Jones, George Fenwick, "The Black Hessians: Negroes Recruited by the Hessians in South Carolina and Other Colonies",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 83, No. 4 (October, 1982).
65. Kamen, Henry, *European Society 1500–1700*, Melbourne: Hutchinson & Co., Ltd., 1984.

66. Kapp, Friedrich,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Berlin: Verlag von Fanz Duncker, 1864.
67. Kapp, Friedrich, *Der Soldatenhandel Deutscher Fürsten nach Amerika (1775 bis 1783)*, Berlin: Verlag von Franz Duncker, 1874. (这一版本订正了 1864 年版当中的一些错误, 但是删去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附录。)
68. Kapp, Friedrich, *The Life of Frederick William von Steuben, Major General in the Revolution Army*, New York: Mason Brothers, 1859.
69. Kiernan, V. G., "Foreign Mercenaries and Absolute Monarchy", *Past & Present*, No. 11 (April, 1957).
70. Kurz, Hans Rudolf,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 Armee*, Friedrichsfeld: Huber, 1985.
71. Lacroix, Paul, *L'ancienne France: l'armée depuis le moyen age jusqu'à la revolution*,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Ditod et Cie, 1886.
72. Lanning, Michael Lee, *Mercenaries: Soldiers of Fortune,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oday'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5.
73. Lardner, Dionysius,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B. C. 110 to A. D. 1830*, Philadelphia: Carey & Lea, 1832.
74. Leemann, H., *Abriß der Militär-Statistik der Schweiz*, Bern: L. R. Walthard' Schen Buchhandlung, 1839.
75. Leeson, Peter T. and Ennio E. Piano, "The Golden Age of Mercenarie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October, 2020).
76. Lowell, Edward, *The Hessians and the Other German Auxiliaries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New York: Harpper & Brothers, 1884.
77. Machiavel, Nicholas, "The Art of War", in *The Works of Nicholas Machiavel*, Vol. IV, translated by Ellis Farnsworth, London: T. Davies, 1775.
78. Machiavel, Nicholas, *Nicholas Machiavelli's Prince Also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of Lucca, and The Meansas Duke Valentine us'd to put to death Vitellozzo Vitelli, Oliverotte of*

- Fermo, Paul, and the Duke of Gravina*, London: R. Bishop, 1640.
79. Mackay, John, *An Old Scots Brigade: Being the History of Mackay's Regiment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Royal Scots*,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5.
80. Mallett, Michael and John R. Hale,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 Venice c. 1400 to 16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1. Mallett, Michael,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Barnsley: Pen & Sword Books Ltd., 2009.
82. Manning, Roger B., *Swordsmen: The Martial Ethos in the Three Kingdo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3. Mauch, Christof, "Images of America-Political Myths-Historiography: 'Hessian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merikastudien / American Studies*, Vol. 48, No. 3 (2003).
84. McCormack, John, *One Million Mercenaries: Swiss Soldiers in the Armies of the Word*, London: Leo Cooper, 1993.
85. Millar, Gilbert John, "The Landsknecht: His Recruitment and Organization, With Some Reference to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Military Affairs*, Vol. 35, No. 3 (October, 1971).
86. Millar, Gilbert John, *Tudor Mercenaries and Auxiliaries, 1485-1547*,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0.
87. Miller, James, *Swords for Hire: The Scottish Mercenary*, Edinburgh: Birlinn Limited, 2007.
88. Mockler, Anthony, *Mercenaries*, London: Macdonald and Company Ltd., 1970.
89. Moryson, Fynes, *An Itinerary*, London: J. Beale, 1617.
90. Muntaner, Ramon, *The Catalan Expedition to the East: From the Chronicle of Ramon Muntaner*, translated by Robert D. Hughes, Woodbridge: Tamesis, 2006.
91. Murdoch, Steve, "Scotland, Denmark-Norway and the House of Stuart 1603-1660: A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nalysis",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8.
92. Murdoch, Steve, "The House of Stuart and the Scottish Professional Soldier 1618-1640: A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and Identities", in Bertrand Taithe and Tim Thornton, eds.,

- War: Identities in Conflict 1300–2000*, Thrupp, Stroud,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93. Murdoch, Steve, ed., *Scotland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eiden: Brill, 2001.
94. Murphy, David, *Condottiere 1300–1500: Infamous Medieval Mercenaries*,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7.
95. Oman, Charles,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Volume 2,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8.
96. Oman, Charles,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99.
97. Parker, Geoffre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98. Parker, H. W., *Greek Mercenary Soldi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Ipsus*, Chicago: Ares Publishers, 1981.
99. Parrott, David, *The Business of War: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Military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0. Percy, Sarah, *Mercenaries: The History of a Nor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1. Preston, Richard A. et al., *Men in Arms: A History of Warfare and its Interrelationships with Western Societ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91.
102. Rakove, Jack N., *The Annotated U. S. Constitution an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3. Redlich, Fritz,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4, 1965.
104. Redstone, V. B., "Some Mercenaries of Henry of Lancaster, 1327–1330", *Transactions of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Third Series, Vol. 7 (1913).
105. Richards, John, *Landsknecht Soldier 1486–1560*, Botley: Osprey Publishing, 2002.

106. Romainmotier, May De, *Hisloire militaire de la Suisse et celle des Suisses dans les différens services de l'Europe*, Lausanne: Jean-Pierre Heubachet Comp., 1788.
107. Rosengarten, J. G., "A Defence of the Hessians",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 23, No. 2 (1899).
108. Rosengarten, J. G., "American History from German Archiv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39, No. 162 (April, 1900).
109. Rowlands, Guy, "Foreign Service in the Age of Absolute Monarchy: Louis XIV and His Forces Étrangères", *War in History*, Vol. 17 (2010).
110. Russell, A. G., "The Greek as a Mercenary Soldier", *Greece & Rome*, Vol. 11, No. 33 (May, 1942).
111. Schmidt, H. D., "The Hessian Mercenaries: The Career of a Political Cliché", *History*, Vol. 43 (October, 1958).
112. Schulze, Hagen, *Germany: A New History*, translated by Deborah Lucas Schnei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3. Scott, Tom, *The Swiss and Their Neighbours, 1460–15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4. Seggern, Birgit von, "Der Landsknecht im Spiegel der Renaissancegraphik um 1500–1540", 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Rheinis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onn, 2003.
115. Showalter, Dennis, "Wild Irish Geese: Driven From Homeland by Centuries of English Domination, Irish Soldiers Went to War Under Many Flags", *Military History*, Vol. 64 (September, 2011).
116. Simpson, Grant, ed., *The Scottish Soldier Abroad 1247–1967*,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2.
117. Solon, Paul Douglas, "Charles VII and the Companies D'Ordonnance, 1445–1461: A Study in Medieval Reform", Ph. D.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1970.

118. Spall, Eric, "Foreigners in the Highest Trust: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European Mercenary Officers in the Continental Army", *Early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2014).
119. Stewart, David, *Sketches of the Character, Manner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Highlanders of Scotland with Details of the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Highland Regiments*, Edinburgh: Longman, 1825.
120. Stradling, R. A. *The Spanish Monarchy and Irish Mercenaries: The Wild Geese in Spain, 1618–1668*, Portland: Irish Academic, 1994.
121. Swart, Erik, "From 'Landsknecht' to 'Soldier': The Low German Foot Soldiers of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RSH*, Vol. 51 (2006).
122. Tallett, Frank, "Soldiers in Western Europe, c. 1500–1790", in Erik-Jan Zürcher, ed., *Fighting for a Liv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litary Labour 1500–2000*,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3. Tallett, Frank, *War and Society in Early-Modern Europe, 1495–1715*, London: Routledge, 1992.
124. Taylar, Peter, "Military System and Rural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Hessel-Cassel",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5, No. 3 (Spring, 1992).
125. Taylar, Peter, *Indentured to Liberty: Peasant Life and the Hessian Military State, 1688–18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6. Temple-Leader, John and Giuseppe Marcotti, *Sir John Hawkwood: Story of a Condottiere*, translated by Leader Scott,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89.
127. Thomson, Janice E., "State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Decline of Mercena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4, No. 1 (March, 1990).
128. Thomson, Janice E., *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State-Building and Extraterritorial 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9.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

130. Trundle, Matthew, *Greek Mercenaries: From the Late Archaic Period to Alexander*, Abingdon: Routledge, 2004.
131. Tuetey, Alexandre, *Les écorcheurs sous Charles VII*, Montbéliard: Henri Barbier Imprimeur-Editeur, 1874.
132. Underwood, Matthew, "Jealousies of a Standing Army': The Use of Mercenari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gress's Role in Regulating Private Military Firm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6, No. 1 (2012).
133. Urban, William, *Medieval Mercenaries: The Business of War*, London: Greenhill Books, 2006.
134. Vieusseux, A.,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From the Irruption of The Barbarians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The 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1840.
135. Whyte, I. D., "Early Modern Scotl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 Whittington and I. D. Whyte,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cotl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136. Wilhelmy, Jean-Pierre, *Soldiers for Sale: German "Mercenaries" with the British in Canada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16-1783*. Montreal: Baraka Books, 2011.
137. Wilson, Peter, "The German 'Soldier Trad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 Reassessmen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vember, 1996).
138. Wilson, Peter,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A Sourceboo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39. Wood, John, *A Gener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witzerland*, Edinburgh: Peter Hill, 1799.
140. Wood, Stephen, *The Scottish Soldier: An Illustrated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Scotland's Fighting Men through Two Thousands Years*, Edinburgh: Archive Publications Limit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1987.
141. Yancey, Philip, ed., *The Student Bible with Concordanc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7.

142. Zschokke, Heinrich, *History of Switzerland*, Memphis: General Books LLC, 2012.
143. Zürcher, Erik-Jan, "Le recrutement et l'emploi des militaires en Europe, au Proche-Orient et en Asie, 1500–2000", *Le Mouvement social*, No. 241 (2012).
144. Zur-Lauben, M. Le Baron De, *Histoire militaire des Suisses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Paris: Desant & Saillant, 1751.

第三部分 工具书与网络资源

1. "Frundsberg, Georg vo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98.
2. "Sebastian Schertlin von Burtenbach", https://de.wikipedia.org/wiki/Sebastian_Schertlin_von_Burtenbach.
3. "Sebastian Schertlin: Landsknecht und Kriegsunternehmer", <http://www.kriegsreisende.de/neuzeit/schertlin.htm>.

本书以英法德三个语种的公文、档案、合同、书信、雇佣兵回忆录、日记等史料为基础，对1350—1800年欧洲的雇佣兵问题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深入研究。

以梳理欧洲雇佣兵在中世纪后期重新兴起的历史背景为起点，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法国领土上的自由军团、意大利境内的雇佣兵、近代早期的军事承包人、德意志长矛兵、苏格兰雇佣兵、瑞士雇佣兵、黑森-卡塞尔雇佣兵等具有典型意义的雇佣兵案例。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研究，勾勒出转型时期欧洲雇佣兵发展史的大致脉络。

立足转型时期，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欧洲雇佣兵从兴起到衰落的深层原因，总结了欧洲著名雇佣兵输入地和输出地的特征，归纳了欧洲雇佣兵的主要类型，并探讨了雇佣兵在转型时期欧洲社会变革中的影响。



<https://www.cp.com.cn>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ISBN 978-7-100-23431-3



9 787100 234313 >

定价：65.00 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欧洲雇佣兵研究 1350-1800年

页数=316

SS号=15625663

时间=2026-01-08 16:41:54